

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

哲學觀點摘錄

入哲學批判部



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

哲学观点摘录

1962年9月1日

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

著作目录

說明：本目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編这本資料时已經閱讀过的书目，第二部分是尙未閱讀的目录，第三部分是从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引文中查出来的书目。

2672/33

4

目 录

一、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著作书目	1
二、伯恩施坦哲学观点摘要	9
1. 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康德主义	11
2. 攻击唯物辩证法	18
3. 宣传唯心论反对唯物论	21
4. 宣传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	22
5. 在阶级、阶级斗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24
6.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传社会改良主义	32
7.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科学社会主义	36
三、考茨基哲学观点摘要	45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言论	47
2. 在社会和家庭等问题上的观点	51
3. 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等问题上的言论	57
4. 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谬论	68
5. 在战争和普遍裁军问题上的观点	70
6.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71
7. 宣扬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	75
8. 诽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攻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	84
四、托洛斯基哲学观点摘要	91
1. 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言论	93
2.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观点	94
3. 关于阶级、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言论	97
4. 在革命暴力问题上的观点	115
5. 反对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	120

五、布哈林哲学观点摘要	131
1. 关于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的言论.....	133
2. 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言论.....	135
3. 关于平衡论的理论.....	143
4. 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一般言论.....	148
5. 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问题的言论.....	153
6.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言论.....	164
7.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言论.....	174
8. 关于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言论.....	179
9. 关于阶级、国家和革命问题的言论.....	184
10.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言论.....	202

第 一 部 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斯坦	舒贻上等	北京三联	1958	137	人 大	
农业的社会化	考茨基	邓 毅	上 海 新 生 命	1929	228	编译局	
农业问题论	"	章子建	上海神州	1930		人 大	
社会主义伦理学	"		上海平凡	1929	214	编译局	
土地问题 (两卷)	"	果 琳	北京三联	1955	521	人 大	有解放前 商务版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	徐六儿等	上海商务	1922	172	"	
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刘 隍	新 生 命	1930		"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区 维	北京三联	1958	210	"	解放前有 神州版共 学社版
资本论解说	"	戴季陶	上海民智	1929	208	"	
基督教之基础	"	叶启芳	北京三联	1955	478	"	有神州版
无产阶级专政	"	骆静兰	"	1958		"	
资本论概要	考茨基	洪涛重	上海神州	1930	273	编译局	有言行出 版社版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	桂 秋	上海沪滨	1930		人 大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考茨基 伯恩斯坦		北京三联	1961		"	
阶级斗争	考茨基		国光书店	1921		"	
中国革命问题 (两集)	托洛茨基		世界文化 研 究 社	1930		"	
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	张太白	春潮书局	1925	226	"	
托洛茨基自传 (两册)	"	石 越	新 生 命	1943	542	人 大 编译局	有节本
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	"	刘静园	"	1933	233	人 大	
托洛茨基之逃脱	"	樊仲云	上海远东 图 书 公 司	1929	159	编译局	
列 宁 传	"	韩 起	国 际 译 报 社	1933	494	人 大	有节本
俄国革命纪实	"	周 途	广州人民 出 版 社	1922	123	编译局	
儿子、朋友、战士、悼里昂、西道夫	托洛茨基	李书勳	上海亚东	1938	72	编译局	
苏俄之前途	"	梁鑑暉	上海新宇 窗 书 店	1930	114	北京图 书 馆	

第 一 部 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伯恩斯坦	舒贻上等	北京三联	1958	137	人 大	
农业的社会化	考茨基	邓 毅	上 海 新 生 命	1929	228	编译局	
农业问题论	"	章子建	上海神州	1930		人 大	
社会主义伦理学	"		上海平凡	1929	214	编译局	
土地问题 (两卷)	"	果 琳	北京三联	1955	521	人 大	有解放前 商务版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	徐六儿等	上海商务	1922	172	"	
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刘 隍	新 生 命	1930		"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区 维	北京三联	1958	210	"	解放前有 神州版共 学社版
资本论解说	"	戴季陶	上海民智	1929	208	"	
基督教之基础	"	叶启芳	北京三联	1955	478	"	有神州版
无产阶级专政	"	骆静兰	"	1958		"	
资本论概要	考茨基	洪涛重	上海神州	1930	273	编译局	有言行出 版社版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	桂 秋	上海沪滨	1930		人 大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考茨基 伯恩斯坦		北京三联	1961		"	
阶级斗争	考茨基		国光书店	1921		"	
中国革命问题 (两集)	托洛茨基		世界文化 研 究 社	1930		"	
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	张太白	春潮书局	1925	226	"	
托洛茨基自传 (两册)	"	石 越	新 生 命	1943	542	人 大 编译局	有节本
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	"	刘静园	"	1933	233	人 大	
托洛茨基之逃脱	"	樊仲云	上海远东 图 书 公 司	1929	159	编译局	
列 宁 传	"	韩 起	国 际 译 报 社	1933	494	人 大	有节本
俄国革命纪实	"	周 途	广州人民 出 版 社	1922	123	编译局	
儿子、朋友、战士、悼里昂、西道夫	托洛茨基	李书勳	上海亚东	1938	72	编译局	
苏俄之前途	"	梁鑑暉	上海新宇 窗 书 店	1930	114	北京图 书 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 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文学与革命	布哈林	李需野	北京未名	1928	354	人 大	
唯物史观(三册)	布哈林	陶 伯	泰 东 图 书 店	1930	880	人 大	
唯物史观大纲	梅 根	梅 根	上 海 平 凡 书 局	1930		人 大	
历史的唯物论	刘 英	刘 英	上海现代	1930	453	人 大	有乐群书店版
共产主义的ABC	郑 侃	郑 侃	新青年社	1926	176	人 大	
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	杨伯恺	杨伯恺	辛垦书店	1930	289	人 大	
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	郑 侃	郑 侃	上 海 水 沫 书 店	1930	357	人 大	“有闲阶级经济学”乐群书店版
社会主义之路	许 平	许 平	辛垦书店	1930	154	人 大	
转形期经济学	许 平	许 平	乐华图书 公 司	1930		人 大	
社会主义大纲	许 平	许 平	社会经 济 学 会	1930		人 大	
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	太 柳	太 柳	新青年社	1927	62	编 译 局	
共产党底计划	李铁声	李铁声	汉口长江	1926	118	人 大	
辩证法底唯物论	陆定一	陆定一	上海江南	1929	134	人 大	
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陆定一	陆定一	新青年社	1927	196	人 大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一、二集)			人 大 出 版 社	1958		人 大	

第 二 部 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 版 时 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论文 选译	伯恩斯坦		北京三联	1959		人 大	
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			1922		编译局	德 文
什么是社会主义	“			1922		“	“
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			1901		“	“
柏林工人运动史	“			1907		“	“
我的流亡生活	“			1921		“	“
论社会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	“			1900		“	德 文
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	“			1905			“
罢 工	“			1906			“
社会政治和社会民主党	“			1907			“
英国大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 和民主	“			1908			“
工 人 运 动	“			1910			德 文
回 忆 录	“						“
社会主义之先决条件与社会 民主问题	“			1899			“
为何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			1901			“
1850—1872的青年与幼年 时代	“			1926			
乌托邦社会主义之评判	考茨基	邓季雨	南京拔提 书店	1933		北 京 图书馆	
论理与唯物史观	“	董亦湘	教 育 社 研 究 社	1927	190	编译局	
社会革命论	“	萨孟武	新 生 命	1930	168	北 京 图书馆	
弗里德利希·恩格斯	“			1908		编译局	俄 文
取得政权的道路	“					“	“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 批判	“			1923		“	“
爱尔福特纲领	“			1892		“	“
1789年阶级利益的冲突	“					“	德文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					北 京 图书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么？	考茨基					北京图书馆	英 文
托玛斯·摩尔和他的乌托邦	“					“	“
德 国	“					“	“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					“	“
新社会主义的先驱	“			1894			德 文
论理学和与物质创造者	“			1904			“
物质创造者	“						“
关于国民经济学	“						“
革命的背叛	托洛茨基	衡 人	“文摘”	1937			
			1卷6期	6.1			
托洛茨基的几篇通讯	“	樊仲云	“新生命”	1929			
			2卷6号	6.1			
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	“	迅 雷	“动力”	1930			
			1卷1期	7.15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文 学的组织	“	郑超麟	新青年季 刊第4期	1924			
莫斯科的精神	“		“响导”				
			122期				
对纽约电闻报主笔何怀德 之谈话	“		东方杂志	1937			
			34卷5号	3.1			
施达林的政治生活	“	杨 英	骆驼书店			人 大	
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 团走的是什么路？极左 派与反马克思主义	“					76 编译局	
红军底诞生	“						
我的生活	“						
苏维埃新经济政策	“						
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条约	“						
为恐怖主义辩护	“			1920			英 文
十月的教训	“			1925			“
不列颠向何处去	“			1926		京 北 图 书 馆	“
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			1926		“	“
生活问题	“			1924			“
我的生平	“			1924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本质	“						“
今天的共产主义宣言	“						“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 版 时 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资本主义临死的痛苦	托洛茨基						英 文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						"
欧洲与美国	"						"
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怎样同它斗争	"						"
共产国际头五年(两卷集)	"						"
俄国革命史	"						"
我把我的生命孤注一掷	"						"
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						"
为苏联辩护1927—37年汇编	"						"
基洛夫谋杀案	"						"
西班牙的教训:最后的警告	"						"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						"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						"
1905年前后	"						"
十月革命	"						"
巴黎公社	"						"
不断革命	"						"
斯大林Harper	"						"
斯大林传	"						"
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						"
斯大林陷害和莫斯科审询案	"						"
未发表的列宁遗嘱	"						"
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	"						"
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	"						"
和平纲领是什么	"						"
世界先叶况状和五年计划	"						"
农民问题	布哈林		新青年社	1926		人 大	找不到书
唯物史观社会学	"	许楚生	北 京 东亚书局	1932		"	有上海 北新版 (找不到书)
从沙皇政治底崩溃到资产阶级底崩溃	"			1923			
共产党党纲	"			1919			
社会主义社会之基本条件和 新经济政策	"		新青年季 刊第3期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 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	布哈林		“布尔什 维 克”				
			2 卷 12 期	1928			
			2 // 3 //	1919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总结	//		2 卷 4 期	1929			
共产国际纲领	//		2 卷 6 期	1929			英 文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帝国主义之资本蓄积	// //			1925			俄 文

第三部分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 的革命	伯恩斯坦		“新时代”	1898			德 文
历史唯物主义	“		彼得堡版	1901		俄文即“社会主义的前提 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问题	“		“新时代”	1898			德 文
社会主义的现实的和理想 的因素	“		“	1898			“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10. 3—8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之 声明	“		德国社会民 主党代表大 会记录	1898			“
关于个人的事情	“		新 时 代	1898			“
辩证法和发展	“		“	1899			“
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	“			1915			“
政治性的羣众罢工	“			1905			“
罢工、罢工的本质及其作用	“			1906			“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 纲领	考茨基						
反伯恩斯坦论	“						
我们对爱国主义与战争的 看法	“						
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	“						
再没有社会主义了	“			1906			“
俄国大地问题	“						
斯拉夫人和革命	“						
小资产阶级“社会党人”	“						
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	“			1907			“
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 和国家同盟	“			1915			“
社会民主党的破产	“		“新时代”	1919			“
国际主义与战争	“		彼 得 堡	1915			俄 文
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	“			1911			

书 名	著 者	译 者	出 版 处	出版 时间	页 数	藏 书 单 位	备 考
黄金、纸币和商品	考茨基			1912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	“			1946			英 文
布尔什维主义的死路	“			1931			“
工人革命	“			1925			“
帝国主义战争	“		“新时代”	1917			德 文
又一次我们的幻想	“		“	1915			“
国债的经济影响	“		“	1915			“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		“	1914			“
战争的影响	“		“	1914			“
帝国主义	“		“	1914			“
最近的急进主义	“		“	1912			“
新 策 略	“		“	1912			“
伯恩斯坦和辩证法	“		“	1899			“
托尔斯泰和布伦坦诺	“		“	1900			“
又一节和反军国主义斗争	“		“	1912			“
我的土地问题的两位批判者	“		“	1989			“
1912年3月26日“前进报”上的八月联盟的第二国际提出的声明	托洛斯基						
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						
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	“						
托洛斯基给齐赫泽的信	“						
“1905年”的序言	“						
托洛斯基文集	“						
“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的说明	“						
和平纲领	“						
我们的革命	“						
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演说	“						
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	布哈林			1952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	“						

伯恩斯坦哲学观点摘要

攻击马克思主义宣傳康德主义

只有敢于直言无讳地把学说的缺点和矛盾说出来，这个任务才能够实现。换句话说，要希望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与完成，必须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今天（1899年）人们好象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得到证明似的。这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护者和卖弄文墨的人等，固然是非常便利。但是，只要保持着一点点理论良心的人，一旦意识到那矛盾，就会感到应该把它去掉。他们的祖述者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要把他的始祖的话永远重三倒四地反复着。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8页

据我所信，关于学说的命运，马克思本人不就已经写过吗：“摩尔的爱人只能死于摩尔之手”。同样，某一理论的错误，只有这个理论的拥护者们承认它的错误是错误时，才能去掉。这样的承认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的毁灭。把认识了的错误去掉之后，——如果容许用拉萨尔派的表现的话，——那末就会更加明白，无妨反对马克思者终于是马克思本人。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9页

错误不能因为马克思或恩格斯曾经犯过它，就成为永远值得支持的东西。真理也不能因为第一次发现它或说明它的人是反社会主义的或不为人所重视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者，就失去它的重要性。在科学的领域内，倾向并非有什么特权的東西，也不是颁布什么驱逐训令的东西。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1页

至于参照了“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就证明马克思的体系内实际存在着空想论的残渣。马克思在本质上接受了空想论者的解说，但认为他们的手段和证明是不完全的。因此，他曾企图作那些修正，但那也是以热心和锐利的批评眼光和科学的天才爱好真理的念头来搞的。当其时他毫不隐蔽事实，并且只要其研究对象不与证明公式的终极目的发生直接关系，也未无理地贬低这些事实的重要程度。就是说直到这里为止，他的著作也丝毫没有必然会损毁科学性的倾向。因为，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努力的一般同情，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致妨碍科学性。但是，当马克思刚一接近那个终极目的真正成为问题的

点时，他马上变为不确实和不真实了，于是出现了如本书在“近代社会中所获得的转变”一节内所指出的矛盾。看起来好象这个伟大的科学精神，终于做了教义的奴隶。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5页

对于马克思已经深深地倾倒而且同他的著作的辩证法的公式——此即上述的搭脚架子——怎样也不能绝缘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管“资本论”中的某些记述已经由于事实而化为空文，还是一面忧虑一面想坚持它。不然的话，为什么象考茨基那样的在别的方面是非常尊重事实的人，竟能对于我在斯图加特所说的有产阶级的人数只会跟着年月增加而决不会减少那段话，提出了如次的反对论呢？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6页

此外，我从乌尔夫所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也多少学习到一些，即使这样说我也不觉惭愧的。

普列汉诺夫却把它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折衷的合成”。好象科学社会主义的要素不是十中八九都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著作中采用得来似的，好象真地存在着党的科学这样的东西似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1—122页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信是跟马克思学说完全矛盾的推断，就非常热心地出来辩论，而结局却证明他们所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大部分并不存在，这种情形是常常发生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8页

据我所记得的，特别是关于已故斯迪布林博士的资本积累对剥削率的影响之研究所引起的辩论。斯迪布林在他的表现方法上，又在他的个别计算上，都犯了错误，发现这个错误的特别是考茨基的功劳。但是，正相反，据“资本论”第三卷所示，则斯迪布林的著作的根本思想即剥削率跟着资本积聚的增加而减少的那个观念，纵令对于这种现象的他的论据是和马克思的论据不同，但对于马克思学说，并非象当时映入我们多数人眼中那样的矛盾的东西。可是，斯迪布林在他的时代却不能不听到这样的反驳，假如他的推论是正确的话，那末，作为今天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学说就是错误的了。实际这样地论述的人们也能够从马克思引证种种章句。所以将这个因斯迪布林的论文而起的争论加以分析，对于说明马克思价值学说的一些矛盾是很有用处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8—129页

这理论的进步虽然确守着主要见解，却使最初表示不容怀疑的命题受到了限制。这种理论改变的某些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所作的。在“资本论”（1867年）的序言中、“共产党宣言”（1872年）的新版序言中、“哲学的贫困”（1884年）的新版序言中和注中、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的序言中，都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那些问题的见解，随着时日的经过，发生了变化。但充分考虑到上面几处及其他地方所述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各部分或前提的全部变化，这个学说是没有最后完成的。只举一例来看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论到宣言所提出的革命措施时说：“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大规模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已跟着增长起来……特别是公社已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攫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1872年所写的。但五年后对杜林的反驳中却象下面这样简单地说：“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1885年恩格斯在“共产党人审判真相”中，揭示了建立于旧解释的1848年革命纲领和在同一意义上起草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执行章程，关于前者只简略地提到“今日还有许多人能够从它[这纲领]学到一些东西”，但关于后者却说：“那里所说的许多事情，就是在今天也还是适当的”。从“首先”、“许多人”、“许多事情”这些字眼上看，我们可以作这样解释，即上面这些文句，只是附有条件的，但就是这样解释，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现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承认的事实上的变化和对于事实的更好的认识，马克思学说在其完成和应用上必须要受到反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种反作用，某部分只作了大概的暗示，某部分仅仅就个别方面认定下来了。即在后一场合，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这样，要使他们的学说统一起来，并求得学理与实际的一致，这个任务，他们遗留给他们的后继者去完成。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7—18页

关于历史上经济与暴力的关系的估价，也存在着和上述同样的矛盾，又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工人运动的实际任务和力量之批判上的矛盾里，上述矛盾也显示着相应的形相。这个问题必须在这里再提及一下。但在这里所应研究的问题不是暴力本来和在历史的长远进程内到什么程度决定了经济，以及相反地经济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暴力，毋宁是一定社会内的暴力的创造力是什么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暴力曾经赋予以纯粹否定的功用，而今天却过分地夸大它的正相反的功用，并赋予这权力以几乎是创造性的全能力。而强调政治的行动，似乎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在其逻辑上虽没有这样来称呼的利益，但如把它的表现按今天的流行式加以改善，则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真髓。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9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将上述问题转过头来，且按照产业无产阶级的潜在能力，把

115
政治的行动说成是这个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陷入了大大的矛盾。那就是，承认了工人阶级尚未达到为他们的解放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又未具有为它的成熟所必需的经济的准备条件，并且因此把它本身和煽动民众的党派分开了。但是不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却始终是靠据着被认为几乎具备了上述两个准备条件的战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内，看到有些处所，以同初期社会主义者的空理几无差异的程度的尖锐强调工人的未成熟。而在其次马上又看到一些处所好象使人认为，一切文化，一切知识，一切道德，只有在工人阶级内才可找到似的。并且看了这些文章，却使人难于理解，为什么缘故必须把最极端的社会革命主义者和暴力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不当呢？照它所说，政治的行动常常要针对着最近将来所可期待的大灾变，与此相比，立法的长远事业则似乎是最拙劣的措施，即单是一时的方策。而我们从立法的行动能期待什么呢？又从革命的行动又能够期待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系统的考察，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关于这最后这个问题，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一望而知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0页

116
……要把如次两件事回想一下。一件是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申明过，巴黎公社实际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其次一件是，1895年恩格斯在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很详细地讲到，政治的奇袭的时代，换句话说，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了。和军队的大规模冲突，不仅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且暂时地会成为使它在某些方面退步起来的手段。更简要说，社会民主党，与其用不合法的手段和革命，还不如用合法手段，会使它的发展更顺利得多。因此他指出，该党当前的任务是：“保持它的投票的不断增长”或“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

这样，正如恩格斯以许多事例表明的，他是常常有些把进化的速度过于重视了。于是或许有人要责备他了，说“他对于由劳动阶级夺取政权，这点已经断念。因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由于合法的宣传已确保了不断的发展，不要用政治的奇袭把它阻住了”。

如果不是这样，即，如果承认了恩格斯的推断，那末，纵令我们说明社会民主党更远的将来所应作的事情，不是老巴望着大灾变，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它发展到民主，并为一切国内改革而斗争，这些国内改革既能使工人阶级向上，又能使国家组织变为民主”，就是对这样的说明，道理上也不致于抱什么恶感了。

上面引号中的几句话是我在我的反驳中所述的，它的意义，我现在还是完全承认。就现在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它与恩格斯所说的是作同一解释。因为所谓民主，常常是指以工人阶级为主、相应于其知识的成熟和经济的发展而能够实行的工人阶级的统治。加之，恩格斯在上述那地方明白说过，“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说，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

要之，就说恩格斯曾经确信过指望大灾变的战术的胜利，他仍旧以为甚至对那种战术而言比德国具有更有利得多的传统的拉丁语系各国，也有把那种战术加以修改的必要。现在他写道：“如果说各个民族间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了。”人们对于这一点难道已经忘记了不成？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4页。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费尔巴哈论”中，对唯物论给予和上述不同的两个定义。一个定义是说：凡简单地以自然为本源的一切学说，都是唯物论；另一个定义认为唯物论就是“放弃那与从自然固有的关系来理解的事实不调和的一切理想主义幻想的学说”。¹²⁴⁵这些定义，对唯物论给予了非常广泛的意义，因而失去一切的确切性，甚至连同非唯物的解释也包含在其中。因此，“唯物的”这个名称，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无宁更多地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就更明白了。普列汉诺夫对这件事也出于无奈地承认了。¹²⁴⁶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46页

“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言中也发见有同样预定的命题。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这样说，“我们问的，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但正当他论到上述“规律”时，却又用较比柔软的概念“趋势”代替了上述铁的概念。而次页中马上就是这样¹²⁴⁷一个常常被引用的命题：社会能够把生育自然的发展阶段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13页

恩格斯晚年在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大胆地指出了马克思和他对于社会政治进化期间的推测所犯的¹²⁴⁸错误。他借这篇序言（称为他的政治遗嘱也不会错）在社会主义运动上所赢得的功绩，无论作怎样高的评价也未必会适当的。的确，这本书中所包含的东西，比所期待的还多得多。然而这篇序言，既不是利用这种正直的告白所产生的一切推论的场所，也不能希望恩格斯在这里对学说本身做如此所必要的修正。假如他作了修正，那末即使不明白说出，事实上也非无条件地与黑格尔辩证法一刀两断不可。的确，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对立面，并且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理观察的圈套。但要恩格斯超越它是不可能的，并且也没有想要这样做。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6页

马克思同“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之间，尽管在其他各点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在这一¹²⁴⁹点上他们的思想方向却是非常近似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97页

依靠这种真正自然的兴奋，或许能够解释，关于革命的反动的接近的某种夸大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期待是转瞬即可恢复——和脱节的说明，但是现实和纲领二者之间的那个激烈矛盾，却是不能依靠它来解释的。这矛盾并非一时的心情的产物——若把这矛盾视为一时的心情，那就会等于在历史上不正确地看待该通告的起草人——毋宁说这矛盾，乃某种智力上的缺陷，即他们理论上的二元论的产物。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0页

近世社会主义运动，固然可分为二大潮流，但他们因时代不同而外形亦异，并且往往互相对立而出现。其中的一个潮流，跟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所制作的改革提案有着密切关系，在本质上是以建设为目的的。然而另一个潮流，却依靠革命的民众动乱来激发其灵感，在本质上是以破坏为目的的。这二潮流实现的可能性，乃基于其时的情况，而视其可能性如何，一派则出现为空想的、宗派的、和平的、进化的，另一派则出现为阴谋的、煽动民众的、恐怖的。并且越是接近现代，越是明确地在一方面喊出“依靠经济组织的解放”的口号，在另一方面则喊出“依靠政治斗争的解放”的口号。在前世纪，则前一派多半为个别的思想家所代表，后一派则为未组织的民众运动所代表。但在现世纪的前半，则双方都已经进行持久的活动的团体成立。即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的诸派以及各种劳动者合作社，在另一方面，则有各种革命的结社。……。

马克思的理论，是想要把这两个潮流的真髓结合起来。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从革命派继承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解释为一个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而从社会主义者继承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之阐明。但是这个综合尚未消灭两者的矛盾，毋宁说这个综合是同恩格斯在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提议——让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要素隶属于政治的急进的社会革命的要素之下——是同样妥协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将来纵令达到任何进步，但在它的根柢上始终带着这种妥协即二元论的性质。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在颇短期间一再显示出本质上相异的外观，实不得不从上述妥协的性质中去求得说明。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任何斗争的党派都会由于情况变化而变化的战术上的要求而发生的上述本质的相异性，毋宁在于虽无紧逼的外部的必然性，而作为单纯的内部矛盾的产物自然表现出来的那种相异性。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0—32页

在德意志，则马克思、恩格斯以急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和布朗基主义完全相同的理论。……

……局部的革命是空想，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马克思曾在“德法年鉴”

里这样地推论过。这样的见解立即引导到布朗基主义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8页

……并不是否认暴动就能从布朗基主义下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代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都没有明白地说到这一点。这些著作，除否认暴动以外，始终是汲取着布朗基或巴贝夫主义的精神。……“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运动纲领，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在“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特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次通告中，都把布朗基主义者写成为无产阶级党。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9页

马克思主义只在一方面——即关于方法——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在其他方面，即在过去重视革命暴力对近世社会之社会主义的变革的创造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未完全摆脱了布朗基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对布朗基主义所加的修正，例如革命的暴力之集约的集中理论，与其说是涉及它的本质，无宁说更多地涉及它的形式。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2页

根据这种见解，我不能赞成所谓“工人阶级不要实现什么理想”这个命题，假如说它的著者不是在作着单纯的笔墨游戏，那末，我就认为不过是自欺的产物罢了。按照这个意义，我当时曾反对在工人运动里寻找它的巢穴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它安适地藏身之处的“空谈”（Cant），而诉之于开尼希斯堡的大哲学家即纯粹理性的批判者的精神。因此，我曾受到各色各样人们的愤慨，而这些愤慨却不过加强了我如次的确信。即，社会民主党虽然需要一个康德（Kant），他会酷烈犀利地批判那种传统的教条，而当那教条外表上的唯物论成为最高因而最易被人误解的观念形态时，他就会揭发出来，轻视理想并且将物质的因素提高为进化的全能威力，就是自欺，这种自欺已经被它的主张者用事实趁一切机会暴露了它的真相，而现仍在暴露中。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5—136页

假使我不必怕被人误解（当然我对于错误的解释却已有准备），那末，我且把“回到康德”改为“回到兰格”吧。因为在主张上述格言的哲学家和真理探求者看来，并不是要回到开尼希斯堡的哲学家所写的文字本身，成为问题的，毋宁是这个大哲学家所奠下的批判的根本原理，同样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也并不是要回到兰格的一切社会政策的意见和判断。在我的眼中，就是在兰格身上已经把对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率直大胆的参加，和可作经常地识别错误、认识新的真理的前提的公平无私的纯科学的观察二者卓越地结

合起来了。象我们在兰格的著作里所见到的宽宏大度，恐怕在具有象马克思那样作为不羁的精神之特质的深刻犀利的性质的人们身上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6—137页。

攻击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肯定”代替了“肯定—肯定，否定—否定”，它的矛盾的综合和由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富于辩证法的特长的各点，常常妨碍了所认识的变动的范围作出正确计算。所以，如果想要根本保持黑格尔派所制定的进化公式，那末必至于不是把事实解释通了，就是当测量达到所期目的的道路时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忽略了。所以，尽管对于社会的经济结构，研究得如此始终不懈、精密细致，却仍发生令人难以置信地忽视明白事实的矛盾，发生从经济具有暴力以上的决定影响这一点出发的理论终于成为对暴力的创造力的特别不可思议的信仰的矛盾，发生一方面想要提高理论、使社会主义科学化，而又屡屡“突变”为使想具备科学性质的要求从属于倾向之下的矛盾。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5页

批判布朗基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而且这种自我批判不单是若干外表的事实自我批判，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颇重要部分之自我批判。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辩证法。从作为社会进化基础的经济出发的学说，如果在以暴力崇拜为极致的学说之前降服，那末无论何时我们也会碰到黑格尔的命题。这或许不过只是推论，若果然是这样，那就越发会损害黑格尔的命题。大大地被黑格尔辩证法所欺瞞，那不一定是全不正确。它正如鬼火和光辉相似一样，是和真理相似的。它并不矛盾。因为在它的辩证法看来，则在任何事物本身之中并未藏着它的矛盾。将暴力放在从来经济所占的地位，果然是矛盾吗？不，并非如此。因为暴力本身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力量”。

不管是怎样的聪明人，也不会怀疑上述最后的命题之相对的正确性。可是，那暴力作为经济上的力量，要怎样并在什么时候才起着可以生出预期的结果的作用呢？假如碰到这种问题，那末，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会毫无用处了。因此，在这时，如果不想犯大错误，那就不得不参考具体的事实和精密地——“形而上学地”——下过定义的诸概念。黑格尔学说之逻辑上的颠倒，实在带有急进的和机智焕发的色彩。黑格尔学说象现出鬼火一样地，现出彼岸的模糊轮廓。但是，要是信任黑格尔学说，来选择可以前进的道路，那就马上一定会陷入泥坑里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完成了那个大事业，并非因为依靠

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力量，毋宁说是因为不曾依靠它的力量。假如说在另一方面他们忽略了布朗基主义最显著的错误，那也首先因为他们自己的学说中，掺杂着黑格尔派的味道。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7页

有产者人数增加而不减少，这并非资产阶级调和主义经济学者所发见，毋宁是由税务署甚至使当事人感到不快才调查得来的事实，关于这个事实，在今天早已无须争论。那末，这样的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了什么样的意义呢？又为什么缘故，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依存于上述事实或此事实之否定呢？说起来，其理由却很简单。那是因为好象有辩证法的公式这样地指示着，又因为假如承认社会的剩余生产物并非为逐渐成为多数的有产者所取得，反而为逐渐成为少数的有产者所取得，那末，支柱就会伸露到搭脚架子的外面去的缘故。但是，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东西只是空论的教条，而对于工人的实际运动，这问题却成为第二义的东西。即他们工人为政治上的民主而斗争，或为产业上的民主而斗争，都和这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斗争的希望，即不是悬在所谓资本向人数减少的资本家豪族掌中积累的支柱上，也不是悬在有这支柱的辩证法的整个搭脚架子上。实则它是悬在与一般的社会进步相辅而行的、社会的财富之增加，或社会的生产力之增进上。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7页

然而，辩证法“用脚站立”，决不是这么简单的事。纵令确是事物常在现实中，但超越了我们能凭经验确证的事实的范围而思考，我们就会立刻陷于衍生的概念的世界。我们在这场合若是遵从黑格尔所拼凑的规律，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上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科学上的大危险，就在这个地方。黑格尔的逻辑命题有时候用来表示某现实客体的关系和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同时，它也许对各种科学问题的说明作了很大的贡献，并给重大的发现以冲动。但如果根据这些命题来演绎地推断进化，那末创造任意的体系的危险马上就会出现。以其进化为问题的对象越是复杂，这种危险也就越大。要是那客体非常单纯，由于我们有许多经验和逻辑的判断能力，也就不致因“否定的否定”这种类推命题而错误地引导到这个对象的变化可能性存在于它的盖然性范围之外的结论，但对象越复杂、它的要素越多、它的性质越繁、而且它的势力关系越是多种多样，这种命题对于该对象的进化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就很少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假如只以这个命题为基础来进行思考，那末，失去一切判断标准的事，就会越来越多。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1—22页

兰格在他所著的“工人问题”中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写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它的根本思想“矛盾及其通过综合而进化”，“差不多可称为一种人类学的发现”，就黑格尔辩证法对历史著作的影响说来，兰格这句话可说是最恰当的批评了。但兰格附带说到，“在历史中也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通过矛盾的通化，不象思虑的构成中那样容易而急激、并且正确而对称地进行着，可见他同时用“差不多”字样是指摘它的缺点。对过去来说，今天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仅仅对将来、特别是最近将来来说，依照马克思的学说是完全不可以承认的。“共产党宣言”写道：1847年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但这个革命，依已经达到的无产阶级的发展和欧洲文明的进步条件看来，“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马克思当时已认真研究了经济学，——其中没有可认为是黑格尔矛盾辩证法残滓的产物的东西，——为何会犯了这样即使政治上最狂热的人也不至于犯的历史上的自欺呢，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但这件事对于马克思，对恩格斯也一样，看来是终生不能完全避免的。而在当时那纷纷扰扰的时代，这件事更加具有对于他们是致命伤的命运。那并非因为单只象这两位精力充沛的指导者能够敢作敢为那样的、又象使他们有时收到奇袭的效果那样的过于重视政治运动的前途，而是因为完全从思索上来预断尚没有最初萌芽的经济和社会进化的成熟。就是说，尽管这样的成熟要几十年才能够实现，但依照由矛盾到矛盾的进化哲学，却把它看做由政治变革直接产生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变革不过是渐渐与资产阶级以自由发展余地而已。“共产党宣言”起草后二年，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同盟内部的反对者不得不一方面非难“德国无产阶级的未发达的形态”，同时相反地，又非难“把无产阶级这名词当作神圣的东西”（“科伦共产党人审判真相”），这不能不认为是他们暂时消释了疑惑的结果。进化之现实上的成熟和构想上的成熟之间的这种矛盾，还必须以其他形式再三地研究。

这里所谈到的，据我所见，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最致命的地位……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23页。

社会民主党对于突然发生的大灾变能否应付得来这个疑问。我是否定这个疑问的，现在还是否定它。因为，我以为不断地前进对于永久的成功所给予的保证，必会比灾变即将发生所给予的更来得大。

因为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所以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为争取劳动者政治权利的斗争、为城乡劳动者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政治活动、以及劳动者的经济的组织事业，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这样写着：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今天我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写着。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4—5页

宣傳唯心論反对唯物論

因此，价值不能从某个商品或某类商品来测定，而纯粹是思维的构成物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9页

对于一种科学理论，至少应该有个什么合理的标准来作为它的界线，这个标准必须一方面求之于空想家，另一方面求之于小资产阶级，这是不用说的。因为，所谓评价，是纯粹主观的事情。一件东西，越站在这处去看，就越见得小，所以，在实际上常常出现这样的事实：有些人本身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但却有前述意义上的“最小资产阶级的”见解，而有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或生活在资产阶级的雾围中因而和工人界毫无关系的人、或最初只从某个有一定气氛的政治集会知道一点点工人界情形的人中，却是常常实际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感情高涨着的显著事实。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6页

所谓唯物主义者首先是把一切现象归着于物质的必然运动的人之谓。依照唯物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批判的过程必然地进行着的。因此，无论什么事象，没有以前为它而存在的必然的作用就不会存在，无论什么现象，没有它的物质的原因就不会发生。所以，物质的运动乃是决定思想的形态和意志的方向的，唯其如此，思想的形态和意志的方向、从而人间的一切现象，也都是物质的必然的东西。所以唯物论者是没有神的加尔文教徒。就是说，唯物论者纵令不相信什么神定的宿命，却也相信，并且不得不相信发生在某一任意时点以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那一定的物质的全体和它的诸部分的势力关系预先决定了的。

因此，把唯物论应用于历史的解释，不消说就是主张一切历史事象和进化的必然性。从而在唯物论者看来，只有如次几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那种必然性是以怎样的方法进行的呢？是由怎样的力的要素或力的因素在历史上作出结论呢，各种力的因素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呢，又，自然、经济、法律制度、思想在历史上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版 第11页

恩格斯有一天问普列汉诺夫说：“你相信老斯宾诺莎的‘思维和广延性不外是唯一本体的两个属性，是正确的吗？”然而，普列汉诺夫回答说：“的确，老斯宾诺莎是完

全正确的”。

那么，有这样两个属性的本体，在斯宾诺莎看来就是神。然而，由于斯宾诺莎把神与自然等同看待，所以一向被人看作神的否定论者，他的哲学也被攻击为无神论的哲学。可是，他的哲学，在主张自然以外存在着人格化的神这种学说的代表们看来，虽然不过是掩着面的无神论，但它在形式上是作为万有神论而出现的。斯宾诺莎对于有着上述属性和这里未另加说明的其他属性的作为无限实体的神的概念，是纯粹依靠思辨的方法来达到。在他看来，合乎规律的思惟和实在是一一的。从而，他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和各种唯物论者一致。他本人所以被人看作哲学唯物论的代表者，只是因为他随意地解释过唯物论这个词。如果要用唯物论的词句来使了解某种确定的意义，那么，只有以物质为事物的终极而唯一的基础的学说才算得是唯物论。然而，斯宾诺莎指出，他的作为实体的神是非人格化的。当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当然是各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照上述的那样，那么，斯宾诺莎决不是唯物论者。

伯恩斯坦：“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46页

我们知道我们在思惟，也几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思惟。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思惟是怎样发生的，即是说完全不知道意识这个东西如何从外在的印象、神经的刺激，通过我们的脑细胞的积蓄和帮助所引起的变化以外的变化而发生。因此，有人想用某种程度的意识能力，即用把一元论意义上的灵化性赋予原子这种方法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说明，是从一个思惟形象，即推理方法和想单一地来理解世界的希求所不期然地达到的假设。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46页

宣傳唯心史觀反对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虽然以最初的形式，在马克思手掌中能够成为历史上大发现的杠杆，但以他那样的天真尚且由这唯物史觀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何况才能和知识都不及马克思的人呢？唯物史觀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基础，只有象上述那样扩张解释，才能使它今天仍保有价值。应用唯物史觀时，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各种物质势力和各种精神势力的相互作用，不管谁这样作，都应该纠正。

伯恩斯坦：“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5—16页

法律到底是社会生活的第一性的要素还是第二性的要素，以及它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即使抛开不谈，各时代的法律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的缩图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在说明社会的形态的时候，并不根据它的工学的或经济学的基础，而是根据它的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则。我们常说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机器时代和电气时代，也常说封建社会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等等。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3—74页

于是经济上的自然力和物理上的自然力同样，相应于对它的本质的认识的程度，由支配人们的地位，降为隶属于人们的地位，所以从理论上说，社会对于经济的原动力，今天比之以往，更处于自由的关系中了。……

「虽然如此，因为人们对于经济要素越来越注意了，以致误以为这种要素今天起着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事实。其所以陷于这样的错误，只是由于经济的动机以前曾经为各种支配关系和意识形态所掩蔽，而在今天却是自由发动着。……今日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状态，给与各种观念要素、特别是伦理要素以前所未有的独立活动范围，结果，技术的经济的进化与其他社会制度的进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渐渐变为间接的东西，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渐渐难以作为规准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5页

当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非经济的要素对历史发展有影响这个事实，无论何时都忽视了。问题不是他们曾否承认过观念的要素，而是他们曾否记述过这种要素对历史有怎样程度的影响，有怎样程度的意义；不用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初期著作中承认非经济的要素对于社会进化的作用和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比之晚年著作中要少得多。这正象一切新学说的自然发展道路。这种新学说起初常是以严峻而明白的法式表现出来，为了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必须证明旧学说已经过时了。今日把唯物的历史学说应用于事实，应该在其最发达的形式上来作，换句话说，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达和效力外，对于各个时代的法律观念、伦理观念、历史传统和宗教传统，以及地理的和其他自然的势力——人类自体的自然性和人类的精神能力也包含在这当中——的影响，也要十分斟酌。不仅关于过去时代的纯历史研究应该如此，就是对于将来进展作估计时，要是用唯物史观为对将来的指南针的话，也都应该如此。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14页

对于主张人性是天赋的、不变的东西的学说，社会主义者批评说：人性随国度的不同、随各该国的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某一定时代的人是生活于与今不同的关系中，所以人显然表示人性是有变化能力的。就其对于新自然关系和新社会环境的

适应能力说来，人性实在是很有弹性的。但这里不要忘记一件事。例如具有由数千年发展而产生的种种风俗习惯的现代各民族，就广大群众而论，如果只有颇大的财产制度的变革发生就期待人性的激烈变化，那是不可能的。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4页

在阶级、阶级斗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我认为近代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并不象“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是由同样丧失了财产和家族的同种类的群众构成的。在最进步的工厂工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着分化为各个阶级的劳动者的完全阶级组织，而且在各个阶级之间只有着微弱的连带感情。库诺在他有关崩溃论的一篇文章里面，认为我甚至在做这种一般自论的时候，也特别考虑了英国的情况。就是说：在库诺看来，德国以及大陆上的其他文明国家的高级劳动者，不象在英国那样脱离革命运动。甚至跟英国恰恰相反，收入最多的劳动者是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的。英国人的阶级精神不是今天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而无宁是行会制度、基尔特制度，以及凭借这些形式的旧式工会运动的结果。

说英国的工会与行会相结合，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十分薄弱的。库诺的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就是除了伦敦以外，英国的行会已经在改革的时候被取消了特权，而且就是在伦敦，工会运动也没有得到特别的势力，而这是与当地尚存的基尔特无关的。假定英国的工会运动内部存在着某种行会的特征，这种特征也不是旧式行会制度的继承，而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的产品。人性的意识，用斯蒂纳的话来说，独立性的意识，是在自由之中发展起来的東西。我确实不想侮辱德国劳动者，我知道应该怎样充分尊重使汉堡劳动者在十年中间为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一般问题而进行工人运动史上无与伦比的活动的那种理想主义。但是就我所知，上述职业上的阶级分化的反作用，甚至在德国工人运动本身中都发生了作用。只是因为这个运动之偏重于政治运动，对工会之有意识的压抑，以及德国在工资额和劳动时间方面的差异较英国为少，这种反作用才没有特别显著地表面化。

上述现象并不是工会造成的，而只是从事实上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表现。这与因职业种类和收入多寡这种现实差异而造成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要求并无二致。精巧机械机和煤矿工人、熟练室内装饰者和搬运夫，通常都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同时也有着非常不同的要求。但是当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的斗争不给他们之间带来什么冲突的时候，他们共同作为工资劳动者这一事实，可以使这种不同从他们的观念中消失，而他们对资本进行共同斗争的意识则可以引起相互间的强烈的同情。这种同情在英国也

并不缺少。即使贵族工会员中最贵族的人，对于处于不幸境遇的劳动者也是常常抱着同情态度的。因为他们之中的多数，在政策纵会不是社会主义者，却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但是这种政治的或社会政策的同情跟经济的连带之间还是有着很大距离。这种距离虽然可以因更加强力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而缩短，但是却常常是随着压迫的减缓而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

假令工业劳动者的这种阶级分化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对工业劳动者的思想并无影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工业劳动者在任何地方也不过占人口的少数。在德国，把家庭手工业者计算在内，也不过占一千九百万独立业者中的七百万人左右。此外尚有工程师及其他职员、商业使用人、农业劳动者。

这些职业的阶级分化都比工业劳动者显著。这类职业的从业者的工会运动的苦难史就是明证。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6—78页。

即使不说——借用马克思的口吻——‘明早也许就会有大事变发生’，但据我的意见，这种方法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也许会比大灾变说还更能指出满足希望的途径，而这个运动的斗士们却没有必要拿大好的热情和精力去搞破坏等等。关于这一点，就是阿德勒也必定不会非难我的。……

……随着民主制度的发达而在我们以外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地但是坚定地运用着的更加人道的观察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仅在日益重要的阶级斗争方面使用，毋宁同时在为阶级斗争创出较比和缓的调停形式。实则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6—7页。

阿德勒及其他几位，对于我期待随着民主制度的发达而阶级斗争会和缓起来这一点，表示恶感，以为其原因是由于我用纯粹英国式的有色眼镜来观察问题。但是这有色眼镜云云，全然不是事实。……固然，当人们热中于斗争时，往往会忽略这种现象，但无论何时都不会认错了。我看见先进各国，无论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较温和的形态。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6页。

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工人阶级力求尽可能地缩短劳动日，资本家阶级却力求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由于利益冲突的结果，这两个阶级在100年以前就开始了斗争，这一斗争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一直继续到今天。在这一斗争中，无产者劳动群众认识到自己利益的一致性。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使工人团结

成为一个阶级、使工人运动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原因。这一政治斗争产生了政治结果，即国家对劳动日长度实行调整，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日。

在作为现代工业发源地的英国，这一斗争的条件和原因发展得最早，也最尖锐，所以斗争比在任何地方都爆发得早。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6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89—90页。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革命行动家的希望都变成了幻想。等级的特权虽被废止，而平等博爱的王国仍未到来，新的阶级矛盾又出现了，在其母胎内隐藏着新的社会斗争、新的变革。贫民没有减少，无产阶级却增加了。革命所创造的国家和社会与孟德斯鸠与卢梭的理想完全不符合，生活表示胜过理想。……在这个革命中积累成堆的利益矛盾，直到现在仍未完全消灭，他本身反创造了新的矛盾，这新的矛盾，在最初只有一些象征，到现在是更锐利更坚决了。在现时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曾经为着传统和同情、地位或目的感觉到它自己与法兰西革命中任何一个社会派别有血统姻缘，因此，对于它们便没有特别温和好感，对于牠的反对者也不怎么严厉。然而法兰西革命恰给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们一个很大的推动力，牠使我们对于法兰西革命底本身及一切其他的历史现象均有当作客观的研究之可能。这种研究找得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人们的愿望，而是离开人们独立的社会关系，——至少是商品经济制度——这种关系，是立于人们之上，并且统治着人们。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2—4页。

法兰西革命的历史学家总想把法兰西革命描写得象一方面哲学家（佛尔泰尔、卢梭及其他）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国民会议的演说家（米拉博、罗伯斯皮尔）的伟业，但是他们不能抹煞那引起革命冲突的第三等级与第一第二两等级的利益矛盾这一事实。他们都看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偶然的、或速成的；这矛盾之出现于一七八九年已经不是第一次，牠在一六一四年三级会议之前已经存在了。牠成为历史的发展因素，因为牠，专制王权得以巩固，最后，可以看出这冲突是基于经济的关系。

.....

历史发展是由于阶级斗争，许多人对于这种理论接受得很偏颇的，他们以为在社会内只存在两个营垒。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两个团结了得清一色的群众——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在社会中只有“上层”与“下层”而已，假使这种见解是对的，那末，普通历史便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然而实际上，社会关系并不如此简单，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东西，社会的有机体与各种不同的阶级以及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错综混合，这些阶级又随着环境的不同而组成各种不同的政党。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4—6页。

第三等级的分裂并不次于一二两等级。后来又发生与第三等级相类似的资本家阶级及与其对立的第四等级性的无产阶级。很明显的，现代无产阶级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他是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是他的经济地位，而不是法律地位，说无产阶级是第四等级是不可以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生存在第三等级内的。除一二两等级以外，第三等级包括了全体人民；属于他的不只是资本家，甚至还有手工业者，农民以及无产阶级。非常明显，象这样一种杂色羣众的组织，我们在他里面当然可以找得出极尖锐的矛盾、极不同的目的、极歧异的斗争方法。因此，在第三等级方面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一致的斗争精神的。

甚至在我们现时第三等级里面所谓有优越势力的阶级——资本家阶级的羣众也不是团结一致的。

资本家阶级中主要的是大财政家。在国家债主的情质方面他们有一切根据要求改良；他们要预防他们的破产，惟有增加他们的收入和减低他们的支出。然而这些改良只是按这种原则来产生，即是以羊羣满足饿狼罢了。因此，另一方面这些财政家又有一切根据反对一切根本财政的或者社会的改良。……

资产阶级的上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根据特权站在旧政治制度方面、站在国家方面，这是无足惊奇的。他们固然也要求改良，但在革命前谁不要求改良呢！极有限制的特殊贵族是被说服了，现存的政治制度是不能再长期维持了，改良成为不可避免；现在不满意的是一切人。每个希望改良的阶级，因为改良对他们是有利益，但同时他们不愿意他们自身有任何的牺牲。……

……如果法兰西想与英国人竞争得到成功，那他必须很快的采用英国人的新方法。行会的限制与官行制度的规定废除由资本主义的工业简单利益问题而成为生死问题了。一七七六年突角就遇着这些急切的要求，但他的改良计划因为特权者的反对与阻碍结果一无成效。为了推翻加在大工业身上的枷锁使其便利发展，革命就成为必要了。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56—57，59，66页。

于是在十八世纪之王权代表中便存在着两种精神，一种“开明”的，另一种是服从政府之黑暗的中世纪的成见，贵族是在封建的生产方法日益没落中的一个阶级，他与资产阶级达到了某种均势，故十八世纪的王权在形式上便统治了两个阶级，超立于这两阶级之上，同时实际上又必然的去保获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因此，所谓“保护弱者勿受强者的侵略”，实际上便不得不归结到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一般的还能影响于国内的经济生活，给人民的下层阶级以灾害贫穷的，并不只是封建的剥削，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最后，他对于这些阶级便成为普通的一切的剥削的象征。

然而，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贵族的利益实际上大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专制的帝王决不能使他们彼此完全适意或融洽。专制帝王若不凌辱资产阶级，那他便不能满足贵族的慾望，反之亦然。

这种阶级斗争在专制制度之下，从来就没有停止；但是当这两阶级的均势状态仍然

继续存在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尚没有力量屈服国家政权使其顺从自己的时候，社会上层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主要的形式便是在帝王面前献媚邀宠；非常明显，这种斗争的参加者只有社会的上层分子，如官庭贵族、教堂的高级官仔、大财政资本家、官仔的代表以及“知识分子”等等。法兰西的皇帝很少是非党的或超党的，他与各国行使立宪的管理方法的帝王一样。其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的工具，就是说法兰西的皇帝之贫乏，阴险恶毒、刁奸诡诈，世上鲜有其匹而已。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14—16页。

现代社会无论如何不是象它对共产党宣言的草率的读者所显示的那样，是一幅十分简单的图画；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间阶级消失了。

不，中间阶层并没有消失，但它们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过去手工业师傅感到接近工人更甚于大企业主，后来被他看成是通过资本主义竞争来压迫他的敌人。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马克思所没有提到的农民经济的生存能力。关于这种生存能力的原因这里不能加以详谈，事实到处通过统计材料表明了这一点。一般地说，小农经济在谷物种植方面是不能与大地产竞争的，这指的是容易用机器来耕种的平原地；相反地，在丘陵地方情况就改变了，同样，在畜牧方面情况也就不同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不单是体力的过程，而且包括了精神的因素，所以耕种自己土地的、饲养自己牲畜的小农劳动的性质是不同于富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的农奴劳动的性质的。即使在工商业方面，中小企业不仅保持下来了，而且它的数目还在增加。

实际上在所有社会阶层都有紧张程度不同的阶级对立，利益的对立，并且那里有利益对立，那里就相应地有激烈程度不同的斗争。哪里大土地所有者占统治，那里就有农民和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一些民主党的农民党派成立了，这些党派由于大部分土地在大土地所有者手里而感到难以施展力量。几乎在所有国家里都发生过一时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在德国，在通过农业税的运动大部分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上的团结出现以后，长期不存在这种斗争。富农和小农共同组织起来反对商人，并且由此也实际上反对消费者。他们要求高额关税，以便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思以公道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与广大不是生产者的消费者群众对立起来。在德国，后来工业家和农民建立了联盟，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关税率的巨大联盟。

但是居民大多数是消费者，他们不是生产中的企业主——工人也是生产者，但不是企业主，而是消费者，同样，教师、官吏等等也是消费者。这里出现了阶级斗争，它不是在街上，而是在议会和报刊上发生的。但阶级仍是斗争。农民反对消费者的斗争，消费者反对生产者的斗争，手工业者反对商业和大工业的斗争，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那些通过强制法律、行会、强制公会等方法来保持师傅的统治的手工业师傅，按情况一方面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反对商业。手工业师傅企图使自己免遭商业之害，因为在他们看来，商业把他们的产品似乎比手工业师傅所能够生产的更加便宜地推销到市场上去，由此他们也就受到了商业的压迫。工业中的大资本家在卡特尔中联合起来的地方，出现了

一种隐藏的、即不是以通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反对消费者的，因为卡特尔总是和维持高价这个目的连在一起的。同时还存在卡特尔反对它们工业部门中那些不同它们联合的企业主的斗争，即反对所谓局外人的斗争。人们知道，卡特尔为了强迫局外人或者参加或者完全停业有时采用如何厉害的手段。人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卡特尔对局外人实行一种抵制，使他们根本得不到原料和辅助材料，而它们采用的斗争手段至少象工人工会斗争中所采用的手段那样厉害。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企业主阶层和比较独立的居民阶级中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虚假的阶级斗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这里很多人，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把德国对英国的斗争描写为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就应当是一个贫穷的无产者，英国就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了。这对助长战争的气氛来说，倒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但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只要斗争是经济斗争，那末这只是利益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如果另外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党的领袖科尔凡提让人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她的斗争是波兰无产阶级反对德国资本的斗争这个对很多国家产生了影响的论点，那末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例如上西里西亚的大多数矿工是波兰人，但是上西里西亚的多数五金工人却是德国人。上西里西亚许多讲波兰话的工人主张上西里西亚归德国所有。那里的斗争本质上是民族斗争，并不是别的东西，即使这种斗争对工人来说在这里或那里是作为阶级斗争而出现的。

但是在这一切阶级斗争（这些斗争在今天的社会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采取了很激烈的形式，以后结束了，并且为另外一些斗争所挤掉）中，最大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工人阶级即雇佣工人和企业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大大扩展是现代工业大大扩展的自然结果。工人阶级在今天社会里所占的地盘越来越大，比拉萨尔进行写作时大得多。1907年我们在工业、商业、交通方面有1,700万雇佣工人。这些工人住在那里呢？绝大多数住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而那里是民族的精神和政治生活恰恰最活跃的地方，而农村大都是和这种生活绝缘的。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在居民中所占地盘越来越大，光凭这一点他们就对舆论起着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同时按照他们争取权利的斗争，后来也对政治起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作为争取国家和市镇村中的影响和权利以及争取对立法和行政的影响的斗争而进行的。只要工人还是一个小阶层，还没有获得阶级意识，这方面是很少被注意到的。至今在一些雇佣工人的数字很小的地方，大部分工人在政治上常常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工人的数目在中心地区越增长，他们就越要参加公共的生活，就越要求在国家和市镇村中取得代表席位，并且发生影响和取得权力，随着民主设施的增加，随着选举权（它也可能长久不给工人）的扩大，这种影响也就增长了。甚至在革命前，在我们德国，工人已经发生重大的政治影响。1866年在成立北德意志联邦的工人取得了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权，除此以外，工人加入市镇村也得到了便利，最后普鲁士三阶级选举权的这道曾经是十分坚固的墙也由于工人的袭击被打破了。在选举权扩大的情况下，进入公共团体的数字增加了，而且由于他们的强大，人数的增加和通过他们有力的斗争，工人在巨大的舆论方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几乎是更重要的。人们在大厅、议会和政府里关于工人

阶级的需要和要求的说法和以前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工人使一系列改革得到实行，即使这些改革不是革命的，但就其社会影响而论却是巨大的。这是工人斗争的一种政治形式，当工人斗争在马克思那时出现时，它本质上是指向革命的，在这里不能把革命理解为在事物中进行的社会改革，而要理解为一个阶级通过起义等来进行统治，而把另一个外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排挤掉。马克思运动还是以此为目的的，而且必须以此为目的，因为当马克思进行写作时，工人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没有选举权的。工人必须首先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似乎工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这种权利。但是选举权取得之后（这在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另外的方法达到的），工人阶级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斗争就必然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部分地经历了这种斗争，并且他们对此所表现出来的理解程度和兴趣也提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积极地参加了工人党的选举斗争。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工人在公共的行政机构、强制合作社、市镇村、联邦、国家，以及在他们自己的自由行政团体中的、标志着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强大活动。然而无疑，不进行行政管理的教育，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影响在长时期内只能是有限度的。但这种教育本身只能在发展多少是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且多少是民主的发展的结果。

工人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经济方面的直接斗争形式，这种斗争主要是通过工人的联合以及工人合作社进行的，前者我们称为工会，后者是另一种的、不同于马克思进行写作时存在过的工人合作社。工人反对企业主的联合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提高工资和工资形式的斗争，但有时也是一种为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安排，以及为劳工法，即在企业中的劳工法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资本主义初期是作为叛乱的斗争而产生的。马克思还在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就叙述了这种斗争。在这本著作里，工会被赋予几乎是直接革命的性质。这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20年以后，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约·施韦泽企图在德国组织工会的时候，马克思于1868年给他的信里已经把工会说成另外一个样子。马克思在信里批评了施韦泽的企图按一定的现成的方案把整个运动包括在一个巨大的统一体内的计划，并且分析这种作法是行不通的，这个计划会遇到很多的阻力。马克思看到另外一种正规的、巩固的职业联盟的工会运动，但他没有详述它的价值。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根本看不到工会斗争的理论的萌芽，而只是看到他斗争的事实评价为无产阶级的有一定目的的活动。马克思不可能更加深入地探究工会斗争的真实本质和内部性质，因为在当时有关这方面的一切还在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发展。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61年版第 50—55页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1922年德文版

工人阶级最关心生产和交通各个领域中的进步，由此他们也是分散的所有制利益的敌人。因此正是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承担者。这通常也表现在工人对国家的态度上。在某个发展阶段上和面对国家的某种宪法，工人阶级甚至会对国家抱敌对的态度，而且曾强抱过敌对的态度，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对它抱敌对的态度。然而这只是在一定的统治情况对一定形式的国家才是适用的。但是国家是正个民族的连接者，是巨大的共

同利益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国家是一致的。工人是不和一定的国家连在一起的，他们根本和社会一直以国家的形式、通过国家联合起来这一点无关的。其他的形式也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也珍视一种国家按合理的观点赖以建立的基本思想。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 1961年

第28—29页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8日)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其自体并非终极的目的，毋宁只是为要贯彻一定的目的和努力的手段。而这类事情，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内既经有这种要求，是谁也不能非难的。至于当它实行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原来是不可预言，我们只有为它的实现而奋斗。但是要夺取政权就需要拥有政治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马上解决的最重要的战术上的问题，我以为就是：为了扩张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利，应该采取什么最好的方法。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5页。

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辽远，而似乎是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根据我们前面的叙述中所展开的原则，我不认为这个国际主义受到什么方法的损害。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103页。

各国人民今天已不那么容易参加战争了。采取坚决的态度，有时比继续服从更加有利于和平。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4页。

在这张口闭口以人民代表和人民立法这些与独裁不相容的东西为立脚点的时候，还是固执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名词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只有除去这个名词的事实上的意义，而赋与它以稍微缓和的意义，它才能同现实相一致。社会民主党的实际行动的目标，是避免痉挛的破裂，把近代社会秩序推向更高的社会秩序，并且创造为保障这种社会秩序所需要的状态和条件。社会民主党是从更高度文明的开拓者这种意识中汲取鼓舞和动力的，而且正是在这里面存在着他们所渴望的社会制度的道德权利。然而阶级的专政却是属于较低的文化。不管事情的当否与实现的可能性如何，阶级的专政必须看做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遗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89页。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传社会改良主义

某些方面认为，好象由我的论说所能得出的实际结论在于放弃由政治上、经济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但这完全是随意的推测，说这种推测正确，我是断乎要争的。

我对于期待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崩溃就要到来的见解，以及社会民主党应该依照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大灾变的期待而使自己的战术适应或从属起来的见解，不能不表示反对，这一点我是要坚持到底的。

赞成这种大灾变说的人，原来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断为依据，而那个论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错误了。

“共产党宣言”关于现代社会进化所述的预见，表述了这个进化的一般倾向，就这一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它在许多特殊的推论上，特别是在这个进化所必要的时间的推测上，却犯了错误。关于这一点，“宣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在他所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已经坦率地承认了。既然经济的进化所需要的期间比预想的要长远得多，那么进化或许会采取“共产党宣言”中所没有预想到、亦不能预想到的形式也未可知，或许会达到“宣言”中所没有预想到、亦不能预想到的状况也未可知。

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以“宣言”所记述的方式进行的。把这个事情隐瞒起来，不但无益，而且是愚不可及。看啊，有产者的人数今天不是在减少着，而是在增加着。社会财富的庞大增殖，不是伴随着资本家豪族的减少，而是伴随着大小资本家人数的增加。中间阶级在性质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没有从社会的等级中消失。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页。

明白道理的社会主义者谁也不梦想今天的英吉利仍可由于大灾变而立刻招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谁也不梦想应由革命的无产阶级一举而夺取会议。恰恰相反，谁也是更多地从事于都市等自治体的活动，同时舍弃过去轻视工联运动的念头，不仅同这个工联运动，而且同各处的消费合作社运动，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8页。

再说一遍，社会民主党越是决心使它今天的面目进一步明朗化，那末政治改良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恐怕虽是政策中的一大要素，但是认为恐怖的刺激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则是错误的。英国劳动者之获得选举权不是在宪章派运动最革命地活动的时候，而是在劳

动者为实现改革而与激进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4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这一著作的结尾曾经写道，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瞬之间的行动，如果人们根据这句话得出马克思的确这样看的结论的话，那末他这句话所表述的观点是不成熟的。不，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辅助手段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已经和它处于同等地位的阶级的巨大武器已经有了，即使他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不能立即获得多数，我们本身也不会遭受失败。民主选举权将始终掌握在社会的最大阶级的手里，而且这种最大阶级的阶级状况产生的不断前进的要求仍然存在。所有这一切会作为动力而存在着，并且将必然会迫使实行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改革。要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如果仔细看一下，到首都和其他城市去一下，调查一下农村的情况——太多种多样了，现代社会这个有机体是太富有生气了，它不是一个人人们在任何时候能够一举改变的没有生气的机体。

.....

“我的看法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来到了或将要来到，它不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上的决定性的战斗的结果，而是工人运动在其起作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胜利的结果，不是对穷人的压迫的太大增长和对工人的轻视的结果，而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增长的结果，是他们所争取到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论理上相对改善的结果。我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有组织的创造同正在斗争的民主制在国家 and 市鎮村中的创造和成就的结合中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震荡和一切争夺，我看到了阶级斗争本身具有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2年版

第32—33，33—34页。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8日）

这里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一般地实行暴力的剥夺，而应通过组织和法律实行渐进的交代。

有着严格等级制的封建制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用暴力来破坏。近代的各种自由制度，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是同封建时代的制度绝然不同的。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进化。为此就需要有组织和有效的活动。而这是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00页。

劳动者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只能采取以革命家俱乐部的恐怖的独裁政治为支柱的独裁

的革命中央集权的形式。布朗基主义者就是这样设想劳动者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共产党宣言”以及该宣言作者的其他同时代的著作，也是这样设想劳动者阶级的政治统治的。然而“由于首先既有过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又尤其有过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二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宣言中所提出的革命纲领，“有某些地方已经陈旧了”。“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攫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新版序言中说的。他们曾指出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此有更加详尽的叙述。可是我们读一下该书的第三节就可以看出，从那里叙述的纲领的政治内容说来，它在一切本质的特点方面同蒲鲁东的联立主义非常类似。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第95页。

不会因挑衅而起来的，不怕逮捕，坚定不移的广大群众的抵抗力是非凡的。群众罢工的目的不是打倒敌人，而是使他们因疲于奔命而让步。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61年 第17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

德国的工会运动发展得非常快；它在一系列职业上就其数字和内部的组织而论，比世界上第一个和最老的工会运动即英国的工会运动还要好，它在某些方面能和英国的工会运动相媲美，我们能从至今不断增长的工会运动中作出结论并且希望：德国的工会运动还能大大变样，还能大大扩大。没有工人阶级的巨大的自身活动，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工会运动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除进行议会活动外还进行工会活动，光是这个事实就向你们说明，议会制必然会麻痺工人阶级的自身活动这种说法是如何的不真实，自身活动在这里完全不需要停止，更谈不上已经停止。

可惜，我今天不能详细讲解这个问题。只是还要指出：除了议会活动外，工会运动在很长很长时间内仍是一个巨大的任务。我们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没有工人的职业工会组织也能行；工会将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的补充、支柱，在某些情况下将成为指路人。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61年 第7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版）

推翻一个政府在某些情况下是轻而易举的，但是颠覆一个社会制度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今天的状况下，发动一次总罢工，很可能也就是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很可能造成一种不得不进行巨大冲突的局面。但工人阶级毫无理由和他们切身的利益开玩笑，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是继续进行那种在实际中证明对工人阶级有益的事情。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61年，第11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版）

应该指出，如果对议会制加以片面的强调，那末它能使群众习惯于过多地依靠上
过多地期待上面和把希望寄托于上面，而他们自己的活动会由于这种方式减少和削
弱。如果正确的意志存在的话，那末议会制的确能作很多的事，但远不能作所有的事。
罢工同样不能作所有的事。如果有人这样提问题，议会制或是总罢工，那末这个问题在
一开始就错了。这样的问题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可以通过总罢工
而一下子被消灭的思想是一种空想。如果对此有怀疑的人看一下周围，看一看现今社会
的真实情况，看一看包罗万象、复杂的、由千百年发展而来的无数部分组成的有机体，那
末就会知道，这个如此复杂的有机体是不能一下子改造得了的，这样作是不能想象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61年版，第6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版)

工人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最有力的斗争工具是在巨大中心区聚
集得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劳动力。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61年，第12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版)

在大城市里，如果群众不上街，就未必能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另一方面，群众
上街会加深自己的影响，并会由此大大提高自己的作用力量。但是，必须注意到，装备
很差或装备不足的群众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行动一致的力量所进行的每一个斗争，
都很可能给前者带来失败和士气沮丧的后果。因此，应该力求不发生这样的冲突，而且
使罢工尽可能保持一种不用武力的示威游行的性质。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61年，第16—17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1905年德文)

在所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向民主让步；一方面受着这种
民主的影响，同时又由于愈勃兴的强大的劳动运动的刺激，对于资本的剥削倾向已掀起
了一个社会的反动。这个反动，今天固然还很微弱，但它的存在乃是事实，并渐渐将它
的势力扩展到经济生活领域之内。工厂法的制定、地方行政的民主化及其施政范围的扩
大、职工会制度和合作社完全从法律镇压下的解放，以及公共团体所办事业中对于劳动
组织的照顾，凡此一切都表示这个进化阶段的特征。所以德国对于工会还能加以压制，
这并不表示它的政治的高度发达，毋宁是证明它的幼稚。

然而，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便越是减少。所
以，那些固执灾变说的人，就不得不象这一说的顽固的辩护者所曾经做过的那样，竭力
来反抗上述的进化，阻止上述的进化。但是，难道只有由无产阶级所作的政权获得才可
称为借政治危机而作的政权获得吗？而且它难道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这个阶级以外的整
个社会独占乃至利用国家权力吗？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2年版 第2—3页

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反對科學社會主義

乍一看来，把民主解釋為“民眾政治”似乎已經足夠了。但是稍稍思考一下就知道，這完全是一種肤淺的、形式主義的定義。今天使用民主這個字眼的人，幾乎都把它理解為政治形態以上的東西。如果消極地來說明，換言之，如果把民主解釋為不實行階級政治，即任何階級都沒有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特權，那可以說是向問題更接近了一步。實際上，這樣的解答已經說明了為什麼壟斷團體是反民主的這個問題，此外，這種消極的說明不象民主政治這個詞那樣有着引起多數人壓迫個人這個觀念（這個觀念才是對近代意識的無條件的叛逆）的余地。這是它的優點。因為多數人壓迫個人這個觀念即使是同民眾政治基本上完全一致，我們也認為是“非民主的”。民主這個概念，按照今天的解釋是包含着正義的觀念的。所謂正義的觀念，就是社會全體成員的權利的平等，而且正是這個權利的平等才是多數人的統治的界限。權利愈是平等，權利平等的觀念愈是支配着一般的意識，民主對萬民說來也就愈成為可能的最高程度的自由的同義語。

實際上，民主與無法律並不是同一個東西。民主與無法律並不是同一個東西。民主同其他政治制度的區別，並不在於不存在任何法律，而是在於不存在規定或承認以財產、門閥、宗派為基礎的特權的法律；不是在於全然不存在限制個人權利的法律，而是在於廢棄限制一般權利平等即萬民平等權利的一切法律。如果說民主是這樣同無政府狀態全然不同的東西，那末專制政治、暴政一類的字眼加於作為社會組織的民主，就不過是漠視一切區別的枯燥乏味的概念遊戲了。因為民主是依多數者的決議來決定事情的，各個人都必須承認多數者所決定的法律。固然，民主並不能絕對保證法律不被單個人看作是專制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的時代，民主社會的多數者幾乎可以無條件地保證不去制定經常危害個人自由的法律。因為今天的多數者往往會成為明天的少數者，因而壓迫少數者的法律也會威脅暫時屬於多數者的人們。實際上，內亂時代的多數者的政，是與近代民主的多數者的支配根本不同的。無寧說，民主制度存在得越久，少數者的權利越是被尊重，而在黨派鬥爭中也越是有沒有憎惡的觀念。認為不訴諸暴力就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人們，也許會從這種事情上得出反對民主的結論。事實上在社會主義文獻中也不乏這種主張。但是，不陷於這樣一種空想的觀念的人，即不認為近代國民將因延期的革命大危機的影響而分解為全然無關的無數集團的人，是會不僅僅把民主看做是為消滅資本而對工人階級有用的一種良好政治手段的。

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說，它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唯其如此，它不能做出任何奇跡才是毫不足怪的。例如，在瑞士這樣一個工業無產者占人口少數的國家里，民主也不能使政權落入無產階級手中。而在英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構成人口中最大多數階級的國家，民主也不能使無產階級成為工業的支配者。

然而不管是在英国、瑞士、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或其他国家，民主已经证明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如果通观赋予城市劳动者以选举权的1867年选举法改正以来的英国各项立法，那末的确可以看出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

民主即使还没有达到实际消灭阶级，但在原则上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人们或许要说民主的保守性质。这在某一点上说是正确的。专制主义或半专制主义都尽可能欺骗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以，在实行这种主义的国家，或者在仍然残存这种传统的国家，就有着夸大的计划、夸张的议论、烦琐的政策、对革命的危惧和压迫的预计等等。各个党派及其下的各个阶级，都知道一旦实行民主时自己的势力的界限，因而力求根据当时的情况，只实行一些可以合理地希望的事情。尽管他们为了能在实行不可避免的妥协——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要求，因而在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要比认真考虑过的要求高一些，但是在实现的时候是会恰合分寸的。所以，在民主的条件下，甚至极左派也常常表现出保守的色彩，改革也因为正确地循序进行的，也似乎要更加缓慢一些。这种倾向并不是不明显的。民主的选举权虽然是取定有选举权者为国家的参与者，但是这种假定的参与关系在长期间内必然要导致现实的参与关系。无论在数量上和教养上都还不够充分的劳动者阶级，在长时期内也许要把普遍选举权看做选举“屠手”的权利。但是随着劳动者的数量的增加和知识的提高，选举权是会成为使人民代表者从人民的主人变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英国的劳动者在选举议员的时候，投各旧党派的党员的票，这从形式上看来似乎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但是在工业区的选举中，“尾巴”支配头的情形要比头支配“尾巴”的情形多得多。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86—88页

不管哪个阶级或党派，如果问它们的多数人，让他们用最简洁的公式来表明社会主义的定义，他们一定要感到困难。不愿简单重复过去听到过的词句的人，一定要先弄明白应该表明的究竟是状态还是运动，是认识还是目的。所以，即使参考有关社会主义的根本文献，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说明也依其属于前述范畴的哪一方而有非常大的差别。就是说，一方是把这个概念看做从法律的观念（平等、正义）中演绎出来的东西，或者认为它的概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他方则把这个概念跟近代社会劳动者的阶级斗争等同看待，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合作经济。所以产生这样分歧的说明，虽然有时是因为解释上的不同，但大多数则不过是由于从不同的观点来考察、说明完全同一事物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特征，最精密地说，恐怕无论如何离不开合作社的思想。因为合作社既表现了经济的关系，也表现了法律的关系。表现这种法律关系的特点虽然同表现经济状况的特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要说明其理由却是不需要什么详细的证据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3页

工会或职工会，从它的社会政策上的地位来说，是工业方面的民主的要素。它的倾向是打破资本的专制主义，建立劳动者在工业管理方面的直接的努力。关于这种努力应该达到何种程度，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在某一种思想看来，工会的要求如果低于产业方面的无限决定权，甚至是违背原则的。但是这样的权利，正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空想的。这种认识使另外一些人否定工会在经济生活方面有任何固定不变的作用，而只是把工会当作各种不可避免的恶害中的较小的恶害来加以一时的承认。也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把工会看做是一种证据，说它实际上只是证明了政治的革命的行动以外的任何行动都是无用的。事实上，工会在目前及不久的将来，都将完成极为重要的产业政策的任务。它的任务决不需要它的全能，而且是跟它的全能不可调和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85页

从历史上说，自由主义负有破坏中世被束縛的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加于社会将来发展的桎梏的任务。自由主义虽然最初是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出现的，但是事实上它却表现了远为广泛的一般社会原理，而它的完成就将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决不应造成任何新的束縛。个人应该自由，但是并不是在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是摆脱对社会的一切义务的自由，而是各个人的行动及职业选择摆脱任何经济的强制的自由。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手段才能使一切人获得这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也可以名之为组织化的自由主义。因为只要我们更加精密地考察一下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组织，就可以发现这个组织与外表上类似的封建制度的显著不同之点正是在于它的自由主义，换言之，亦即在于它的民主主义的结构和解放的性质。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93页

最近的大自由运动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利。以自由为名的各党派，事实上都是资本主义的不折不扣的卫兵，至少随着时间的经过也会是这样。因此，这些党派同社会民主党处于敌对的关系上是很自然的。但是作为世界历史的运动的自由主义，无论从时代的连续上来说，还是从它的精神内容上来说，社会主义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社会民主党在就各种根本问题决定其态度的时候，总是实际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的某项经济要求而不得不采取危害自由的发展的方法时，社会民主党总是不惜采取反对的态度的。在社会民主党看来，保障国民的自由，要比实现某项经济要求占居更高级的目的，即使在表面上看来是强制的手段。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这种强制手段，这里的所谓强制常常意味着社会自由总量的增大，即提供较被缩小的部分更为广大范围的自由。例如，法定最长劳动时间，事实上是最低自由的规定。就是说，禁止每天自由的出卖超出一定的时间长度。因此它在根本上是同一切自由主义者所赞成的禁

止将身体出卖为人格奴隶站在同一立场上的。正因为如此，最初实施最长劳动时间的国家是欧洲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瑞士，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民主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形态。自由主义是对外部强加的制度、对仅以传统为存在理由的制度下人民所蒙受的压迫的反抗运动。所以自由主义首先要求作为时代和人民的自主权的原理来实现。这两个原理引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国家法学者的不断争论。卢梭在他的“民约论”里把这两个原理当作宪法的合法性的根本条件，而法国革命则在充满卢梭的精神的1793年的民主宪法里面把这两个原理宣布为不可让渡的人权。

1793年的宪法是那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的当然的表现。这个宪法过去和现在如何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只要看一下它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了。巴贝夫和平等论者曾把这个宪法看做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良好工具，因而曾把恢复1793年宪法当作他们的首要要求。其后，自称为政治的自由主义的东西，不过是被削弱了的自由主义，不过是古代制度崩溃后适应或满足资本主义的市民阶级的要求的东西，不过是曼彻斯特学派对经济的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所创立的原理的削弱或片面的表现。事实上，自由思想，从它的概念的内容来说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的自己责任的原理。乍一看来似乎完全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东西，但依我看来，社会主义既不能从理论上否定它，同时在能够想象的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也不能停止它的作用。老实说，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我们在理论上可以任意设想人类行为的自由。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必须以作为道德律的基础的自由为出发点。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道德才是可能的。与此相同，在有着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民的现代国家，在今天这样的交换的时代，如果不假定全体有劳动能力者的经济的自己负责，那末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社会生活。承认经济的自己责任，是个人为了社会所给予的效益而对社会所做的反对给付。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90—92页

传统本来是保守的，批判通常多是破坏的。所以当重要行动的时机，虽属事实上最正确的批判也可能成为有害的，而且也可能是因而受人非难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116页

工人的阶级运动要求在一切领域内改造社会，使之没有阶级区别并能通过社会本身有计划地调节整个经济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公式，它不只是雇佣工人的事情。……

如果我把在这里所发挥的一切概括地说一下，那末社会主义的定义就是：

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认识了本阶级地位和本阶级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自然意向的总和。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31—32页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1918年12月28日)

我曾向五个人提出了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从一个老工人那里得到了精辟的回答。他在纸上只写了两个字，即**团结**。在我看来，这是用两个字能表达的最正确的答复。这种整体的感觉，作为社会的人的团结一致，就是普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显然，他是把这种思想与一定社会经济观念（而且是一种基本正确的观念）联结在一起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29页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1918年 12月28日)

人们可以这样说：的确，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封建主义，贵族，君主，他们还都掌握大权，他们今天还有足够的力量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力，正如他们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反革命的机构一样。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作不到，即他们不能阻止工人阶级的发展；在他们所作的一切事情上，他们不能阻碍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日益增加，尽管他们也煞费心机，……工人阶级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必要产物在不断增长，甚至最强大的反动势力在反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方面，归根到底也不能有所成就。而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正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于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 第14页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 1905年德文版)

一定的任务决定于种种的因素，如：该党活动领域的一般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发达程度；该党的敌对党派或友好党派的性质；该党经常使用的手段性质；主观的理想主义的要素如该党对本党的目的及实现此目的最善方法的见解，等等。关于第一点，依国家的不同而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是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工业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国家，也可以看出非常显著的政治的差异和国民精神倾向的差异。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作为国民生活基调的习惯、世袭的诸制度及各种传统，虽然产生观念形态的差异，但观念形态只是慢慢地接受这些东西的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的诸政党，即使在最初以同一的前提为其活动的出发点，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这些党派的行动也不得不适应其本国的特殊情况。所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虽然可以规定出一定时期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一般原则，但是要规定出适用于一切国家的行动纲领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01页

正如在前节所说的，民主主要远较今日所屡屡推测的、在更高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换言之，民主不仅是手段，而且是实体。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或民主传

统，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恐怕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工人运动或社会民主党也一定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它的理论说明）是法国大革命之际开始被重视的权利观念对于工业劳动者关于工资和劳动时间的运动所发生的影响的产物。当然，这些运动即使没有这种权利的观念也是会发生的，正如在这种观念和这种运动发生以前就存在着与原始基督教相关联的人民共产主义一样。但是这种人民共产主义是很模糊的，而且是半带神秘的东西。所以说，工人运动如果没有上述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这至少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进化的必然伴随者）作为基础，恐怕是要缺乏内在的联系的。在今日东洋各国可以找出与此类似的例子。缺乏政治能力而又受到迷信和不完整的教育的劳动者阶级，虽然也可在一时之间揭起叛旗，结成小规模对党徒，但是决不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运动。要让偶然企图叛逆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观察力和相当发达的权力观念。所以，政治的权利和教育，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中占重要的地位。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01—102页

我所说过的“人所称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个东西，在我却不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那句话，往往被人解释为连社会主义运动的任何一定目的也一概否定了。而普列汉诺夫甚至还揭发我是从舒尔泽—格柏尔尼兹所著“为了社会和平”一书中摘录了这个“著名的句子”。的确，该书某节内说，以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终极目的，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固然是不可缺少，但对于情愿把将来的目的暂搁在一边而首先要求达当前目的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就并非如此。因为，据那本书所说，某种终极目的对实际目的说来是可有可无的，而我也承认对于终极目的不感兴趣，所以我就是舒尔泽所说的“无批判的附和者”。但是，须知要证明这样的事情却非有极丰富的思想不可。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7—118页

当我写作这篇关于终极目的的文章时所曾考虑的，并非这段文句的一切方面，而是它的根本思想。因为，这段文句不是说结局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反之，预先详细规定的终极目的不管是什么也是对运动不重要的东西，此外还说出了什么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声明过，关于终极目的那句话，只要许可这样解释，即应当宣布一切作为原则而定式化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那我就乐于放弃那句话。但是，在关于运动的发展的先见的理论中，超过如上所述为一般所公认的目的即所以决定运动之原则的方向及性质的理论，就必然会成为空想论，到了某一时期，这种空想论会阻碍运动之真正理论的和实际的进步。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9页

不论是在什么样的进化阶段上，凡不足以使人期待工人阶级当前的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言，总应当舍弃，这和那拒绝具有小改革事业及友党关系的资产阶级诸党的援助的誓约常被忘却干净，正是相同的。而在党的会议上随时能听到有人表示不满说：在各处竞选时，未曾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放在重要地位。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9—120页

实际上我不仅不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依存于社会主义里“内在的经济的必然性”，而且反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给与社会主义以纯唯物的基础，唯有关于这一点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27页

假如有人或则把将来可能有的事移到现在来思考，或则强词夺理说它是现在的事实，那末，他就还没有克服空想论。我们必照实地来观察工人。并且工人既没有象“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那样一般地赤贫化，也没有象他们的侯臣对我们宣传的那样摆脱了并谬见和弱点。他们是担负着那支配他们的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的条件的恩惠和重荷的。且这些条件以及条件的作用，也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除掉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2—133页

要而言之，要在两三年之间，把整个工人阶级引导到本质上和今天围绕着它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另一关系上去，那是办不到的。对于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数量关系爱说大话的人，尤其应该首先了解这个事情。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4页

但是，看见过现实的工人运动的人，谁都知道下面的事情，即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重视去掉资产阶级出身而冒充无产阶级的人的眼中视为庸俗的那些性质，工人运动根本不珍重道德的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有着使无产阶级化为“俗物”的倾向。至于无祖国也无家庭而放浪不羁的无产阶级，恐怕不可能搞坚决而持久的工人运动吧？并且这决非资产阶级的谬见，反而是经过数十年组织运动所获得的确信，这种确信又使英吉利工人运动许多领导人——不管是社会主义者也好，非社会主义者也好——化为有节制的运动的热心信奉者了。工人中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自己的阶级的缺点。他们中间的诚实者，向来不讚美这些缺点，却以全付精神来努力克服它们。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4页

比如某阶级的大多数人们，住在狭小的房屋内过着拥挤的生活，受着劣等的教育，而又得着不安定不充足的收入，我们不能从这个阶级期待高度的知识和道德的状态，来作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创设和持久的前提。所以我们不欲对他们阶级的人们说处于这种状态的假话。现代工人运动把所修养得来的知识，决断力和实行动力大大地积累起来，却是我们喜悦的，但是，不可把能适用上流社会即数十万人们的事，无批判地原样不动地搬过来适用于大众即千百万的人们。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35页

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前提条件是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的发达，第二前提条件是劳动者阶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之行使政治统治权。这种政权行使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4页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无产阶级获取政权。获取的方法虽有种种，但大致可分为二：一是行使选举权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手段的议会斗争的方法，一是采取革命手段的暴力的方法。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相当后期才把上述方法中的后者看做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的方法。今天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仍然把这种方法看做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往往认为这是捷径。

人们所以抱着这种观念，是因为劳动者阶级是人数最多的阶级，同时作为无产者又是社会的最活动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在用那足以防止现存制度的基础复辟的制度来代替现存制度的基础以前，是不会停止活动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5—76页

说工业劳动者渴望社会主义的生产这种说法，与其说是确定的事实，不如说是假定的事实。选举当中社会主义者得票数的增加虽然可以说明拥护社会主义的努力的人在逐渐增加，但是任何人都不认为投给社会主义者的票是来自社会主义者。即使假定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非社会主义者选举人和非无产者选举人与没有选举权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数，在四百五十万成年工业劳动者中，社会主义者方面的选举人也只有二百一十万人。就是说，德国的工业劳动者中，有半数以上今天对社会民主党是不关心的、不理解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对抗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78页

没有人想破坏作为文明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市民社会。无宁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既不想瓦解这个社会，也不想使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无产阶级化。不，无宁说社会民主党所不断努力追求的，是把劳动者从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市民的社会地位，使市民阶级或市民的地位普遍化。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建立无产者的社会来代替市民的社会，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所以，与其使用前者那种意义不明的词，不如采用后者那种意义极为明确的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论敌所指责的在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和实践之间存在的大部分其他矛盾。少数的社会主义报刊现在满足于玩弄反市民的词句。如果我们过着神人一般的宗教式的生活，这些词句也许是适当的。但是当个人生活即使是“资产阶级式的”，也不能算作违反社会主义感情的今天，这些词句实在是难于令人满意的。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90页

考茨基哲学观点摘要

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言論

在我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我极不同情马克思的理论。我对于马克思理论曾采取批评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正如现在那些讥讽我盲目拘守教条的人一样。但是我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那时，以及后来每当我在基本问题上有了任何怀疑，最后我总是看出，其罪在我，而不是在我的先生；对问题加深研究就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每一次新的研究，每一次再考察的企图都使我更加信服，更加承认那种学说，这学说底应用及推广成了我毕生的责任。

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1898、12）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9页

然而“资本论”对于我们研究农村经济关系，却是最可宝贵的，这不仅就他的结果而言，他的方法论也足以使我们在这一领域内顺利地继续这一已经开始的工作。如果在这本书内我能够发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便应归功于我这两位伟大的先生。我特别愿意声明这点，因为从某个时候起，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已有一种议论，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底观点是陈旧了。这些人说，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是创造了一些完全值得注意的东西，固然，在现时他们的著作还能推动思想，但是谁不愿意拘守教条，谁就不必完全屈服于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只可作为达到较高点的过渡阶段。他们说，这是从马克思辩证法观点中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辩证法说，永久的真理是没有的，一切的发展是经过现实的否定来完成的。

这似乎是合于哲学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同时产生出很有趣味的结论：即马克思之不正确就是因为他的正确，辩证法之不可靠，就是因为辩证法的可靠。在这个结论中无可争论的只有一点：即辩证法的虚妄，但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虚妄。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第三版第一三三页）一书中曾指出，把消灭的否定当作辩证过程底分子是何等的妄谬。无论如何发展之经过否定并不是说否定一切的存在，它是以那发展中的事物的继续存在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但不是人类社会的毁灭，而只是它的某一发展状态中某几方面的毁灭而已。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别于前期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并不加以毁灭。如果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之否定，那末社会主义的制度就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恢复个人的财产，但这种财产是以资本主义时代之收获为根据的”（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七九三页）。如果发展不是简单地否定，消灭，而且还是保存；如果在现有的应当毁灭的东西以内，发现出值得保存的东西，这时发展才是一种进步。进步就是以前诸发展时代底收获之积累。有机体之发展不仅由于适应，而且由于遗传，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阶级斗争

不仅在于毁灭和重新创造，而且在于征服，也就是说在于现存的保存；科学之成功，若不承袭原先的收获，又不对原先的收获取批评的态度，就没有可能；艺术之进步并不是单单基于一种不承认有任何遗传的天才的禀赋上面，而且也基于对前辈底典型的著作之理解上面。

只有实际的研究，才使我们能够判断什么应该毁灭，什么应该保存；辩证法在这里就绝对地不相宜，它不能作为代替此种研究的尺度。它只是帮助研究系统化及磨鍊研究者之见解的一种手段。它的最高的价值就在此。然而它并不直接提供现成的结果。

从马克思学说本身中推论出它必须为较高的学说所代替，这种意见是由于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了错误的了解所致。在这一学说中何者是错误的，何者为科学之永久的收获，这个问题之解决不是引用辩证法，而是要研究各种事实。但是从我的观点看来，这种研究直到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地步。我只看见一些犹豫和怀疑，但没有看见一种能够超越马克思学说的新真理。

但是单单犹豫和怀疑，在辩证法意义上还不算是否定，还不算是超越现有知识界限的继续发展，也不算是胜过现有的理论。怀疑的原因，照我的意见，如其说是由于被怀疑的学说，勿宁说是由于怀疑者的本身。我想这不仅根据研究这些怀疑的结果是如此，就是根据个人的经验也是如此。

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1898年12月）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7—9页

只要注意的看一下马克思理论的性质及其理论创立的时代，此种情形即很可瞭然。马克思理论的降生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无产阶级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即资产阶级自己也已感到自己优越地位之不见得永远可靠了。因此而产生了此种宣布一切是在永久变动，现存一切都无坚固性的宇宙观；因此而产生了此种宣布阶级斗争为历史的必然性并且全历史过程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论；因此而产生了此种建基在更深刻的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说，由劳动价值而推论出剩余价值规律（简言之即利润），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必然性，而此两个阶级的斗争将至于颠覆资本主义。

但是这还不够，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只是创定了此种学说，并且由此学说而得到了效果。只因为有了他们研究的基础，才能够得到科学的确信；无产阶级现在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提高社会的任务是担负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此所以他们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战斗的无产阶级，参加他们的队伍，在这种队伍中作区别胜负的斗争，努力于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以提高无产者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的水平。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129—130页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绝不能与任何死板教条的宇宙观相比拟。马克思认为宇宙的实质是在运动。只有那些限于眼界的人才认为物质是在静止的状态中，因为眼见的都是静止的。一切都在运动中，虽然这种运动有时节不能看到。或者也可以说马克思认为革

命是“物质本身”。但是运动是矛盾的平衡与斗争。矛盾的接触造成运动。运动的本身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引起了新的运动。此种矛盾的斗争运动是固定的，到处通行的。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 第114页

规律及其结果，自然是两件不同的东西。在自然界或社会内正在完成的诸过程底研究者，应当把这两件事分隔开来，如果他希望发现它们受支配的一些规律。他应当考察每一过程在其纯粹形式内，把它和足以破坏它的正确性的那些附带的情况分隔开来。只有用这样方法他才能了解作为一切现象底基础的规律；知道了这些规律，就不难了解现象本身。用相反的方法，两者都不能了解。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73—74页

任何自然科学规律或社会规律，都是企图解释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现象。但是，每个现象未必仅仅决定于一个原因。各种不同的现象会有形形色色的极其复杂的原因；此外，现象本身也不是各不相干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所以，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研究者，负有双重的任务。第一，他应该把各种不同的现象区别开来，使它们不混在一起；第二，他应该把引起这些现象的各种原因区别开来，把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经常原因与偶然原因区别开来。这两种研究，只有借助抽象方法才有可能。自然科学家在研究中可以利用一系列的十分完备的工具，采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但是，社会规律的研究者应该完全摒弃实验的办法，而应该满足于很不完备的辅助手段。

研究工作者是借助抽象方法发现他所想解释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规律的。不认识这个内在规律，就不可能解释相应的现象；但仅仅依靠这个规律，是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各种现象的。

某一个原因可能被其他原因所削弱，甚至它的作用可能完全抵消；但如果由此作出结论说这个原因根本不存在，那就错了。比方说，物体下落规律只有在真空地方才有效力。这个规律说明，只有在真空中，铅块和鸡毛才会以相同速度下落。在有空气的地方，由于空气的阻力，结果就不同了。可是，物体下落规律仍然是正确的。

价值规律也是如此。当商品生产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商品价格的规律性不能不引起生产参加者的注意，不能不推动人们去研究规律的原因。在研究商品价格以后，就能够确定价值量。但是，象重力并不是决定物体下落现象的唯一原因一样，商品价值也不是确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原因。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有些商品的价格不仅有时而且还经常地低于价值。譬如说，黄金和钻石的价格据说就始终没有达到十足的价值。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长时期低于价值。

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利润对价值规律起影响，因

此，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不仅有可能，而且还必然经常地高于或低于价值。虽然这样，价值规律在这里仍然是有效的。价格和价值不相符合的现象，也只有借助价值规律才能够加以解释。现在，我们只能够这样说，要详细地把这一问题谈清楚，就必须了解资本和利润的规律。我们在后面还会重新谈这一问题。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6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7—19页

我们所实际需要的研究，是要能在全部混乱的事实中，发现其间的联系，阐明隐伏在现象里面及决定现象的性质的诸根本倾向。直到现在，一般农业问题之部分的问题，如大生产与小生产间之关系、债务承继权，劳动者的缺乏，海外竞争之类都是当作独立的现象，孤立地加以研究；现在就得将它们当作单一与一般过程的局部现象来观察。

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1898、12月）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6—7页

研究唯物的历史观也是要以这种观点。其命名之本身即已显然，此处的问题是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他（唯物的历史观）——攻击那些对于他们虚伪的了解——并不努力于解释人类生活的一切的表现，他只在研究在某种时期所发现而在别个时期所没有的特殊状态。在另一方面，他并不解释人和人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性，他只在研究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个体间综合的特性。

此种特殊的社会表现反映出某种的规律性。在相等的社会状态之下他们是要反复重演的。因此这些是不能够以单个人的偶然的影响来叙述清楚的；而那些能够活动于该时代前，该时代后的物质与特性也不能视为这些现象的起源，例如气候，田地的特性，民族特性等等。马克思在经济关系特性中，找到了这种每个历史时期特性的来源。

人类社会是一种组织，这种组织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生产。人不能够单独的生存。要想得到自己的必需品，他应当同其他的人结合。但是他同其他人结合的行动方法并不依赖于他的生产，而是依赖于各种条件，不只是技术的状态，并且还有气候，田地性质等等。因此后者（气候、田地等）的条件在历史上也形成过作用，不过他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影响生产方法而已。所以，虽然他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活动不是永久一样的。例如，希腊的地理特性，因为有许多内海港湾及海岛形式，所以在某种条件之下对于商业是很有利的，并且这种条件当时很有利的帮助希腊的发展。但是当大的航业还未发明的时节，这些因子是不能够有什么帮助的。在另一方面，当航业的发展已经达到更远而沿岸航行已经表现落后的时节，他也就失掉他的意义了。

现代人类合作的方法及其关系，这是一定的现象，人是不能够按着他个人的意志来变更它的。但是这种合作的方法是随着劳动分工的程度而愈复杂化的；并且还造出了特殊的职业，而这种职业按其对于社会之力及意义上看来是彼此不同的。由此而易于造成管理阶级与被管理阶级间的对立。共同的活动变成了彼此的斗争。每一个特殊时代所通行的特殊方法，都能反影响到该时代人类的思想与情感，创立出其异于别个时代的特征，

决定这个时代的政治，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的特色。

历史的唯物论的简短的解释就是这样。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117—119页

在社会和家庭等問題上的观点

人类社会有两种大特色。第一，我们前已说过，动物的个体，他本身具备有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各种器官，至于人类社会的个体，自分业发达以后，他便不能没有社会而单独生活。象鲁滨孙那样没有任何的机关以产生任何的物件，这种事实只能于“儿童故事集” Childrecis Story Books和“有产阶级的经济学”中找得出来，有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相信“发现社会法则的最好方法，是完全不去理他”。人类本来就倚赖于社会，而受社会的支配，只有由于此种特色的特别性质，才能够理解社会。

其次人类社会之第二特色，是在于“不绝变化”之一点。人类社会为着区别于动物社会的缘故，常常是依于器械技术之进步而发达。动物社会的发达多半只跟着组织动物社会的动物个体之发达而发达。人类社会发达的进程实在是急速得多，但是若使把社会和个人的发达相对照，以为社会也和个人一样，由幼年时代进至壮年时代，再进至老衰乃至死灭的时代这是非常的错误。只要地球上诸势力的源泉依然存续，因而器械进步的基础不消灭，人类社会便绝不会老衰乃至死灭。人类社会将要跟着技术的进步而永久进步，而在这个永久进步的意义，便就是所谓永生不灭。

人类社会是依着他所有的器械，和使用器械的各个人而异其形体，人类社会各个人间之社会的关系，即基于使用器械的方法。所以器械次第进步，而使用器械的人们，若使他的数目，他的心力和他的体力没有减少，社会便不会有死灭的事实。

无论在那一个社会，“死灭”决不是永续的状态。因为某种特殊事情的结果（此事以后再说）社会确实是暂时死灭过去，那些“社会要求所发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变成僵硬，且阻碍器械技术，和社会人数及其心身精力的发达，甚至发生反动退步的运动。但是就历史上说，这些现象到底不是永续的，这些社会进步的障碍，或且由于内部的运动——革命——，或且多半由于对外的战争而早晚消灭过去。再，社会随时变换他一部分的分子，改变他的领域或且名称，这等事实，在研究的人看来，好象是呈老衰死灭的现象。但是，在实际上，这也如同个体一时患病一样，不久便恢复他的元气。举一个实例说。罗马帝政时代的社会，并不是死灭，实借着日耳曼之血而返老还童，自民族移动以后，他们和新民族混合，把他们器械的技术加以改善，并且创造许多器械的技术。

考茨基：“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

见：商务 1933年版 第104—106页

我们不属于那些人，他们把市場上的竞争与生存斗争混为一谈并以自然的必然性来解释它们。社会成员底某种相互竞赛及选择最适当的，当然是一切社会继续进步及巩固已经达到的发展底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是，要是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底实质既不和这些竞赛相容，也不和这些选择相容，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阶级差别底消灭，各个社会阶级底生活程度底平等绝不意味着任何足以提高各个个人能力的社会差异底消灭。现时在工人联合会内部，在它的会员间并没有任何阶级的差别，任何生活舒适水准上的差别，我们看到差别是在尊敬上、威信上、个性表现底方式上以及和这些情形相适合的——在选举代表和管理全工会事务的人时的竞赛和选择，很显然地，这些差别在如象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整体内，还更加增长。生活水准底平等，一点也不压制互相间的竞赛，而且也不会因调换较高的而同时是最负责，最困难的职务的时候，使选择最适当的人成为不可能；平等可能是这种竞赛底必要的前提条件。马的竞走，若是从跑马場底不同位置开始赛跑那是不可思议的；一开始就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竞赛，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然而，选择最适当的人只有在处于同一条件的人们当中才能实现。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244—245页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动物的有机体，也不是植物的有机体，而是特殊的有机体，但总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个人底简单的混合体。并且作为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就一定要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组织起来。愚蠢的想法，似乎在社会内一部分可以在某一个方向发展起来，而另一部分，同样重要的部分，可以在相反的方向内发展起来。社会只能在一个方向内发展起来。但要使有机体底每一部分从自身中产生出对于自己的发展所必要的动力并不必要；只要有机体底某一部分对于整个有机体产生出所须的力量就够了。如果大工业的发展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如果这种工业在现社会内是占统治的力量，那末它就替社会主义征服那些不能从自身中产生出这种变革底前提条件的领域，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它必须为着自己本身的利益，为着社会团结一致和协调的利益而这样做。

我们不能做出比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坏的对现社会的预测，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洋洋得意地宣告：“让工业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底道路走向‘个人主义’。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如果农业是充分有力的，足以抗拒社会主义，同时又没有力量把“个人主义”强加手工业，那末这种情形就意味着并不是拯救社会，而是毁灭社会，是不断的内战；幸而资本主义剥削底这个最后的救生锚对于人类社会是不可靠的。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50—351页

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社会是单一的有机体，但是它和动物的有机体之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各部分并不是以同一速度发展起来的。有些部分在其发展中较为落后，为其他部分所超越，因而在它们统一体底利益上需要借助外在的作用来推动，以

便与整体相适应。这种情形适用于各个国家，也适用于各个阶级。有一种思想好象承认社会发展底原则，在排除一切突变，排除一切人为的，也就是说，排除对社会现象的自觉的干涉，没有再比这种思想更错误的了。这种原则单只排除任意的干涉，排除与社会发展底诸倾向立于矛盾地位的干涉，排除单为我们的一些愿望和欲求所指导而非为社会的预见所指导的干涉。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81页

有人说，如果大批欲望低、知识水平低的新的无产阶级分子要是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在经济上完全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分子要是使有组织的工人底一切努力麻木不仁，那末在工业区中的鼓动就不会成功。

这种论调从个别工人阶层底狭隘的眼前的利益底观点来说，从狭隘的行会手工业者底观点来说，而不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走向新社会制度的动力——底观点来说，那是对的。如果上述的论证是正确的，那末工业无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就应当和一切增加自己的队伍作斗争，即是说，自己取消自己胜利底必要条件。诚然农村群众流入城市会妨碍有组织的工人在无产阶级当中占据特权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流入就有可能把劳动人口底许多阶层组织到并联合到战斗的无产阶级方面来，否则他们就停留在无产阶级队伍之外甚至部分地供作工具来反对他。自然，把新兵引向胜利，比老兵更困难，可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军队中新兵以其极大的热诚及其人数之众多战胜了没有办法来补充自己队伍底损失的欧洲专制国家底老兵。这样看来，无产阶级军队胜利底保证，不在于他的老兵底发展，而在于很兴奋地在他的旗帜之下新兵数量底迅速增加。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03页

现时很流行的学派，凭籍着康德及斯宾塞的学说，不作深远的研究，而喜欢把自然界底规律应用到社会历史方面。自然科学的许多成就在我们这一世纪是这样光辉，它们很容易使自然科学家相信，似乎现在在他们的锦囊里有了妙计足以解决那些甚至离他们很远的领域中的一切的谜。另一方面，简单地把正确地被确定了的自然规律推广到社会生活方面而不作复杂的研究，以发见社会生活中特殊的固有的规律，这对于某些社会学家倒是很方便的。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3—34页

这样说来，历史这个东西，就大体说，不过是一盛一衰，同一圆环的反复罢了，正如同单独一个人，他常常能够树立一些比他已经达到的更为高尙的目的，而屡屡失败过去，所以这个历史的圆环也不过是一齣恐怖的“悲剧的喜剧”，所有他里面最高最强的东西，也常常遭没落的悲运。

考茨基：“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

见：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 第85页

回溯四十九年前，马克思，昂格斯 tu8cs 指出来在最后的分析中，人类的历史不是由意思所决定；是由于顺从某种隐藏的法则，而不是顺从某人的愿意或幻想的那样一种不可抵抗的经济发达所决定。在前章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是怎样进行；怎样引出新生产方式，因而需要新社会方式；怎样使人类发生新慾望，使他不能不回头影响到社会状况，而想出使社会适应于生产进行相合的新制度。因为我们总记得这种适应的作用，自己不能进行，他必须要人类脑筋的帮助。没有思想，没有意思，便没有进步。但意思不过是社会进化的工具。第一个动力不是从意思发生的，如以前一些人所相信，现在仍然好多人那样的所想一样第一个动力，是从经济状况中出来。

所以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决定社会进化的趋向；思想家所能做的，是发现，是认识，是引导。他们能做这些事，比例子他们对于进行的状况懂得明确的程度而定。但他们不能自己决定社会进行的路程。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106页

事实的进行，不是毫无所赖于个人。每个这社会上活动的人，对社会都多少生些影响。亦有几个人特别因为他能力或社会地位的优越，能给全国民很大的势力。有些人靠启迪人民以促进社会的发达，建造革命力量，使这种力量勇猛而审慎的实行出来。别的人把他的力量用在反的方面，阻碍了许多年的社会进步。前者是被社会进化论所激励，想减少进化所需要的痛苦与牺牲；后者恰恰相反，想把痛苦与牺牲更加增些。但无论是最强大的君主，或者最聪明最仁慈的哲学家，没有人能随意决定社会进化所将取的方向，而精确的预知这种这种进化所将采的新社会方式。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108页

人家每怪社会主义者要打破家庭；其实依我们所知道，每种生产制度之下，总有他特殊形式的家庭，有家庭关系的特殊制度去适应他。我们不信现在的家庭制度是最高的一种方式。我们盼望在新而进步的社会组织之下，发达出一种家庭关系而更高尚的方式。但这个主张，是与使家庭关系全然瓦解的不同。使家庭关系瓦解的人，——不仅想这样做，而且在我们面前实际已经做了的，——不是社会主义者，反是资本家。古时许多畜奴隶的，或随意的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但资本家变本加厉，乃甚至于从为母的怀中，夺婴孩以勉强他付托于生人之手。盈千累万的这种事，虽是每天发现；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却设立了许多所谓慈善机关，使母子等更易于分离。然而这种社会，因社会主义者只信家庭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反映，他们看得生产制度更远的变迁，必然发生更完善的家庭关系。然而这些人偏只怪他们要打破家庭。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民国十年版 1921年 第20—21页

世人既怪社会主义者要打破家庭关系，还说社会主义者要公妻。其实两个罪案，都是一样不能成立。社会主义者原只主张纯洁的恋爱，正与公妻乃至一切性慾的压迫与放纵相反。社会主义的世界，只以恋爱为结婚根基。这种纯洁的恋爱，亦只有在那种社会里做得到。至于现在社会试看到底如何呢？

无助的妇女，被勉强去到工厂商店矿山里去谋生活，因之堕入资本家贪慾陷阱中。资本家不但利用他们的无经验，给他们少得不够自己开销的工钱；而且对他们暗示，或者甚至明说，只有卖淫是补充收入的个法子。无论甚么地方，工厂中女工增加，必然卖淫的事亦增加。在近代国家，虽那些基督教传布得极发达的地方，那些兴盛的工厂中，女工仍然给工钱很少，令他们不肯卖淫，便只好生生饿死。资本家宣布说，要工人竞赛作工能力，要工厂发达，不能不用这低的工钱。因为工钱太大了，他们会失败。

卖淫的事，从世界有贫富以来便有了的。然而从前卖淫，还只是界乎乞丐与盗贼之中的一种阶级，是社会上的一种奢侈品，只备以供豪富子弟使用。那便卖淫的事废了，还不至危险到社会的存在。今天却不然了。不仅那些下流女子卖淫，女工为金钱的原故，亦不得不卖他的身子。女工的卖淫，更不仅只是社会的奢侈品了，成了生产事业进行的一个立脚地。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子。忠于眼前社会制度的人，自己犯了个罪，却偏要把这个罪名加于社会主义者。公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色。这种公妻制度，于现今社会既然这样重要；亦有些现社会代表人，公然宣布卖淫是必要的事。他们不能懂劳动阶级消灭，便卖淫制度消灭。他们的智慧，既是这样晦塞；他们亦不想出世界上会有不公妻的社会组织。

公妻是上流社会所发明，与劳动者无关。公妻是剥夺劳动者的一个方法，这不是社会主义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反面。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民国十年初版（1921年） 第21—23页

反对社会主义最广大的偏见，卒足以为社会主义是要打破家庭的见解。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有那远打破家庭的见解。便是说，用法律或武力解散他。只有最粗线的错解，会把社会主义看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想得家庭生活，可用命令建设或打破，亦是一种蠢见。

近代家庭形式，并不仅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世界，并无打破家庭的需要。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113页

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是要遏抑经济的发达，乃是要给他一个新动力。经济的发达，将从

家庭工业的圈子里，进到成为一个个的专门实业。将来的进行，仍如已往的一样。他影响于妇女身上，是不待说明的事。妇女将不复为个人家庭的工人，将成为大工厂的工人了。但在那个时候，不是象今天一样的这种改变，只是由家务奴隶变成赚工钱的奴隶；不是象今天一样从他家庭保护之下赶了出来，放在暴露无助的劳动家地位。妇女因与男子在协力的大工厂同时作工，故妇女与男子平等。在群众生活中，有同一的权利责任。他将是男子的自由同伴，不仅从家庭奴隶方面解放了，亦从资本主义的奴隶方面得了解放。女子既与男子平等，为他自己的身分，他即刻会把法律所许或不许的卖淫事业停止。这才是历史上第一次真看见的一夫一妻制度。以前只是虚伪的罢了。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114页

然而，如果历史家不把一种世界宗教认为一个超人的产品，而把它认为一种社会产物，则他的态度便截然不同了。基督教起源时代的各种社会情况是为人们所很熟识的。我们也可以借赖研究基督教的文献而较为准确地断地原始基督教的社会特性。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1908，9）蔡启芳等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5页

……头脑简单的肤浅历史家便相信基督教团体中的一切伟大而往往至于流血的冲突——一切表现于宗教旗帜之下的斗争——都只不过是字句解释的斗争，因而又是人类的愚蠢性的一种可悲的例证。然而假如有人在解释一种社会的群众现象时只说那是参与者的愚蠢性，则其实这种愚蠢性只不过是那个观察者和批评者的愚蠢性，他显然是不能在各种他所不熟识的见解和意见中找出他的观察方向，或者不能深察各种隐伏于这种思想形态之下的物质情况和动机。就通例说，这些战争原是各种很实在的利益间的斗争；当各种基督教派别在争论着一种关于耶稣的说话的不同解释时，主动这种冲突的其实就是这些利益。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1908，9）蔡启芳等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2—43页

假如我们把基督教当为某种阶级利益的沉淀物，则这种演进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假如把基督教只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那便不可能了解了。因为从基督教的基础主张而发生的逻辑发展言之，它应该发生奴隶制度之消灭的结果；然而当阶级利益执行决定的时候，逻辑的力量便决不能够运用于一般历史之中。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1908，9）蔡启芳等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22页

因此，我们虽然也许不能由“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获得关于基督的生平和教义的确切消息，我们却可以获得关于原始基督教团体的社会特性、理想

和希望的很重要的消息。当“圣经”考证把向来积聚于这些作品的各层中的各种堆积物掘开之时，它最少也使我们约略追溯这些团体的发展经过，而“异教”的和犹太的史料则使我们可以瞥见在原始基督教中同时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势力。这种研究使我们认识和理解基督教原是它的时代的产品；这就是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1908，9）蔡启芳等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6页

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等問題上的言論

但是，不论所有这些关系多么重要，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首先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个别资本家和个别工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时，不需要利润理论，因为利润理论解释的是利润量怎样取决于与劳资关系不相干的许多因素，所以如果在这时提出它，反而会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模糊起来。

可是，不论个别资本家的利润采取怎样的形式，利润量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剩余价值量，即取决于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这首先是就全体资本家来说的，因为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

我们并不是根据利润规律，而是根据剩余价值规律，才学会懂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学会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6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86—87页。

社会民主党是领导自己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底政党；但它不仅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同时还是社会发展底政党，它是以整个社会有机体从它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形式为目的的。

这两方面结合为坚固的一体，就是社会民主党底特殊的表征；这种结合底奠定，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底不朽的历史功绩。大家都知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处已经详述过——工人运动与空想主义起初是各自独立地而且常常甚至在彼此敌对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自然在某些地方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就已经溶合起来，例如在宪章运动中底社会主义一翼内，在法国的平等共产主义内，在惠特林派内。可是在巨大的社会现象萌芽的时候，理论向来就没有超越过实际。理论只有经过个别的、半信半疑的试验和已确定的传统还未切断精神的联系，才能发现新现象底基本特点并承认其一般的必然性。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把经验的搜索与感情的愿望代之以那种明确的意识；工人运动底最高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形式，社会主义只有经过工

人运动方能实现，这种运动自然而然地一定会力图脱离资本主义社会，有力量使社会过渡到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唯一阶段，就是雇佣工人阶级。

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无可争辩的明确性，论证了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或底不可分离性，如果现在还提出这些问题：运动或是最终的目的，什么比较重要，实践理论有没有更大的意义等等，这并不是在理论上超出我们的导师的一种标志，而是比他们要退步，因为这些问题本身不是别的，而是五十多年以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底或多或少不明显的变体而已。

目的与运动溶合在社会民主党内，彼此互不分离。但如果目的与运动相冲突，那就应当放弃后者。换言之，社会发展高于无产阶级底利益，社会民主党就不能保护妨碍社会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一般地说，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事。承认社会发展底利益与无产阶级底利益一致，因此前者即为后者底自然动力，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底理论基础。

但是在过于奉行“手中之雀胜于空中之鹤”原则的地方，在趋近而步远的地方，那里就表现出各个无产阶级阶层底较为主要的特殊利益处于与社会发展相矛盾的地位。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75—377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不只是少壮的新兴阶级与老朽的行将被淘汰的阶级间斗争的结果，即在希求保存现存秩序者与日益不能容忍此现存秩序者之间，——并且是各个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各种斗争，无论斗争者在每个个别场合之目的如何，但结果对于革命事业则同是有利的；这好象是很奇怪的，但此种事实无容争论，并且不只统治阶级中间的倾轧，同样被统治阶级中间的倾轧，同是革命的熔炉。

资本家与小资产阶级、城市与乡村之阶级利益的矛盾，对革命事业好象是显示了阻碍性的影响；恰恰相反，他们以兴奋鼓舞的形式去行动，他们提高了在革命中所表的活动力。他们对具有革命情绪的人民群众，日益提出更广泛的任务，一直驱逐着他们更向前猛进。

反之，统治阶级间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是趋向于其活动的削弱、趋向于其日益缩小他们的任务，而无从紧结其队伍进而坚决勇敢的与革命作战，愈趋愈甚的仅限于从现存制度的动摇中攫取一时的小利。他们不去设法扑灭其家门之火，而在其爆燃之房舍与其劫掠品未一同葬送之前，却去趁火打劫其邻家。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146—147页。

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阶级斗争以及彻底讲来，人与自然的斗争，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社会较之于其他的自然，好象是没有什么特异之点，我们在社会中与自然间可以找到同样的由矛盾斗争的方面而运动与发展的仪式。一切是有发展过程，并程发

展过程的本身重新创立的。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36页

我已在别一地方指明过，当资产阶级还在革命的时期，他承认自然的发展是以突变的方法完成的。自从他变成保守者之后，即便自然界的任何突变他都不喜欢听了。按他的意见，发展的过程现在是以最缓慢的形式，完全不可细察的变动的方法而完成的。突变现在他们认为是非常态的，不自然的，只能够助长阻碍自然发展的。不顾有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资产阶级的科学倾其全力以使发展的意义与完全和平过程的概念相撮合。

反之，马克思却认为，阶级斗争只是自然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的形式，他远不是和平的。我们已指明过，他以为发展是“异证”的过程，也是阶级对立的产物，他的降生是带有必然性的。而每次不可调和的对立者的斗争最终是以战斗者某一方面的胜利而结局的，因之，即引起了突变。突变是在很缓慢的过程中准备，战斗者一方面的力量可以是完全微细的增长，而别一方面的力量是在绝对的或相对的减少，并且其中一方面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此种不可免，并不是因为此种现象他自身就来完成，而是另一方面力量膨胀与斗争的结果。每一种的死灭不外就是“突变”，而一切的存在者也都由此突变创设。此种规律不祇是对于动，植物间适应，他通行于整个的社会，大陆，天体间。并且他们发展的一般过程的行径是以相互活动的渐次增长，准备定期的突变。没有此种定期的突变，不能承认有任何的运动，任何的发展的。后者是发展的必然阶梯，没有定期的革命，进化是不可能的。

此种意见既消除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发展只能以突变的方法来完成的观念，又消灭了那保守资产阶级的观点，后者视突变为不必要的经过形式，在缓度的完成过程中，他只是破坏与障碍。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或者说，保守的与革命的阶级间的别一种对立，我们可以在认识的批评中找到。革命的阶级，他感到了自己夺取政权的力量，因而也倾向于否定一切对于自己科学胜利的界限，他认为自己能够解决现代的一切问题。反之，保守阶级天性就惧怕任何一步的前进，不只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并且在科学的范围内；他感到更深刻的认识，对于他不能增益，只有无穷的加害。因此，他失掉了对于科学的威力的信仰。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42—44页

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没有一国达到象英国那样的发展，并且没有一国象英国那样鲜明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紧相联系着。如此，恩格斯与马克思同时才完成了唯物的历史观。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49页

阶级的斗争，因此也不带有严格的集中的性质，时常，取部份的冲突形式。

凡此一切，都使他们，在生活上，意识上，被一种新旧妥协的精神蒙蔽着。思想家与新兴阶级的奋斗者，原则上他们不摒弃基督，贵族，专制；他们的政党没有树立广大的政纲。他们不志在将自己的意识达到论理的极点，他们只预定了一种要实现的“实践策略”——这在当时暂时对他们是有利的，——以代替了广泛的政纲。狭隘性保守主义，在政策上，对于小的日常斗争过份估量，对于远大的前景取消极的关系，这是当时各阶级所有的同样的特色。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 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56页

那些感受了宪章主义与法国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方面得到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后者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形成很大作用。法国大革命明显的指出，夺取政权对于任何阶级的解放上，有若何大的意义。因为法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最有力的政治组织甲可宾俱乐部在恐怖的政策下夺得巴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与无产阶级，经过巴黎，动员到法兰西全国去。并且当革命的时期，巴比夫根据这些事实得到纯粹无产阶级意思的推论，并且阴谋掌握政权以组织共产组织。

巴比夫的影子在法兰西的工人间永远不能毁灭。这就是，夺取政权很早的就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的原因。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幼稚与无准备，他们只看见了夺取政权的一条路；共谋者羣起骚动，应当展开革命。法国抱这种观点的党派的人最著名的就是白兰克，德国此种思想的代表者即维特林。

别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接受法国革命的衣钵。但是他们认为，骚动对于毁灭资产阶级政权上并非很有利的方法。他们也如以前我们所提过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的认为工人运动的力量是很小的。他们看透了，在小资产者，资本家以及生产工具私有的存在的基础上，无产者若想能够战胜资产阶级，不只是小资产阶级“民众”没有障碍，并且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只若有共和政体与普通选举权，国家政权就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与这些共和派的执信者（他们代表就是路易白兰），相对着的，在德国我们可以找得有，社会专制保皇党们，他们的思想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与观念论者所发扬。

此种国家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时髦的诱惑；更时常是撞骗的旗帜。他从没有形成过严重的实际的意义。只有白兰克与路易白兰等派别曾形成相当作用。在1848年二月革命的时节，他们曾统治过巴黎。

蒲鲁东给了这个理论一些很有力的批评。他不信任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是的，他承认无产阶级应当自己解放自己。可是他更看到了，当无产阶级作自由的斗争时，他应当夺得政权以与国家的斗争，因为在法律上禁止组合的条件下，即便纯粹的经济斗争，工人也要感到每一步的进行都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因为蒲鲁东以为政权斗争是无望的，罪恶的，所以，他警告无产阶级离开一切的斗争以追求自由；只利用和平组织的方法，例如，设立交换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机关等。职工组合的意义，和政治的意义一样，他很少了解到。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冲滨书局印行1930年版 第83—85页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代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如果工人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如果他们还发生这样的问题：以怎样的方法来达到保存无产阶级的生存与消灭一切的剥削；工人运动（职工组合，争普通选举权等）呢，还是社会主义？假设若有以上两种情形，工人运动一定是薄弱的，无力的。他们深解这样的设立问题是错的。社会主义，保障工人生存，与消除一切的剥削，这三者是同一的概念。问题只应当这样：无产阶级以怎样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答复是：工人运动。

不错，阶级斗争现在还不能创立无产阶级生存的保障与消除一切的剥削，但是这是唯一的保获全体无产阶级离开贫困的方法。无产阶级借助于阶级斗争更增加了自己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力量，虽然随此种力量之增长亦加甚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工人运动之意义是在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不是看剥削的减少。不要伯兰克的阴谋，不要路易·伯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要蒲鲁东的和平组织，所要的只是阶级斗争，虽然后者在建立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时要延长几十年。按马克思的意见：进行经济的与政治的阶级斗争，为此而继续不断的执行必要的日常工作，以社会主义的光的闪耀而结合无产阶级的组织与行动到统一的，调协的一体，而不停的发展下去——这是所有那些（无论他是否无产阶级，）佔在无产阶级的观点，并且志在解放无产阶级的人所应当作的一切。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冲滨书局印行1930年版 第86—87页

在一般的上，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是自卑的，忍耐的，而对于那些佔在无产阶级领袖地位者则是取严格的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马克思准备让一切以参加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工人都加入无产阶级的组织，——无论他是有什么另外的观点，不同的理论或者他不信任某种推论，无论他是无神论者还是驯良的基督徒，蒲鲁东主义者还是伯兰克主义者，维持林的还是拉塞尔的后继者，无论他是否了解价值的劳动理论或者是认为这种理论为完全无用的东西。

显然的，工人的有阶级意识与无阶级意识马克思看来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他以为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这些工人群众间宣传，因此，如果拒绝这些只是因为他不能分析理论问题的工人加入组织，他认为这是绝大的错误。马克思相信阶级矛盾的力量以及阶级斗争的逻辑必然的，要促使每一个无产者到正确的路上去，只要他所加入的是真正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

对于那些带有一种阻碍阶级斗争的力量与同一的观点来教育无产阶级的人，他是完全取另外的一种态度。他承认对于这些份子是不能有任何忍耐的。在这种情形下他是要严格地批评他们这些不好的企图；只要他们不是空费力气，只要他们能收到相当的结果，那末他们的行动就是很危险的。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1930年版 第98—99页

社会民主党并不是资产阶级字义上的民主主义人民党，企图满足人民各阶级的利益（不管他们的利益是如何的矛盾）的世界恩人，而是阶级斗争底政党。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14页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雇佣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对我们这一世纪发生影响底动力。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存在于现代社会内的唯一的生产形态。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还可遇到保存到现代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另一方面，在国家或公社经济的某些形态与协同组合内，已经发见新的较高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家阶级与雇佣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还不是现代的唯一社会矛盾。除这两个阶级以外及在这两个阶级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阶级——在它们之间，有社会的上层与社会的渣滓；一方面有君主和他的廷臣，另一方面有各种游民。他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形态的产物，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本身底需要所产生的，或最低限度是资本主义在其成长中所保留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正在发展的，一部分正在垂死中的阶级的极其复杂与不断变化的利益，以极复杂的形式，一方面和资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交错，但并不与任何一个基本阶级的利益完全相结合。这些中间阶级使我们今天的政治斗争具有动摇的、充满各种奇怪的意外的性质。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13页

但是如果工人和资本的积累有利害关系，这不就表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和谐一致么？

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甚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也有共同利益。主人穷了，奴隶也就要挨饿，奴隶病了，主人就要受损失。这种一时的利害一致并不排斥他们之间的长期的阶级对立。这种对立也表现在积累问题上。资本家的动力是利润。资本家为增加利润而积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愈多，他就能够积累得愈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资本家来说，最容易的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可是工人之所以关心资本的迅速积累，恰恰是因为资本的积累能使他们达到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的目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见：三联书店1961年 第85页

（考茨基：国债的经济影响，1915、4、2 新时代）

总之应当承认那种意见是一种虚构，它把这两个阶级底利益的调和，说成好象劳动者是农业生产产品底好主顾。工人底工资愈高，则他耗费于食物方面的工资部分亦愈多。这样看来，农民似乎极关心高度的工资，他们的利益似乎与无产阶级底利益一致。

象这一类的论证并不新奇；人们为着要发明利益底调和，曾不止一次利用过这些论据。对工人表示好感的人们曾劝告工厂主将工资提高；他们说，这是扩大国内市场及避免贸易停滞的一个最可靠的手段。反之，工厂主则向工人解释，从他们方面去强迫工厂主提高工资，这是何等愚蠢，因为工资提高的结果或者会提高了食粮的价格，这样，工人便会得之于彼而失之于此，或者就会减少了利润。但是利润愈高，则资本愈能积累起来，对劳动的需要亦愈迅速地增加，这才是提高工资的最有力的手段。因之，工人就有着重大的理由来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利润减少的事态，例如罢工之类。他们似乎完全象工厂主一样要关心高度的利润；他们两者底利益好象是一致似的。

这个论证只有在那种关系内才是正确，即资本主义社会，象一切其他社会一样，本身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在它里面某一部分每次损坏对于别的一部分不无一些有害的影响。可是，这个事实并未消除阶级的对立，并且也并未使任何一个阶级在和敌对阶级作斗争时不要坚持自己的利益，甚至破坏他们的利益。不同阶级的利益底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在某种限度以内是无可争论的），与他们的阶级利益底无比的极坚决的对立，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怎样不完善的有机体，为了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它是一定徒然浪费许多人力和物力。

资本主义社会赖以推动的，各个阶级的相互地位赖以决定的，——绝不是他们的利益底调和，没有直接意义的，或即有意义亦无关紧要的调和，而首先是直接的阶级对立。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 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65—366页

绝不是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农民方面找得出来。人们指出抵押权底所有者，实际上就是他的财产底所有者。但是象我们指出过的，债权人实际上对于农民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关系，而是土地所有者对企业家的关系。农民由于抵押也很少成为无产者，有如工厂主不是在自己所有的而是在租来的坊所上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农民仍旧还是生产资料底所有者，是自己工具及器具，自己的牲畜底所有者，简言之，是自己的财产底所有者。自然，这种财产也可以拿去抵押，但他还是执行着企业主底职能，并且他本身仍旧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有如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并且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工厂主执行着工业资本家的机能一样，并以此资格来敌对无产阶级。

这种对抗在那些不剥削雇佣劳动者便不能进行生产的农民方面，即在大农方面，极其尖锐地表现出来。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 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364页

无产者与中农之间的对立，其尖锐不及富农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中农或者完全不雇佣工人或者顶多只雇佣很少的工人，他主要是用自己家庭的劳力来经营，虽然他是靠替坊生产食粮来生活。在这种场合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自然就不存在；

可是这里仍旧有对立，存在于为市场而生产食粮的一切生产者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购买者与出卖者之间的对立。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365页

食粮的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关系，情形亦是如此。他们的对立太直接了，卖者太不注意买者的购买力就不能缓和这种对立。

农作者希望尽可能高价出卖自己的生产品，工人则希望尽可能廉价购买它们。工人底工资提高，假如只引起人造牛油，美洲脂肪、澳洲肉类及各种罐头食品底更大消费，试问这对于农作者有何利益？农作者企图消除对工人有好处的市场上的竞争并人为地抬高自己生产品的价格。

利益调和（即指农作者与无产者底利益调和）底说教，虽然想得很聪明，但完全不会被感觉的，并不能调和利益底这种对立。

农作者是否会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这不决定于他是否饥饿，他是否负债，而是决定于他之出现在市场上是作为自己劳动力底出卖者还是作为食粮底出卖者。饥饿与债务本身还不会造成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它们甚至会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对立，因为饥饿可以被消解，而债务可以被清偿，只有在那种场合内，如果生活资料的价格被提高，工人就失掉照廉价享受它们的可能。

除了这些对立的利益之外，农民和无产阶级，自然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往下还要说到它们；有时利益底共同性可以胜过它们的对立性，并引导农民与无产者到政治的合作。但即使他们甚至能够常常一同作战，那末，照一般的通例看来，他们一定是分别进行；今天是联盟者，明天他们可能就是敌人。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66—367页

无疑的，这种思想是漂亮的，但就其对社会而言是空想的，在社会内利益底矛盾十分强烈，甚至在一国之内经济斗争这样的现象，例如，罢工斗争，用仲裁法庭也不能解决。永久和平底前提条件，最低限度应当是那个条件，即各大国首先应当解决它们现有的一切争端，并预防新争端的发生。但我们此刻离开这个前提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远。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底发展所产生的一切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欧洲底分割尚未完结，而为分割世界的最后斗争又已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民族间利益的更深刻的对立，以致不能期待资本主义政府间缔结联盟。这一任务註定是要由无产阶级底国际团结来解决，这种团结现在已经是比资产阶级的一切和平会议还更可靠的和平的保证者。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12）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78页

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降生的时节，只看到了其贫困的一方面——破坏的趋向，但是，他们没有指明别一方面——促醒无产阶级到革命的情绪。按他

们的意见，能够解放无产阶级的唯一力量就是在善心肠的资产阶级的哀怜。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情，估量资产阶级，并且希望在资产阶级的群众间，找到相当的“同志”，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

此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资产阶级的博爱者间遇到了同情。资产阶级这种集团一般的并非由残酷的人们组成；贫困也激发他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从别人的贫困间自己也得不到利益，他们也愿欲去辅助那些贫者。但是，如果他们是准备着同情于那些低首乞怜的无产阶级，那末，那些奋斗的无产阶级又将他们变残酷了。他们感到后者是在掘断他们生存的基础。无产阶级的请求遇到了他的同情，而无产阶级的要求却遭到了他的残酷的敌人了。所以，工人运动也引起了那些乌託帮先生们的不满。因为，工人运动将那些乌託帮先生们所最常计划着的，“以善心肠的资产阶级的悲悯而得到程救”的因子都吓跑了。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79—80页

要想研究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的理论家，不应当因为这些现象的繁杂而感到困惑。他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纯粹的形态中，在完全摆脱围绕它的其它生产形式的残余与萌芽的典型形态中去研究它。反之，实际政治家如果以为资本家及无产者是现代社会中活动的唯一因素，而不注意家所有其他的阶级，那就会陷于极大的错误。

马克思的“资本论”仅论述资本和无产者。但在同一作者底“拿破崙第三政变记”及“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两书中，就与此相反，除了资本家及无产者外，君主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者，官厅与兵士，教授与学生同样起着作用。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13—14页

从前农民的家庭协作组合，系专用自家的力量管理自己的土地，这种地位现时在较大的农民经营内，则为雇佣劳动者所占据，他们在土地所有者监视之下耕种他的土地，饲养他的牲畜，收获他的谷物。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侵入农村，甚至侵入农民的家庭并且破坏了利益之旧的和谐及共同性。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25页

十五世纪初期在捷克吉希特战争以及在波兰条顿族武士团的政权之倾复，完结了日耳曼向东方拓殖的继续扩张。同时中欧的人口，虽然还未达到在当时经营方法之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可是已大大繁殖了，已不再感到人口的缺乏，劳动力的缺乏了，土地已经不象先前不给价的土地那样丰富了。于是，垄断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有了可能，同时也表现为一种倾向了。从此发生了农民与封建贵族间最残酷的和顽强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最近的时期，而且从来没有中断过，虽然在德国这两个阶级间坚决

的斗争还是在十六世纪才发生。他们斗争的结局差不多到处都是有利的封建贵族，封建贵族服从巩固的国家政权，因此在反对农民的斗争中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帮助。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29—30页

农村经济愈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则它愈益发展着大生产与小生产间技术之质的差异。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116页

这样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保护农民的意义上说来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更坏的是大大地损害了社会民主党。因为这样的纲领既与我党底无产阶级的性质相矛盾，又与我党底进化的，或者说革命的的性质相矛盾。为着成问题的一时的胜利，一个最有远见的政党就不得不付出许多代价，如自己内在体系底扰乱，进攻力量底减少和自己威信丧失。

但可以要求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纲不单以保护农民为旨趣。人们说：农业表现出比工业更为缓慢的发展。农业成为我们向前运动底制动机。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方法来加速它的发展，就在这种意义以内，我们才需要土地政纲。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80页

欧洲各文明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在它们的各部分内，在生产底各部门内尚未消灭的更早以前就已成熟了，何况直到现在我们还碰到农奴制度底若干残余。同样现代社会对社会主义成熟得比最后的手工业者和最后的农民消灭以前更早，比整个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在经济上组织起来以前更早；诚然这些条件决不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到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底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人民底这些落后阶层并保证他们有更高生产方式和更高文化的手段。提高农民地位的方法，在使它接近和尽可能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底意义内，在一切场合之内，将起着绝大的作用。在这一意义内社会民主党自然需要土地政纲。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81页

现代国家，象过去一切既存的国家一样，首先就是一种统治底制度。……。

但是现代国家，在这里也正如过去一切既存的国家一样，只是在极不重要的阶段内才是文化利益底代表者。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73—474页

在国家生活内必然出现相反性质的趋势，但这种情形的发生不会早于无产阶级对国家生活命运具有影响以前。国家权力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杠杆，而且无产阶级必需夺取这个政权，也是自然而必然的。不过不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只想像成大城市底“卑微的和被侮辱的人”在一天黄道吉日用暴力夺取内阁，并利用国家权力底强制手段，去劫夺有钱人。

无产阶级不把自己和国家提高到最高的发展阶段，就不能顺利地掌握国家政权，就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利用这个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他才获得使他达到统治阶级地位的道德的和知识的品质，并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的统治。但无产阶级争取掌握国家政权，就意味着不单是简单的争取这一政权工具；斗争底结果，专制的君主政体或寡头政治应当变为民主政治；同样就发生国家行政权底缩小和它的文化任务底提高；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察的和军事的国家转变为文化的国家。

其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无需进一步的解释。

可是，如果国家底这样转变有利于全人口，那它对于农业人口比对于城市人口还要更有利些。在这样情形下，农业人口所得较一切的人为多。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74—475页

但是社会民主党渴望把国家从统治的机关变为文化的机构来帮助农业，不仅是在这一消极的形式上；在和官僚政治及军国主义底全能作斗争的形式上。战斗的无产阶级也应当设法使国家成为普及文化和解决文化任务的一个工具，这些任务是私人 and 公社无能为力，而同时对于全体人民却有无可争辩的需要底意义。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480—481页

国家成为今日的方式，那便是说成为官与兵的国家，成为资本阶级的工具，这种情形便都变了。像以前的国家一样，近代国家是阶级专制的工具。但非解散或剥夺那些立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组织上的经济机关的独立，而自夺其职务，他便不能尽他的职务，满足资本阶级的需要。便在这些近代国家，让中右组织继续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亦渐毁坏，而不能行其，职务。然这些职务，因资本制度的发达，而渐扩展，他扩展得这样快，国家乃不得不起而担任那些虽他极不愿担任的职务。

考茨基：“阶级斗争”（ ），国光书店1921年版，第92页

要将农民捲入反军国主义的斗争，首先就必须明显地向他们证明，问题决不是不保卫“祖国”。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77页

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謬論

帝国主义的这一面，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被克服。

但是帝国主义还有另外的一面。占领和奴役农业地区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之间引起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从前只是陆军方面的军备竞赛发展为海军方面的军备竞赛，并且最后使酝酿已久的世界大战变成了事实。但是帝国主义的这一面也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一种必然性么，一种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必然性么？

战争结束以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就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了，从资本家阶级本身来看也是这样，至多从一些对军备感兴趣的人看来还有这种必要性。

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经济遭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最严重威胁。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呼喊：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

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当然，对超帝国主义，我们也必须象对帝国主义一样的作坚决的斗争，不过超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不在于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而是在别的方面。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 第77页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新时代)

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扩展的要求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它之前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自由贸易半个世纪以前，自由贸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言，就象今天帝国主义被看作是最后一言一样。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75页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4月11日新时代)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74页
(考茨基：帝国主义，1914年9月11日 新时代)

帝 国 主 义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征服和吞并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

库诺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帝国主义也力图在外国地区铺设铁路和建立矿区，建设军港和开凿运河。当然如此。但是在什么样的“外国地区”？正是在农业地区。我并不

认为，资本输向外国地区，只是为了经营农业，也就是说，只是为了农业上的目的，而是认为，资本输向那些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毋宁说还处于农业生产占统治的阶段的国家。

我不承认我说的定义过于狭隘的意见。

另一方面，在库诺看来，我的定义又太广了。它适合每一种殖民政策，不光是适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

“考茨基的定义不只是适合现代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而且几乎适合每一种任意的殖民政策，既适合荷兰在印度群岛的殖民政策，又适合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殖民政策。考茨基的这个定义的最具特征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本来应当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然而恰恰没有考虑到近代殖民政策的现代帝国主义特点。”

如果我的定义只是说明力图吞并或征服农业地区，那末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这是每一种殖民政策的本质。但是我认为帝国主义的特点在于力图吞并或征服农业地区是由“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不是这样，西班牙或法国的殖民政策也不是这样，甚至荷兰的殖民政策也不是这样。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的动力毋宁说是封建贵族，后者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地区，并且在巨大发现之后在大洋的对面非常容易地找到了这些地区。此外商业资本也参与这件事，它在荷兰，尤其在英国与货币商业资本一起成为殖民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在英国一直到十九世纪，封建贵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凡是有殖民政策的地方，工业资本自然企图利用这一政策，但它一般说对殖民政策并无好感，因为殖民政策给工业资本带来的耗费和损失大于所得。工业资本愈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殖民地的兴趣也就愈减弱。

只是在工业资本的最新阶段（约三十年来），工业资本才对殖民地发生兴趣，而且它的势力和作用愈大，殖民的扩张政策也就愈成为国策的中心，由此殖民政策就具有一种崭新的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有必要把它跟过去的殖民政策区别开来。这样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帝国主义的政策。

库诺反对这种观点。他说，现今殖民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财政资本。他用这个词时，其意义是同“银行资本”和“银行财政”一样的。……

如果人们如库诺那样同意这一观点，那末在财政资本中，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库诺把银行资本说成是“现今殖民政策的背后的主要动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反对我说，据此站在背后的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这就不对了，因为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一致的加强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正是从这种一致中产生出工业资本对殖民政策的愈来愈大的兴趣。但由此也就产生出帝国主义的内部分裂，这种分裂固然受到工业资本的促进，但它又成为工业的一种阻碍。

我的帝国主义定义包括所有这一切因素，因此我也就坚持这一定义。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89—91页

（考茨基：又一次我们的幻想，1915，5，21—28日 新时代）

由此根本谈不上某个国家可以靠殖民地使它的工业在原料供给和销售方面不依赖于外国。那些怀有这种梦想的帝国主义者只是由此表明他们的极端无知。一个国家的工业愈猛烈增长，它在取得工业原料和销售工业品方面就愈要依赖于世界各个区域。甚至有庞大殖民地的英国，不从俄国和美国这种世界上没有力量能使之变为殖民地的国家中取得原料和食品，就不可使他的工业维持下去。1912年英国光从这两个国家中所取得的商品几乎等于从庞大殖民地取得的商品总和。……

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想攫取殖民地而使自己在获取原料方面不再依赖外国的任何意图，都一定会使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把它卷入长期的，消耗的战争中，不使它接近自己的目的。这个政策是使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遭到破产的最可靠的途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99页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同盟 1915年 德文)

在战争和普遍裁军问题上的观点

因为国家与君主，一天天更倚赖资本家，所以海军陆军逐渐遂全然成为资本阶级的机械。战争更非政治的性质，而为商业的性质，最后成为民族的性质。他们便只是由于不同民族的资本家经济竞争之所致。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民国十年版（1921年） 第48页

非常荒谬的是，似乎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似乎一旦战争到来时，不是选择帝国主义就是选择社会主义，似乎德国、法国以及英国（从许多方面来说是这样）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不加思考，只要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会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社会主义，从而导至史无前例的破产。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94页

(考茨基：又一次我们的幻想，1915，5，21—28，新时代)

在保持和平的宣传中，社会民主党还能够无障碍地施展它的全部力量。相反地，它在战争一开始就必须估计到，它由于战争的爆发被置于战时法规之下，在它的运动中受到阻碍。政府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强大，政党从来没有象战争开始时那样软弱。

人们对这样微妙的问题抱很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遗憾的是，我们在和平时期没有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战争时期的行动是一个比宣传和和平复杂得多的问题。战争时期最不宜于心平气和地讨论有争论的问题。客观性在这个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它

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背叛。

当战争还只是有危险时，对我们来说事情很简单，在现今条件下，没有一次战争对各民族，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不是一种不幸，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用什么手段能够防止有爆发危险的战争，而不是讨论哪些战争有益，哪些战争有害。

然而一旦表明我们没有能够防止战争，也就是说一旦战争已经爆发，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只要缔结和约的时间还不成熟，实际问题不再是：是战争还是和平。而是：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

当然可以设想，而使在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政党可以在不使本国瘫痪的情况下反对战争。而这种反对要在交战国双方同时进行，并取得同样的成就才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代替失败而缔结和约。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根本撇开不谈。而战争爆发后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是胜利还是失败。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 1961年 第80—81页

（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1914年10月2日 新时代）

普遍裁减军备会省出一大笔款项，这笔款项用来实行上述的改革政纲虽然还是不够，但总可以提高一般的文化程度。德意志帝国每年用于海陆空军方面的经费为七、八亿马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用这笔款项是可以举办国民教育，使全世界为之惊异并使德国人民成为文明国家底首领。可是普遍裁军的希望是很暗淡的。

普遍裁军的条件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出来。但是，不能将每一种需费很大的郑重的改革延缓到普遍裁军实现的时候。

从常备军制度过渡到民营制度是会，而且必不可免地会使军事预算大大地和绝对地减缩。在一切场合内军事预算不会减少到使省出的款项足够弥补现代文明国家底费用。

考茨基：“土地问题”（1898年12月）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90—491页

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如此，但已足以证明，在具有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工人由于自己的努力能够使自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便最后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群众组织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来取得政权，而不是通过“内战和外国战争”来取得政权。这种斗争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凡是沒有政治自由的地方，凡是有待争取政治自由的地方，“内战和外国战争”也许对于获得民主，即推动工人阶级进步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必需的。凡是有民主的地方，工人阶级就不需要采用武力作为取得政权的手段。

.....

马克思在1872年把欧洲各国分成两类。一类国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

工人阶级似乎有可能不通过暴力来取得政权。而在另一类国家（马克思把大多数大陆国家包括在内），要想不通过革命而取得政权，看来是不可能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
213页。

（摘译自：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 1946年
英文版）

谁要是认为，工人阶级把经济生活建立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就能使幸福和自由得到保障，谁就是错误的。把争取专政当作最终建立起一切人的社会主义平等的手段，以便消灭敌人、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树立特权地位，同时把其余的居民贬为贱民，这同样也是错误的。但是，由于认为没有人道的政治制度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试图把入道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残忍横暴的基础上，这是最不好的。因为这种国家一定要能实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
213—214页

（摘译自：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 1946年 英
文版）

工人阶级的利益对民主的要求并不亚于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工人阶级在获得民主方面要比获得社会主义更迅速。因为其他劳动阶级，如工匠和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也同样关心民主的发展。

.....

不言而喻，在民主武器已经行之无效的地方，我们是不能够再用这个武器进行斗争的。现在有些人把民主的方法同革命的方法区别开来。我们中间有些人被说成是主张采用民主方法的，另一些人则被说成是主张采用革命方法的。后者的特点是包括举行起义和总罢工。但是把民主方法同其他方法相提并论，犹如把改良主义者同革命论者相提并论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是革命的。我们使用改良的办法还是采取革命的态度来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不取决于我们的思维过程，而只能看我们从国家、社会和现存阶级关系的既定情况这一观点出发来检验我们的策略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如何，即便是这一点也不能由我们的意愿来决定。这就是决定我们采用民主的行动方法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依据。

.....

有的人认为，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工人也应当利用“革命”、起义、总罢工的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与投选票相比，利用这些方式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总之，民主国家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将只好屈服于起义和总罢工。

.....说服一个人去投票赞成社会主义要比动员他丢弃职业或牺牲生命容易得多。

.....

由此可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不能用武力的办法增进民主或获得那些不能用民主办法获得的成就。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近便、最可靠、付出代价最少的道路，正如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的最好工具一样。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紧绑在一起的。

.....

一个没有力量保卫民主的工人阶级（除非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是不能够用武力来反抗剥削者的。凡是丧失了民主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民主。

为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采用民主方法这一点进行争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唯有那些单纯使用民主方法的人才有这样的义务。暴力的行动是不能用投票、报章论文或群众集会来代替的。虽然如此，当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不得不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情况时，他们必须先设法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不论他们采用民主的方法还是其他方法。而且，他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事实，即民主始终是工人可能拥有的最宝贵的工具。

凡是沒有民主的地方，劳动者和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政治自由。那种认为工人必须首先使自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而且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民主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不管我们是否把一个经过普遍平等的选举、拥有出版、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强有力的人民代表议会看作是“形式上的”民主，这都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工人离开了这些机构，就无法使自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自然，当社会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时候，民主的机构将改变它们的性质。而在目前，它们是工人阶级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将只能作为自由的社会管理机构的工具。这就是今天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区别。人们常说的“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概念，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
214—215页。

（摘译自：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 1946年 英
文版）

生产的不断发展是使大家享受繁荣所不可少的。资本主义的毁灭决不就是社会主义。凡是资本主义生产不能立刻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必须继续照旧进行，否则，生产过程就要中断，人民群众的艰苦贫困就要接踵而来，这种艰苦贫困在近代往往表现为普遍失业，是无产阶级所最害怕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在新的条件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那些地方，要社会主义生产能够代替它，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无产阶级获得了自治、工会、市政的经验，而且参加过立法和行政设施；（2）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愿意为它服务。

在经济不大发展，无产阶级只是少数的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在上述各方面是不可

能达到成熟的。

所以，这一点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即无产阶级只能依靠专政，不能依靠民主维持权力的一切地方，社会主义就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因而要说专政可以迅速地为一代人谋取物质繁荣，并且由于这样，能使被专政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大众对强力统治谅解，这是不可能的。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52页。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象以前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并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象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坚决地反对专政。专政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某个国家中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取得统治、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只是向这个政党提出它费尽心机仍不能胜任的任务的一种手段；它这样做就很容易污损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它就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这种思想的发展。

幸而专政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的破产。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前奏，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专政能够及时地由民主制度来代替，革命的主要成就可以得到挽救。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
153页

（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德文版）

但是世界革命不是通过专政的道路，不是依靠大炮和机关枪，不是依靠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来实现的，而是依靠民主和人道来实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达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创造高级的生活形式。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
144页

（摘译自：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1919年 德文版）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注意不要把当作状态的专政和当作政体的专政混淆起来，只有把专政看成政体才是我们队伍中争论的题目。把专政视为政体也就是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后者的选举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被剥夺了。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否社会主义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只有借助于它们才能实现。

首先要指出，如果我们说专政是政体，我们就不能说阶级专政。因为如我们指出的，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假如我们要把专政不只是当作一种统治的状态，而且还当作一种政体，那末只能说一个个人的专政、或者一个组织的专政，因而不能说无产阶级、而只能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这样问题就立即复杂了，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分为许多政党的。这些政党中的一个政党的专政无论如何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部分对于另一部分的专政。假如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它们和非无产者阶层的关

系的不同而分裂的话，情况将更复杂，比如一个政党通过城市无产者和农民联盟取得政权，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变成了无产者对无产者的专政，而且是无产者和农民对其他无产者的专政。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具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114页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德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如何把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同工人运动牢固地联合起来。我们时代的一切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上一世纪七十五年代兴起的早期党派），就是以这联合为基础的。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它们把阶级斗争当作解放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把它当作解放工资劳动者的手段。

各社会主义政党不但为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为争取失业保险费和工厂代表会议进行斗争，而且也为全人类（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进行斗争。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212页。

摘译自：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 1946年 英文版

很明显地，促进资本主义意义农业底经济的发展，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土地政纲底任务。这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不，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方法，它们现在在农业内已经能够准备下基础并无痛地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

这种思想由于农业中土地私有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关于这种矛盾我们已经指出过好几次了——已成为可能的了。农业生产比工业生产更有落后的性质，离社会主义更远；当资本主义在工业中，也就是说在社会中占统治的那个时候，要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那是完全无望的事。

考茨基：“土地问题” (1898年12月) 梁琳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383页)

宣揚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

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将采取不同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方式，这个革命在所有已经建立民主的地方，可能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而不是用暴力来实现。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2页)

无疑的，假如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取得了政权的话，我们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要用暴力来摧毁新兴阶级实现民主的企图。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民主对于无产阶级丝毫没有价值。假如在上述的假定下，一个统治阶级采用暴力手段的话，那么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畏惧民主的后果。它的暴力不是别的，而是民主的消灭。因此，预计到统治阶级摧毁民主的企图，并不足以说明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没有用处，倒是说明无产阶级有竭尽全力保卫民主的必要。当然，假如有人告诉无产阶级，说民主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就无从产生了。各地的人民群众都很珍爱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不肯放弃它。反之，倒是可以设想，他们会用这样巨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就是，假如敌对方面力图摧毁人民的权利，就会引起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评价愈高、对其权利的珍爱愈切，则愈能预测这一事态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认为上面预测的不利形势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我们不需要如此气馁。国家愈是民主，执行机构，甚至于军事机构所握有的力量便愈是依赖于舆论。假如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还弱小，如象在农业国家那样，或者假如由于没有组织起来并缺乏觉悟，它在政治上也还孱弱的话，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执行机构和军事机构的这些力量也可以变成压制无产阶级运动的手段。但是假如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增长到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取得政权的话，那么资本家的专政要想调动必要的力量来镇压民主，会是一件巨大的困难工作。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5页)

对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说，再没有比内战更大的阻碍了。在现在这种有着广泛的地理上的分工的情况下，大工业处处都与交通的安全密切相关，恰如它和契约的安全密切相关一样。对外战争会动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那怕敌人并没有侵入国境。在目前的革命中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为了重建社会都坚持和平的必要性。这种坚持是正确的。

不过，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说，内战远比对外战争更为有害，因为内战是在自己国土上打的，它和外国侵略起着同样的消耗和瘫痪作用。

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常常是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增加或损失权力的问题，而不涉及它们本身的存亡。在战争之后，不同的交战政府和人民都寻求和平的生活，那怕并不是友好的生活。

在内战中政党间的相互关系就大为不同了。它们进行战争并不是为了从反对者方面取得一些让步然后就和它们和平地生活下去了。内战也是有别于民主的，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是这样被保护的，即当任何政党处于内战地位、并且不得不放弃执政的希望的时候，它却不必放弃政治活动。每个已降为少数派的政党都永远保留争取变为多数派、从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权利。

在内战中，每个政党都为自身的存在而战斗，而失败者就受到完全毁灭的威胁。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说明了内战是如此可怕。一个只靠军事力量维持统治的少数派，是要用流血手段击败它的反对者的；而且当它遭到叛乱的威胁，并且胜利地镇压了这种叛乱的时候，它会在残酷的杀戮中把反对者毁灭大半的。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巴黎和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流血周就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管是长期的内战，或是专政的统治，群众的反感和麻痺，都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组织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可是，那或者是制造内战或者是制造反感的少数派的专政，却被认为是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无上手段。

许多人把内战和社会革命混淆了，认为内战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并因而认为内战中的武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而予以谅解。他们说，这历来就是革命中常有的，而且将来也永远会有事情。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凡是过去是怎样的事就该永远是怎样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于革命的看法是按照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例形成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将在与这些情况十分不同的情况下来完成。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0—31页）

应该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内战区别清楚。

社会革命乃是通过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绵延几十年，而且不能划出它终结的确定界限。由于它完成革命的形式是和平性质的，它会是一种比较成功的革命，内战和对外战争是它的死敌。按照常规，一个社会革命是由一个政治革命引起的，通过国家中阶级力量的对比的突然改变，一直被排除于国家政权之外的一个阶级占有了政府机器。政治革命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很快就告结束。它的形式要看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个国家的组织结构而定。愈有民主的统治，而且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深入到工人阶级力量中的民主，那么政治革命就愈有可能是个和平的革命。相反，迄今存在的制度愈是失去人心，而仅仅代表倚仗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的少数派，政治革命就愈有可能采取内战的方式。

可是，就是在上述后面那种情况下，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也有一种急切的愿望，希望内战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性的插曲，它所服务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和实行民主，而社会革命应该适应民主的步调。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31—32页

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顺从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

.....

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上面所叙述的，而不是破坏国家政权。在解决这一任 时 可

能暂时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只有通过群众行动来克服，从而暂时战胜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下，这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66页。

(摘自 考茨基：“新策略” 1912年8月)

工人无论怎样建设工团，去改良他们的生活，如减少作工钟点，及求得其他有利益的改变，这努力可说是正当。或且说是必要的。但若以为这样的社会改良，便能延缓社会革命，却究是个大错。有人相信要承认社会改良的用处，必不可不承认须保存社会，以立于现在根基之上。这亦是一样的错。反过来说，改良可以从革命的一点进行。因为我们说了的，他是促进革命的实现，他不是求避免资本制度自杀的倾向，只是加他的力量。

把人民变成劳动家，把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使这少数人管理资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这些资本主义残暴引起革命的结果，都非立于现存财产制的社会改良所能救治，无论他的改革是怎样伟大。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81页

这样的革命，可以有各种方式，由他所以发生的各种情况而不同。但却不必要会有暴动流血。历史上有许多比例，治者阶级或有特别明瞭的眼光，或因特别的怯弱，便屈服于这不可免的前途，而自愿退让。社会革命亦不是必为举手而成的事，或者永无举手而成的事，亦未可知。革命须靠几年乃至几十年经济上政治上的竞争，以为预备。他们常由于反对的各阶级各党派彼此势力的起落；常由于长时期的反动所成功。

但革命所取方式虽多，然而没有一种革命不是由于最受痛苦的一部分人强力的反抗现存的情况。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79页

每个生产力的进步完成，每加增生产力与现行财产制的冲突。想不侵犯财产制度。而消灭这种冲突，或减少这种冲突，都已证明是无益的事。那便以后更再有这等的努力，仍然必是无益。

过去的一百年，有产阶级的思想家与统计家，都极力去防止生产工具私有制可怕的崩坏。那便是说防止革命。他们永久对于实业界设法外级，对于生产工具私有制一时除去这种毛病，一时除去那种毛病，至少亦求减轻他的毛病，但总不敢干犯私产自身。他

们称这为社会改良。在过去的一百年，有许多补救的方法说过了，亦做过了；现在亦想不出甚么新药方子了。一切这些诊治社会的走方郎中，所称为最新包治百病的药，能神速的治疗旧社会，不在多钱，不受痛苦的，过细考察起来，便知道都只是老法子翻新。一切的老法子，从前在别处都已是试验得没有效的，他们却提议去用这消灭生产方，与现行财产制的冲突，而想尽力维持且巩固财产制。这可断言不可能的事。但我们的意思，亦不是说社会革命，一打破生产工具私有的制度——是可以自己完成。这不可抗御不可避免的革命程途，不须人的助力自然实现。亦不是说一切社会改良里没有价值，在现在忍受着生产力与财产制度冲突的人，没有别事可做，只好袖手静候这财产制的打破。

我们说社会革命是不可防御不可避免，我们仍以人是人，不是木石的原故。人是有某种需要与冲动，有某种心力与体力，将运用以求他自身利益的一种生物。静候那似乎不可避免的事，非社会革命进行途中容许的事。因为那样，社会革命将停滞不能进行了。

我们说打破生产工具私有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不是说一天早晨，一些被剥夺的阶级，将不费力的找着，有些好仙人把这个革命带来了。我们想得现在社会的崩坏，是不可避免；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进化，必然引出使被剥夺阶级起来反抗私有制度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添加了被剥夺者的人数及力量，而减少了剥夺者的人数及力量。结果必会引得民众大多数到这样不可忍耐的情况，使他们没有别的路走，非永远沉沦下去，便只有推倒私有制度。

考茨基：“阶级斗争”（ ）

见：国光书店 1921年版 第77—78页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马克思）

喜欢引用这句话的人却常常忘记马克思当时所说的暴力并不是拳指头和刺刀（机关枪当时还没有），而是指国家政权（State Power），即“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他们常常忘记，在上段引文中，马克思曾告诫要提防那种企图通用冒失的跳跃来清除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所出现的障碍物的做法。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149页。

（摘译自“工人革命” 1925年 英文版）（考茨基）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必须以民主为前提。即或不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至少也应该是组织群众并给予群众同等的教育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民主。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1页。

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区别是常常这样被划分的，就是，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民主则仅仅是达到这个

目的的手段，有时候这个手段会变成不适当的，甚至于成为一个阻碍。

然而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各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来自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一个种族的。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2页。

无产阶级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人数庞大的力量。除非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人口中最大的阶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比无产阶级的数目多的地步，无产阶级是不能解放它自己的。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

见：三联书店 1958年版 第16页。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用语既然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用语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政体，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以和平地实现过渡，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是指的政体。

当然，民主不能保证和平过渡。可是，没有民主肯定不可能有这种过渡。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41年 第113页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德文）

根据这些理由，我推测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采取不同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地方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而不是使用肉体暴力的手段来进行。

我今天的见解还是这样。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 1961年 第112页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德文）

……工团主义者想通过群众罢工废弃议会制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相反地，我们认为群众罢工是促进这种斗争和议会制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工团主义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无产阶级碰到政治和经济敌人，群众罢工就是可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根本不必考虑是否能直接获得成就，只要群众的愤怒情绪能由此不断增长就行。对德国绝大多数的同志来说，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是最后的手段，正如同对国家来说战争是最后手段一样；只有当其他手段失效时，只有当牵涉到生命攸关的问题时，只有当群众使用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要求极端强烈和最难以抗拒时，才使用它。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1961年 三联书店版 第72—73页。

（摘自考茨基：“最近的急进主义” 1912年12月20日）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那些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发生的，专制国家依靠一支脱离人民的军队的支持，压制一切自由运动，这里没有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普选权，没有真正的人民代议制。在这样的国家里，反对政府的斗争必然要采取内战的方式。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是要在那些哪怕不是“纯粹”民主而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已经生根几十年的国家里，在那些军队已不象从前那样脱离人民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条件下，构成人民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怎样夺取政权，还不能预料。但我们决不应该设想西欧会重复法国大革命的道路。假如今天俄国显得与1793年的法国很为相似，那只是表明俄国是怎样地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应该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内战区别开来。

社会革命是通过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绵延几十年，而且不能划出它终结的确定界限。社会革命的形式愈和平，它也就愈会成功。内战和对外战争是它的死敌。一个社会革命通常是由一个政治革命引起的，通过国家中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改变，一直被排除于政权之外的一个阶级占有了政府机器。政治革命是一种进行迅速并很快就能结束的突然行动。它的形式要看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个国家的形式而定。民主（不仅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上深入到劳动群众力量中的民主）愈占统治地位，政治革命就愈有可能是和平的革命。相反，迄今存在的制度愈是不依靠居民多数的支持，而仅仅代表依仗军事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的少数派，政治革命就愈有可能采取内战的形式。

可是，就是在后面那种情况下，拥护社会革命的人，也急切地希望内战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性的插曲，它只服务于建立和巩固民主，而社会应该适应民主的作用，就是说，在目前，社会革命不能超越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愿意到达的程度，因为超越了这一点，尽管立即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有远见的人所希望的，它却不能取得巩固下来的必要条件。

然而，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即少数人的专政，不是产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巨大作用吗？

这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样的作用呢？那种专政是欧洲君主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法兰西而发动战争的产儿。恐怖统治的历史功绩就是胜利地击溃了这个进攻。由此这一专政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那条老真理：专政比民主更便于进行战争。但是它决不是证明，专政是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实现社会变革和保持政权的方法。

1793年的恐怖统治的威力是无与伦比的了。但巴黎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保持住政权。专政成了各种无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种方法，而最后它成了结束一切无产阶级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的手段。

下层阶级的专政打开了武力专政的道路。

如果根据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革命等于内战和专政，那末也必须得出结论说，革命必然以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式的统治而告终。

然而，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并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局。可是只有在那里才具备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

我们除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为无产阶级在民主基础上的统治以外，不能作任何其他了解。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109—121页。

（自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 1918年 德文版）

在尚未叙述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利益矛盾之前，我们不妨把那个时代的国家制度（这些阶级利益矛盾，即在此种国家制度范围内所发展起来的。）作一个简单的研究，因为国家的形式能够决定各阶级为实现其自己的利益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

法兰西的国家自一六一四年起到一七八九年止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政体，此种国家形式完全禁止其“臣民”一切政治的活动；在经常的条件之下，也毫无强度的阶级斗争的可能。因此，这种国家形式与现代社会决不能有长期的协和。一切阶级斗争之最后结果，都应变成政治斗争。一切上层的阶级，如果它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那它一定要为争取它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固然，即或取得这些政治权利，政治斗争也不会停止的。反之，从这时起，政治斗争才特别厉害。这种情形，在一七八九年以后一八四八年屈服了吓坏了许多的理想家。

所谓专制主义，即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独立，换言之，即在此种国家形式之下，上层的政权并不是阶级统治的直接工具，表面是超阶级超政党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种国家形式只有在各阶级之参加国内社会生活是在一种均势的状态之下的地方、只有在各阶级彼此均无充分的力量能够把国家政权抓在自己手中的地方才能够产生，国家政权在此种条件下，于是便有可能使每个现存的社会阶级都服从它，并使它们互相依靠，停止政治斗争，用它自己之和平的本性命令它们，强迫它们服从自己。……总之常备军完全服从国家政权；常备军首先就在保护国家外来的危险。但是用这组力量去镇压国内一切对国家政权的武器反抗，也是颇为便利。

考茨基：“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 ）

见：新生命书局 1930年版 第7—8，10页。

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from 1848 to 1850）的新版本，作了一篇有名的序言，该序言的结尾说：

“距今约有一千六百年以前，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危险的变革党，举行了一个大骚动。这个变革党把宗教、把国家底一切基础全然破坏了；它率直地否认该撒底意志是最高法律，它没有祖国，它是国际的，它蔓延于罗马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而且越出了帝国疆界之外。它早已就从事地下的秘密的煽动，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它觉得自己已够强大，可以公开出现了。这个变革党，那些称为基督教徒底党，在军队中也有强大的代表者；全军团都是基督教徒。当命令他们去参与异教的国教会（Der heidnischen Landeskirche）底牺牲祭，以表敬意时，变革党士兵很有胆量，敢在他们的甲冑

上，插着他们特有的徽章——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军官所惯用的兵营式拷打，也是徒然。戴克里辛皇帝当他的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军纪已被颠覆时，他就不能再漠然视之。他乘现在还来得及，猛烈干涉。他颁布社会主义镇压法——我应该说是基督教镇压法。禁止变革者的集会，封闭或甚至拆毁他们的会场，基督教的徽章，十字架，等等，既被禁止，如同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巾一样。宣布基督教徒不能任政府中的官职。甚至也不许他们任军队中的排长。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象库拉先生 (Herr von Köller) 底社会主义镇压法所假定的那样受过“尊重人格”的良好训练的裁判员，所以，不许基督徒在法庭上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除外法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基督徒轻蔑地把告示从墙上拆下来；甚至说他们在他的头上把皇帝的尼可默地亚 (Nicomedia) 宫烧掉。皇帝采取报复手段，在三〇三年大迫害基督徒。这是大迫害底最后的一次。其效力之大，至于十七年之后，军队中绝对大多数是基督徒，继任的整个罗马底独裁君主——君士坦丁，由牧师赐称为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和把恩格斯的“政治见解”之最后的几行与恩格斯在其一生中所表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人，便不能够怀疑隐在他的滑稽的比较后面的意旨了。恩格斯要指出我们运动的进步的不可抵抗的基础的性质，他说，其不可避免的性质，特别因为军队中的信徒的增加，所以便很快使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让步。

.....

但是这一段文字，也可以作很不同的解释，因为在其前面记述的派别，在今日，当其实行法律方法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还以为恩格斯在其“政治见解”之中，反对他一生的工作，而最后，还说他指出为他所支持了两个时代的革命观点是一种错误。这些人以为恩格斯现在已承认马克思的教条——他说，武力是每一种社会的新方式的助产妇——再不能够维持了。在描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时，这种形式的解释者，不会把他的注意，放在事件前进之中“不可抵抗的及基础的性质”之上，而却放在君士坦丁“自动”公布基督教为国教之上；后者在国家中，完全没有经过少许“破坏的骚动”；便获得胜利了，他之胜利，只应用“和平”的方法，经过“政府的一种友爱的赞助”。

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将来必是战胜者。在恩格斯死了不久，这种希望，似乎是实际地达到了，因为华尔德克·卢骚 (M. Waldeck Rousseau) 象一个再生的君士坦丁，出现于法国，而且指派一个新基督教的主教米勒兰 (M. Millerand) 为他的部长。

凡晓得恩格斯的生平而且毫无成见地批评他的人，必会晓得恩格斯之脑中，永没有走进一种他的革命概念的请求，所以他的“序言”中最后的一段，必不能以上举之意义，加以解释。不过，我们也可以承认那一段文章是不很清楚的。凡不晓得恩格斯而想象他在逝世之前忽地发生对于他自己终身工作之实践，加以怀疑之袭击的人，或者会解释这一段文章为一种独立的文章，指明基督教之胜利就是现正从事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旅程的一种模范。

假如这真是恩格斯的意见，则对于社会主义之判断没有比它更坏的了；它不是等于一种获得成功的预言，而是等于为社会主义所拟想的伟大鹄的的一种完全失败的预言。

这是那些运用这一段文章而却忽略了恩格斯的一切伟大的和深刻的因素的人的特

点，但是狂热地拥护这一段文字的词句——假如它们真正包含所应该包含的——却完全是错误的。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9月） 蔡启芳等译

见：北京三联书店 1955年版 第466——468页

实际上，第一国际完全公开的认定了自己以下的任务：结合一切的无产阶级到共同的行动，但是要离开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政策的“独立”的行动，以剥夺资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从统治者手里夺得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政权为目的。在这种过程上最主要的最断然的一点就是夺取政权，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最终目的；“一切的政治运动只是一种方法应当附属于经济斗争的。”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94—95页

革命的法国是比任何国家都易于证明以下的事实：一切的阶级斗争是政权的斗争；伟大的政治政党，其目的不应当是实现某种的改良，而是夺取政权；当此种胜利已被奴隶阶级完成之后，他就宜鼓起精神来将一切社会关系重新改造。

考茨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来源”

见：上海沪滨书局印行 1930年版 第60页

誹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命攻击苏联布尔什维克党

世界各国处于极不相同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愈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愈是民主，它就愈接近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发展，它的生产力就愈高，它的财产就愈大，劳动就愈有社会性，它的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就愈多。一个国家愈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就组织得愈好，就愈有训练。民主有时候或许会抑制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它是使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夺取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任何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不过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方面愈是先进，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冲突中，不但取得暂时胜利的希望，而且保持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

无产阶级要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了政权，它就会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有足够的力量，来立刻使经济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来立刻增加普遍的福利。

这就将给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的国家以一个真正的事实教育，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大众于是就会一致要求采取同样的措施，而较穷的阶级的其他各阶层以及无数的知识分子也将要求国家走同样的达到人人富裕的道路。这样，通过先进国家的事实教育，

在那些无产阶级在今天还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也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样的时期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来到。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的前提。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只不过是权力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的团结问题。但是俄国却不是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那里正在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时候，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第122—123页
(摘译自：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德文版)

布尔什维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鼓励受他们影响的无产者阶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的专政是与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超越或下令取消符合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学说背道而驰的。他们从哪里找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来说明他们的行动呢？

他们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上曾用过一次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但马克思只是想用这个词儿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这个名词现在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尤其指苏维埃的统治所表现的那种政体。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在某种环境下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把这种状态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不可缺少的，当然他几乎同时说明，象英美这样的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要实现这一点又只能以民主为基础而不能以专政为基础，于是他也就自己证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废除。但是这并没有使专政的拥护者茫然不知所措。由于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就声称苏维埃宪法以及剥夺苏维埃敌人的权利，似乎已经为马克思本人承认是适合无产阶级的性质并且和无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政体。因此它必须和无产阶级本身的统治长期共存，直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从而直到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为止。就这一意义来说，专政似乎不是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临时的权宜措施，而是我们必须做长期准备的一种状态。

这种解释可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第9、10两项中得到证实：

“(9) 以前人们指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是没有研究专政要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它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困阶层长期专政的形式。因此重要的是说明下列一点，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按这个字的狭义所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国体。这里正是指的新的国体，这一点不应该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某些措施混淆起来，这些措施不过是适应庞大的任务和斗争的特殊的国家机构的职能。

(10)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的战争状态。显然，那些叫嚣共产党人使用‘暴力’的人，完全忘记了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本身

就是‘暴力’行动。在所有的文字中，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暴力制度。暴力的阶级内容在这里是很重要的。这样就从历史上对革命暴力作了说明。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愈要加强，这一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由此也就得出，作为政体的专政不仅是长期的，而且要在一切国家中实行。如果俄国现在又取消了刚刚获得的普遍自由，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后在这样的国家中也会发生，在这些国家中人民的自由已经根深蒂固，存在了半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并且它是人民在不断的流血革命中获得和得到巩固的。新理论很认真地肯定了这一点。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新理论不仅在俄国的工人中获得了支持，这些工人仍然记得旧沙皇制度的束缚，现在因为翻了一下身就高兴起来，就象学徒满师以后，因为他们也能象师傅殴打他们那样殴打他们自己的学徒；而是连瑞士这样古老的民主国家也有人支持这种新理论。但是还有更奇怪、更令人不能理解的事。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130—132页

（摘译自：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德文版）

如同一种论者所崇奉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位多疑善妒的神。他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容忍其他诸神。如果党内有人不相信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确性，就会激起他的仇恨。列宁强求整个工人阶级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如果党内有人对其他领导者表示较多的信任，列宁就把他当成最坏的敌人，用尽一切办法同他作斗争。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213页

（摘译自：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比”1946年英文版）

布尔什维克自称是卡尔·马克思的最忠实的，或者不如说唯一忠实的弟子。不幸的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限于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圣经，搜索一些字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他们不懂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用马克思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是严格地诚实地检查当前的现象。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206页

（见：摘译自（考茨基）：“布尔什维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建立在小农技术基础上的耕作业必然在各地产生一种使单独的小生产互相分开并使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倾向。欧洲和美洲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情况在全世界都在重演。难道俄国农民是非凡的人，可以不受这个普遍规律的影响吗？凡是把俄国农民当作普通人和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作比较的人都会认为，在目前俄国农业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说法是一种幻想。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 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124页

（摘译自：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德文版）

……农民过分牢固地依恋他的私有财产。我仍旧主张，农民私有和单独经营自己的房子、农场和花园，同时与其他村民一同耕种田地，这样将是最有利的。……我进一步建议，在建立新的居留地时，房屋、农场、小花园都应当交给移民私有经营，田地则共同耕种。……

……

我在1899年形成的主要结论是，我必须在某几点上同意大卫，而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但只是为了更加坚定地遵循后者的主要论点。我必须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注意到的大规模生产在农业中的发展已经停止了，而且它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发现小产业逐步取代大规模经营的现象，我只是注意到两种经营的比例保持稳定。这一种或另一种依次占优势，但运动始终是很慢的，而且从来没有长期朝一个方向发展。一般说来，如果只有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而没有外力的影响，大小农场的比例是很少变动的。很难精确地判定大规模经营是否比小农场优越，反之亦然。有时这一种，有时另一种证明较为有利，完全看占优势的社会情况而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了这一点。他们并不认为每一种大农场都一定比小的优越，只有那种能够使用现代技术和现代农业科学所提供的工具的大农场才是优越的，对于小农场说来，这些工具部分是无力购买的，部分是不能应用的。

当大农场和小农场都是用同样的工具和同样的知识来经营时，小农场总是更为优越的，因为农民对于自己农场的出产的兴趣远远胜过雇工对于大农场的工作的兴趣。只有大农场所使用的较好的工具和较多的知识才能抵销小农场的这一优越性。不仅如此，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的发展方向是强烈地抵制高度发展的机械和知识的运用的；这是农业中和工业中大规模操作的一个重要差别。我在这里指出了这一点，因为人们一直很少注意它。

……

在这里又是这样，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的结论为根据，却丝毫不理解马克思的方法。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大农场对于小农场的优越性不是绝对的。他总是使任何优越性依附于某些条件。布尔什维克完全忽视了这些，而且也不得不忽视这些，因为如果对实现他们手中的计划是否具备有利的条件进行调查，就会使他们从开始就无法进行。但是，如果把行动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冒幻梦的危险，就必须在作任何行动之前先做这样的调查。

为了使大规模农业正常地进行工作，首先必须充分供应现代化农业设施。为了要把这些设施用于这一目的，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受过科学训练的管理人员，这就要求有许多高等农业学校和生物学、化学研究站以及类似的机构。但是，最主要的是，必须有水平高的农业工人，而这就要求有高度发达的民主的国家不仅有好的初等教育，而且有充分的结社、集会自由和绝对的新闻自由。农业工人及其组织只有在生活条件较好的城市工人的帮助下才能发展起来。和后者们的密切联系是必要的，而除了充分民主以外，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也是必不可缺的。

必须具备所有这一切条件。大规模农业的技术优越性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在

西欧条件也不完备，必须做许多工作来加以改进。在俄国则几乎完全缺乏。虽然如此，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一批工人的精华，如果在俄国有这样的精华能够成功地创造有生命力的、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有高度水平的农业组织，用来作为对整个农业人口起刺激和教育作用的典范，那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从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开始，就作了这样的尝试，并且由国家加以促进，但结果却不能鼓励别人来效法。这样的组织往往存在短期以后就解散了，或者只能苟延残喘。

.....

这样的坏结果本来应当提醒苏俄的独裁者；但后果却恰恰相反。因为农民并不急于加入大农场和交出土地，就得出结论说必须强迫他们这样做。谁会真为这些细节麻烦，适合这样组织的条件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能够创造？他们有权在手，能够发号施令，而这就是结束。凡敢于怀疑这些方法是否有用的人，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

我们已经看到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大规模农业经营从一开始就不及小规模生产优越。机械、受过良好教育的农学家和受过训练的有创造性的农业工人的缺乏，必然会大大地缩小了大规模生产的范围。用来创立大规模生产的过火的方法更加大大地加重了大规模农场的缺陷。在大农场已经建立的地方，它们现在主要是靠强迫劳动维持着，而且也不是一个向高级形式的经营组织的进步，而是向旧的农奴制和庄园的倒退，不同的是，苏维埃的采邑不是属于军阀家族，而是为一群共产党内战贵族所有。

强迫劳动是各种可能的劳动形式中最不利的一种，而且就效果说来，它是最不能和自由劳动相比的。只有贫穷的完全破产的农民才乐意参加集体农庄，而他们的确是最不熟练的、最不会劳动的人。他们飞向集体农场，以便成为从国家领取津贴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有有助于使大农场成为繁荣的事业。

最突出的是，采取新的改革时的速度和毫无事先准备，以及野蛮的暴力，没有暴力，在苏俄是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城市的“突击队”担负了教导农民爱好大规模经营的任务，不仅剥夺了境况较好的农民，而且毁坏了他们的许多工具和杀死了许多牲畜。另外一种情况是，许多农民很快就认识到拒绝参加集体农庄是没有用处的，他们就杀死了自己的牲畜，或者吃了，或者卖了，因为他们想，在集体农庄里他们再也不需要它了。因此，在牲畜和工具本来就储备得很不充足的俄国农庄里，许多迫切需要的生产资料被毁坏了。

最后，在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之上还要加上笼罩着整个农业的可怕的不安，农业的前途不取决于农业人口中最了解工作条件的那一部分人的意志和知识，而是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常常是愚蠢得可怕的人的怪想和一时需要。农村居民所保留的工作中的创造性和兴趣完全被这种令人麻痹的不安压抑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试验必然会引导到什么结局，是很清楚的。

在任何条件下，苏俄不可能创造有生命力的农业大规模生产。想在一夜之间用魔术制造出几千个大农场的尝试，只产生了而且以后也只会产生一种后果，即毁灭农村人口的最健全的最有生产力的部分。这是农业革命的唯一永恒的效果。整个的俄国农业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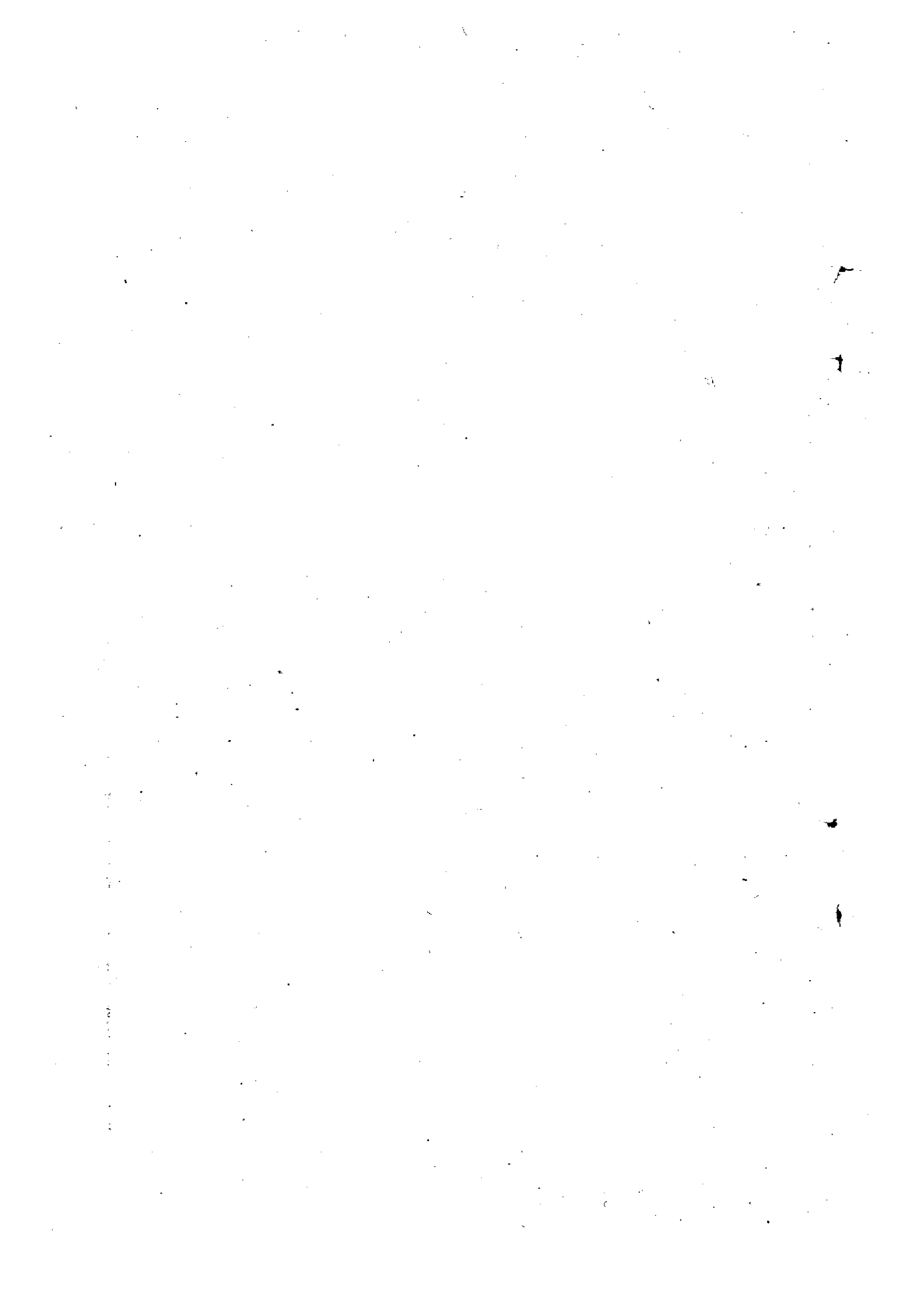
能以斯大林所坚持的“闪电速度”集体化而不致引起生产过程的完全停顿。

在工业中，有可能在小作坊的旁边建立大工厂而不致毁灭前者。如果产生了毁灭，那是大企业兴起的后果，而不是前提。在农村中却不一样，所有的可耕地都在耕种着，只有在一定量的农民农坊被消灭以后新的大农坊才能产生。这就是说，如果想避免农业生产过程的整个解体，那末从小生产到大生产的转变必须是逐步的而不是迅速的，而且只能是局部性的，不能到处实行。这是农坊规模的大小比例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所有权的情况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但工作的条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206页

（见：摘译自“布尔什维主义的死路”1931年英文版）

（考茨基）



托洛斯基哲学观点摘要



对馬克思主义的一般言論

馬克思 (K. Marx) 和恩格斯 (Engels) 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中，而且自然是在资产阶级底文化上，不是在无产阶级底文化上长育起来的。假如沒有劳动阶级，及其罢工，斗争，痛苦与暴动，自然就沒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因为沒有要求牠的历史的必需。但是牠底原理是完全在资产阶级文化（科学的与政治的）上建成的，虽然牠至终向那种文化宣战。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底压迫之下，资产阶级平民政治底普遍思想，属于牠底最大胆，最诚实，最有见识的代表者，升到可惊的捐弃的地步，具有着资产阶级科学底一切批评的武器。馬克思主义底原始是这样的。

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1924. 7）

见：北京未名社 1928年版 第260页

赫尔岑 (Hertzen) 说，黑格尔 (Hegel) 底学说是革命底代数学。这定义甚至可以更正确地应用到馬克思主义上面。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底错综变化，是真正的革命的代数学。在外眼可见的场所中，是混乱，洪水，无定形，无限制。但是这是计算过称量过的混乱，牠底逐步的层续是预先见到了的。这些层续底相继而起的规律，是预先预备的，而且包含在似公式中的。在元素的混乱中，有一种盲目的深渊。但是在有指挥的政治中，存在着明见与谨慎。革命的策略不象一种元素般无定形，牠象数学公式一般完整。我们看见活动着的革命底代数学，在历史中这是第一次。

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1924. 7）

见：北京未名社 1928年版 第135—136页

后来，一般支配特殊的观念，形成我文字和政治工作的主要部分。愚蠢的经验主义，无耻地的谄媚地崇拜，那时常是空想的，以及其虚伪的解释，我觉得是非常讨厌的，除开事实，我看到了定律。自然，这曾使我不止一次得到轻率与不正确的概论，特别是青年时代，知识是书本上得来的，生活的经验不充分。但是无论从那方面讲起来，我觉得只有我把握着“一般”的线索时，我才能行动。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是我整个的内部生活之永远的枢纽，就是那从知识上对于为琐碎的小事斗争，对于那彻头彻尾的实经验主义，及一切思想上不缺乏具体，理论上沒有综合的仇视上发长出来的。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1929年）

见：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 第132—133页。

一般支配特殊、定律支配事实、理论支配经验

一般支配特殊、定律支配事实、理论支配个人经验——这种意识在我幼小即生根于

心中，且随年以俱进。城市在形成此种意识时，发生了主要的作用，此种意识后来变成哲学的人生观的基础。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1929年) 新生命书局 1931年版 第131—132页
依据辩证法的原理，错误的政治路线和一切世界上事物一样受矛盾律发展力的支配。

托洛斯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
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版 第196页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观点

历史是人造成的；要想估计那些产生现代历史的主要原动力，除以积极的态度外，别无他道。为明了转入漩涡的各阶级，各党，和各党领袖是怎样起见，我们必须从许多政治的复杂关系，许多谎言，许多假仁义的话，和那无所不至的议会里的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言里寻出线索来。在这种情形之下，辩驳的方法是政治分析的必要方法。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1929年版 第1—2页

如果认为只是由于老干部经历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锻炼，他们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堕落和机会主义蜕化的自满自足的保障，那便是浅陋的偶像崇拜。不！历史是通过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人们常常决不是有意识地在创造历史，其中也包括创造自身的历史。归根结蒂，问题当然是由具有国际意义的各种重大因素来解决，如：欧洲革命发展的进程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但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这些客观因素上去，这和只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主观激进主义中寻找保证一样是不正确的。在具有同样的革命精力和同样的国际条件下，党反对腐化倾向的斗争却有好有坏，这决定于党对危险的认识程度和克服危险的积极性。

托洛斯基：“新方针(三)”(1923. 12)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78—179页

假如没有生产力的增长，那就谈不上所谓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我们目前所估的经济水准和文化水准之上，社会经济制度中生产中生产力之发展，只有诱发生产者之个人利益才有可能。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4页(著者序)

至少在目前，老年的资本主义比少年的社会主义占优越，究竟构成这点最有力之处是什么呢？不是一般的可变价值，也不是库里满藏的金银，更不是蓄积的和占有的财富总量，从前蓄积的富源并非没有牠们的主要性，可是牠们不是有力的因素。一个生存着的社会不能靠牠的旧资本久存；牠将用生存的劳动产物满足牠的需要。远古的罗马虽则是富饶，抵挡不住“野蛮人”的侵入，因后者劳动生产力较衰落的奴隶经济为高。给大革命惊醒了法兰西资产阶级社会，不过把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Italian city-republics) 中世纪以后所积蓄的财富劫夺过去罢了。若果美国的劳动生产力会降到欧洲劳动生产力的水准以下，美国藏在金库的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金银对牠没有多大用处。资产阶级国家经济的根本优越在乎资本主义直至今日仍然出产较社会主义更低廉更精美的货物而已。这一个事实，或者可以这样说一般仍照陈旧的资本主义之惰性定律 (Law of inertia) 生存着的国家，其劳动生产力在今日仍较那一个在因袭野蛮性的条件之下，开始应用社会方法的国家，更为优越。

我们已熟悉历史的根本法则了，胜利终落到那个为人类社会准备了更高的经济平面上。

历史之争讼将会由劳动生产力的系数比较所决定的——自然不是即时就决定的。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 (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48—49页

一般的政治状况——不论是内地的或是国际间的——构成许多问题繁复的联系，而每个问题都要连合着经济的形势来考究。这样的分析对于本书的任务是不重要的。经济基础演进之基本趋势，其大纲之创制，自然不是供给政治之上层基构之蜕变以完全的解说，因为这上层基构有牠自己的内部逻辑，自己的任务，与自己的困难。一个普通的经济朝向 (Orientation) 将不会替代政治的朝向，牠只有使后者的朝向更加容易。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 (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09—110页

一个时候每件事情之实际解决方法要依该时各因素交互作用之研究而追求出来，追求的愈精深愈好。但是对于经济长久演进作一个考究就要将一般上层基构 (Superstructural) 的因素被排除出来，尤其是政治上的因素应该这样。譬如，战争就会给进化一个巨大的影响使其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可是欧洲革命之胜利，同时会令她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这不但是外来的事实会如此正确，即使苏联内地之经济进程也会产生一个极繁复的政治反应，这个反应所得的结果可以发展而成为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乡村经济之不相涵接，我们已知她绝不会诱起任何直接的经济危险，即是说，资本主义趋势之急激增长，绝不会牺牲了社会主义的诸倾向；可是在某种境况之下牠会产生政治上的趋势而使社会主义之演进蒙不利之影响。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 (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08—109页

我在谈到十人决议草案时，应当提醒同志们，要知道将要表决的不是演说，而正是这个草案。我认为决不能表决这个决议草案，因为这个草案十分——不妨这样说——不完善。在这里，列宁同志仿佛责备我（在这一问题上，他责备布哈林同志为折衷主义），说我好象是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其实政治是集体的经济。我过去和现在都说，党内的协调、革新、妥协和大力扩大工人民主范围等问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在这里，并没有忘却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危机，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从前，危机只是以征兆的形式在苏维埃，党及其他各方面呈现出来的。在职工会里，它表现为工人阶级消费心理的压力，表现为工人群众与生产心理的联系不仅不够，而且近来日益减退。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付报告”（1921. 3）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85页

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宗教，法律，道德和艺术，代表同一社会发展历程底各别的方面。虽然牠们从牠们底实业的基础上分化自身，变复杂了，加强了，并且详细地发展牠们底特殊的特性，政治，宗教，法律，伦理，和美学，仍然一毫不差地是社会的人民底机能，并且服从他底社会组织底规律。唯心主义者，正相反，所看见的，不是从自身中开发必需的官能与机能的，统一的历史的发展底历程，却看见或些独立原理——宗教的，政治的，美学的，和伦理的原质，这些在自身中寻求原始和解释——底交叉，组合，和相互作用。黑格尔底（Dialectic）唯心主义，把这些原质（牠们是永久的范畴）归到一种创生的单元，而把牠们排出某种程序来。虽然黑格尔底这种单元是绝对的精神，在其 dialectic 的显示底历程中，将自身分成各种“成分”，黑格尔底系统，因为牠底 dialectic 的性质，并不因为牠底唯心主义，给人一种历史的实在底观念，正如翻过来时一只手套给人一种手底观念一样。但是形式主义者（他们底最大的天才是康德）不注视发展的动力，而注视牠底一个横切面，在他们自己的哲学显示底时日。在这横切面上，他们显示物体底（不是历程底，因为他们不想历程）复杂性与繁复性。他们分析而且类别这种复杂性。他们将名目给与各元素，这些即刻就变成要质，变成第二义的绝对物，没有父或母；将名目给与机智，宗教，政治，道德，法律，艺术。此地我们不复有翻过来的历史底手套了，却是从各个手指上剥下来的皮肤，干到完全形而上的程度，而此种历史底手，竟成为大拇指，食指，中指，或一切其他的“成分”底“相互作用”底产物。美学的“成分”是小拇指，最小，但并非是最少被人爱的。

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1924. 7）

见：北京未名社 1928年版 第241—242页

唯物主义无论在逻辑中，法律学中，或艺术中，都不否认形式元素之重要。正如法律制度能够而且必须从牠内在的逻辑与坚密中去加以判断一样，艺术能够而且必须从其

在形式中的收获底观点去加以判断，因为没有形式不能有艺术。

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1924. 7）

见：北京未名社1928年版·第238页

关于阶级、国家、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言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并把土地交归农民之后，会遇到不仅大农民、而且大部分中农这班敌人，甚至反革命势力的反抗。我们有过“暗示”没有？有过某些暗示，而且还不小。……农民（其中包括中农）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在该阶段中农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形式。

“托洛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6日“真理报”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206—207页

伊里奇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一、二十年的正确关系。这就是说，伊里奇认为在一、二十年內我们决建设不成任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应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消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就是说，这里前途在于二十年，在这二十年期间，我们要执行一条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政治路线。首先是这一点。但接着又说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前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说，仿佛我规定了这样一种规律，在世界革命胜利前应当尽可能和农民建立不正确的关系。（笑声）同志们，显然，这里不是想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

……我们现在争论的是对富农课税，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系的方式方法。这是什么？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你们尽可以认为我们某个提议不正确，但全部思想斗争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那些关系更正确。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6日“真理报”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209—210页

中央委员会在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继续攻击反对派，即攻击这样一部分共产

党员，他们在近年来坚决主张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仔主义者，也就是坚决主张把国民收入实行适当的再分配，以保证更快地进行工业化，减少失业和消除商品荒。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仔主义者的最好的办法是压制党内始终坚持这种行动纲领反对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的那一翼。恰恰相反，日益增长的富农和耐普曼正在推动现在的党领导去迫害反对派。他们通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内的官仔们对党施加压力。“第三种势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急不可耐地希望粉碎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便实现其经济纲领；发动富农和耐普曼，并用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办法和外国资本结合等等。

为了正确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保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急剧地改变总的政策方针。

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1927）苏联托洛茨基

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2集，人大 1958年 第337页

我们不应该只估量某一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的态度，而应估量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该国历史任务的态度。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压迫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农奴制的沙皇，在旧俄是一个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同对工人农民的态度上，并不见得比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同工人农民的态度上要革命些，或者也可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我们只能这样的观察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是很实际的，并且很能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面目；牠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则必定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牠本身利益的一个危险威胁。假如推翻满清的斗争比较推翻沙皇是历史上的一个较小的任务时，则现在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便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了。假如我们在开始活动时，告诉了俄国的工人，叫他们不要相信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能够推翻沙皇制度，打倒封建势力；那末，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工人面前，从最初的时候起，即应不放弃宣传这种不信任的精神。史太林布哈林所宣称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内在”革命性之绝对错误的论调，这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翻译成中文用到中国政治上去，其结果只是在中国被压迫的地位上，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于国内政治舞台上更增一重力量，以反对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

托罗斯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版 第14—15页

列宁再三申说，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清楚，但是列宁从来不曾且从来不会发这样的问题，仿佛在实行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要比非殖民地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来得更进步些革命些。理论上既说不过去，而在历史事实上亦未能证明。不论俄国的自由主义者

如何的可怜，不管他的左半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孟雪维克是如何的混杂，但终究不能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俄国的革命些或是高超些。

以为殖民地的受压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雪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孟雪维克以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完全是革命的，因为它受了专制的封建的压迫。

托洛斯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出版 第9—10页

发动俄国革命（十月）之客观社会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将以更复杂的剧烈形式表演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相互敌对，就一般可能讲，将要比俄国当时为更不可能调和之状况，因为在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是直接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的工具相勾结，而在他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其最初已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建立了关系。中国农民之成分比俄国占更大的数量，然而受国际的冲突矛盾所挤压（他的命运须依此冲突之向那方面解决而定），使中国农民比俄国农民还更少领导作用的能力。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预言，而是各方面都已经完完全全证明的事实了。

托洛斯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

见：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版 第30页

只要中国国内外的矛盾尚未经过革命方法来解决，中国潜伏的（即可能的但非现实的）革命局势还是深深的存在。

托洛斯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 ）

见：世界文化研究社出版部 1930年版 第128页

在产业工人方面，由于使工业劳动者靠他们自己的劳动生产能力以赚得他们的工资。这层工作业已达到。在农民方面，农民自身利益之获得，祇有在下列事实中才有可能；他所经营的是私有农村经济，而又是为市场而工作。然而这种条件仍含有种种的困难。不论工资的差异怎样大，无产阶级总不至于发生分化的现象，因为劳动者仍然是国家企业的劳动者。可是在农民方面的情形却有点不同了。为市场而经营的二千二百万的农村经济；（其中苏维埃企业，农村集体组合，和土地公社Land Commune，现在还是寥寥无几）。不可免地造成使一部分农民群众的富裕而兼剥削的行为，而同时又使另一部分的中农群众衰落，变成贫农，使贫农变成农村劳动者。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当其采取新经济政策并把这政策伸展至各省区的时候，牠对于市场制度的一般不可免的社会结果，或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并没有掩饰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危机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看待，而应当作一种问题看待；这些难题应加以仔细的考虑，同时在实际工作的每个阶段中把牠来解决。

当乡村的阶级分化仍在不断地发展着的时候，假如国家经济在工业上，商业上，与

财政上的地位不能不出之于退让的一途，那我们上面所说的困难更难消减了。因为在这场合之下，私人资本得以扩大他在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的影响，结果更促进了乡村中的阶级分化，使我们全部的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的路上发展。我们也正为这个缘故，应首先决定阶级势力在工业，交通，财政，国内和国外贸易各方面所进行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在上述经济各方面中（国家设计委员会Gorplan所规定的），其势力之扩张，足以形成一种城市和乡村间的新关系。

我们经济方面既有资本主义成份与社会主义成份的斗争和冲突，（新经济政策之本素又构成这两种成份之协作与对抗，）那末，这种斗争的结果当然以是这两种成份进展的速度来决定。换言之，假如国家工业发展慢于农业，而后者之前进又使双方各走极端之速度增强，（资本主义的富农在上无产阶级在下）。此进程之结果必使资本主义复兴。但我们不妨让敌人试行证明这结果之不可避免性。可是纵使他们的旁证博引较之考茨基成麦唐纳尔的还要高明，他们仍不免有途穷七见之一日。从一方面看来，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秉权的政党在政治和经济的策略上处理失当，而使现在发展得最有希望的工业生长发生阻碍，同时又放弃乡村中政治和经济的势力，那末，社会主义在我国当然会消失净尽了。然而对于这些病态，我们全没有被迫而作这样的臆测。

.....

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策略，是迥然与他不同。我们要指明怎样把既夺得的政权保存起来，怎样使它更巩固，怎样使无产阶级国家的态度充满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圆满。我们有一切理由，计算我们的工业进展，与乡村中分化过程的调和，使这进展与调和，形成农业集体化的技术条件和经济的先决条件。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4—8页（著者序）

我们国家的经济进程里所引起的矛盾，这件事，我们老早已经完全预知并且没有为她掩护了。因为这些进程构成两个互相排挤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曾把历史的问题概括成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谁殴打谁”？（Who beats whom?）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 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9页

自必然，我们业已很明瞭苏联经济进展的社会形态是具有二元性，因为是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一切方法，形态和目的之合作与斗争。这些就是新经济政策安排我们进化所根据的条件。进一步说，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包含于这些条件之内的。关于我们发展中矛盾性质一般的意见，现在已不能使我们满足了。目前，我们寻求而且极端要求我们的经济矛盾的，明显的标准，我们不仅要一般进展的活动系数，并且需求这个或其他趋势的比重之比较系数。靠这个答案来解答这个问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其实，

我们国内和国外政策之一切都靠这个答案的。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3页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真正的高涨时，这就是说，城乡之间不应该有矛盾；这就是说，普遍满意，无忧无虑，有文化。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真正高涨的意思。我们离这还远得很。我国还有无依无靠、失业的人，我国农村每年产生两百万剩余劳动力，每年流入城市约五十万，而工业每年能接受的不超过十万人。我们可以为既得的成就而自豪，但决不应破坏历史的远景。这还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的高涨，这仅是在联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桥上最初的严重的几步。这难道是同一回事吗？不是同一回事。我的受到指责的那段话是正确的。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11）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二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214—215页

富裕农户在这里也占着和他们的数量不相称的地位，掌握了牛乳合作社一半的管理，提供乳品总量的一半。在其他专业合作社中，材料也是一样。这些材料都说明，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由于没有把生产过程实行公共化，所以它不是削弱，而是在加强农村分化的过程。农村合作社对于农村富裕上层发展经济的帮助，比对贫农的帮助多些。我们的合作社目前在很大的程度上联合农村力量强大的富裕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掩盖这个事实是直接和列宁的观点相抵触的。为了使合作社完成列宁向它提出的那种伟大的社会主义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揭露现在的合作社的缺点，不要用列宁关于“真正居民群众的真正合作社”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天才言论来掩盖下列事实：富农和富裕阶层暂时还利用合作社来达到自己组织和自己积累的目的。

托洛茨基等：“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第2册，人大 1958年版 第323页

每逢非常紧急，责任重大的相当时期，各种阶级在各种情形之下，为各种目的，不得不将绝对的权利交付于那些在某个时期最能拥护他们的基本利益的领袖们。所以我们说到专政，便不可不首先弄清楚，究竟这种专政在历史上表现它代表那些利益，那些阶级。譬如克伦威尔和卢倍斯比都是表现中产阶级社会的进化之历史进步的趋向，各人代表一个时期。威廉·皮特也是很近于个人专政的，他便是拥护王权，拥护特殊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抵抗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最盛的时候便是卢倍斯比专政的时候。

托罗斯基，英国帝国主义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湖书店1929年版 第155页

在一般的经济问题上，国家的权力虽非全能，然而，当它有意识地拥护历史演化之进步底趋势时，国家的经济势力无论如何是很大的。当它允许资本主义趋势发生的时候，这个工人的国家却能够予这些趋势以相当的限制，而使其利于或激进社会主义之趋势。在这场合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便是：国家的预算制度和一般行政性质的计量；国有的内地和国外商业制度；国家鼓励的消费协作社运动；严颁适用于国家权力需要的特许权政策；综之，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保护政策的高明制度。这些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它们的活动范围又须限制于专政的领域之内。在那与苏联渐有更大的商务关系之国家里面流行着，显然是相反的制度；即是广义的资本主义之保护政策。这里便是他们的差异了。在苏维埃的领域里，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但有工人国家立在他那边；在世界市场的领域上，社会主义就要面着资本主义，后者受帝国主义国家保护。这是，不但经济与经济斗争，而且政治与政治斗争了。这时，国外贸易独占与特许权政策之让与与是工人国家经济政策之最坚固的利器。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则和方法不能在世界市场中尽力推行，可是，社会主义经济对世界的关系，大部分仍要有赖于这个工人国家之意志。这样的结果，一个正确地应用的国外贸易制度，将来会成为很重要。特许权政策的作用之在工人国家中，将在这个场合愈加其重要性。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99—101页

国外信用在苏联经济动力上有何意义呢？在积蓄方面，资本主义使我们前进，可是这样积蓄还未存在，在这三五年间，我们仍然要从事于创造她。我们进步之基础，其前进远胜于我们今日所积蓄之物质资源之组织。假如借助欧洲技术的“方法”，我们便能促进我们的生产进程，同时借助以信用得的欧美机器，使这进程更能尽量发展。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使资本主义在一定期间获得社会主义债主的任务，资本没有从封建经济的乳房吮吸滋养品么？历史的债务应该要还清的。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81页

工人阶级以前的斗争取得和保证了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四个不可动摇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实在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6日

“真理报”第257号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201页

我们在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斗争中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国家政权。只有修正主义的笨蛋才会不了解这个工具的意义。资产阶级都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这点。

无产阶级手中的另一个工具是国内最重要的生产力：全部经济、运输业、全部采矿业、绝大多数的加工企业都由工人阶级直接实行管理。

土地也属于工人国家，农民每年缴纳几亿普特的实物税。

工人政权还掌握着国界：外国商品，一般外国资本只有在工人国家所希望和允许的范围内才得流入国内。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和手段。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6日“真理报”第257号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200—201页

党的机构为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的趋向，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单独依靠传统来巩固领导集团威信的趋势。尊重党的传统，无可争辩地是党的教育和党的团结的极为必要的组成部；但是，这个部分只有通过独立的积极的检验党的传统，通过集体制定目前的党的政策而不断丰富和巩固起来时，才是生气勃勃的和牢固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那就可能使尊重传统变质，而成为空洞的热情乃至十足的官样文章，即没有内容的形式。不用说，这种世世代代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和不巩固的。从外表上看来，它在内部还没有暴露出致命的裂缝以前，可能维持五分钟的巩固。依靠党内“风平浪静”的党机构的方针，其危险也就在于此。由于保持革命传统的、没有染上官僚习气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即——正如我们所确信的——老一辈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确了解上述这种危险前途，并站在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立场上来全力帮助党实现这个决议，所以可能造成党内各代人物相互对立的主要原因也就消失了。那时，某些“铺张浪费”或青年在这一方面的嗜好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首先必须创造条件，使党的传统不要集中在机关内部，而要在党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生根和革新。从而也将避免另一种危险：把最老的一辈分成“机关领导分子”即拥护“风平浪静”的分子以及非机关领导分子两类。不用说，党的机关即它的组织上的骨干，如果能摆脱闭关自守的处境，那它就不会削弱，而会更加巩固。至于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权力集中的机关，在我们党内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

托洛斯基：“新方针（一）”（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161—162页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

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津盖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斯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的前夜更清楚，以老一辈的声誉为幌子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许容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末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要防止这种毋庸置疑的危险，除了对方针作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使它向党的民主方面转变，并一天天把更多的直接参加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

要求青年重复我们的公式，是十分不够的。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使它化为血肉，要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要能够拿出因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来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的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都全部清洗出党！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也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勇敢和独立不倚地捍卫自己的见解。要是他今天在自己的组织内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错的。他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务或转变的必要。他坚持不懈地两次、三次、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为党效劳，帮助党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的任务或完成必要的转变而不致于遭到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的痉挛。

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分裂行为是不应当有的，而且将来也不能有。这种行为是遭到作为独立集体组织的全党反对的。但是，只有把工人民主这一方针加以发展和巩固，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每个人或集体带上一顶宗派活动的大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托洛斯基，“新方针（一）”（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人大
1958年版第158—160页

如果把民主恰好理解为群众实际的更加自觉的和更加有计划的参加各方面的管理，那么可以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它采取怎样严厉的“专政”形式，才能创立、制定和发展这种真正的民主。换句话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使工人阶级能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建立自己所必须的一些机关；才能各得其所。

这种过程是不是在一切领域和在任何时候都通过形式上的选举完成的呢？没有的

事。对形式上的民主标志的这种崇拜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没有经受过的，领导工人阶级的党，既是自觉地和确切地反映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胜利的意志，不能不一再对工人阶级指出，在那些场合必须缩小形式上的民主并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制，以便保障基本的东西即工人阶级的政权。

假若作纯粹抽象的讨论，也就是想法脱离实际的国内外历史条件，那末可以说，最好从作坊和矿井开始到处都立刻实行选举制。这样一来，劳动群众就会有最丰富的资料来比较各公叶机关实行选举的结果，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改正错误并逐渐学会把适当的人选到适当的岗位上。譬如说，假若在军队中立即实行普遍选举制，那末归根到底我们的各排、各团和各师就会学会选出那些最后能保证胜利的指挥员。不幸的只在于：在走向这一胜利的道路上，我们的师团，而且与它们在一起的还有整个工人阶级，就会被已经挑选了指挥人员的敌军彻底歼灭，所以我们甚至没有可能把军队选举制的经验推行到底。正确的阶级本能与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大大限制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工人阶级清楚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军事上内行的和政治上可靠的机构来选择指挥人员，较之对此准备不足的群众直接选举，能获得虽不是理想的、但实际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上述种种经过某些更改和缓和后适用于苏维埃工作的一切方面，而首先适用于经济方面。

由此可见，不应该用形式主义的民主准则来对待问题，而应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具体条件从实际吸收群众参加管理的角度来对待问题。

无疑地，战争使采用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大大地缩减了。但是，这决不是说战争机械地使真正民主的发展中断。决不能这样说，在最困难条件下领导农民群众这一方面军队给了几万先进工人非常重要的教育。另一方面，军队首次使千百万农民认识了苏维埃政权这一概念，并吸收他们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生产。这个极重要、极宝贵的经验，虽然不是以形式主义的民主方法获得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机关以“任命”方法获得的，——但是它在目前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最重要的组织部分之一。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为了保证自己有必要的国家机关并在每个特定时期加强那些解决当前最重要任务的国家机关的机构，必须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轮流使用，有时配合使用选举制和任命，委员制和一长制，直到个别独揽大权为止，——所有这些方法，有时见一种方法靠另一种方法扩充，有时是互相补充，总之这些方法是供工人阶级来建立必要的管理机关和解决那些已提到日程上的任务。

托洛斯基：生产民主（1921）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阶级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31—32页

有人对我们这说种军事化与工人民主方法相抵触。决不会的。军事化本身说明我们应当这样建立我们的组织和这样规定我们的工作速度，即：让工人舆论机关对一切破坏

生产的工贼施加压力。这就是军事化的实质。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其技术方面。越往后，我们就越要使军事化依靠更广大的工人群众阶层，依靠更有组织的，重要的群众性劳动。任务在于要职工会也成为一个是吸引群众参加生产的机关。这项任务，不应当放在反对与职工会无关的官僚主义的某种外部斗争上，而应当放在内部的即对落后性和惰性所作的斗争上。当我们在作坊里碰见每个工人的时候，当他考虑到他在工具上和在工作方法上可以作出什么贡献和改进，在作坊里何处应当安装门才不致于使工人们每天多跑冤枉路……的时候，如果他考虑到这方面，那么，同志们，这就是真正工人民主最重要的，基本的部分。

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的发言（1920年）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28页

工人阶级把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各种不同方法配合起来而保证了自己有一个必要的战斗机关，虽然形式上的民主大大缩小了，但是千百万群众参加了，而且自觉的参加了军队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军队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最高度的军事民主的军队，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军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质上的）。

托洛茨基：生产民主（1921）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33页

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具有的丰富经验——首先是在最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农民的经验——不仅应当加以估计，而且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利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我们决不打算向后退，也不打算在发展的线索仿佛已被战争打断的地方结起小结（某些肤浅的宣传员对事情作这样描述），不，我们要把宣传经验和军事经验（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经验）运用于经济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向群众明确地提出经济任务，无论在任务的共同性（统一的经济计划）或任务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方面，不仅对专门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进行纯粹组织上的检查，而且首先是全面的提出关于选择，审查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的问题。

托洛茨基：生产民主（1921年）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录第1册

人大1958年版 第33—34页

结果，职工会任务的提法愈来愈不明确了。共产主义学校这一类老生常谈的词句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主要工作——制定经济计划、实行经济计划、建立经济机关、挑选和教育经济工作人员——愈来愈不通过职工会了，即愈来愈不要职工会过问了。职工会愈脱离苏维埃经济工作的实际过程，则它愈难参与这种工作，它愈来愈失去凭借，从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常常以一些老生常谈的空洞词句来说明

自己的任务……

当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讲到党与职工会之间的分裂是极大的灾难时，与疑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更现实得多的危险，即职工会中央机关与工人群众的分离，疏远和脱离。职工会参加生产过程越不积极，则它的活靠山就越少，它就越不争取群众和现实其教育作用，因为在目前条件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不是在不过问生产的情况下，而是只有在生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

托洛斯基：答彼得格勒同志们（1921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录第1册

人大1958年版 第38—39页

这种绝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单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事实还不能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这个时期作了最好的说明。在中央的提纲中用混淆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庸俗机会主义宣言代替了列宁对这个过渡时期及其内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竞赛、“谁战胜谁”问题的说明。

托洛斯基等：“托洛斯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192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2册 人大1958年版

第301页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如何克服因自己的苏维埃职权而分离的党内各个部分和集团地位不同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并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决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古董，相反的，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中产生的新现象。

无产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国家来实现自己专政的。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因而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实行这种领导，而不过分密切地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构纠缠在一起，并在这种纠缠中遭到官僚主义蜕化。

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员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的。他们在国家机关内相互之间是处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并与非党群众保持复杂的个人关系。他们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因为这是涉及到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共产党员直接参加生产，参加工厂委员会，管理企业、企业托拉斯、辛迪加，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既然问题涉及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所以党要考虑——应当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阶梯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我们党的主要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它能够在每个具体的时刻通过党员做工，党工会干部、党员经理和红色商人的眼睛来观察工业，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结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

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主基础上才能实现。相反的，机关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越会被它的执行机关（党委会，支委

会、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强调这种方针时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羣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书记可以任免人,发布命令,追究责任,等等。在领导上发生了这种退化现象时,党的主要的无可估价的优越性——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就失去了意义。领导具有纯粹组织上的性质,常常转变成简单的强迫命令。党的机构日益陷于解决苏维埃机关的琐碎任务和问题中去,一天到晚关心它的日常问题,受它的影响,结果,党的机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果说作为集体的党组织一向具有比国家机构的任何组织更丰富的经验,那末,对于党机构的个别负责人就决不能这样说。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其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厅主义部门、官厅主义情报和书面资料的附属机构,并用这个原来使自己同苏维埃机构接近的附属机构,把自己和生龙活虎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象德国的名言所说的情况:“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官厅主义日常行为都投入到党的机构中来,造成了党机构内官厅主义的发展。作为集体组织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行领导。因此,即使在领导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有不满或怀疑的情绪产生。但是,这种领导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分散精力,因为它没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样,官厅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团结,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确影响作用。这一点总是那些在党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问题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们所不注意和不理解的。

托洛斯基:“新方针(三)”(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80—181页

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对官厅主义的反应特别锐敏。无怪乎列宁同志建议要广泛地吸引学生来反对官厅主义。青年学生就其社会成分和社会关系来说,是反映一切有代表参加我党的社会阶层的,并受他们情绪的影响。由于青年热情,青年学生总是立即使这种情绪激动起来。他们作为青年学生总是力图说明和归纳问题。但这决不是说,青年在自己的一切表现和思想情绪中都是反映健康的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党内万事如意,或者是青年不再反映自己党的情绪了。但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有人说,我们的基础不是学校支部而是工厂支部,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说青年是晴雨表时,我们正是认为他们的政治表现不是具有主要意义,而是具有征兆意义。晴雨表不能创造气候,只能预察气候。政治气候是在阶级的深处和阶级相互冲突的地方造成的。工厂支部使党和我们的主要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系。农村支部在差得多的程度上与农民建立联系。使我们和农民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军队支部,但军队支部处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最后,从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中招收来的成分复杂的青年学生反映着我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如果我们不是十分用心地了解他们的情绪,那我们就会是感觉迟钝的人。在这一问题上还必须补充的是,我国大部分新的学生都是具有一段对青年一代说来十分重大的革命经历的党员。目前最热心的党机关迷对青

年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是完全徒劳无益的。青年是我们的检查者，是我们的接班人，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托洛斯基：“新方针（三）”（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79—180页

革命即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意义。他将政权由一耗竭了自己的阶级之手移转于正在兴起的别一阶级之手。暴动是两阶级为政权争斗的最尖锐与最紧张的时机。暴动只是在基于进步的阶级之上（这一阶级能团结压倒的大多数人民于其周围）时，才能引到革命的真正胜利和建立一新秩序。

托洛斯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1932年11月27日讲演）

· 见：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3年版（民国22年） 第6页

你说这个妙不妙：一本“小书”拿来作调和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方法：我们再总括一下吧：欧战以前，“似乎是”大家都承认现社会制度须要改良；不过关于改良的方法尚无一致的意见，资本家主张私有财产，工人反对私有财产；战后情形更坏，政治上的歧道更甚；因此，韦布夫妇便作了一部小书，为的要使双方开诚布公的妥协；不过这种希望作者也承认“或者是不中用的。”不错，或者是不中用的，或者之至啊！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99页

但是无论孟什维克及其鼓舞者普列汉诺夫在革命前的观点和今天的观点有多大的不同，“没有资产阶级”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却依然如故，骤然看来，这种看法可能算是一个公式。事实上它只是愚蠢。

人类的历史不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从前就是有过生命。在18世纪的末叶，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次革命叫作伟大革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在它的一定阶段上，政权落到了雅可宾党人的手中，雅可宾党人依靠了共和党人，依靠了城市内的底层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在他们跟吉朗特党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当时的立宪民主党人中间设下了四角形断头台。只是因为雅可宾党人的专政，才使第一次法国革命具有了真正的意义，才使这次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然而，这种专政的实现不仅没有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罗伯士庇尔没有来得及认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违反了社会学的一切法则，不仅不与吉朗特党人握手言欢，而且砍掉了他们的头。这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但是，这种残酷决没有妨碍法国革命成其为伟大的革命，同时也沒有使它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所有的无能之辈都在滥用马克思的名义，可是马克思曾经写过：“整个法国恐怖无非是平民对待资产阶级敌人的办法”……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害怕这些平民对待人民之敌的办法，所以雅可宾党人不仅从政权中排除了资产阶级，而且每次资产阶级企图阻止或“减弱”自己的工作时都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显然，雅可宾党人是在不许资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

关于1648年的英国革命，恩格斯曾经写道：“只有革命大大超出了它原来的目标，完全象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一样，才会使资产阶级夺去已经成熟的果实。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法则之一，显然而且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臆测是恰恰相反的。

托洛斯基：“俄国革命的性质”（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 1958年版 第17—18页

新的时期产生新的组织。现在到处都在斗争的火焰中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丰富遗产当然不会毫无用处。不过，在这种遗产内要进行内部清洗工作，正个一代的“现实主义”庸夫俗子都将被抛到一边去，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倾向将破天荒地获得全部的政治意义。

托洛斯基：“国际策略”（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 1958年版 第24页

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俄国的革命越是坚决和英勇地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会越有力地推动西方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

托洛斯基：“回顾与展望”（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版

1958年 第15页

夺取政权的斗争，对于我们不只是目前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不，它是要完成一项国际义务，是要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战线上占领一个重要的阵地。正是这个基本的观点，决定着我们对所谓民族护国主义的态度。战线暂时移动到某个方面，既不能使我们停止，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斗争，我们斗争的锋芒已指向了靠帝国主义互相残杀人民来支持的资本主义基础的本身。

不断的革命反对不断的屠杀！这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托洛斯基：“国际策略”（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25页

我由研究结果所得的推论便是英国正在急速的向着大革命的时期前进。不消说，英国那些拥护政府的消息家和听从他们的话的美国人一定要说我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好

象局外人竟可以利用小册子书改变一大国家进化的程序，实在说起来，我不过是想分析分析英国的历史进化中几个要点，借此说明英国在这条历史的途径上将要遇到继续存在的障碍——内部的和外部的障碍。所以根据我这番讨论便说我有干与别国的事情和造成革命的嫌疑，那差不多无异于因为一个天文家预测日蚀将要发生，便骂他要造成日蚀一般。

但是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认为天文的现象与社会的现象是相同的。前者是在我们以外发生的，后者却是由我们的活动而发生。然而这句话又不是说历史的变迁可以随我们的愿望造成，或靠小本书的帮助而指挥。以拥护资本主义——包括英国资本主义——为唯一目的而出的书比攻击资本主义的书多得多了。无论那种理论要想发生效力，一定要以社会进化的实际情形为根据才行。英国之有革命的趋势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破产的时期。如果定要找出罪人来，如果定要追究促着英国向革命的途径上前进的原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便是：不是莫斯科，而是纽约。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出版
第3—4页

于是英国因被排挤而失却其全世界主宰的地位，这种情形早在19世纪的末期便渐见分晓了，结果在20世纪的初年便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内部的不安和酝酿，劳动阶级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根本上含着革命的性质。劳资之间的剧烈冲突便是这些变化的主要成分。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3页

无论什么人要想明了历史变迁的因果关系，一定要知道那根本重造大不列颠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若没有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是决不能成功的，若没有那时打倒贵族特权和朝廷闻官拥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和中产阶级的事业的革命，决不能唤起那工艺界发明的精神，并且也不会有人能将这些发明的结果应用来达到经济的目的。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是以从前的发展为基础而产生的，这次革命便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先声。现在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须要一番经济的革命，其历史的价值较之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多了。但是这种新的经济革命是要按照一个单纯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将经济局面的全部加以根本改造的，要想使它实现，也非先经一次政治的革命不可。当初那些行会的特权也是一种小资产的势力，但是现今生产方面的私有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发生的阻碍较之行会的特权还要大得多。中产阶级当然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他们的财产的特权的，所以我们非率性的采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从历史上看来，我们还找不出一一种别的办法。英国当然也不能逃出这个圈套。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5月24日）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48—49页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牠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途径上所遇到的阻碍便愈大。这

话我确实说过，现在我再在这里说一遍。我们从前的统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是很幼稚的。我们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议会或民治的传统。因为这种情形，我们从中产阶级的势力之下解脱民众和推翻中产阶级的统治，便比较的容易。但是正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得势很晚，成功很少，所以我们所承继的也就是一种很落后的局面。我们现在不得不从事筑路、造桥、办学校，教成人读书写字，换言之，就是那些资格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已经办到的经济和文化的事业，大多数都是我们现在所必须作的。我说我们打倒我们的中产阶级更容易，要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便更难，其意义便是如此。但是这个浅显的政治定理也包含着反面的意义：一个国家愈富愈文明，牠的议会民治的传统愈久，共产党要取得政权便愈难；但是取得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进步也就愈迅速愈能得到成功了。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出版 第41—42页

苏联向社会主义的路跑呢还是向资本主义的路跑呢？想把这个问题正确地解答，我们就先要把这个问题正确地弄清楚。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可以分作三部分：（1）在苏联生产力是否发展着？（2）在生产上进展中，一般社会形态究竟是些什么形态？（3）这个发展的速率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月）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2页

如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而又能将国家的一切统治地位巩固的生产力不仅急激地在一种绝对的方法上增长，并且较之在城市和乡村的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增长得更急激；同时这生产力又为最艰难的改革时期中的试验证实了——从原始农村根基所发生之商品资本主义，其趋势若干分之扩张，对于任何经济的危机，对于由分量变为质量的突变，即是返于资本主义的突然转变，我们绝不会蒙这些危险的。

……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的经济进展之速度决定我们抵抗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的压迫力量。这种种的因素，目前是不能不计及的。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月）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4—16页

信用机关同样是集中的国有独占。然这些强有力的独自保留的国家托辣斯，却召二千二百万的农村经济之反抗。于是国家经济和农村经济的联合——就一般而论，生产力也同时增加——就成为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社会问题了。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月）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4页（著者序）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十月革命以前，业已晓得经济之社会主义过程必定从工业

和机械的运输方面开始，以后，渐及于乡村。所以国有化工业活动之研究——以数目字为确证——是苏联经济转变中社会主义进展之根本问题。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月）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25页

在农业方面，事情尤为繁复，由散漫的单纯的农村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土地经营，非在技术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经过多次的阶段就简直没有可能。这一点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咄咄怪事的。然而这个转变的根本条件，在政权能保持于一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利用其已得之权力，导社会臻于社会主义。由于国家工业，由于农业技术提高至最高程度的手段，国家更能影响农民群众，使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因此形成。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月）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1930年版 第三页 （作者序）

我们还争论了工业化的速度，我属于那些指出现在速度不够的人，认为正是由于工业化速度不够才使农村分化的过程特别的重要。不言而喻，富农在抬头，或者贫农在农村中占的比重在减少（这是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过渡时期的重严现象、病态的现象。“害怕”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也认为，在工业落后，即在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现象可能是危险的。……

我们坚持，农村的分化要求对农村各阶层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减轻下中农的税额负担，增加富裕中农的税额，并对富农施加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富农和商业资本结合的方面。我们主张免除40%的贫农的税额。我们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你们认为不对。不过这里会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却是想不到的。（笑声）

我们说过，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增长就造成在政治方面必须有双重的保证，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容忍扩大富农、雇主、剥削者（那怕是一班较小的）的选举权，我们曾就扩大小资产者选举权的指令发出了警告。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6日“真理报”第257号。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中国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96页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他们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各部分无产阶级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在利益上暂时不相一致，——所有这些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党支部，通过国家机构，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局部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嫌隙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局部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意见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为固定的小集团了，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和党的其

他部分对立起来，从而会更多地受到党外的影响。在共产党出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不愿有派别组织，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小集团；如果你不愿有固定的小集团，就要躲开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务必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但另一方面，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全国生活的，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党究竟如何防止意见分歧呢？这就是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处的地位中产生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不是光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办法就能解决的。

托洛茨基：“新方针（二）”（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63—164页

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只有辅助的性质，可是，这个决议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决一切内部困难的锁钥。如果认为，一个空头决议——不向党的发展进程、领导的错误、机构的保守主义、外部的影响，等等——就能使我们防止小集团的产生和派别的震盪，那就是过分肤浅的组织上的偶像崇拜。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严重的官行主义。

.....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每一个比较严重的和长期的党内小集团，尤其是组织上的派别，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的趋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它发展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或半敌对的阶级利益的反映。所有这些都完全属于官行主义，甚至首先是属于官行主义的。必须从这里动手。说官行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预料，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那末，它在发展过程中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它的危险就在这里。但是，那些比别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露骨地主张每一个意见分歧、每一类意见（那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现的同志们，都不愿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行主义，这一点大可注意，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其实，社会的标准在这里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认为官行主义是十分明显的恶行，是有目共睹和绝对有害的一种倾向，它虽已遭到正式谴责但并未根除。而且它怎能一下子根除呢？但是，如果象中央决议中所说的，官行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也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反官行主义的斗争决不能预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等量齐观。相反的，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愿望必然会在党内产生对官行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掩护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回击官行主义的行为纯粹从形式上看成是异己思想侵袭渠道的派别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成了人所共知的官行主义侵袭的“渠道”。

可是，不能把认为党内的意见分歧尤其小集团活动就是各阶级影响的斗争这种看法

理解得太简单、太肤浅了。举例来说，对是否需要在1920年用武力试探波兰的问题，我们是有局部意见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较谨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冒昧地作这种武断。这是在对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价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双方在估计问题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解决。而在那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的问题上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根据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类不同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分歧意见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预防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厅主义自卫武器的老一套。如果我们越是严肃地实行新方针，那末，就能越顺利地检验和区别性质不同的、目前反官厅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并抛弃其中一切敌对的和有害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党的机构在思想情绪上没有重大转变，那末，这项工作也就无法实现。相反的，我们遇到的却是党的机构实行新的进攻，它对形式上已遭到谴责但还没有取消的旧方针的任何批评都一概置之不理，借口说这是派别活动。派别活动既是一种危险——确实如此，那末，对保守官厅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性熟视无睹就是犯罪行为了。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首先正是反对这种危险的。

托洛茨基：“新方针（二）”（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168—170页

在革命暴力问题上的观点

然则在事实上而论，不赞成武力是什么意思呢？简直就是说，被压迫民族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一定不可用武力反抗；工人们不可用武力反抗中产阶级，农人不可用武力反抗地主；印度人不可用武力反抗英国的统治。君主对于人民，中产阶级对于工人，地主对于农人，军官对于士兵，盎格罗、撒克逊的奴主对于殖民地，“基督教徒”对于异教徒，都施以暴力压迫，“国家”便由此而成，这个千百年持暴力以存在的流血的玩意，麦唐诺却奉为神圣不可侵犯。“恐怖”二字只是应用于他对于为解放而用的武力所持的态度罢了。这就是他那“为人民服务的宗教”的真面目。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5月24日）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79页。

所以不信武力真无异不信地心引力。一切人类生活都是建筑在各种武力之上的，都全

仗某种武力与另一种武力相对抗；现在统治世界的便是靠着用武力压迫多数人而存在，所以反对为解放而用武力即无异对于压迫阶级予以拥护了。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06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使武力消灭，起初用较粗的流血的手段，后来用其他的较和平的手段——这是我们并不否认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行为和道德，这不过是与资本主义暴力相斗争的具体方法罢了。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09页

我们这假定的总罢工的目的是要推翻法西斯党的势力。这种目的如要达到，惟有靠武装的队伍制胜敌人的实力。这又可分两步骤：直接与反动的军队作战，以得军事上的胜利，或是设法煽动这些军队归于革命实力以内。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毫无参用牠法的单独实行。革命的行动只要能将反动的军队中最厉害的、最绝对的、最可靠的一部分打败，再煽动其余的武装军队来归，胜利便可得到了。但是要作到这一步，却有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要使政府方面那些动摇的军队深信劳工群众并非只要表示他们的不满意，而是坚决的不顾一切的要推翻政府，拚命到底的战争也不会畏避的。要想将那些犹豫的军队引到民众方面来，惟有使他们明白这种决心。主持总罢工的人所持的政策愈因循，愈犹豫，愈软弱，政府方面的军队便愈不会动摇，他们拥护现存势力的决心便要愈加坚固，他们得到的胜利的机会也就愈多，结果必使劳工阶级的头上大遭流血的报复。换言之，劳工阶级为图解放起见，不得不实行政治大罢工的时候，便须首先完全明了罢工的结果一定要引起局部的和普遍的武装冲突和半武装的冲突；同时还要彻底地明了劳工群众对于罢工破坏队，挑战者和法西斯党人，只要能予以充分的抵抗，罢工便不致马上失败；他们必须首先明了政府的命运既已发生了问题，它迟早当然会要命令它的武装军队调到街上来应战，现存势力的命运便以革命群众和这些武装军队冲突的结果为转移，因此这种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生死关头。工人们必须首先利用各种的方法，用初步的煽动手段将军队弄到民众这一方面来，但是劳工阶级要预先知道政府一定是时常留着充分的可靠的或有几分可靠的军队，它可以叫这些军队出来压制革命行动，所以终究还是要以武力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在革命群众方面当然要先有详审的计划作准备，并且还非以充分革命的决心领导着不可。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13—114页

因此，兰士培里的所谓不信武力简直就是无意识。就事实而论，他实在是天天都在利用武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利用武力的。进一层说，他干脆就在利用过去的若干年中革命行动的成功。他不过不肯拿其中的关系推出合理的结论罢了。他反对以革命的武力取

得政权。换言之，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的行动求彻底的解放；但是应用武力只要不出中产阶级的范围，他都是很赞成的。足见兰士培里先生是片面相信武力，而不是全部的相信。他实在有点象那些不彻底的素食家，吃鸭肉和兔肉都可以的，屠宰牛羊他却反对，因为他是讨厌杀牲的。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17页

要解决革命武力问题，议会民主的原则决不是我们心目中最多的标准。人类并非为民主主义而生，民主主义不过是人类发展的途径上附带的工具之一罢了。只待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成了人类进步的障碍，我们便应该打倒它。从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程序并不是由那立在社会之上的表面的民主主义原则而生，这种变化是由于社会本身发展的物质条件而生，由生产力的增长而生，由资本主义那些不可挽救的国内和国际的冲突而生，由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之增剧而生。我们只要以科学的眼光分析全部历史的经过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验——欧战包括在内——都可以证明我们原有的文明已经到了停滞和破产的地步。唯有无产阶级由那革命的先锋队领导着，后面有本国和各殖民地那些劳动的，被压迫的民众随从着，才能使人类达到社会主义的境界。我们一切活动和一切政治计划的最高目的便是要促成无产阶级为取得政权和改造社会而战的革命。若以民主主义的抽象原则和法律观念的观点来判断无产阶级的运动，我们认为这是反动的迂腐之见。我们认为唯一的正当方法是以无产阶级历史的利害关系来判断民主主义。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表面，而是里面。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26—127页

我们权且认定以后选举的结果可以使劳工党在议会里占到多数，于是议会便依法律的手续规定地主的土地无偿价的移交于农人和那些长期失业的工人，并规定抽很多的资本税，国王和上议院以及其他不适宜的制度都要去消。如果这样办，有产阶级一定不肯甘休，非一战不可，这是无疑的；况且我们都知道警察、法庭、海陆军队，都在他们手中，完全由他们支配，那他们当然非抵抗不可了。我们已经看见英国发生过一次内乱，国王由下议院的少数和上议院的多数拥护着与下议院的多数和上议院的少数相对抗。这是一千六百四十余年间的的事。谁要当真以为有了近三百年来基督教人生观，人道主义的思想，民主主义的精神，以及其他种种冠冕堂皇的东西显然的进步了，便觉得这种的内乱（以新的阶级情形为基础）在20世纪没有重演的可能，那简直是个馐子，简直是个不可药救的馐子。有了乌尔斯特叛乱的前例，便足以使我们知道有产阶级逢着议会——他们自己的议会——被迫而限制他们那特殊地位的时候，即令是最轻微的限制，他们也是不肯随便罢休的。所以打算取得政权的人便非准备着应付一切因有产阶级必然的抵抗而发生的难关不可。我们对于这点，必须彻底明了：若是英国有一个真正的劳工政府得了势，即令是依极端的民主主义手续而产生的，内乱也不免。劳工政府对于特殊阶级的反

抗当然不得不加以取缔。要取缔他们的反抗行动，决不能利用旧有的政府机关，旧有的警察，和旧有的法庭，旧有的民军。由议会手续产生的劳工政府当然不得不从职工联合会和一般的劳工组织里找出实力来，造成自己革新的新工具。这种步骤一定要引起劳工群众的活动和独立行动骤然的增加。各职工联合会因为马上要与剥夺阶级斗争，当然会联合起来活动，这种联合不仅限于它们的上层分子，便是群众也是一样，结果当然非产生地方代表会不可，这种代表会也就是劳工代表的苏维埃。旧的政府机关既然是有产阶级的工具，完全以增进无产阶级利益为责任的真正劳工政府当然就非将这种政府机关毁灭不可，因此也就要靠劳工的苏维埃与它相抗。这就是说，劳工政府依民治主义的程序产生了出来之后——假设竟能有这种事情——结果还是必须以这革命的阶级的实力来抵抗反动的敌人。

托洛茨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22—124页

既说是革命的武力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下才不能用，全部的问题马上就转移到另一方面了。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对武力的民治主义者便比那些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高明些。我们要说明这点是很容易的。

革命武力是否可以用和应该用的问题，可以随那中产阶级统治之下的民主政治程度若何而决定，这话靠得住么？从一切历史的经验里便可以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劳工运动之中，革命的趋向和协妥的，立法的，修正的趋向之争执早已有了，在未有共和国家和采用普遍政策之前，早已有了。“和平”发展的基本武器便是选举权，这种权利从民权运动的时候一直到1868年，英国的工人是绝对没有的。但是民权运动便分为两派：一派是代表民众的，主张用武力，另一派是主张靠道德的力量，这派的分子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的人和劳工贵族。德国荷罕佐拿朝的时候，议会势力很小，社会民主派也有两派相争，一派主张议会改革，一派主张革命的大罢工，还有，在萨皇时代的俄国，门什维克党人，也在1907年6月3日的政策之下放弃革命的方法，打起那“为法律的自由而奋斗”的招牌来。那末，若使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或普选权是修正的和立法的根本方法，那简直是表现理论上的糊涂，表现健忘和十二分的假冒。实在讲起来，主张立法改良的人无非是要使奴隶屈服于奴主的种种制度和法律而已。究竟这些制度里面是否包含普选权，究竟作头领的是一个国王或是一个总统，这个问题，那怕是一个投机家也认为是次要的。投机家时常都跪在中产阶级国家的偶像之前，甘愿只从那中产阶级替他作好了的狗洞里摸出去以达他的理想境界。但是这些狗洞都作得很小，谁也是摸不过去的。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18—119页

我们简直可以说，国际关系中的暴力是可容许的，甚至是不能免的，而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暴力却是该挨骂的。不过既是这么说，为什么偏要说什么渐进的自然律，说这

种法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的发展，即对于社会也是一样呢？为什么不率性的说：一国里面的压迫阶级用武力以求达到它的目的的时候，被压迫阶级便应该尽力赞助它呢？为什么不说不说被压迫阶级要想在这以压迫为根本的社会里取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没有利用武力的权呢？这并不是什么“自然律”啊，这不过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刑事法里面的一条法律罢了。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34页

我们只要认真的研究这些事实与英国内部问题的关系，便可以得出一个当然的结论：英国统治阶级避免他们本国革命的爆发，其所以能得到比较的成功，便是因为他们在这别个国家里面借着战争和各种的扰乱行为增加他们的物质势力，因此他们便可以用卑鄙的吝啬的暂时让步手段，制止民众革命的热潮。但是这种结论固然是无可置驳，它所表现的情形却恰和包尔温君所要证明的状况相反，因为英国历史的全部在事实上只足以证明这种“和平的发展”非有那些战争和压迫殖民地的行为以及种种流血惨剧里不能实现的。这实在是不很象渐进啊。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32—33页

若以我的导师们和我自己而论，对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和它的经济政治或道德方面“渐进”的原则，即在“最近几年”的经验之前，也从来不曾否认过。但是关于这些渐进的变迁的性质，我们愿意稍微弄明白一点。包尔温君是一个主张保护政策的人，我们便拿一件和他关系密切的事情是作例吧，譬如德国在十九世纪后期渐渐的入了世界竞争的场上，我们完全承认它渐渐成了英国最危险的对手。大家都知道，这便是欧战的导火线。包尔温先生是否认为战争是渐进和改良的方法的表现呢？欧战的时候，保守党主张以英国的武力“将德奥人摧灭”，将德皇打倒。据我想来，凡是主张渐进之说的人似乎应该力求感化一般德国人的人，一方面渐渐的改进德国和英国之间相互的关系。但是据我们所能记忆的事实，包尔温君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却绝对的反对应用渐进的方法来改进英德关系，极力借着武力，尽量的靠着爆炸品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为各种的炸药都不能算是保守的改良政策的行动所应该用的工具。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出版 第25—26页

克伦威尔对他所挑选的自由地主和工匠们说的话是很有趣的：“我不愿意欺你们了，我并不想依照训令里的吩咐，使你们自以为是为国王和议会而战。无论我当着什么敌人，无论他是谁，我都要用我的手枪打他，犹之打别的敌人一样，你们如果觉得受良心的责备，不愿这样干，那就请到别处效力去吧。”克伦威尔以这种态度不仅造成了他的军队，而且造成了一个党；他的军队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武装的党，它之得力显然是因为

有了这种特性。到了1644年，克伦威尔的“神圣”骑兵队已经能大胜王党的马队，得到“铁骑兵”的称呼了。凡是革命都是须要“铁骑兵”的。关于这点，英国的劳工可以从克伦威尔得到许多的教训。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 第162—163页

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是愿意劝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议会。不但如此，从前有些英国共产党人表示这种趋向的时候，他们还在国际大会的时候受过我们的反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议会政策根本是否值得运用，而是议会对于社会进化处的是什么地位；各阶级的实力究竟是在议会里面，还是在议会以外，这些实力互相冲突，将取什么方式，将在什么场所，资本主义为保全它的生命和发展而造成的议会，是否可以由无产阶级用来作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 1925年著 上海春潮书局

1929年版 第129页

反对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 可以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說

請問，同志们，是什么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呢？首先当然是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农民战争”（这正是列宁天才地预见到并从理论上规定了），无产阶级在我国掌握政权是不可能的。但难道在其他革命中农民战争使无产阶级执政了吗？至多是使资产阶级执政。为什么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呢？因为它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和整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同走了下坡路，也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链条最弱的一个环节。如果旧俄国是一个孑然独存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帝国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没有财政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统治，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精神统治，它就决不能“自力更生地”如此迅速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以为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就象关电灯一样轻而易举地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

.....

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隐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现有工业这种状况的以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而一切自己制造的话，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非常自然的，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我国装备的空隙，就会使我国的发展慢

得惊人。而发展的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

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或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我们和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及对它的斗争将与时俱增。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地位，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从的体系中。谁如果论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提倡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

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首先要消灭阶级，用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组织代替阶级社会。问题在于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这又要求农业本身的高度工业化。而这一切都要在资本主义依然包围的条件下进行。决不应把这个问题和仅仅对国内资产阶级的胜利等量齐观。

……能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结成一体？上面说过，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入口。机器在世界资产阶级手中，它又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资产阶级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们对它会有有一定的依赖并会向它作斗争。为了除去这种依赖，战胜本国资产阶级是决不够的，因为这里问题不是从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政治上我们早在1917年把它推翻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向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并且暂时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行。所以问题不是民族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作殊死的斗争。问题只应该这样提出。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6，12）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二册 人民大学1958年版 第277—281页

我肯定，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我们所理解的我国革命：第一，财政资本大大丰富了我国经济发展；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丰富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斗争。在1917年以前，革命靠着集合伟大世界力量而准备起来，十月革命就是从这里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现在人们都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态度是形而上学的。决不可能撇开国际环境。

托洛斯基，在联共（布）党第15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主论选集第2册 人大1958年 第219页

请问，大概你们中间谁也不会认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

如果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掌握了政权并组成合作社，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不能。这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别的因素，地理环境、天然财富、技术、文化。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第15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第2册 人大
1958年 第216页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第15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第2册 人大
1958年 第214页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1922年）。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第15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第2册 人大
1958年 第211页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比帝国主义的资格要更老些。此其一，没有疑问，资本主义如今在全世界发展得极不平衡，但在十九世纪这种不平衡要比在二十世纪更加厉害。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举例说，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日本曾是一个闭塞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废除的同时，日本也加进到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来。中国在酣睡，等等。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知道得不比我们差些。正因为财政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正因为如此，所以帝国主义比财政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发展的趋势更趋于“平衡”。现在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这是无容争辩的，但如果说，在过去，在19世纪，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中，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平衡，因而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当帝国主义增加了发展的形态，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正确的了（这说不通），这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现象推翻这种说法，应该寻找别的更严重的论据。

.....

同志们，请问，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事件呢（而且这是主要点，是整个问题的中心）？你们说：不管这时在全世界发生什么事件，我们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时间？伊里奇认为，二十年內我们无论如何建不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三十年內也建不成。姑且假定三十到五十年，作为最低标准。请问，这一时期內欧洲会发生什么事件呢？我既不能预测欧洲

的形，也不能预测我国的情形。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们说，三、五十年内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内取得政权，那末无论在我国或国际范围中社会主义的阵地都是有保证的。但是，显然你们认为，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欧洲无产阶级在近三十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否则你们为什么要你们的预测呢？请问，这一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呢？从纯理论的角度说，这里有三种可能，或者欧洲将和今天一样围绕着战前水平摇摆不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摇摆不定，彼此平衡。但是我们所以称这种“均势”不稳定，因为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延长二十、三十、四十年。这种局面必将从某方面解决。

你们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将找到新的活动均衡，你们是否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将保证自己有一个新的高涨的时代，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而我认为资本主义决没有这样的希望），如果在理论上在一分钟内假定如此，那么这就是说：在欧洲和世界范围上资本主义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是向前发展着经济和文化资本主义，但这就是说，我们跑得太前了。

总之，如果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三、五十年内将走上坡路，那末就应该作出结论，我们将被窒息或击溃，因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还会有相当的军事技术，以及一般相当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大力发展时，它可以通过工人贵族鼓动群众进行战争。在我看来，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个环境，这种阴暗的前景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在这种前景下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

我在今天也认为，只有随着欧洲无产阶级胜利的革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才能得到保证。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精力奋发地向前推进这个建设。和德国工人准备夺取政权一样，我们在准备着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成就便利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如同他们的斗争便利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一样。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前景。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言论选集”第二册 人民
大学 1958年版 第213—222页

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责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规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这是全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大大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这种均衡化决不会是完全的。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化，这就使得稳定

在一定水平上的帝国主义完全成为不可能的事。列宁把不平衡总的归结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问题牵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问题牵涉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速度的悬殊引起一定的均衡化趋势。谁不懂得这点，他就是不懂得全部问题的根本点。……

同志们，世界经济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巩固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抽出来，这样来看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命运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二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275—276页

帝国主义大战是什么？是生产力暴动，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帝国主义大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范围对于生产力已狭小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总是说，资本主义不能掌握它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容纳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范围而成为更发达的经济整体的生产力。退回到孤立的国家去是走不通的。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二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276—277页

大战期内，美国绝大的经济优势渐渐造成了，充分的表现出来。美国从那海外僻地的地位一跃而为经济发达之国，结果便猝然的使英国居于第二位了。

现在美国和英国“合作”的呼声不过是表现英国越来越落后于美国了。

这种“合作”也许要在某个特别的期间被用来抵制某个第三方面；但是无论如何，世界上最主要的竞争终究还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其他的竞争虽则也许在目前更觉剧烈，危机更觉迫切，归根说起来还不过是英美的竞争所引起来的罢了。所以英美“合作”即是未来战斗的先声，犹之改良时期即是革命时期的先声一般。现在英国已经上了“改良”的途径，换言之，即是美国强迫她实行许多让步，这种事实不久便要使目前的局面改变，合作时期不久便要一变而为对敌时期了。

托洛斯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1925年著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1929年出版
第4—5页

对社会革命的态度这个问题下正是机会主义的，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的分水岭。有不少“国际主义者”，他们以战争所引起的一时沉醉于沙文主义的现象来解释国际的危机，或者指望一切迟早都要恢复原来状态，旧的社会党会重新找到现在已经迷失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幼稚可怜的希望！战争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社会暂时失去平衡的外来灾难，而是在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对于民族国家和私人占有形式的局限范围所进行的反抗。向着上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对平衡状态后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或者是用层出不穷的帝国主义新战争继续盲目破坏生产力，或者是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历史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

托洛斯基：国际策略（1917）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
选集，第一册 人大1958年版，第22—23页

我因为说过“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话而受到指责。这是我在1917年8月写的。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这里不说一般“资本主义的欧洲”，而说“保守的欧洲”，是决非偶然的，保守的欧洲保持自己的机器，而主要的是军队。请问：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

……

当我试图向自己和别人提起这点时，只找到大致如下的提法：“我们曾认为，或者国际革命来帮助我们，那时我们的胜利就完全有了保证，或者我们将进行我们微小的革命的工作，同时意识到，一旦失败，我们终究是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的经验有利于别国的革命。我们很清楚，没有全世界国际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早在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后，我们认为，在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现在或者很好就会发生革命，否则，我们就会灭亡。我们就是这样设想革命的命运的。……早在革命前，以及在革命后，我们认为：“在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现在或者很快会发生革命，否则，我们就会灭亡”。

“托洛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6

日“真理报”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
大学1958年版 第207—209页

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在以后数年间会在欧洲有发展起来，那末，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就会达到牠最简单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并非最不足信的。但从社会主义病态的观点看来，这个境况不会给我们以困难的。很明显的苏维埃联邦经济和欧洲苏维埃经济联合会胜利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比较系数的问题，无论美国所给与的抵抗力如何庞大。并且这种抵抗力能够支持得长久与否还是成为可疑而待决的问题。

假如我们暂时设想那包围着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可以久持至数十年之久的，那末，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极繁复了。然而这样的一个预测是全无意义的，除非我们籍其他许多预测，我来使它有更具体的表现，假如采取上面的预测，欧洲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什么，而美国的无产阶级又会成了什么？资本的生产能力又将如何？假如我

们有暂时假设这数十年间是风潮起落不定的时期，是一个残酷的内乱时期，或是经济停滞甚至衰落时期；社会主义诞生前分娩的奋斗时期，单由我们的经济基础之具有无可比喻的浩大的常态，在这过渡期间，苏联经济还可以达到一个优势的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倘若假若在以后数十年的过程中，一个崭新的动的均势占据了世界市场，假如这是类似从一八七一年发展到一九一四年期间扩大生产所显示的，这个问题将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形态。这里所假设的一个“均势”之先决条件与一个新开展的生产能力同其意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妥和平”的关系上，与及社会党和职工同盟在战前期间之机会的适应上，由于工业上之浩大的兴旺，使两者都有可能，假如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其不可信的事实就会成真实了；假如世界资本主义，或者可以更明显的说欧州的资本能够为着它的生产力寻得一个新的有动力的均势，并非为它不稳固政府；假如资本主义在以后数年间或数十年间会经验得着一个新而大的复兴——这些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强迫我们——虽则我们业已从事把缓慢的货车换了更快的客车——要赶快使用头等的特别快车。简言之，这样就表现我们在基本的历史的评判上错误了，即是说，资本主义实在还未尽了它历史“使命”，而那开展在我们当前的帝国主义的形态并没有构成一个资本主义互解的形态，还未到它死力斗争的形态，而只是一个到新开花时期必然的局面。很明显的，在欧州和全世界，新资本主义之再生的境况之下必定能够维持许多年月，这时社会主义之在落后的国家必会觉得自己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此危险的性质又是什么样呢？这或是一坊新战争的危险，这危险因欧州无产阶级受复活的兴旺所陶醉因而不能防止它之再来；同时这战争使我们的敌人会有技术的无限利益驾乎我们，或是资本主义巨量商品的形式，因为这些商品之制成较我们所制的优良而价廉，所以会颠复了我们国外贸易的独占，同时波及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之其他基础。不过使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绝对明瞭；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若果资本主义在许多年中不仅使生产力复活，而且使它有增长的机会，那么，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国家中就会难于施行了。可是对于第二个假设所援引的理由，全然不是严重的，所以，先想象一幅绝对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图形从而又用尽脑力来设法控制这种虚构情境那是一种最愚蠢的了。

目前欧州经济制度与世界经济制度表现着这样矛盾的复杂体，这些矛盾远离有利于演进的过程，并每一步为这过程发掘道路；在以后数年间历史给苏联以充分的机会来加进速度之成功，然这要以利用苏联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之一切富源为条件。这是我所从事之目的，无待多言了。与此相平行，欧州之演进同时将会从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方面把政治势力的系数改变，虽则它是迟缓而有些偏倚。一般地，历史的清算簿会有裨益于我们，这是可以断言的。

托洛斯基：“苏俄之前途（1925年12日）

见：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年版 第110—114页

的确，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间，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现在在全欧还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俄国人却不应害怕这个。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少数会很快变为多数。工人群众所

积累的愤慨一经彻底打破国家纪律，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他们的朋友就会立刻取得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只有举行社会革命的政策才证明组织上的分裂是适当的；但是这个政策也使组织上的分裂成为必要。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的同伙）与我们相反，他们不承认应从社会革命的政策下提出政治任务。他们在自己的政纲中宣称：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所以我们的任务只应限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种议论完全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国际任务。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俄国，那么马尔托夫的议论或许是对的。可是问题却是关于消灭世界大战，关于向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俄国的工人进行介绍，说俄国的命运现在跟欧洲的命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必将保证我们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说，欧洲工人的失败会使我们回到帝国主义独裁和君主制去，最后还要变为英美的殖民地；不是使我们的全部策略服从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目标和总任务，马尔托夫同志反而拿局限于民族的根子来看俄国的革命，并把革命任务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这种提法正在完全面临着曾使第二国际崩溃的该死的民族局限性的危险。

托洛斯基：国际策略（1917）。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论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24—25页

对于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在不便时刻可以随意背叛（象策烈铁里和契尔诺夫一样）的抽象思想，而且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我们不能用那些使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困难的步骤和策略为代价来换取局部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坚决与社会爱国派断绝关系是我们全部政治工作的必要前提。

托洛斯基：国际策略（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论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22页。

以往人类千万年历史、阶级斗争和文化的发展，要求必须在现在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问题的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和出路。俄国革命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这既不是“民族”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谁要把它看成“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谁就是还生活在18和19世纪。可是，我们“时间的祖国”是20世纪。俄国革命在今后的命运，直接取决于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就是说直接取决于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正在使欧洲阶级矛盾的发展带有灾难性。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之流用竞争获胜者的口吻说话未免过早。卡利丁之辈磨牙未免过早。叛徒策烈铁里一伙人高举反革命用轻视态度伸给他们的手也未免过早。革命只不过刚刚说了它的第一句话。它在西欧还有巨大的潜力。反动事业家和小市民糊涂虫的

握手，一定要被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的伟大握手所代替。

托洛斯基，俄国革命的性质（1917年）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21页

康文特恐怖分子和莫斯科会议投降分子之间的差别，跟老虎和大小牛犊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但是这不是基本差别。它还掩盖着民主派本身的决定性差别。雅可宾党人所依靠的是贫穷的和无产的阶级，包括当时还没有形成的无产阶级，在我国，产业工人阶级已从非定型的民主派中分离出来，并成了有头等意义的、独立的历史力量。随着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离出的无产阶级发展了最宝贵的革命品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同样的程度上失去这种品质。这种现象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18世纪末叶的德国的结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决不能用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它的决定因素是无产阶级在生产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已在战时极明显地表现出来。铁路罢工的威胁，使我们现在重新想起了全国都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集中工作。小市民和农民的党，刚一踏上革命的道路就受到双重砲火的袭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阶级的强大集团；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小市民的党为了影响工人，越来越用它的“国家制度”和“爱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党，因而正在陷于屈从反革命资本的集团的地位。同时，小市民的党完全不可能真正消灭一切欺骗人民群众的形式，即使只消灭旧时野蛮的形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影响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由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对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所代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派”，由于“自愿地”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集团，不得不把它的革命使命彻底交给无产阶级的党。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露骨的援引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来解决策略上基本问题的企图，只是为了煽惑落后工人和欺骗农民。

在1848年德国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作了独立活动的英勇尝试。但是，它在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革命理论，也没有有威信的组织。它在生产中的意义大大低于今天俄国无产阶级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后，在1848年的背后已经有了按自己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伟大革命，因而这一点立即就影响到无产阶级，主要地是巴黎的无产阶级跟人民群众断了联系。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土地奴役等级桎梏以后教会的压迫和等级掠夺，是摆在革命面前必须采取坚决无情措施的迫切问题。我们党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断绝关系”，甚至彼此不相往来，最极端的“断绝关系”，也决不等于无产阶级跟城乡受压迫的群众断绝了关系。相反的，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反对现在苏维埃领袖们背信弃义的叛变行为，只会给千百万农民带来有益的政治分化（分裂），从顽固的社会革命党人叛徒的领导下把农村中的贫民争取过来，并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的、“平民的”革命中成为真正的领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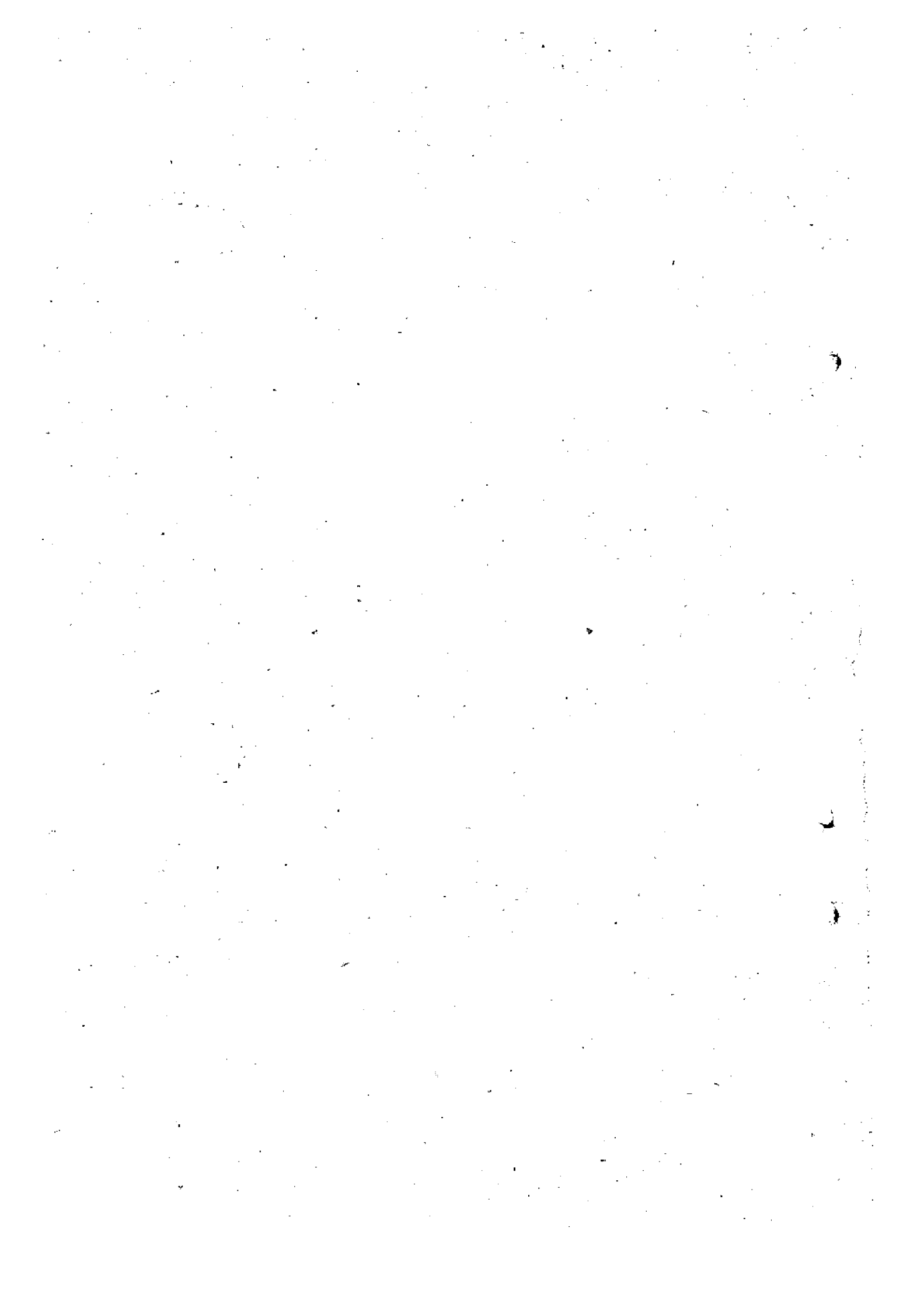
最后，对我国革命“资产阶级”性的空洞引证，也一点没有谈到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而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伟大的雅可宾革命，在它的周围并且和它对立的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君主制的欧洲。雅可宾制度由于不得不在极度紧张的重担下反对中

世纪的联合势力，终于变成了波拿巴制度而宣告垮台。恰恰相反，在俄国革命面前有一个大大超过俄国的已达资本主义发展高峰的欧洲。现在世界上的屠杀现象表明：欧洲已达到了资本主义饱和限度，已不可能在生产资料和有利的条件下继续生存和发展。这种流血和毁灭性的紊乱，是盲目的生产力的粗野暴动，是铁和钢为反对利润的王国、反对雇佣奴役和反对人类关系的卑鄙无能而进行的暴动。被战火所笼罩的资本主义，正在用它的炮向人类宣布：“或者是抑制我，或者是我把你埋葬在我的废墟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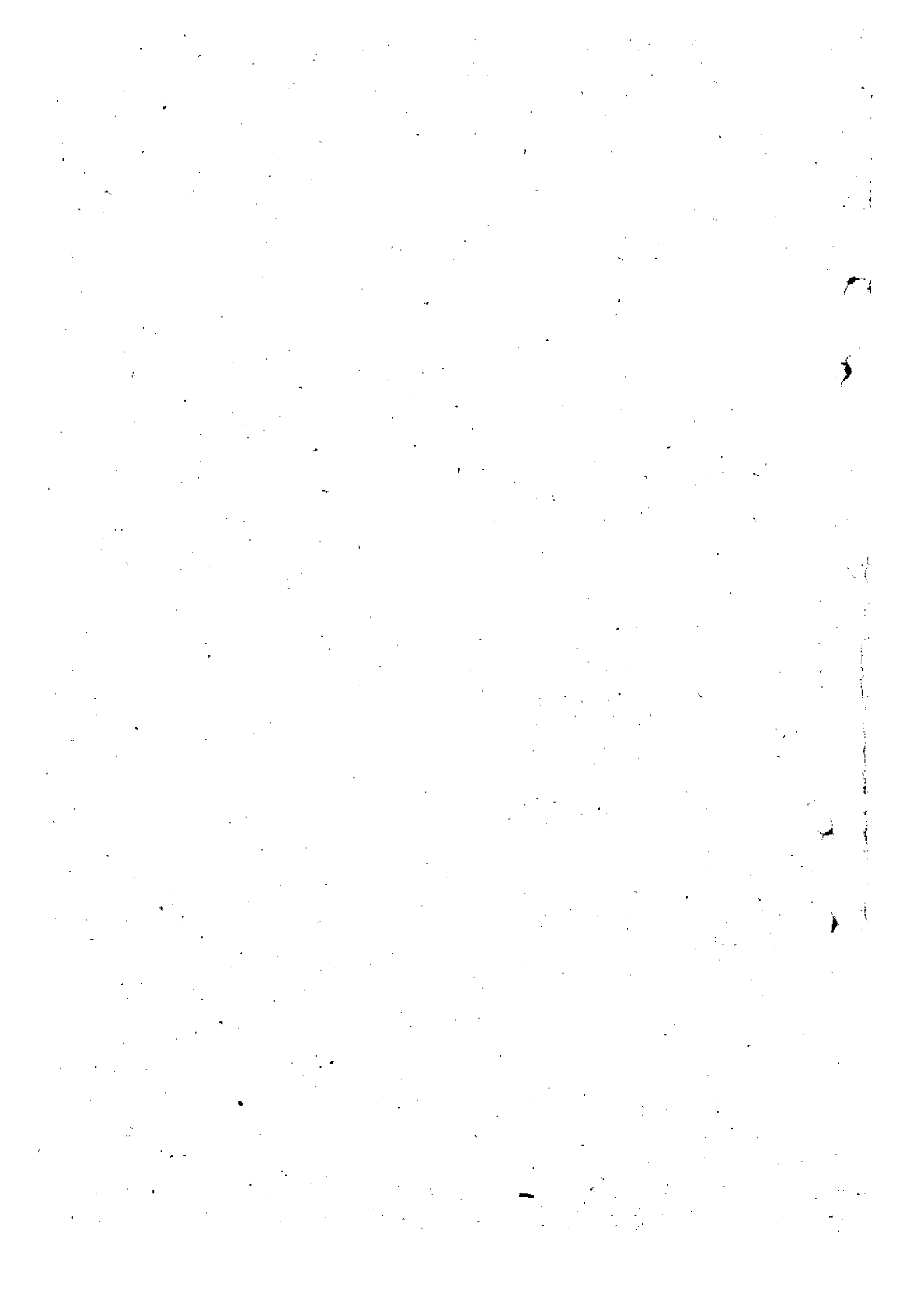
托洛斯基：俄国革命的性质（1917）

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

人大1958年版，第19—21页



布哈林哲学观点摘要



关于唯物論和唯心論問題的言論

但是这里我们却碰到了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扰乱了人类思想的问题，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俗语所常称为“灵魂”与“肉体”的问题。普通我们把现象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广延性的，占着一定的空间位置可以用感官去接触的——可以见，可以闻，可以尝，可以触，等等——这是所谓物质现象。另一种现象，在空间不占位置，我们触不着，亦见不着。譬如人的思想，意志，感觉等。只要每个人省察自己，便知道它们确是存在的。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以为只有这种事实才足以证明人的存在，他说：“我想——即我在”（“Cogito, ergo sum”）。然而同时人的思想不能用手触，也不能用鼻嗅它没有颜色，更不能用尺码或米突去直接测量。这是所谓心理现象普通称之为“精神”现象。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现象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一切事物的根源”是精神，还是物质？什么是本原，什么是基础？物质产生精神，还是精神产生物质呢？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哲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的解答，与社会科学范围内许多问题之解答是相联系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85—86页

现在从各方面尽可能地来考察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注意：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从自然科学知道，人是自然界之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服从一般自然法则的一部分。譬如以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而论，心理现象，即所谓“精神”现象，不过是一切现象中之一小小部分罢了。

第二，我们知道人是从别种动物进化而来的，并且“生物”在地球上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发生的。……。

第三，“精神”的发见，必定在由特定形式所组织的物质发现之后。……。

第四，由上所述，已经很明白，为什么没有精神物质能存在，没有物质精神便不能存在的缘故了。能思想的人还没有出现之前，物质就早已存在，地球的存在，比起在这地球上的任何精神之存在就早得多。换句话说，物质的存在是客观的，与精神无关的，反之，心理现象，所谓“精神”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而独立。没有脑筋，思想不能存在；没有愿望的机体，愿望亦不能存在。“精神”常是紧紧地附着于“物质”（只有在圣经里，精神才独自飘摇于杳冥之中）。换句话说，心理现象即意识现象，不过是依据于特定形式组织起来的物质之一种属性，一种“机能”而已（某个量的机能是依附于前一量而发生之另一量）。譬如人，他是组织得异常之精致的物质。假使把这个组织破坏，体解他，折为各个构成的部分——那时精神便立即消灭。假使人们有一种方法，能够将已经折坏的机体恢复起来，使人体恢复工作；换言之，假使人们有

一种方法，将已经拆开的物质部分重新组织起来，使之恢复原状，彷彿排组一个拆开的钟表一样，那时意识亦一定立即恢复；钟表一经修理——它便重新转动，人体一经恢复——他便开始思想。固然，人们的知识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当我们讨论有定论时，就已经知道，精神状态即意识状态，是依附于人体状态的。譬如人体为酒精所毒，意识立现错乱，“精神”也就表现昏醉。人体一经恢复常态（如以解毒剂将毒消除），精神便立刻复元，照常活动起来了。这些实例已经明白地证明：意识依附于物质，换言之，即“思想依附于实质”。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86—89页

于是，无物质精神不能存在，无精神物质却可以安然存在，精神乃是一种由特殊方法组织起来的物质之一种特殊的性质。

由此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得了解决，随着哲学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间之争论也就得了一个解答。

唯物论认为本源的基础的是物质，唯心论则以为是精神。唯物论者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而唯心论者恰恰相反，认物质为精神之产物。

布哈林：“唯物史观 I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90—91页

不难明白，唯心论（即以一切存在的观念，“精神”，为基础的学说）不过是宗教观念之一种缓和的形式罢了。宗教观念的意思，以为自然界之上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人的意识乃是神秘力量之一种表现，而人自身又为神所选拔出来之一种造物。唯心论的观点。其发展直接走到妄诞无稽的地步，但这种妄诞无稽的学说却往往为统治阶级的哲学家们所拥护。唯心论特别联系于那种否认外界的见解——这见解否认客观的与人的意识无关的事物之存在，并且有时还否认他人的存在。唯心论这种极端彻底的形式，称之为唯我论Solipsiam（按拉丁文Solus一字是“唯一”的意思）唯我主义者的论调是如此我直接所得的是什么呢？我的意识外，别无所有；我所见的房子是我的感觉，与我说话的人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我以外别无他物存在，存在的只有我的“我”，我的意识，我的精神实质；我的外界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东西，——这些一切都是我的精神之产物。因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自己的内在生活，我不能跳出这个内在生活以外。凡是我所见所闻所尝的一切，我所思所念的一切，——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的感觉，我的想象，我的思想罢了。

关于这种狂妄的哲学，叔本华（Schopenhauer）曾说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找得它的忠实信徒出来”（这句话不曾妨碍叔本华认世界为意志为观念，即不妨碍他是一个纯粹的唯心论者）这是可以拿人的实际经验来一步一步地证实的，当人们吃着，参加阶级斗争，穿靴，采花，着书，娶妻或嫁夫的时候，——谁也不去怀疑他们外界的存在，即谁也不去怀疑他们所吃的食物，所着的靴，所娶的妻之存在。然而这种怪诞无稽

的学说实是由唯心论的根本思想上产生出来的。实际上，如果精神是一切的基础，那末，当未曾有人的时候，精神是怎样存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可有两种解答，或是承认超人的神秘的精神之存在，彷彿圣经里所载古代犹太的神话一样；或是说太古时代亦不过是我的想象力之产物。由第一种解答一定引到所谓客观的唯心论。客观的唯心论虽承认“自我的”意识以外还有外部的独立的世界之存在，但这个世界的实质在它看来，还是精神，是上帝或代替上帝的“至高理智”，“世界意志”以及其他类似的玩意儿。第二种解答经过主观的唯心论直接达到唯我主义。唯我主义以为存在的东西仅仅是精神的实质，各个能思想的主观而已。不难明白，唯心论之彻底的形式就是唯我主义。但是实际上，唯心论从何处发生，并依据什么呢？为什么唯心论认为精神是本源的基础的呢？归根落底是因为唯心论认为“我”直接所得的仅仅是自我的感觉。若果真正如此，不仅屋子上砖瓦之存在，一切他人之存在，就连自己父母之存在，都同样在怀疑之列了。如此，唯我论者只好自杀，并且连哲学上之一切唯心论都要杀掉，因为唯我论要彻底追求唯心论的见解，就走到与人们的实际经验步步相反的那种绝对荒唐，绝对虚妄的方向去了。

哈布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91—94页

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的言论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视辩证法如同一种思想的范畴，如同一种现实的物质现象过程中之辩证法的反映，因为“精神”的现象仅仅是以特别的语言转移在人类脑筋中的一种物质现象而已，如此辩证法就从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了。可是现在却还有人企图将思想过程与物质过程隔离起来，而且这种企图日甚一日的发展，企图将辩证法变成一种单纯的思想的构造，变成一种不与任何现实相适应的方法。譬如奥国马克思主义的首领昂特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模型。我们对于此种彰明较著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公开的反唯物论的见解，应该怎样地去对付？异常明显的，我们首先就应该把辩证法之物质的根源掘将出来，即应该在变动的物质形态中去把黑格尔辩证法三题公式“相适应的”东西找寻出来。我们知道，各种力量之不断的冲突，各种系统之发展与破坏，新系统之形成与其本身之变动，换句话说，即平衡之不断的破坏与建立；平衡之破坏，它又在另一部新基础上重建起来，又重复破坏等——这便是与黑格尔三题法的公式在现实生活上相适应着的。但是此种解释究竟给我们以什么“新的”东西呢？实际上一点什么新东西也没有给，与以前还是一样，不过此地所指示的是物质过程和物质形态的变动而已。换句话说，这是物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思想上是由黑格尔的三题法的公式表现出来的。

有人非难此种公式为机械的公式，那完全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不能将现代的机械学去与辩证法相对立。假如说机械学不是辩证法的，即一切变动都非辩证法的，那末，所

谓辩证法所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反之，辩证法之物质的核心和它的客观的基础，却是为变动所形成的——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剥去了辩证法之神秘的外衣，而把它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上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以唯物的方法运用辩证法与自然界与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之中。现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是辩证法这个方法之理论的和有系统的解释及其理论上之系统的根据。这就是平衡论的理论所以必要和必须阐明的理由。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第5—7页。

矛盾的不断发生和克服是社会发展和衰亡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所谓平衡是在不断地破坏和不断地恢复着的。在这里表现出来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也是不断地被克服，又重新发生，又重新被克服着的，——这里面便横亘着社会发展或社会衰落之根本原因。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65页

历史的进化，是由矛盾造成的。社会的经济构造，是要循着矛盾的轨道而发展的。各种形态的暂时的存在及永久的更新，继续不断推陈出新的生活着的动力学，就是真实的内在的法则。经卡尔·马克思颠倒运用过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很卓越的。因为它把握着生活的辩证法规律，根据事物现象之全部其自身即含有死亡之萌芽的事实，毫不动摇，大胆的分析现在。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年）

辛垦书店，1930年版，第299页。

事实上，充满着社会的矛盾的整个体制，所以比较能够存在的理由，理论上说来，有次选的两个方法。即是，有“第三者之力”的存在，来调和诸阶级，使矛盾圆滑起来，而促成社会的持久的协调之成立。或是，有一方面的营垒的组织之存在，利用一切手段（从直接的权力的行使，以至于极复杂的文化的思想的绸膜的配布等），来压倒敌对阶级的阵营。二者之中，必择其一。但是在事实上，只有第二方面的解决方法，换言之，只有建主支配阶级的组织。然而大多数的思想家，甚至于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思想家，还在高唱第一方面，还在高唱国家权力“调和”的理论。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

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版，第23—24页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别的的方面。直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只是环境和个体之间的矛盾，外部的矛盾。然而在个体之内还有内部的矛盾。每一个体都是由某种方法而结合的成分（Elements）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成立于人，树林成于树木和灌木等，石堆成于石

头，兽群则成于许多单个的动物，等等。而它们之间自有许多矛盾，衝突，对抗。严格一点说，假使环境与个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平衡，那末，在个体内各种成分之间亦自不会有这种平衡了。

譬如人类社会这个最复杂的个体，就是一个顶好的例证。难道在这里我们不是碰着无数的矛盾吗？阶级斗争便是“社会矛盾”之最显著的表现，但我们知道，“阶级斗争乃是推动历史的原动力”。阶级的矛盾，集团间的矛盾，思想间的矛盾，人们怎样劳动及其怎样分配劳动生产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不调（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状态”）——这些便是形成矛盾之无限的链环。所有这些都是从矛盾的构造产生出来的个体内部之矛盾（“构造上的矛盾”）。虽然如此，但这些矛盾自身还没有毁灭社会。它们也许毁灭社会（譬如当国内战争时，战斗阶级之两败俱伤），但迄今以前还没有毁灭社会。

往后应该说社会各个成分间之动的平衡。至于这种平衡之如何形成，则是以后应当讨论的问题。现在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应当明白这一道理：不要象许多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观察社会而不去注意社会内部的矛盾。反之，对于社会之科学的研究，我们须以“存在于社会内的矛盾”的观点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矛盾的发展。

这里我们又应该注意以下的事实，这是我们在本书里所要再三讨论的。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矛盾有两种：环境与个体间的矛盾和个体内各成分间之矛盾。那末，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是不是有何种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思索一下，便可以坚决的答复：有的，有这样的联系存在着。

因为十分明显，每一个体的内部构造（内部平衡）之变化必须依据个体对于环境之关系而定。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决定的因素。因为个体之一切情状，即其变动之根本形式（崩坏，发展，停滞），是为这种关系所规定的。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社会与自然间的平衡之性质足以规定社会演化的根本倾向。在这种情形之下，内部的构造能否在相反的方向长期发展呢？自然不能。假定有发展的社会，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的内部构造是否永久恶化呢？自然也不是的。假使社会的构造在发展之下日益恶化，就是它的内部冲突日益增长，这就是表明，已经发生了新的矛盾：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那时将怎样呢？那时如果社会要往前发展，它就应当改造；使他的内部构造适应于外部平衡的性质。所以，内部的（构造的）平衡乃是依附于外部平衡之一种因素（即外部平衡之一种“机体”）。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29—144页

第一是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进化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般说来，“进化到社会主义”这一句话是被我们十分仇视的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是出于修正派，冒牌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叛徒的学说。他们创立了整个的理论，以为革命是无必要的，革命并非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发生出来的，以为工人可以用不着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条

件，遵循有机道路，不经过突变，祇靠其内心的发展，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以为无产阶级，从各种方向，在经济生活方面和国家行政方面，逐渐伸张其“根系”，这样，到最后，不用革命，不用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在国家机关中和经济机关中，占据优越的形势。

这一种理论，我们大家都明显知道，它的名称就叫作“进化到社会主义”。但是，同心们，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开始有机发展的时期了。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十分明显看出这一问题的设向就改变了，就根本改变了，亦如其他许多问题的设向一样。所以当我们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究将怎样（我们自然拿单独一个国家来说）这一问题之时，其答案就是，这一国家内部发展到社会主义，是经过进化道路而不能走其他道路的。换一句话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开始真正的“进化到社会主义了”。列宁未曾恰切创成这一理论。但我们能够从列宁著作中引证无数段落来影证这种思想。尤其在他最后所著的论文中，譬如在论合作社一篇论文中，他直接说：如果在前一个历史发展的时期，我们主要的倾向是革命的政策，是突变的政策，那么，现在，在我们目前建设的时期，我们主要的政策就是和平的组织的工作。他在这一段中所说的，也就与我刚才所说的一样，然而大家知道，这一思想需要从各方面详细来研究，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譬如经济形式之进化的斗争问题，国家的发展（起初是向上的，以后是向下的）问题，——这也是按照进化的道路。起初我们应该巩固并增强无产阶级国家组织，应该团结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后这个国家组织又按照进化道路开始消灭。第三次的革命，这里是无需要的。反过来说，——一切以突变的形式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种制度，客观上不是别的，只是反革命。这正因为工人国家乃是一种完全特别的国家，亦如我们的军队一样，其本身就孕育着由进化道路而自己消灭的萌芽的——所以一切发展都带进化的性质。事实上，夺取政权时期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以后，这一“进化到社会主义”也才开始。这里自然需要有特殊的法则，这一时期矛盾性之消灭，是应该与资本主义时期矛盾性之消灭，根本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很简单的原由。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别的，祇是资本主义矛盾性之扩大的复生产，即这一时期矛盾性消灭了，到别一时期又再发现出来，而发展中的每一阶段，其一切矛盾性都比前一阶段更加厉害，以至于结果整个制度都陷于破产，——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以后的新的发展时期（我并不是说能够从外面消灭无产阶级专政，譬如在芬兰），则矛盾性之发展，经过相当时间后，就开始消灭，这就是说，那时我们的制度之矛盾性不是扩大的复生产，而是缩小的复生产，我们的制度的这种复生产并且由进化的道路转变至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整个的发展性质，是与资本主义底下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列宁著作中找得几段出来证实这个思想。这是理论上一种新的形态，带着新的法则，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法则完全不同。由这一新的理论中，也就有了新的实际政治结论出来。

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1924年）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48—51页

……在自然界在社会里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有一定的法则。发见这种规律性，便是科学之第一天职。

这种规律性在自然界和社会之中，无论人们认识与否，它是完全独立地存在的。换句话说，这是客观的（与人们的意识无关的）规律性。科学的第一步就在从现象的混沌中去发现这种规律性。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6页

我们对于这种不知道的原因便称之为偶然性。

.....

假使相交的两排原因，或几排原因之中，我们只知道一排，那时由相交而得的现象对于我们便是偶然的，其实这种现象本来是极有规律性的。我只知我出门往街上走这一方面的原因，而不知道我的朋友亦同时出门往街上走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不能预先知道这两方面的原因之相交。所以这种相交（相碰）在我看来便是“偶然”的现象了。其实严格说起来，并无所谓偶然，就是天下没有无原因的现象。但因为我们对于现象没有完全知道它的原因，便以为这现象是偶然的罢了。

关于偶然性的问题，斯宾诺莎就早已知道了，他说：“所谓现象的偶然，完全是出于我们知识之缺乏”，“只因为我们对于那些还没有知道”（见基尔赫马（Kirchman）出版之伦理三八页）。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65—66页

承认一切偶然性存在的偶然论，便直接走到信仰超自然论，信仰上帝。所谓上帝的存在之“宇宙论的证明”便建立在这种偶然论的基础上。偶然论主张：如果世界不受规律性的限制，那末，很明显地这一世界的存在及其发展应该有其特殊的原因。此种论证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西谢龙（Cicero）莱布尼兹沃鲁富（Wolff）的学说里找得出来。到现在资产阶级衰落和解体的时期，偶然论的学说又开始愈加扩张起来譬如布都鲁（Boutroux）和伯格森（Bergson）。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1—72页

与偶然性的概念相反的便是必然性（原因的必然性）的概念。

“从一定的原因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现象便是必然的现象”。当人们说到某现象是历史的必然时，这就等于说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无论好与坏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一说到原因的必然性时，对于事实的价值及人们对之愿不愿意都没有丝毫的暗示，只是说明这种事实的不可避免性罢了。但决不可以把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相混合：愿望的必要和原因的必然——这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譬如说历史的必要，这个

意思并非站在希望社会进步的观点上，而是说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某种现象。十九世纪生产力发展之迅速与罗马帝国之崩坏或所谓希腊文明之灭亡，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必然。必然的现象是为一定的原因所限制的，不能多也不能少。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2页

依据已有事实去探索必要的条件（或必然的条件）的方法，虽然是直到现在还很少人留意，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常常运用的一种方法。全部资本论的构成就建立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5页

对于自然界及社会之一切事物都可以有两种观察的方法。一种以为一切事物都是静止的，不变的“过去是如此，将来亦是如此”。宇宙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另一种则刚刚相反，以为无论在自然界在社会里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过去的便过去了”，“已过去的是不会回转的”。第二种观点，第二种观察法称之为动的观点 Dynamic point of view（希腊文 Dynamic 就是“力”和“动”的意思），第一种则称之为静的观点（Static point of view）。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观察宇宙呢？究竟宇宙是完全静止的不动的呢？抑或绝对相反，而是变迁的，运动的，今天已与昨天不同呢？以动的见解来考察自然界，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在自然界里没有不动的东西。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08—109页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很显然的是：宇宙间没有不变的静止的东西。一切都在运动，都在变迁。或者换一句话说：实际上没有静止的事物，对象，只有过程。譬如我现在写字的这张桌子，就完全不是一个不动的东西，它每一秒钟都在变化，固然，这桌子的变化不是人们的耳目所能感觉的，但是让牠摆着经过许多年，它就必将腐朽而变为尘埃了。这种变化是突然的么？自然不是的。可是这种腐朽的结果是早就已经逐渐发生了的。桌子的那些构成部分是不是消灭了呢？不是的，不过变换一种形式罢了；随风吹，变成地土的成分，滋养植物，而成为植物的纤维等等，——永久的变化，永久的运行，一切都是新的样式，新的形态。“动的物质”就是宇宙。因此，要想了解某种现象就必须研究这种现象的发生（如何，从何处及为什么而发生的），发展及其消灭，——总而言之，必须观察其运动，而不在于静止的想象。这种动的观点也就称之为辩证法的观点（辩证法还有其他的特征，以下当详论）。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11页

因为宇宙既在经常不变之中，所以研究宇宙现象就必须看牠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得视为绝对分立（孤立）。实际上，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一地方的小小移动，小小变化，都可以影响一切。至于影响到什么程度呢——那是另一个问题，总之有影响就是了。譬如，人们砍伐瓦尔加（Volga）的森林，其结果，水分必见减少，气候必起相当的变化，瓦尔加河将要“干枯”，瓦尔加河的航行将因之感受困难，因此就需要溶河的机器，制造这些机器，又需要大批的制造工人，等等；从另一方面，向来棲息在这森林里的动物必见消灭，新的动物又必因之而发现，旧的不是消灭，就是逃往别的森林地带去了；但是我们由此还可以引出别的问题：如果气候一有变化，那末，整个的地球都要受其影响，所以瓦尔加气候的变化不论多少总要影响到各方面。在实际上，假使地面上只要一有变动，——虽然异常之小——那就地球对于月球或太阳的关系都要发生变化。譬如现在我用笔在纸上写着，这必定加桌子以压力，而桌子又压在地上，随着便要引起无穷的变化。我动一动笔管，震盪空气，而这些震动之极微末的影响简直是无穷无尽。不管变化怎样的微末，但决不是等于无，始终是存在着的。宇宙万象都被连结于不断的联系之中，决没有独自孤立的，与世无关的东西。换句话说，宇宙间没有绝对的孤立物。固然，我们不能处处都注意到现象之一般的联系：譬如我们谈论到养鸡时，便不必常把议论引证到一切事物上去，引证到太阳和月球上去；要这样引证是很笨的，因为在这里现象之一般的联系对于我们是一无益处的。不过讨论到理论的问题上，那我们就不得不注意这种联系了。就是实际上也得常常注意这些联系。当人们说这个或那个人的眼观“不能超过鼻子以外”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把“他的环境”视为孤立的，忽略了横在这环境以外的一切关系。农夫把产品运到市场上，他以为可以得到高值，但是结果价钱却很贱，几乎要大大亏其本。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农夫与别的生产者的关系已经过一道市场，在市场上面包的价格受了各方面的影响和竞争的关系，所以就如此低贱了。为什么我们的农夫想错了呢？因为他看不到世界市场的关系（从他的偏僻之处也不能看到）。资产阶级在欧战后不惟没有得到利益反而遭受工人的革命。为什么？因为与战争相联系的其他许多事物，资产阶级没有看到。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各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都认为俄国布尔塞维克的政权不能维持长久的。但是他们的根本错误在那里呢？在于他们把俄国看作孤立的，忽略了俄国与西欧的联系，忽略了那些帮助布尔塞维克之世界革命高潮的关系。俗语倒说得很对：“必须斟酌一切情形”，这就是说，研究某种现象或某种问题，必须从牠与别种现象的联系上去考察，从它与“一切情形”的关系上去考察。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13—116页

于是异证法对于一切现象的考察方法是：第一，要看现象之间的不断的联系；第二，要看现象之变动。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16页

在讨论现时的一切迫切任务时，这两个特点都必须注意。然而在党内的争论中，在许多问题上明显地出现两种基本思潮：一种是对时局的估价只从政治角度着眼，另一种，认为最重要的只是经济观点。其实，若无经济的高涨就不能彻底消除群众心理上的不良现象，这是很明显的。同样的，如不把无产阶级内部的任何摩擦尽可能缩减到最低限度，那么经济高涨也是不能实现的。……

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但还未充分地吸引群众参加管理经济的时期，职工会不可避免的要实现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共产主义学校”，是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的中介人，是使广大无产阶级基层群众卷入积极活动的机关；另一方面，它是——而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般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职工会运动的组织问题和职工会的工作方法等困难，正是由于职工会的任务必不可免地具有双重性，而职工会又要在实践中克服过渡时期的客观矛盾而产生的。……

如果说总的进步发展路线是职工会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融合即职工会“国家化”，那末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是国家“职工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逻辑上历史上的权限，将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吞并职工会，而是国家和职工会这两个范畴的发生，以及第三者即共产主义的创立。

布哈林等：论职工会的任务与结构（1921年）

苏联托洛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1册·人大1958年版 第
44—46页

事实上，社会的生活过程是一个统一的川流，现实地只有一个历史，没有如许的历史——法制史，经济史，风俗史等。惟有仗着科学的抽象的帮助，我们才能分这个统一的生活为数部分，故意着重现象的某系列并依一定的特征而组合他们。所以反对普遍抽象的人，论理地也必反对经济学由法律与道德分开。然这种立场当然不能维护住。无疑地社会生活是个统一态；可是，必不可忘却，没有抽象，任何认识皆完全不可能；甚至概念就是由“具体”而来的抽象；同样，一切叙述的前提，是接着或一理由上看取的特征，而给现象下一定的选择，所以抽象不外是认识行为的一个必要的属性；它只当从具体的特征普遍化的过程结局成为绝对空幻的抽象时，对于认识无所裨益，然后可被接弃。

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4年）

水沫书店 1930年版 第12页

关于平衡論的理論

万有的基础就是变迁的法则，不断的运动律。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有两个哲学家——古代的赫拉克里特及近代的黑格尔——特别主张这种变的，一切皆动的见解。然而他们还不止此。他们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来：究竟动的历程是怎样的呢？于是他们便发现这样的原则：一切变化都是由于不断的内部矛盾，内部斗争所惹出来的。赫拉克里特说：“斗争是一切发生之母”。黑格尔说：“矛盾——就是动的前进”。

这种见解无疑地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如果假定宇宙间没有任何势力的冲突，没有什么斗争，没有各种势力的相互对立。这成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全宇宙都在不动的平衡的状态之中，即在一个完全而绝对的稳定状态之中，在完全的没有任何变动的静止状态之中。静止究在何处呢？静止就在那里——一切构成分子，一切势力，都站在绝无矛盾的相互关系上，那里绝无相互作用，绝无“牵制”，总而言之，绝无矛盾，绝无斗争的矛盾势力之对立，不论何时绝无平衡之破坏；恰恰相反，在那里支配着的而是绝对的稳定。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一切皆动，一切皆流”。绝对的静在实际上是沒有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

比方有机体科学，即生物学（Biology）上所说的适应，这是大家知道的。所谓适应的意思就是说，一种物体适应于别种物体，能与之长时并存。譬如说某种动物适应环境，这就是说它能在这环境里生存，它的本质适合于环境，恰能得环境的帮助而维持其生命之存在。鼯鼠“适应”于地下的环境，鱼“适应”于水里的环境；但如果将鼯鼠放在水里或将鱼埋在土内——那它们立刻就要呜呼哀哉了。

然而这种同样的现象，我们在所谓死的自然界里也看得见，譬如地球不落到太阳上去，而能所谓“不相抵触”地围绕着太阳运转。一切行星系对于环绕它的宇宙都站在这样的关系上，而能长期存在。但这里普通不说适应，而称之为物体间之平衡，即这些物体的组织系统之间的平衡。

再则，在社会里更是这种同样的现象。社会，无论好与坏，总之生存于自然界里，它多少总须“适应”于自然，不管这样那样，总得与自然界保持平衡。社会的各部分亦是如此，只要社会存在，它们相互之间必须保持能同时存在之平衡；含着资本家和工人的资本主义已经存在有好些年月了！

从以上这些例子里看来，我们所说的不管这个那个，实质上就是所谓平衡。但假定如此，那末，所谓矛盾与斗争究竟何在呢？恰好反过来说：斗争即平衡之破坏；那末究竟其总意如何呢？总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及社会里所考察出来的平衡，并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平衡，而是变动的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平衡一经破坏，便立刻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起来，随后又破坏，又恢复，如此辗转不已。

对于平衡之更确切一点的意义是如此：“人们说到某种组织是在平衡状态时，就是

说这组织不能自发地，即不加以外来的力量，便不能改变其状态”。譬如说某物体，其中各种力量相互均等，这物体就是在平衡状态中，如果各种力量中有一种或增或减，那时平衡就破坏了。

假使平衡的破坏急速终止，物体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时平衡方谓之稳定，不然，就谓之不稳定。在自然科学里人们常区分之为机械的平衡，化学的平衡，生物学的平衡等（参看哈勒伯Halben著的化学的平衡（Chemisches Gleichgewicht），载于自然科学辞典第二卷470—519页。以上的文句就从那里引来的。

也可以这样说：宇宙间有种种互相影响，互相反对的势力。这些势力只有在特殊的状态之下才能得到煞时间之相互对峙。我们所谓静止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些势力的实际“冲突”之一时的潜伏状态。但是只要这些势力中有一种有变化，“内部的矛盾”便立刻显露出来，发生平衡的破坏；又如果有一瞬间新的平衡成立，这新的平衡必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建立在其他势力的结合之上。由此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所得结论是：“斗争”，“矛盾”即各种势力之相异倾向的对抗性，规定了变动的过程。

自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历程的形式是：第一，平衡之状态；第二，这一平衡之破坏；第三，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平衡之恢复。于是历史便开始重复演进：新平衡成为新破坏之出发点，接着又是新的平衡，等等，如此反复无端。自全体看来，所谓变动的过程，而其根本就是内部矛盾的发展。

黑格尔指出这种变动的性质，并且以底下的形式表示出来：平衡的原始状态，他称之为正题（thesis），平衡之破坏，称之为反题（antithesis），即对立，建立在新基础上之平衡的恢复，称之为综合（Synthesis——调和一切矛盾之综合的形态）。一切事物变动的性质都包含着这三种题式（tripartite formula），黑格尔则称之为辩证法（dialectic）。

“辩证法”一字是古代希腊用以称谓辩论术或演说术的。当人们意见互相冲突的时候，怎样进行讨论呢？第一人说甲，第二人说乙以反驳之（否定第一人所说的），末了，“从争辩中产生出真理”，这真理包含着甲与乙之各一部的真理而成综合（Cynthesis）思想过程的进行也是如此。所以唯心论者黑格尔便以为一切都是精神的自动发展，那就很明显，他不会想到平衡的破坏。所以，思想的本质，即精神的原始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就是现实的本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道：“我的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简直是相反，在黑格尔，他把思想的过程在观念的名义之下变成为独立的主体，实际的创造主，而现实却仅是外部表现出来的想象。至于我呢，恰恰相反，所谓观念不过是人类脑经中之物质的反映而已。在黑格尔，他是把辩证法放在头上，但我们为要在神秘的外壳内发现合理的种子出来，便不得不把牠翻过来放到脚上”（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在马克思：辩证法，即矛盾的发展，首先就是“一切现实”的法则，物质运动的法则，自然及社会中一切运动之法则。这种法则的表现就是思想的过程。辩证法，思想的辩证方法之所以必要，因为它能够运用自然界的辩证法。

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如马克思所说的）用语转译成为机械的用语，我们以为是很可能的。在不久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差不多都反对过机械学的用语；

这是因为旧观念常把原子看作分离的与别的东西不相联系的孤立的成分的原故。现在有电子说，原子是一整个儿的组织体——系统，彷彿太阳系一样，因此我们再没有理由去避免机械学的用语了。科学思想上比较进步的倾向都承认这种见解。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给了明确的暗示（各生产部门间之平衡说，即建立在这学说的劳动价值论上）。

凡是物体——不论石头，生物，人类社会，或是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视为由各部分相互联系而成的整体；换句话说，这个整体我们可以视为个体（System）直译为系统或组织体。但此处译为“个体”以与环境 environment 相对立在中文中似容易了解——译者注）。每个这样的物体（个体system）不能存在于空虚之域，必为自然界其他的成分（elements）所围绕与它发生一定的关系，这个我们称之为环境（Environment）。树林中树木的环境就是：一切别的树木，溪流，土壤，羊齿，草头，薪柴，以及一切含有其他物质的东西。至于人类的环境首先就是它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社会（从此才发生“环境”一名字），而人类社会的环境则为外部的自然界。环境与个体之间有经常的联系；“环境”影响“个体”亦复影响“环境”。我所首先应该提出一个根本问题：环境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其界说如何；其形式如何；其意义对于这个个体是怎样：

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些关系区分为以下三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稳定的平衡。环境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变更现状，或是旧的状态虽然破坏。而又重新恢复到以前的形式——那时便是稳定的平衡。譬如，有一种生物生存在沙漠之中。如果环境不起变化，即供给这种生物的食料分不增多，亦不减少；捕食它的猛兽之数量亦无增减；一切病患，一切霉菌（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于环境之内），亦停滞于原来状态。那时将得出什么结果呢？在大体上我们这些生物的数量必定停滞于原来的状态；它们之中有一些死亡或因猛兽之侵害而消灭，别一些却又生长出来，在这种环境的条件之下这生物仍旧与以前一样。这就是停滞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个体（即该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曾变更。这就是稳定的平衡。稳定的平衡也不是常常绝无变动的。变动许是有的，不过这里平衡一经破坏，随即恢复原来的基础。在这种场合里，环境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在同一分量的关系上继续地往反恢复。

这种同样的情形，我们在停滞的社会里亦看得见（关于这点以下还有详细的解说）如果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变更，即社会以生产手段从自然界所吸取的能量与其消耗的能量相等，那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亦得往反恢复原状。这里社会是停滞不进的，这亦是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第二，积极的变动的平衡（个体之发展）。但是实际上稳定的平衡是没有的。这只是一设想，思想上的，或如我们所说之“观念上”的场合而已。其实，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无论何时不能在同一的关系上往反恢复的。换句话说，实际上平衡的破坏不能恰恰在这一基础上恢复平衡，如以前一样，而新的平衡必须成立于新的基础上。譬如（我们仍旧拿上面所说过的生物作例），假使那种侵害它们的猛兽的数量减小，而食物却增加，那时无疑的，这种动物的数量亦必见增加；我们的个体必将发达，就是新的平衡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上。这里就是发展的表现。换言之，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在

质量上已变成别一种的矛盾。

如果我们将动物代以人类社会，又假定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起了如次的变化：社会以生产的手段从自然界所吸取的能量多于所消耗的能量（如土壤变成肥沃，或发现新器具等），——那时这个社会必将发展，而不是在停滞不进的状态之中。新的平衡每一次在实际上都是新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每一次的复生都是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如此，那时个体必见增大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含有积极征兆的动的平衡。

第三，消极的动的平衡（个体之崩坏）。然而亦可有完全相反的场合，就是：新的平衡建立于“更低”的基础上。譬如，假使动物的食物数量减少，或因为某种原因猛兽的数量却增加。那时，这种动物则将见“死灭”。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平衡每一次的成立必将牺牲个体之一部分。矛盾将带着消极的征兆在另一种基础上复生出来。社会亦是如此。假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向这样的方面变化，即社会的消耗增多，生产减少（如土地荒芜，技术退化等）。那时，新的平衡每次将使社会之一部分消灭，而成立于更低下的基础上。这种状态是一种带有消极征兆的变动，社会也就将成为一衰落崩坏的社会了。

一切所能想到的情势都可以归纳于此三种形式之中。至于变动的根本（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其实就横亘于环境与个体间的矛盾之上。而这矛盾又是在经常地辗转和恢复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考察过社会平衡之诸种现象。可是在这里我们不应一刻忘记我们所曾叙述过之平衡乃是变动的平衡，不要忘记平衡之不断的破坏，在另一基础上重新恢复，又重新破坏等。换句话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矛盾的过程，即不是静止的状态和绝对顺应性的状态，而是对抗的争斗，辩证法的运动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考察社会的建筑物，即社会各部分中间的相互关系时，决不要想象那些部分之间有什么完全的调和。因为一切构造的自身都含着矛盾，在凡是阶级的社会里这些矛盾特别厉害。有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曾认识各种社会现象之相互间的矛盾，即完全不明白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矛盾性。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孔德（Auguste Comte）所创立的全学派，对于这一点还很注意。孔德承认一切社会现象间之联系（所谓“交感”）“秩序”即其中之表现。可是对于这种“秩序”的矛盾，而特别是引导这种秩序趋向于不可避免的崩坏之那些矛盾，他却不认为是分析的对象。反之，在辩证法的唯物论者看来，问题的这一方面即令不是极本质的，也是本质的方面之一。何以故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某一制度的矛盾就是引导形态走向变化之“动力”，即在社会发展或社会崩坏的过程中引导趋向本质的变化即种的变形之动力。

当考察社会的结构之际我们便已经知道，社会结构的变迁乃是与存在于社会和自然中间之关系的变迁相联系的，我们称此种联系为外部的平衡，同时称存在于各列社会现象之间的平衡为社会的内部平衡。如果现在从矛盾的发展这一观点上来观察整个社会，

立刻便有许多问题呈现于我们之前：首先我们看见，每一列社会现象的内部都有自己矛盾（例如在经济上之各种劳动机动间的矛盾，社会政治结构上之各种阶级中间的矛盾，意识形态上之各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体系中间之矛盾，等等。至关于别方面的许多矛盾且不提了：）其次，经济与政治之矛盾（例如，当法律规范“赶不上”经济的发展时，便发生所谓某种的“改良”，经济与意识形态间之矛盾，心理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例如，当人们已经感觉到需要某种新的东西，而在意识形态的形态上这新的东西却还没有出现），以及科学与哲学中间的矛盾，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不费一点力把它们认识出来。这就是各列的社会现象中间之矛盾。这些都属于内部的平衡。但是此外还有社会与自然界间之矛盾，即由生产力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存在于社会与环境间之平衡的破坏。这是属于外部平衡的范围。我们已经知道，还有一种异常重要的矛盾场合。这就是生产力的运动与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与其他之一切社会结构）中间之矛盾。在这场合里，存在于社会与自然中间的关系同藏在于社会内部的关系之间便发生了冲突。此种冲突，此种矛盾，在社会生活上不可避免地要演着极重要作用，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它们是与“现存制度的基础”，即与现时“秩序”所依据的“柱石”相抵触的。

在这里我们仅仅指示出与社会矛盾相关联之主要的问题。详细地分析这些问题，那是下一章的任务，在那里我们将要从社会的运动中去考察社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所观察过的问题只是社会的结构，即该社会形态之结构。往后我们首先就要进而讨论关于由一“结构”过渡到另一结构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得重复说一次，社会平衡的法则就是变动的平衡的法则，它包含着敌对矛盾，不顺应冲突，斗争，并且（这是特别重要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大破裂与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革命的理论。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53—557页

所谓从平衡的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体制，来观察不合理的盲目的体制，当然同所谓预定调和学说，全然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观察，是以这一体制的存在的事实及这一体制的发展事实为出发点之故。而且后者的前提条件——平衡，并不是静止的平衡，而是可动的平衡。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222页

马克思时常这样的设定问题：平衡是在成立着——但怎样的能够这样呢？平衡是被破坏着——但它怎样的被重新建立起来呢？这正是所谓平衡的规准。正是在那一典型的局面之中，去考察整个的体制。而在这一局面中，平衡是否不能再建立及体制之能否没落，是还不能成为问题的。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220页

平衡的规准，在过渡期间，不能适用。所谓平衡，是说一个体制（设若有这种体制的时候）固然非要达到平衡状态不可，但同时不得不说它（平衡）又是不能达到平衡的一个状态。在过渡期间，生产同消费之间，或是各种生产部门之间，都不相称。（附注：人的要素之间，也不相称。）所以，如欲把平衡时代所适用的范畴，概念，法则等，一般的适用于过渡期间，便是根本错误。这样一来，或者有人说，社会既然没有消灭，那末，不是还有平衡么？但是要晓得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期间，既然是一相当的长久期间，这种议论，是不对的。不消说，社会没有平衡，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灭的。但这种社会体制，在一时的“异常”的状态中，在缺乏着平衡状态中，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在这个时候，破坏体制的一部分，而可以得到某一种的相对的平衡（设若我们不能从生产以外，得到什么补救方法的时候。这种状态，自然是不能持久的。

根据上述，于是我们可以把研究方法的变化及修正之一般的特征，表现如次：在巩固的生产体系的条件之下，完全可靠的而且妥当的若干方法论的单纯化，不能适用于一切过渡期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设定方式，则为：某一现成的经济形态，怎样的能够存在，而这一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消灭的法则，是怎样的一法则。

对于过渡期的修正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成立之物质条件是如何？这一社会，在这种条件之下，能够存在到几时？生产怎样的可能？是否能够建立平衡？假如平衡是可能，会生出什么样的结果？设若平衡是不可能，又怎么样？这两种状态中之某生产关系，如何的变化？两种状态中之运动法则如何？

于此，我们必须转到经济学之某种基本概念的研究，而来确定这些概念对于过渡时期所能适用的程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观念，这些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社会诸关系一样的不是永远不灭的东西。它们不过是历史的，过渡的一时的产物”。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227—228页

关于历史唯物論的一般言論

哲学以前和现在都是企图将一切知识的总和，用一个观点，一种见解，把牠们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系统，把它们联系起来或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在人类精神上是占着一个“最高无上”的地位，牠阐明人间与肉体之起源，较之其他科学的领域自然比较要困难些。然而在这里我们仍然指出最根本的法则：哲学的“终局”也是依靠在社会技术的发展上，即依靠在生产力的水平線上面的。当然，在这里依靠的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这基是说，哲学对于技术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直接的，而在牠们之间还有许多中介的链环。

布哈林：“唯物史觀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97—398页

所以我们又重复达到如下的结论：哲学决非是离社会生活而独立的，哲学是一种量，牠的变化是与社会各方面之变化相关连的，即归根到底牠是依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而存在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21页

把唯物论的观点适当地应用到社会科学上乃开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出版他的经济学批评（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在这部书里马克思发表了他的社会学的学说（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同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亦于那年出版，达尔文在这部书里证明动植物界之变化是受生存的物质条件之影响。然而决不能因此便说，达尔文的定律不经过任何发展便可以简单地搬到社会里去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指明自然科学的一般定律应用到人类社会里有其特殊的方式，即仅仅对于现存的人类社会的方式。马克思曾痛快地嘲笑不瞭解这个道理的人们。他们对于一个德国的学者朗格（F. A. Lange）曾这样说道：“朗格先去算是干了一件大发明。一切历史似乎都在那唯一的伟大的自然法则之下进行。这个自然法就是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life（达尔文这条原则被朗格一应用便成了一句空话）。那么，分析生存竞争，就是分析在各种社会形式里从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生存竞争，只要把各种具体的斗争换一句生存竞争的话就够了”（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致枯格勒迈（Kugelmann）的信）。

自然，马克思亦有其先驱者，尤其是所谓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们（圣西门（Saint Simon））。但是，在马克思以前没有谁能够运用唯物论的观点造成真正科学的社会学。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06—108页

我在这一部“历史唯物论”中，不只是将以前所讲过的再来加以重复，而且还要一方面将同一的东西用不同的公式来表明，另一方面将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给以确切的解释和发挥并进一步加以深刻的探讨。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他死前不久曾经说过，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还只是作了初步的工作。由此看来，伟大导师的门徒们对于探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应该是最急切的任務了。但是许多人生来就富于人类的保守性，竟使他们不能了解这一任务之重要。然而同时对于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却又成为当前最急迫的要求；因为反对者方面的著作日益地增加起来，我们实有反攻之必要；但要达到反攻，自然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理论之日益提高的基础上。我在这篇简略的附註中，想把本书中所有那些“新说”的原来动机叙说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那些“新说”都是依照“最正统的，最唯物的，革命的马克思观念”（见本书“序言”）而向前进的。

布哈林：“唯物历史观 I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第1—2页。

工人阶级有他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即大家所知道的历史唯物论。这理论的基础是由马克思和昂格斯所创立的。有称这种理论为历史底唯物主义的方法，或简称“经济唯物论”。这种异常天才的理论是人类思想和知识之上一种最精锐的工具，这工具帮助无产阶级去理解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中之最错杂的问题。这理论帮助社会主义者正确地预言战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转移人类的伟大革命中之各政党各集团各阶级的行动。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1—12页

社会科学中有两种重要的科学，这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社会生活之某一方面，而是社会生活之总体；换言之，它们所研究的不是某几部分的社会现象（经济，法律，宗教等等），而是研究整个社会里之一切现象。这样的科学，一方面是历史（Historr）一方面是社会学……。

……社会学是阐明人类发展之公律，所以社会学是历史的方法论。……历史提供社会学的结论和综合以材料，因为这些结论并非只凭着脑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在的历史事实里抽绎出来的。社会学的职务，就在于指出确定的观点，研究的方法，即所谓研究历史的方法论。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0—11页

历史唯物论的位置在何处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历史，这当然是研究社会及其发展定律之综合的学说。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3页

物质为精神之母，而不是精神为物质之父，同样，在社会里并非社会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产出社会物质，就是并非社会的“精神文化”产出物质的生产，从自然界汲取一切有益于社会的东西到社会来；恰恰相反，而是由于社会物质的发展，即物质生产的发展造成所谓“精神文化”的基础。换言之，社会的“精神生活”是依附着，并且不能不依附着物质生活的实际状态——即人类生产力之发展程度。社会的“精神生活”，以学理上的术语来说，是生产力的效能。什么是效能，社会的“精神生活”怎样依附于生产力，——关于这些问题往后再说。现在我只要指出，据上面的说明，社会当然不是什么“心理的机体”，不是什么一切意见之总和，更不是什么“崇高和优美”，“高尚和纯洁”，而不过是劳动的组织罢了（马克思有时称之为“生产的机体”。这就是社会学上之唯物论的观点。我们知道，唯物论的观点并不否认“观念”的作用。马克思对于高度的意识，对于科学的理论，大书特书道：“如果理论抓住了群众，这理论就变成了一种物质的力量”。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104—105页

然而唯物论者不能以那种“人们是这样想”的简单答案便为满足。他们还要问：为什么人们在这一地域这一时代是这样想，在那一地域那一时代又是那样想呢？为什么在“文明”社会里人们思想是如此之多，以至著书成山，而在野蛮社会里简直一无所有呢？对于这样问题我们都能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里找到解释。所以唯物论能解释社会“精神生活”的现象。唯心论却不能。唯心论的“观念”是独自发展的，与“罪恶的大地”不相联系的。因此唯心论者到了要解释某种现象时，总是要依靠上帝。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说：“这个善，这个理性，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上帝。上帝统治着世界；它的统治的内容，它的计划的实现，便是世界史”（“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Reclam-Verlag））。唯心论的理论必须得一切都归责于上帝，归责于那个不幸的老年人，依他们的学说，上帝于创造亚当时应当同时创造：臭虫与娼妓，刽子手与疯瘫者，饥饿与贫困，好去惩罚那些罪人，即上帝所创造并依它的意志而犯罪的罪人，好去永久排演那滑稽悲剧于奇异的世界上。但从科学的观点上来看，此种“理论”，推究到底，简直是荒谬绝伦。

可见，在社会科学里，唯一正确的还是唯物论的观点。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05—106页

我们可以举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之三种特征——客观的社会的立场，物质的生产的观点，及辩证的历史的规定问题方法。

所谓客观的社会的立场，是认定社会要胜过各个经济主体的个人。这一立场，认为个人不是一个原子，不是孤岛上面的鲁滨逊，而且社会体系的一小部分。“站在社会外面的孤立的个人生产，……与人们不营共同生活不互通言语时候的言语的发达样，同时没有的事”。（马克思）

物质的生产的观点，认定生产对于消费及一般经济生活全体的优位。第一的（客观的社会的）立场，若借数学家的话来说，固然是标明正个方法的特征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社会是一种稳定的体制的存在。但这一体制物质的存在条件，是什么呢？“无论那一国民，不要说上一年，只要停止劳动到几个星期，一定要倒毙下去。——这连三岁小儿，也都知道”。具有社会的一定的性质的社会生产，规定着社会的存在。我们把社会自身，应首先认为是“生产的有机体”，应首先认为经济是“生产过程”。生产的力学，规定欲望的力学，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生产，是一种现成的要素。

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把社会在它特殊的历史的形态中观察起来，把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法则，在具体的诸现象中，认为是某一社会构成的法则（这一法则的作用，为社会构成之历史的界限所限制。）而观察起来。所以，经济学的诸范畴，又是“适合于物质生产之某一发展阶段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之理论的表现”。这些范畴，无论如何，决不象资产阶级科学所主张的样，是具有永久性质的范畴。资产阶级科学所以使此类范畴永久化起来，即使因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永久化起来的原故。马克思的方法，除了上述的根本的特征之外，还有所谓平衡的标准的方法论的特征，在这里不能不举出来。这一方

法，第一因为非常重要，第二因为在马克思学说的一般的说明之中，都没有论到，所以，在这里非详细的讨论不可。

马克思实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事实出发，去理论的把握这一生产关系的体制。这一体制既然存在，那末，不管充分不充分，总之，社会的需要可以说是被满足着。无论如何，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使人们不死灭下去而能够生活、劳动、繁殖。在有社会的分叶的社会内（而资本家商品社会，实以这种分叶为其前提条件）这种事实，即表示在正个体制内，必须有某一种的平衡。适应着“必需量，来生产石炭、铁、机械、布、麻布、麪包、砂糖、靴子及其他等等。为要产出这一切东西的必需量，必须要消费生存着的人们劳动的相当量，来使用生产手段的必要量。不消说，在这个时候，固然要发生一切乖迳和变动，而且正个体制，会扩大，复杂化，发展起来，会通过不断的变动和动摇。但在大体上，可以说是维持着平衡状态的。

这一平衡法则的发觉，实形成理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把正个资本主义体制在它的平衡条件中，观察来的总结，即形成理论经济科学的体系。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215—218页

著者所以选出历史唯物论这个题目来的，是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根本”，至今还没有系统的解说。

布哈林：“唯物史观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页

怎样去研究这个社会呢？从何处下手呢？什么是本原，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付产，什么是原生呢？这些问题提出于哲学之前，便把哲学家分成了两大营垒：唯物论派与唯心论派。因为从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是这样去理解：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能思考，能行动，能慾望；受观念，思想，意见的指导；由此所得的结论是：意见支配世界，意见的变动，即人们见解的变动乃是一切现象之根本原因；因此，社会科学首先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应先研究“社会意识”，“社会精神”。这便是社会科学中之唯心论的观点。但是依据上面所述，我们已经知道，唯心论是与那种承认观念不依附于物质而依存于神力的见解相连贯的。所以唯心论的观点把社会科学直接联系于天神鬼怪，结果，将社会科学引到消灭，而代之以神意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毫无足怪的，譬如法国人波修埃（Bossuet）他的著作，世界史论一六八二年出版）说：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神引导人类”；德国唯心论哲学家勒西（Vossius）则以为：历史就是“神对于人之教育”；斐希德说：在历史上活动的就是理智；谢林亦以为：历史是“绝对之永恒不变的逐渐表露”，即神的表露；最著名之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对世界史所下的定义是：“宇宙精神之理智的必然的发展”（an die）此类的例子还可引出许多，但为证明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的见解与哲学的见解之如何紧相联接这一点，也就很够了。

所以，唯心论的社会科学和唯心论的社会学在社会内所首先看见的就是这个社会的

“观念”，他们以为社会本身完全是心理的，非物质的；依它们的意见，社会就是一个由人们的愿望、感觉、思想、意志等无限的结合交错而成的东西，换句话说，所谓社会便是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社会精神。

然而，也可以用完全相反的态度去观察社会。其实我们在研究有定论时就已知道，人的意志并非自由的，而是为存在于人以外的条件所规定的。但是，社会不受法律的规制吗？社会意识用什么去解释呢？它与什么相联系呢？我们只要将这些问题一提出，在社会科学里唯物论的见解便立刻发见出来了。人类社会如同全人类一样，为自然之产物。人类社会依附于自然界，并且只有从自然界汲取于它有益的东西才能生存。它用生产方法去吸取自然界的東西，但是人类社会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意地进行生产的，只有在有组织的社会里，那里一切都有预定的计划，生产才能有意识地进行。至于在无组织的社会里，生产的进行是无意识的；譬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工厂主想多得些利润，便扩张他的生产（决不是为扶助人类社会；）农民生产是为养给自己家口。但须一部分完纳租稅；手工业者则是为维持自己地位或扩充事业。至于工人呢则是为避免餓死才从事于生产的。在结果上不论好与坏，社会总之存在就是了。物质的生产及其手段（物质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便不能有什么“社会意识”，什么“精神文明”，正如没有脑经便不能有思想一样。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 9 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00—103页

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问题的言论

一般说起来，只要是经常相互动的一个范围，这便是一个特殊的系统，一个特殊的现实的总和。包含有人类间之经常互动的最广泛的互助系统就是社会。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 9 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 163 页

我们认定社会是自由状态的诸要素所形成的体系。我们在这里非把这种观察方法充分的适用起来不可。这种观察方法，在研究一切“危急存亡”时期的时候；因此在研究资本主义瓦解时期的时候，用再生产的观察方法，是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方法。当“恒常的”时期，换言之，当可动的平衡诸条件尚存在于社会体系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站在社会关系偶象化的表现的平面上去下观察。何以说呢？因为这种偶象化的表现，还带有稳定的性质，还要预先假定有物质的社会的一定劳动过程存在，才能成立的原故。货币关系，价值及其他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的范畴。我们在“恒常的”时期中还可以研究这类范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在“恒常的”时期内，还能够保持其恒常状态之故。而且价值法则是无秩序生产构造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体系变动平衡的必要条件。

生产制度一转到“变态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则形势焕然一新。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没有一切可动平衡的条件。因此若要在这种时候，企图去研究价值关系及一般偶像化的关系的诸范畴，则在方法论上犯着绝对的错误。反之，在这种时候，必抓出一切事物及劳动力的自然形态。拿这些作单位而加以研究。这时候必须认定社会自身是一个由诸种仍充分保有其自然性质的要素所形成的组织。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第69—70页

社会是由个人组织而成的，社会现象就是由于无数个人的感情思想，意志，行动积汇之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换句话说，社会现象就是个人现象的结果（或者有时说各个行动的结果）。譬如价格，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市场价格（行市）已经不是各个卖主或买客所原来希望的。而已经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意”志相互竞争之结果。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亦是如此。……马克思说：“一定的社会关系，好象麻布等类，同样是人的产物”。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3—54页

由此，我们对于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乃是包含人类之一切经常的相互动作用而且依据于人类的劳动联系上的最广大的系统。

于是我们对于社会已达到唯物论的见解。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劳动的联系，恰如生活之基础为物质的生产过程一样。

然而关于这一定义也可以引起——并且常常引起——如次的反对“好，就依你的意见，但是劳动联系是怎样成立的呢？难道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不互相说话，不各自思想吗？难道劳动联系不是一种心里的，精神的联系吗？那里来的唯物论？这已不是证明唯物论之需要吗？假使毫无心理的联系，那你所谓的劳动和你所谓的劳动联系，又将怎样表现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详细分析一下，不然，一定可以发生许多误会。先且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假定有一个工厂，在这工厂里有许多普通工人，又有各种熟练工人；有些在这部机器上作工，有些在那部机器作工；这些为这一目的而工作，那些为那一目的而工作；此外还有监工，技师等等。马克思曾经描写这类工厂的生产情形道：真正在机器上工作的工人（譬如看管机器动力和料理供给机器燃料的工人）与普通工人或此等机器工人的助手（差不多都是童工）之间，一考察起来有很大的区别。所谓普通工人里还包含着所有的 Feedres（仅仅添加劳动原料到机器里去的工人）。除这一主要阶级之外，就是少数的职员，专门视察一切机器和经常修理机器的，譬如工程师，机械师，机匠等（资本论第一卷）。这就是工厂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所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作“自己的事”，而这事又只是公共的事。之一部分。这就是说，每个工作者站在一定的位置，作一定的动作，与物体及其他工作者参

与物质的接触，耗费一定数量的物质的体力。这一切都是物质的，物理的关系。当然，所有有这些物理的物质的关系同时引起“精神”的关系：人们各自思想，交换意见，互相谈话等等。但是这些精神的关系是为一定的物质关系所规定的：他们被分配在那一厂房，站在何种机器旁边，这些便无形之中规定了他们的交换意见和互相谈话等等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被分配在工厂里，犹如分配一个物理的肉体一样；所以他们都是于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站在一定物理的物质的关系上。这就是工厂里的工作者之物质的劳动的组织，马克思称之为“集合的”或“集体的工人”；在我们面前就是物质的人的劳动系统。当这一劳动系统正在进行之时，便是物质劳动的过程：人们耗费精力造出物质的产品。这也是物质的过程，在这一物质过程里同时有它的精神方面。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即工厂里的情形，亦可推及于全社会，社会不过更复杂些，更广泛些罢了。因为整个儿的社会不过是自成其为一种人的劳动机关而已，在社会里每个人或人的集团在劳动过程之中各自占据一定的地位。我们试拿包含所谓“文明人类”以至于更广的范围之现代社会来看罢。在这里我们便看见，在一些地方主要的生产是麦子，在另一地方是可可，而在第三个地方却是金属品等等。而在这一地方之内亦是如此：这些工厂制造这些生产品，那些工厂制造那些生产品。工人，农民，殖民地的奴隶，以及工程师，监工，技师，组织员等，都被分配于地球各国，散布于世界各部分里，——他们虽非有意如此，而实际上却互相为而工作的。当许多商品由这一地方运到那一地方，由工厂运到市场，再经过商人由市场运到消费者，——这是表现什么呢？这就是表示一切这些人之间的劳动联系。这就是说，这种劳动联系便是统一的社会生活之劳动机关的物质基础。譬如人们研究蜜蜂之生活时，毫无疑问的，必定首先描写蜜蜂之中分成几类，蜜蜂如何从事工作，他们在同时同地其相互间之关系如何，总而言之，就是先须描写“蜂国”里之物质劳动的机关。虽然人们也常说到蜂类的本能，蜂类的心理生活，以及其‘性格’等，然而在这里决没有人首先就认定蜂房里的蜂是一种心理的总和，一种“精神的结合”的。但是，得罪了，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好拿来与蜜蜂相比！

当然，人类社会里各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即会比起高等的猿猴来尚且丰富得多，何况蜜蜂。人类社会的“精神”，即所有这些心理的相互作用，比猿群的精神要高得远，同样一个人的精神，比一个猿猴的精神也要高得远。但是，构成现代社会精神之各种各式的又复杂又丰富的心理的相互作用，亦有它们的肉体，没有这一肉体，它们便不能存在，亦犹之个人的“精神”没有他的肉体便不能存在是一样的。这种肉体就是劳动基础，劳动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之物质关系的系统，即马克思所谓生产关系。

布哈林：“唯物史观”（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69—173页

如果人是永久生活于社会之中，即是人如果永久是社会的人，这就是说，各个人便永久以社会为环境。社会既常是各个人的环境，那就不难了解，个人不能受环境的支配；这一社会有这一社会的环境——所以这一社会的个人，便这样发展，那一社会有那

一社会的环境——所以那一社会的个人则那样发展，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里便发生了一个重要问题，这问题曾引起并正在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这就是个人在历史里之作用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所感觉的那样困难。在事件的进行中，个人有否相当作用抑或是毫无作用呢？个人是否等于绝对的零？抑或个人有相当作用？非常之明显，如果社会是由个人组织成的，那末，每个个人的行动一定要影响于社会的事件。就是，个人确有相当“作用”，即每个人的行动，感情，欲望都成为社会现象之一部分。“历史是人类造成的”，“而人类”又是由许多个人组合而成的，那末很明白的，个人决不是等于零，而是一种适当的力量。社会现象便是这些力量的错综交接和相互作用形成起来的，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其次，如果个人是能够影响社会，那末，这个个人的行动究竟为什么所规定呢？我们十分知道，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为外界的环境所规定的。所谓对于个人的外界环境就是社会的环境（家庭，团体，职业，阶级等的生活条件，以及该时代全社会的状况），所以，个人的意志要受外界环境的支配；个人行动的动机都是由这些社会条件中发生出来的。譬如克林斯基（Kerinski）时代俄国军队中的兵士，看见他们农民的经济破产了，生活一天一天的坏了，战争的终止却遥遥无期，资本家是发财了，而农民却得不到土地。因此便发生了兵士们要求停止战争，没收土地，推翻政府之行动的动机这就可见社会环境足以规定个人行动的动机了。

这种社会环境，并且还可以限制各个人的目的之实行的范围。一九一七年美留苛夫（ilrukov）企图巩固资产阶级的势力并凭籍协约国，然而他这种企图终于失败了：因为当时的环境使得美留苛夫只有失败，不能不失败。

再其次，如果从个人的发展方面观察一下，那我们就明白，个人的本质从肠胃到皮肤都充满了环境的影响。人是在家庭里，街市上，学校里，教养训育起来的。个人所说的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所思想的一切观念，是过去几世几代所逐渐积累遗留下来的；围绕着个人的其他一切人类一切社会习惯，无时无刻不影响于他。个人好象一个海绵，随时随地吸收着新的印象——由此便“形成”所谓个性。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包含着社会的内容。个人自身就是社会影响的结晶体，社会的缩影。

最后，还有一种现象应当指出的，就是个人的作用，往往因为他占有特殊的地位和执行特殊的工作，所表现出来是非常之伟大的。譬如军队里的参谋部。军队可有数十万人，有时甚至于几百万人，而参谋部却常只是几个人组织成的。大家知道，这几个人（参谋部）的影响比那几百万人（兵士和军官）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参谋部一旦被敌军捕获了，那有时简直等于全军复灭。这几个个人的影响可以说真是大极了。然而我们且把事体进一步来研究看看。假使参谋部没有军用电话的联系，没有军事探报，没有军用地图，没有发命令的可能，没有军纪等等，那时参谋部还有什么作用？简直等于零。参谋部里的各个个人与其余的个人差不多是相同的。那末，参谋部的势力，参谋部的作用究竟在那里呢？他们的势力，他们的作用，根据什么而造成的呢？他们的势力是由于特殊的社会联系，特殊的组织所造成的。当然，他们应当有适当能力能够执行其任务

(有充分的教育或天才，有很丰富的经验，譬如许多的将军们如拿破崙或俄国红军的军事领袖，便是具有以上这些条件的)。但是他们若一旦离开这些特殊的联系，便立刻失其作用。我们这个例子表示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参谋部所以能够强有力的影响于军队，其实是由军队本身所造成的；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秩序。一切相互动作的总和所汇聚起来的。

社会里亦是如此，譬如政治领袖。当然他们的作用比起在那一阶级和那一党里的普通人的作用来，确实要大得多。当然，要作一个政治领袖，必须要有适当的能力，学识，经验等。然而非常明显，如果没有相当的组织（政党，工会，及其他团结群众的机关等），所谓“领袖”是不能有什么作用的。社会联系的力量给予优秀个人以力量。我们从别一方面说，譬如发明家，学者等，亦是为此。他们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发展自己的天才。比方一个抱有天才的技术发明家，却没有机会去学习去研究，被迫得去操作完全另一种的职业，譬如贩卖破布，——那时他的天才不得发展，以致于衰萎；也就没有人知道他了。军队以外的军事领袖是不可思议的；同样，机器，机关和适当的人以外的技术发明家亦是不可思议的。从反面来说；假使我们的破布商人得到一种机会，就是他在社会联系的系统里得到一定的地位，那时也许他会变成安蒂孙（Edison）第二罢。这样的例证还可以引出许多来。但是从这许多的例子里社会的影响还可举出一点，就是：“天才的发展”只有在社会的（阶级的，团体的，共同的）需要范围之内，才有可能。

所以，社会的联系自身给予个人以力量——这就是我们上面所举之例证所得来的结论。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85—190页

目的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方才能有，有意识的生物有愿望，收这些愿望定为目的并趋向于满足这些愿望（即接近目的）。……目的适应性等类的概念对于整个儿的宇宙简直不适用。现象的规律性决不是目的论的规律性。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1页

不管其中是否有人定的目的。可以说，即使人能够完全调节一切社会现象而如其所愿那时解释现象还是不要目的论，而是要看现象的原因，找出原因的规律性。可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这一点上并无何种差异。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30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1年版 第35页

目的论的观点是依附于宗教。目的论的发生，于是推广在地上最深的和最野蛮的奴隶制度。在整个儿的宇宙中，一方面服从，一方面统治目的论在根本上是与科学的解释

不相容的，牠纯依着信仰而立。目的论是僧侣神父的观点。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4页

什么是原因的定律呢？这就是必然的经常的随处都可以察觉的一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一切原因的定律可以下例的界说“形式”来表示：假使有甲种现象必定有乙种现象与之相应。解释甲种现象寻找牠的原因，就是寻找与牠有关的乙种现象，这就是阐明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此种联系还未寻着，便是现象还没有解释，如果此种联系已经寻着了，发见了，证实了，这联系实际上是经常的了，那时我们就得着了科学的（原因的）解释。这种解释，对于自然界的现象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现象，都是唯一的科学的。这种解释排除一切神秘性。排除一切现象的超自然力，一切旧时代的偶像，而指出正轨，使人类能运用自然力以及自己的社会力。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8—39页

关于生物学与社会学中间的规律的相互关系之不断的论争，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根据上把牠们提了出来。这就是说，我是把人类之生理上的特征以及与此等相适应的心理上的特征视为社会之一定的劳动力之特征（搬运夫，音乐家，生产的组织者，商人，侦探，汽车，官厅等等之心理的与生理的特征）。如此去解决问题，才不至于发生“种种规律”之无谓的重复，这种重复就是在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也可以常常碰见的（一方面，是生物学和生理学等的规律，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实际上，这一个就是那一个之变态的存在。同一个现象，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观点上去考察。搬运夫之心理和生理的构造及其劳动力的特征并非二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对于观察同一事物二个不同的观察法。这种情形，在我们研究泰罗制度和劳动心理时，就很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第22—23页。

马克思严密推重他的经济学理论底历史性，及其诸法则底相对性。“依他的意见，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固有法则。……人类生活一度尽一定发展时代，而从一定阶段进到其他阶段去时，其他法则又开始支配着。”自然，这不一定就是，马克思否定任何支配社会生活过程于其种种发展阶段之任何一般法则底存在。比方说，史的唯物论便定立了用来说明每一段落的社会发展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排斥经济学的特殊历史的诸法则，它们，与社会的诸法则相反，表现一定的社会构造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4年），

水法书店1930年版，第56—57页。

假使支配着社会的一切习惯和道德是与社会的经济状态紧相矛盾，那时便是缺乏了社会平衡的根本条件之一。实际上，支配着该社会之一切法律，习惯和道德与其经济关系都是相适应的，它们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发达，并与之变化和消灭。我们试取这样的一个实例想象看：谁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支配着一切事物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所表现出来的，便是所谓财产法，这财产法是为一切的国家权力机关所拥护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在法律的言语（法学上的用语）上称之为财产关系，而这些财产关系就是依靠无数的法规来支持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要想一切法规（法律）不去保获这一社会的财产关系，而去毁坏它们，这有没有可能呢？当然这种假定是无意义的。同样，关于道德也可以作为是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道德意识”是反映和表现这一社会之物质的实质。再取私有财产的例子来看罢。道德认为盗窃是不对的，必须公平正直，一介不取。这是异常明白的。假使比方没有此种道德的枷锁印入于人们之脑中；那时资本主义的社会便要活活地被瓦解了呢。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32—333页

我们由上面种种的研究，可以知道社会科学亦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预言。这种预言当然不是巫覡式的，而是科学的预言。我们知道，譬如天文学能够很正确地预言日蚀月蚀之到来，能够预言慧星或彗星之出现。气象学家能够预言气候——风、雨、阴晴。这种预言里没有丝毫神秘的成份。譬如天文学家知道行星转运的定律，知道太阳，地球，月球的轨道，并知道它们运行的速度；从这些条件之下，计算出来什么时候月球要走到地球与太阳之间而发生日蚀——这有什么希奇呢？现在我们要问，社会科学能否如此？当然可能。假使我们真正知道社会发展的定律，就是社会必然要走的路线，发展的方向，那我们也就不难预测社会的将来。我们根据于社会发展的定律，曾经预言经济的恐慌，纸币的低落，世界战争，社会革命，这些都是由于战争的结果；我们曾经预言革命时期中各阶级各团体各政党之行动；我们并且预言过俄国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必然要变成富农的反革命党；在革命以前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预言俄国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工人运动亦必随之发展的。象这种的预言例子还可以举出几百。在这里没有丝毫希奇，我们不过是知道社会发展的定律而已。

我们现在还不能预言一切现象发见的时日。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还没有达到能使用正确数字之能力。我们虽不知道社会发展的速度，但我们已能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6—77页

由上面的解说，便无所谓偶然，“偶然性”这一概念应该从社会科学里驱逐出去。社会的发展同宇宙万象一样，同是受规律性支配着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1页

如果一切事实都是有规律性的，没有什么所谓一般的偶然性（无原因之意），那末，很明显地也就没有历史的偶然性了。一切历史上的事跡，无论如何表面上看来是偶然的，但实际上都是有因果的；平常历史上所谓偶然性的现象，不过因为许多交错的原因之中人们只知一个，便以为偶然的罢了。

然而历史的偶然有时亦有别一种意义。……。所以这里所谓“历史偶然”的意思，是指那些在整个的社会历史进化中无关轻重的事实，即使没有那些事实，社会现象的进展未必有多大的变动。譬如，即使没有奥太子的被杀，帝国主义的战争仍旧是要起的，“事情”并不在于奥太子的被杀，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帝国主义列强间之竞争日趋剧烈日趋火并的缘故。

但是能不能说，这种“偶然的”现象对于社会生活丝毫没有作用，丝毫不能影响社会的命运，简直等于零呢？如果我们要正确的答复，那就应该说，绝不是的。因为一切事实无论如何“微细”，实际上必定影响于将来的发展，问题只在于所影响的程度有大小不同而已。就上面所举的偶然现象的意义说，这种现象对于实际的影响是不重要，很微细，可以说是异常之小，但决不能说等于“零”。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些由许多“偶然”汇集起来的总和，便立刻明白了。……。因为单个的偶然起不了什么作用，没有什么重要。但是你如果将这类的“偶然”搜集起来，汇合起来成为一个大数量，那时你立刻可以看出，所谓“偶然性”就开始消灭了。多数“偶然”的作用和意义，而其总和的效力便立刻可以影响于未来的发展。因为单个的偶然决不是等于零。只有零不能有所加减，始终是一个零。我们不能从无中生有。

……所有这些事实同样不是偶然的，同样受原因的限制，即同样有原因的必然性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68—71页

人们的实际经验完完全全否认了这种意志自由的学说。因为如果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与什么都无关，那人就不能有所行动，因为什么都无从计较，无从预料。……意志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为许多原因所规定的，假使不如此人就无从行动了。

……人的意志不论在经常的或“非常”的场合里，都是不能自由的。

入当其机体已经成熟时，便要发生色慾，人在极度的疲劳之下，便要表现倦态。总而言之，人的感觉与其机体及其所处之环境是相联系的。人的意志同自然界其他的一切现象一样，而是为一定的原因所规定的。人在自然界之中，并不是什么例外，不论他是想搔一搔首，或想作一桩英雄事业，——一样都是有原因。固然，有时候要发现这些原因是很不容易的然而这却是另一个问题。是的，难道我们已经将死的自然界里一切的原因都发觉了吗？自然还没有。然而正因为如此，人尚不能解释一切，但却亦并不是绝对不

能解释。

还应当注意，不但“经常”的事态得要服从原因的定律，就是一切现象都是服从原因的定律的。譬如神经病就是很实在的例。神经病和疯子他那种矛盾的荒谬的非常的愿望及举动，有何规律性，有何秩序呢？然而始终有它们的原因。在这种原因底下的疯子便这样举动，在那种原因底下的疯子便那样举动，第三种原因底下的疯子又是第三种做法。这就是说，原因的规律性，就是对于神经病也一样保存它充分的权威。

.....

从我们上面所引之许多不同的比喻里，可以显然看出，在一切条件之下，不论是经常的或非常的条件之下，个人的意志，感觉，行动常有一定的原因，他们常受限制的有一定的。至于意志自由的学说（无定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半宗教的更精练一点的形式丝毫不能有所解释，并且与一切实际生活相反，简直是科学发展之障碍。只有有定论才是唯一的正确的观点。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9—53页

……如果社会现象是有规律性的，如果社会现象是人们行动的结果，那末，每个个人的行动一定要受某种限制。就是人和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而要服从一定的法则。……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的意志未见得不是自由的。难道人不是自己决定自己要作什么吗？……。

这种问题，在哲学上叫做人的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这叫做无定论（Cnaet——eMmiriNm意志无束缚说）。以为人的意志要受限制，非自由的，这叫做有定论（DeFeumtntom意志束缚说）。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3—45页

……须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人们往往将无束缚的感觉与客观的（事实上与意识无关的）无束缚混而为一。……，决不能把自由意志的感觉（无束缚的感觉）与人的欲望及行动之无原因无限制混为一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一切无定论者往往故意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即以此为观点，把人的“精神”变成特殊的不可思议的“精神”。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5—46页

我们于一切为近代社会经济组织之典型的这些场合，可以纵谈对于人们的意志，意识及意图的社会现象底独立性；但是决不可体会，这独立性是关于相互间完全独立的二种不同现象的。这一定是背谬可笑，如果假定人类历史不在人们的意志上，但在这意志

外，被作成（这种“唯物史观”是布尔乔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虚构讽伤的描摹）；事实却适得其反。二系列的现象——个人的行动与社会现象——互有最密切的发生的（Genetic）关系。这独立性须专在这意义上被体会：个人的行动底客观化了的诸结果支配该行动的一切微细部分。

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4年）水沫书店 1930年版，第44页。

在无组织的社会里，没有有规划的生产，却有互相斗争的阶级，一切都不是按计划去进行，而是听其自生自灭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出来的社会现象，自然不能与许多人的愿望相符合。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说：“社会现象不受人的意识感情和意志之束缚”。但是这里所谓“不受人意束缚”，并不是说社会生活里的现象不是人所造成，而是说，在无组织的社会里，在听其自生自灭的发展中，这些“人意”的社会产物，往往与许多人原定的目的不相符合，而有时简直违反那些原定的目的（人们希望发财，而结果却是破产）。

.....

由上面的解说看来，可以知道，在无组织的社会里，以至于在一切的社会里，一切现象亦并非不管人的意志，却是经过人的意志的。不过在各个人之间有一无意识的原始自然性统治着，这原始自然性又恰好是各个意志的产物。.....

.....在无组织的社会里所发生的现象，往往不完全是——有时完全不是——人们所愿望的。可以说，统治着人的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现象）。这句话的意思，不但是说社会现象规定人的行为，而且是说社会现象的进行与人的愿望相离异。因此，我们对于在无组织的社会里的关系，可以得到以下几种原则：

一、社会现象成于各个人的意志，感情，行动等等之交错。

二、社会现象随时随地规定各个人的意志。

三、社会现象并不是表示各个人的意志，却常常与这意志相离异，强迫地支配它，以致各个人往往感觉着那社会的原始自然性之压迫（譬如破产的商人，在战争期受革命威迫的资本家等）。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5—59页

现在我们来看看共产社会的情形。在这种社会里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更没有阶级利害冲突，等等。同样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也没有矛盾。在那里只有亲密友爱的工作者，按照一定的计划去为自己而工作。

在那里个人意志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显然可以知道，社会仍然是由个人组织而成，社会现象仍然是个人意志之交错。不过这种交错的性质，成就这种交错的方法，比起无组织的社会来，是完全不同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共同的精神更可以扩充到极大的范围和极繁复的形式（此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并非指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和初步的共产主义，而是指最发达的，

无产阶级无国家无法律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很明显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而社会的意志也就是有组织的意志了。这种社会已经不是不受个人意志“束缚”的原始自然性之结果，而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社会决定。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发生的一切恶现象也就没有了。这种社会里不是“社会的产物”支配着人，而是人支配自己的决定，人有意识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象现在这种对于社会大部分人有损害的致死的恶现象，当然不能再存在了。

然而上述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意志和各个人的意志决不受任何束缚，亦不是说在共产主义制度底下支配着的完全是意志的自由，人变成超自然的神物，不受原因定律的规制的。

不然，在共产主义之下，人始终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始终还须服从原因性的一般法则。实际上，难道每个人真不受环境的限制吗？当然不能。不过人们的活动不象非洲的野人，也不象摩尔根（Moulien）银行里的职员，更不象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骑兵。那样受束缚罢了。但是人始终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一分子，生活的环境仍要规定人们的意志。譬如，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大家仍然要与自然奋斗，因此，这一斗争的条件仍然可以规定人们的行动。总而言之，有定论的理论，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仍然有充分的效力，仍然可以应用的，因此，我们对于有组织的社会的关系亦可以得出以下的原则：

一、社会现象是成于各个人的意志，感情，行动等等之交错；不过这种交错的过程，不是原始自然性的，而在决定者之范围内是有组织的。

二、社会现象随时随地规定各个人之意志。

三、社会现象已能表示人的意志，并且不与人的意志常相离异，人是自己支配着自己的决定，不感受任何社会的原始自然的压迫；社会的原始自然性已消灭而代以理智的社会的有组织性。

恩格斯说：“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就是完成“从必然的世界跃入自由的世界”。有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便以恩格斯这句话的意思，仿佛指有定论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的社会。这种武断的意见是基于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其实恩格斯所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他的意思是：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是指有意识和有组织性，以与无意识的原始自然性相对待。那时人们能够知道，在规定的条件之下应该作什么及怎么作。“自由是已经认识的必然”。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9—63页

希塔摩勒尔质问马克思主义者道：既然说社会主义必然要到来，犹如日蚀在一定时期之必然要发现一样，那末，为什么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又这样努力去实行社会主义呢？希塔摩勒尔说：两者之中只能有其一——或是社会主义之到来有如月蚀，——那时须努力，无须奋斗，更无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等，从没有谁想组织什么党去帮助实现月蚀的；或是组织政党，奋斗，等等；那就是说社会主义也许不来，可是你们要他来，

所以当然要为它而奋斗。那时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必然的了。

经过我们前几章的讨论，希塔摩勒尔的错误是不难看出的。月蚀对于人的意志，一般说来即对于人，不论直接或间接都是没有关系的。正如人皆有死，不论其阶级别，性别，国别，年令别。月蚀不管人们关心与否，到了一定的时期必然要发现。至于说到社会现象却就大不相同了。社会现象是经过人的意志而成就的，社会现象没有人——没有社会，这就等于圆的方形和热的冰。社会主义不免要到来，是因入，一定阶级的人，不免要促它实现，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它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意志，它不过解释意志罢了。当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共产党去奋斗时，这也是历史之必然的表现，历史的必然本来是经过人的意志和行动而表现的。

社会有定论，即一切社会现象受规制的学说，决不能与定命论 (fatalism) 相混淆。定命论是盲目的信仰命运，命运在一切之上，一切都须服从它。人的意志简直等于零。人并非原因之一，不过是一种附属的材料而已。这种定命论否定人的意志，以为不是发展之一要素。有定论决非如此。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80—81页

社会民主党的这一部分联络于资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腐化成为定命论。洁诺夫 Cunow 便是一个最模范的定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切“哲学”的结论就是：“历史永久是对的”，所以反世界战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都不必要。一切工人的共产主义的暴动在他看来都不是历史必然的表现，而是违反历史发展律的一种无聊的举动而已。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82页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言论

这里的所谓生产力；我们且把牠作为是生产手段及整个劳动力的意思来说罢。这样的一解释，则一方面就有现成的一切种类的机械，原料、燃料等等整个生产手段，他方面就有现成的一切种类的整个劳动力（金属工人的劳动力，技术工人的劳动力，纺织工人的劳动力等，换言之，各种具体性质的及各种品质的劳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般人类发达的基础。所以，非从此种观点来观察出其生活的一切事实不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符合于再生产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相当于扩张的再生产；生产力的停顿状态，相当于单纯的再生产；生产力的低下，便表现为一种周期的消费生产物的再生产部分之不断的减退。而在最后的事实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退步。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55—56页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答复一个问题：生产力是什么？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乏”中，这样的说着：“假若从一般分析出发，以期最后达到特殊的生产要量，——机械，这种方法，简直是侮视历史的方法。机械同牵引犁耙的牛一样，不是一经济的范畴，而是一生产力。反之，建立在机械利用上面的近代玉坊，是一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个经济的范畴”。

马克思在这里说明的认定生产力，是生产之物质的及人的要素。所以，生产力这一范畴，不是经济上的范畴而是技术上的范畴。但是，在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另一定义。在“资本论”第一卷及第三卷中，马克思屡次把“生产力”这一表现，用为“社会的劳动的生产性”的意思。然而在马克思呼社会的劳动的生产性为生产力的时候，却同时不断的再三指明，劳动力是社会的基礎的生产力。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148—149页

首先且问：这一概念的意义，在那里呢？人们的所谓生产力，是指着人类支配自然的程度，征服自然的程度而言。即是，人类所达到的进步的程度，结局，被生产力所规定。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来观察马克思的种种定义的相互关系。罗它伯尔斯，劝人须严密的把这两个概念，分别清楚。在他的“社会问题讲义”中，他说“我们要好好的把生产力同生产性区别起来。”生产力是指着生产力的效力或长度而言。设若从前作工的工人是十人，而现在作工的是二十人，从前安置有某一效率的机械一台，而现在安置效率相同的机械二台的时候，则生产力可以增高至二倍。反之，现在的工人十名，制造从来二十人分的東西；或是一台机械，其价值不得比从来的高，而能有从来的二倍的效力的时候，则生产性可以说是增加到二倍。在这里，劳动也是最后的测量器。较多量的劳动，便形成最高程度的生产性”，这样的一考察，则生产力的这个概念的“不明确”的原因，相当的变为明了。即是，这个概念，是位于技术同经济的分水岭上的一界限概念。从经济的立场看来，社会的劳动的效力的概念是重要的。从技术方面看来，社会起至（方面看来）至剥削社会劳动这一效力之物质的等价物，换言之，现有的生产手段及劳动力的总量，是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把生产力同社会劳动的生产性，看为是一个数学的量（ $\frac{M}{a+b}$ ）的两面。这里的M，是表示生产物的总量（不管它是能力的量，抑是其他的量），而这一总量，表现为具有效果的任何诸单体；a同b，表示社会劳动的诸单位体，a是死的劳动的单位体，b是活的劳动的单位体。若从“物的”观点，来观察上面的定式（ $\frac{M}{a+b}$ ），则M表示着各种生产物的总量，a表示着各种生产手段的总量，b表示各种异质的劳动力量。这三种量绝对的互相依赖着，而此中的生产手段，实为第一的要素。生产手段分为劳动手段及其他的生产手段（原料，助成材料等）。这两部分又互相有机的结合着。具体的生产手段，一般的要拿某种品质的劳动力的适当量，作其前题，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过程，实有牠自身的技术的论理之故。而且在某一瞬间，物的要素及人的要素，根据

着一完全特殊的方式，并且在一定的关系，互相结合着。但是，同时，若从生产手段的物的特性方面看来，牠（生产手段）实分为彼此互相限制的二部分。从上述的观点看来，我们可以拿生产手段中的能动的部分——劳动手段，换言之，社会之技术的体系，作我们分析的出发点。而这一技术的体系，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测量着生产力进步程度的分度器”。

所以，我们所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或退步，是指着社会的劳动生产性的增进或减退而言，所谓生产力的分配及重新分配，是指着生产手段及劳动力的分配及重新分配而言，同时，所谓生产力之物理的消灭，也是指着生产手段及劳动力的消灭而说，设若我们对于生产力，要下一社会学的定义的时候，则可以说牠（生产力）是社会之技术的体系——社会发展之能动的不变的“要因”。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50—153页

可见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方产出有用的能量之分量和他方消费社会劳动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即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可是我们已经知道，社会劳动之消费包括两部分：即包含于生产机关中之劳动和“活的”劳动即直接所消费之活的劳动力。假使我们把劳动生产力的分量当作一种物质之构成部分的分量来考察，那时我们便可以得着三种分量：第一，所产出之生产物；第二，生产机关；第三，劳动力，即活的劳动者。所有这三种分量都是互相关连的。实际上很明显的，假使我们知道生产机关是怎样和劳动是怎样，那末我们便可以知道在一定量的时间内能生产多少东西；第三种分量——所产生之生产物，是由前两种分量所决定的。这两种分量合拢起来便形成我们所谓之社会的物质劳动生产力。如果我们在某种社会里，知道这一社会所占有的生产机关是怎样，其数量有多少，这社会里的劳动者如何，其数量如何，那我们便由此可以知道社会的生产力是如何，这一社会对于统治自然界之权力的程度是如何，即这一社会使自然服从牠自己达到如何的程度等等，换言之，生产机关和劳动力能够给我们以测量社会的发展程度之极准确的物质的标准。

然而我们还可以深一层来观察。我们可以说，劳动力亦是为生产机关所决定的。譬如，假使社会劳动的系统里加入了植字机，那一定随之而发生适当的熟练劳动。劳动过程中之一切活动的要素，并不是一堆简单的物和人，而是一种系统，在这系统里每一种物和每一个人都被配置在牠一定位置上，一个与一个地互相衔接，互相适应。所以，只要发现某种生产机关，那相应的工作者自必随之而发现的。至于所谓生产机关，我们又可区别分为二大部分：原料与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仍是积极的一部分，常被人们用来在原料上工作的。但如果我们说到某社会里有某种样的工具时，那就同样可以说在这一社会亦有适当的原料（这里是指复生产之常态的进行而说的）。因此，我们能够得出以下完全正确的结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正确的物质的标准便是社会劳动工具的系统，即这一社会的技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生产性即表现于此种技术之中。

“遗留骨骼的构造之对于研究已经消灭的动物之组织和遗留工具之对于研究已经消灭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各种形态的社会——原著者註）是同样重要的。经济的时期的区分，

不在于生产，而是怎样生产，即怎样的劳动生产工具”。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27—229页

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是不断的向上的曲线的发展。反之，在对立的社会中，生产力之无间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当然明白的事实。何以说呢？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平衡的法则，是专要靠不断的或周期的破坏平衡，才能实现起来，而且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实现起来之故。因此，平衡的再成立，必须以平衡的破坏为先决条件。然而在这时候，这种平衡的破坏（牠的职务，是在较广泛的而同时又较多矛盾的基础上，再建立起来平衡），常不可避免的引起生产力的减退；所以，在对立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经过生产力之定期的破坏，才有可能。——这是不用说的。

这个事实，很了明的表现于资本主义的恐慌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世界市场恐慌，看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实在的总归结及强制的调节。”（马克思）

这种矛盾的“强制的调节”，换言之，新平衡的诸种条件的产生，惹起了生产力的破坏。而生的平衡，把旧的矛盾，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再生产起来。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不独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再生产起来的一个过程。新的平衡，无论何时，都要经过“生产力的大量的消灭”，（而这一消灭，不断的增大其规模），才能再建立起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对于上述消灭的最重要诸形态，与以极明了的分析，而且是从两个观点——现实的物的观点与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来实行这个分析。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54—155页

这个解决是这样，我们所了解的生产关系乃是在空间与时间上之人与人（看他们如同“活的机器”）的劳动的配置。这种生产关系的系统，其“心理化”的程度是与太阳的行星系统同样的。系统的位置之确定乃在化年史上之每一点上，这也就是系统成为系统的原因。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2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第14—15页。

我们知道，所谓生产关系，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那由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发生出来的，即由那包含生产关系的分配之生产过程和生产物的分配过程中发生出来之人与人中间之各种各类的及一切可能的关系。很明白的，此种生产关系是异常之多样而复杂的：例如在巴黎收买纽约纽约托辣斯股票的交易所买办，他与属于这一托辣斯之工厂中的工人和厂主，管理员和工程师，必然结成某一定之生产关系。银行家与其所雇用之簿记员也是立在某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上的。同样，木匠与其在同一工厂中工作的旋盘工，与其邻近市场作买卖的商妇及监督他的监工等都要发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且这个木匠与邻近捕鱼的渔人及为他制造裤子材料的纺织工和与他的工人等等，都是站在某一定的生产关

系上面的。总而言之，依生产关系的模型之相互区别，陈列在我们面前的确是真正不可计量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第567—568页。

社会分工乃是根本的生产关系之一。但是现代之分工的基础究竟在那里呢？不难明白，现代社会分工是依着现代的劳动工具，机器与工具之性质，形态，结合等而决定的，即依着资本主义社会之技术系统而决定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91页

所以大生产的生产关系是依技术而决定的。从古代希腊同罗马的技术曾经产生一种特殊的小的和中等的生产之生产关系，同样，从现代的技术里便产生大生产的关系。不论这里或那里，在社会技术同社会经济之间自有一种相对的平衡存在着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94—295页

每一种既成的社会技术的系统便能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系统。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78页

这样的技术便决定了劳动者之模型，即劳动者之熟练程度，并且亦决定了各种劳动关系，即生产关系。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81页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社会的劳动之生产性底增大，社会底生产机能底扩大。没有消费即没有生产；这是无疑的；欲望常常是一切经济活动底动因。另一方面，生产对于消费也有最显著的影响。依马克思，这影响由三方面去作用着：第一，生产造出消费的材料；第二，他规定消费的样式，即其底的特质；第三，他创造新的欲望。

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1914年）水沫书店 1930年版 第70页

技术与所谓“文化的丰富”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我们只要把现时的中国和日本来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在中国——因为整个的环境——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的技术发展得比较地极其缓慢，所以目下中国的文化是在停滞的状态里。不过在这里因革命化的影响亦已发生新的资本主义技术的萌芽了。至于日本最近十年间在技术发展一方面已经有了伟大的进步——随着这种进步的情形，于是日本的文化也就急速的发展了，只要

将日本的学术界一考察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的。

中世纪前半期里，其社会文化的方面比起所谓“古代社会”来还要低许多倍，这是因为他的技术比较古代退步得很远，在古代社会里曾有的许多机械的发现都完全被忘掉了……只有军事上的技术及与之相关联的冶金术算是例外”（亚格佛诺夫W. K. Asafanov 近世的技术 *Nadern technology*, 俄文版，第三卷一六页）。异常之明显，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上要有“丰富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为滋润此种“丰富的生活”的生活计异常之少。欧洲之急速的生长恰好是与资本主义的机械技术相适应着的（一七五〇年与一八五〇年之间在技术方面曾起了巨大的改革；如蒸汽机，蒸汽的交通机关，煤炭制铁业之机器化等”。后来电气的应用，杜尔毕式（Turbine）的机关，狄塞勤式（Diesel）的动力机以及自动车飞行机等都普遍起来了。社会的技术基础及其生产力达到未曾有的高度。在这样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异常复杂的环境之下，必然要发生适当的“精神生活”；那是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希奇的。假使我们甚至拿那含有比较复杂的精神生活的全盛的古代文化的技术与近世欧洲和美国之资本主义的技术比较一下，那便立刻可以看出其如何粗笨和落后。在古代应用比较复杂的工具主要的是以农业灌溉和矿业为限。就是极大的生产也不是建立在完全的工具上，而是建立在巨大数量的活的劳动力之上的。“赫罗多特Hesodotus曾报告说：为霍普斯Hecops之金字塔搬运石头者共十万人。并经过三阅月之久（纪元前二八〇〇年）；从采石坊所至尼罗河岸开辟一条搬运石头的道路，其工程便经过十年”（亚格佛罗夫前书第五页）。古代社会”的技术是如何粗笨，我们只要把那时的工程专家斐都鲁凡Vitruvius对于当时“机器”所下的定义一看就明白了：“机器就是一种木材之适当的组织体，其最大之作用，则在于起运货物”（前书三页）。那些木制机，其主要的作用就在“起运货物”，并且还需要巨大数量之人的或动物的力量呢。

布哈林：“唯物史观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第233—236页

与此同一的现象，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竞争（这一竞争，是建立在分散的社会生产之上）的时候，也能看出。设若牠是一合理的而有统制的体系，则一切劳动必然按着必要的比例，而被分配于各种部门及企业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这种意识的统制者。所以，平衡的法则——价值的法则，如象“屋宇倒在人的头上时候的重力”样，以最原始的方式而作用起来。而且因为这个法则，不外是社会的原素力的一盲目的法则，所以牠是要经过无间断的破坏，才能实现出来的。即就这一点来说，平衡的破坏，是树立新的平衡的一必要条件。而且在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新平衡中，又生出新的破坏。这样的向前进行。而这种变动的机构，换言之，新的平衡必须经过牠才能实现出来的这一平衡破坏的机构，便是竞争的机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的发展，实要经过生产力之无间断的浪费，才能得到。而这种浪费（“竞争时候的损失”）便是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移动的平衡的连锁，凡进到一个新环的时候，这个平衡，便在一更高级的形式，在集中过程的基础之上，被再生产起来

的原故。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57—158页

可见社会的发展是依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所规定的。所谓劳动生产力的意思，就是取得生产物的分量和消费劳动的分量之间的一种关系。换一句话说，劳动生产力乃是某种劳动时间为单位之生产物的分量，譬如某种生产物的分量之制造成功，需要一日，或一时，或一年。假如一小时造成成功的生产物的分量增加了一倍，那就是说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假使她减少了一倍，那就是说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低落了一倍。

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等差”（Balance的一种准确的尺度，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是环境与个体间的相互关系之一种准绳，这准绳能够规定环境内这一个体的地位，这准绳一有变化，更是表示社会内一切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起变化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224—225页

分析必须从生产力出发；社会各部分中间之无数的相互关系决不排除那根本的，最终的，极深刻的关系，即一切社会现象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影响于社会的原因之复杂性决不与社会发展之统一的规律性之存在相冲突；这是很明白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27页

然而不难看出，在这里的规律是一种次序颠倒的规律，就是：人口数目增加之可能性的本身也是依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即就是依技术发展的程度而决定的。人口数目之增加（多少是继续增加）就是社会制度之扩大和增长。没有扩大的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不能生活多量的人口的。反之，社会生活的基础如果缩小，便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人口数量的减少方面来。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产儿率之低落，产儿率之人工的节制，死亡与疾病之增加率，身体的过早劳动与平均寿命率之减退，——所有这些的说明，都是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同这一社会的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相离的。此外把人口的增长，想象成为一种纯粹生物的自然繁殖过程，这是绝对错误的。此种繁殖过程是与一切的社会条件相关连的，即与阶级的分界，这些阶级的地位，以及社会的经济形态等相关连的。而社会的形态及其构造——往后要解说的——这亦是依生产力发展之水平而定的。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在技术发展与人口运动，即人口数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现在人类的繁殖也与动物同一原始和单纯，那只有那头脑简单的人才会这样想象罢。譬如要想在社会内增加人口，那就常常需要扩大生产力。不然，如我们已所说的，那所增加的人口便将什么也没有食的，然而自另一方面，物质的幸福之增加不一定常能引起一切阶级之生殖的急速增长；譬如无产阶级的家庭常因生活条件困难而用人工去节制

小孩数目的生产，上流阶级的贵夫人因怕损坏其姿色而放弃作母亲，法兰西的农民因怕分散遗产而不愿有二个以上的小孩。所以，民族人口的运动是依着许多社会条件，即社会的形态及在社会中之各个阶级各个团体的地位而决定的

因此，关于人口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人口的增加是以社会生产力之发展为前提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形态，及各种阶级之不同的地位，都能引出人口运动之特殊的法则来。“抽象的（即离当前的形态而独的，一般的——布哈林着）人口法则只有对于植物和动物是存在的——那时在这一范围内历史上不与人类相抵触；凡是一切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法包含有牠特殊的，即有历史意义的人口法则”（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芝加哥版六九三页俄文版六七九页）。而历史的生产方法，即社会形态，又是为生产力之发展，即技术的发展所规定的。所以，在人口运动中沒有规律性的存在是一种决定的事实，而人口运动的自身却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发展（或衰退）的规律性所规定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第248—251页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把生产力看作解释一切（追根到底）的原因呢。关于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我们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主义者，亦包括在内）意见却极不一致……。有些人每每将这一问题归结到无益的“因素论”上去，并以生产关系（经济的因素）去代替生产力呢。还有一些人甚至往往提出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出来。就是普列汉诺夫在他“一元论的历史观”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不能令人满意。他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怎样解说呢？他例举两派流行的常相争执的思想来说：一派肯定地说：“人类的意志可以支配世界”，另一派则主张：“人类是为生活条件所创造的”，用我们的术语说来，就是上层建筑与基础的问题。但是上层建筑是否影响于基础呢？是影响的。基础又是否影响于上层建筑呢？也是影响的。普列汉诺夫他也承认在这样的设问之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末，究竟怎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依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以为这二种互相影响的东西乃是依靠第三种东西（生产力）之上的。他就是以这一点去解决全部的问题。

然而很容易看出，象这样不过把问题向前移动，并没有将问题解决。我们进一步试问，究竟实际上上层建筑和经济是不是反影响于生产力呢？也是影响的。那末，问题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发生出来了。只是如此，也就是如此。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8—9页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解答——应当如此：生产力之决定社会的发展，是因为生产力表现社会（一种特殊的现实的总和）与牠的环境之间关系……而环境与个体（制度）之间的关系归根结蒂是决定任何制度之一种因素。这就是变动的形态之一般辩证法规律之一。这也就是一个框子，在这框子以内发生各种力之分子的移

动，连结并解脱无数量相互影响和相互矛盾的结头。生产力虽然要受“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而变化，然而这些影响对于根本的事实绝对不能有所改变；社会与自然中间的相互关系，为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并社会生活过程中之一切变动所赖以随时改变形式的物质能力的数量，始终是一个决定其他一切的因素。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11—12页

近代世界经济，不单是一个商品经济，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此经济的各个部分间的对抗，进行于两个主要的领域内。第一是企业间的无秩序的相互关系的领域。第二是阶级社会之无秩序的构成的领域。换句话说，现在有“纯经济”的对抗与“社会的”对抗的两个领域。前者影响到后者，是很明了的事实。生产力的破坏与资本集中的过程，极度的激成阶级间的对抗。因此，设若这两个原因间一发生联络的时候，就惹起正个体制的破坏。而此破坏，即从正个体制中之（组织上）最簿弱的部分开始。这便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17—18页

I、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

……同样，我们要认清，我们现在是在说所谓一般的生产过剩，即是每种生产，或几乎每种生产都有过剩。这个事实，只要看各种工业都在其原有生产能力之下工作，即可知道。所以，现在的生产与消费之间，有很大的不相称，换句话说，我们已非常清楚看到最普遍的。每个人知道这之矛盾就是平常资本主义恐慌的根基。生产与消费的不相称，乃是生产与消费发展的方向或速度不同之故。设使生产增多而消费也增多，但倘若生产比消费增多得快，结果是生产过剩，或是生产并不增多而消费低减，结果还是生产过剩，再或者生产与消费都在低减，而消费比生产低减得更快，于是又有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寻常”恐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向上时，资本主义矛盾之爆发。恐慌解决了这个矛盾，解决之后，在比以前高一级的经济水平上，重演经济循环。所以这种恐慌爆发时，生产与消费间的不相称，是因为生产比消费增加得更快的缘故，换句话说，“寻常”恐慌的生产过剩，是上面所说的三种中之第一种。倘使我们翻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之全史，我们可以看见，市场（消费）是继续不断地在增大。因为消费与生产同时在增大，而消费时时落在生产后面，于是就有矛盾，结果就是恐慌。

布哈林：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55—56页

II、

在资本主义的初期，资本主义自然具有的各种矛盾，仅仅雏形；可是，这些矛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每一进步而发展而扩大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达到惊人的比率。

发展已到这个程度，生产力严厉的要求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皮膜必然地会要破裂。

金融资本时代，将妨碍着资本主义结构之适应的一切要素；尽量地表现出来。从前资本主义，还具着进步能力之作用的时候，资本主义与其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相同；其内部的缺点，得因前资本主义各种要素之显著的落后性及适应的不可能性而掩饰了一部分。伟大的生产，即怪物的机械军，毫不留情地击碎了手工业之贫弱的技术。这个痛苦的过程，就表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崩溃。他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各种“第三阶级”之存在，容许资本主义和平的扩大其势力，并且，安置于资本主义皮膜之内的经济发展的限度，也无发见的可能。所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的诸矛盾——即构成资本主义之“法则”的东西——最共通特征，只有在资本主义脱胎出来，不仅成为经济的社会生活之一般形态，而且成为经济关系之，世界的形态这样的经济发展的阶段之中，那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为世界资本主义之活动的时候，才能够最鲜明暴露出来。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见着资本主义内在的对抗以非常的活跃显了出来。在垂绝的痛苦中，浸浴于血的波涛之内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之灾难，就是资本制度之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终究要使资本主义制度炸裂飞散的。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年） 辛垦书店

1930年版 第300—302页

（第五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我们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现出来的一切矛盾性及由此矛盾性产生出来的一切敌视我们的倾向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无产阶级，是非常之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固然一般的发展是由进化的道路，但不能因此就说，那时尤其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没有十分重大的矛盾——矛盾是有的，在某种时期而且继续增长“，如果说这些矛盾将能够逐渐消灭直至成为共产主义社会，那我是就大体来说，就一般来说，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中，尤其在最初时期，某种矛盾性之发展仍然是可能的。

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1924）

新青年社1927年 第56—58页

工业的电气化，大发电所的建造，大交通网的创设等，会根本的一变都会与农村间的旧关系。这不独促进分散的小所有之转化为社会的劳动者，而且会使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合理化起来，根本的变换其形态。原始的野蛮的工具会被消灭起来，而代以最新的技术发明，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之根本的矛盾——工业与农业间之不平均的发展，会要消灭。这一矛盾的发生，是由于有地租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因为有这种存在，所以在战前，农产物的价格，才那样的腾贵。城市与农村间的对立，渐次的消灭，同时，一种特殊的“农村生活的蒙昧”，也会丧失。社会人们的生产力，会依照着最适当的自然条件（例如接近原料及燃料资源的样的条件）而被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方面。“工业之建设地点”的问题，到现在始脱离资本主义的障碍，而被解决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会以巨大的步骤，踏实的而且整齐的继续前进。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74—175页

同样以“原素”的重要性为观点来考察的也是错误的：比方说经济是重要的“原素”，政治或科学是不重要的“原素”，——象这样的提出问题，是可以引出许多误解出来的。当着没有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的经济便不能存在之时，那究竟怎样去说明“原素”之重要性呢？把重要性的问题看成为主要之问题者，那就完全等于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枪身与枪机究竟那个重要呢？左手同右手谁重要呢？钟表的发条和钟表的齿轮……究竟又谁算是最主要的呢？在某种场合里诚然可以说这一个比那一个重要些（譬如经济比起跳舞来无疑地是重要的），但在别一种场合里却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在一切个体内能存在的部分对于其整个之存在同样都是必需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20—521页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言论

我们已经知道，伟大的“上层建筑”是立基在社会之经济基础上的，按其内部之构造，即其“结构”是异常之复杂的。在这里有物质的物体（工具，器具等），有多种多样之人的组织，有严密的系统化的观念和形态之结合，有广漠的非系统化的思想和感情；最后还有“第二等的”意识形态，即科学之科学，艺术学等等。所以在精密的分析中迫得我们不能不制造一些限定的概念。

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之一切社会现象的形态的意思；包括在这当中的如社会心理，社会的政治组织及其所包含之一切物质部分（如大砲），人的组织（如官吏之等级制度），以至于语言和思想等类的现象都是。所以上层建筑乃是一个极概括的概念。

所谓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思想，感情或行为的“准则”（规范）之体系；所以包括在这里的是这类的现象，如科学之内容（然而譬如望远镜或化学实验室内部之人的组织是不属于此），艺术、风俗或道德之总和等。

至于所谓社会心理者乃是表现在社会，阶级，团体，职业等中之非系统的或少系统的感情，思想和心绪。现在我们便要进而考究这种社会的心理。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73—474页

有了上述的关于国家权力的介剖，于是我们可明了：国家权力，是具有位于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之性质的东西。国家权力，也和其他的“上层建筑”一样，也不

是单单一个罩在经济生活上面的玻璃盖子，而是巩固自身下层基础——生产基础——的一个能动的力量，一个能动的组织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第30—31页

上层建筑的体系，从政治经济学始一直到哲学终，都好像社会现象的链条中之一个必要的环，与当时社会之经济基础及其技术体系是相联系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17页

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乃是直接受社会的经济结构所规定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14页

然而，我们如果将一种上层建筑内部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的时候，就不难看出这些要素间之具体的依存关系：（一）互相依赖；（二）依赖别种上层建筑的要素；（三）这些要素又依赖于基础；（四）直接依赖基础；（五）直接依赖技术等等。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第18—19页

上层建筑决非无意义之“末事”。我们关于这一点曾引证过许多实例：如果资本主义的国家一经破坏，那时资本主义便成为不可能；如果毁灭近代的科学，那时大生产及其技术亦将随之而毁灭；如果人类的交际工具如语言和文字一经消灭，那时社会便不能存在，而亦必归于消灭。这就是说，认为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是否定一般的上层建筑以及特别的意识形态那种见解，简直是毫无意识的。在我们理论（历史唯物论之理论）的信仰者看来，问题决不于一般地否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计算它们有无存在的分量，或毫无意义等，而在于要解释它们。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19--520页

上层建筑的自身本是由经济的关系及决定此等关系之生产力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前者对于后者究竟有没有影响呢？经过上面的解说之后，明显地可以看出来是不能不有影响的。上层建筑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在某一定的条件之下亦可以成为制动机。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始终是能影响于经济基础及生产力之状态的。换一句话说，在各种各类的社会现象之间那相互影响之不断的过程是永久在进行着的。原因和结果的地位是相互转换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24—525页

因此，我在本书中首先将意识形态的概念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分开，并视上层建筑为一个更普遍更广泛的概念。意识形态乃是思想，感情，意象，规范等等的一种系统。而上层建筑则包含其他许多东西。在上层建筑之中，我们应分出三个主要的范围出来，所谓三个主要的范围如下：

(一) 上层建筑的技术，“劳动工具”（科学上实验的仪器，国家机关的房屋，大炮，算盘，图表等等；艺术界中之绘具，乐器等等。）

(二) 人与人中间的关系（科学协会，官厅机关，艺术工作室中之人的关系，音乐队中之人的配置。）

(三) 观念，意象，规范，感情等等的系统（意识形态）。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第16—17页。

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这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是由各种各样的互相联系的要素形成起来的。一般地说，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的阶级结构所规定的，所谓社会的阶级结构在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即社会的技术相关连的。它的要素之中有一些（军事技术）是直接联系于技术，另一些则联系于社会之阶级的性质（社会经济的）及上层建筑之自身的“技术”（军队组织），所以，上层建筑之一切要素，直接或间接，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基础上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25页

但是当我们考察这一社会之“政治的上层建筑”时，可以并且应当注意以下的事实。此种政治的上层建筑不限于一些人的机构，这是在上面所举的实例已经表述了的。政治的上层结构，犹如整个儿的社会一样，在它一方面也是由物人，观念，结合而成的。就拿国家机关来看罢。在这里我们看见它有它特殊的事务机关，有它特殊的教职制度（梯子式之人的组织），有它的系统化的观念（范规，法律，法令等，）等等。或如军队，这是国家之一部分。可是在军队内亦有它的技术（大炮、小枪、机关枪、军需），有它的依照特定编制之人的组织，有它灌注全军的特殊的“观念”（服从精神，军纪等）。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23—324页

按照一定的政治形态，构成近代国家的过程，是依经济的需要和必然而产生的。国家，发展于经济基础之上，不过是经济结合的表现。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1915年），辛垦书店，1930年版，第92页。

我们已经知道社会中最严重的矛盾就是各阶级中间的矛盾，所以它便“需要”一种

强有力的调节器于一定的时间内以抑制此种矛盾，而国家的权力及其命令，即所谓法律的规范，便是此种调节器。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29—330页

既然一切有益于人的结合之存在始终是与社会的经济结构相联系的，那末，由此凡一切种类的含有一定定量的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为社会的生产方法，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91页

社会发展的机能有两种最共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物，即语言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或半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往往以为这些东西的起原是与历史唯物论无关系的。例如考茨基（Kaufsky）便主张人类的思想能力差不多是全不变的。然而事实决非如此。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形态是异常之重要和实在的，在社会生活上所演的作用是很大的，其发生和发展都与其他许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没有什么例外。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63—464页

家族的组织，即夫妇及小孩的总和体，在人类的组织之中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此种性的组织之不断的变迁是有它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其基础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25页

家族关系的形态之变迁是依附于经济的条件，这在近代也可以寻找出来：只要将农民的家族，工人的家族及现代资本家的家族比较一下就明白了。农民的家族——这是一种坚固的结合，因为它是建立于直接生产的基础上的。没有BaBa（农家主妇）怎样呢？没有BaBa是不行的。”必须有BaBa去榨取牛乳，饲养猪豚，预备饭食，洗衣，扫屋，看获小孩等。家族的经济意义是异常之重大的，结婚便是为自己的经济而打算的：“家中必须有主妇。”从经济的观点上计算，家族中的成员；他是一个“工作者”又是一个“食饭者”。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比较固定的基础上之农民的家族，它自身便表示族长的坚固的特征，因为那时还没有受那城市的“腐败的”影响呢。至于工人的家族就不同了。在实际上他没有自己的经济。他的“家庭经济——纯粹是一种消费的，消费自己的工钱的经济。另一方面，城市中有酒饭店，食货店，洗衣店等，家庭经济便一般地没有那样的必要了。最后，大工业“破坏家族”，把无产者妇女都强迫到工厂工作去了。所有这些情状便形成一种别样的，动多而静少的家族关系之新形态。在大资产阶级因为有私有财产；所以维持家族，但是资产阶级的寄生主义增长了，并且在他当

中形成一整个儿的阶级层，妇女变成了物件，妖艳的物件，可是是没有脑经的玩意儿，消遣的工具，闺中的附属品。婚姻制度之各种形态（一夫一妻制，多妻制，多夫制等）也是与经济条件的条件相联系的。不要忽略，性交无论何时不只限于家庭之内的。譬如娼妓这类的现象，在远古时代早就有了。娼妓的形式及其范围也是与社会的经济相联系着的，我们只要将娼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的作用想象一下就十分明白了。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的压迫，娼妓，家族等是要随着私有制度之消灭而消灭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27—329页

当我们想要以科学的方法，来把握所谓过渡期经济这一极不固定的具体物的时候，最初我们就感觉着，理论经济学的以来诸概念，完全没有用处。于是，我们就遇着一很奇怪的矛盾。即是，经济学的范畴，在这一时期，事实上，依然是一种形态，使不断的变化着的经济真相，普遍化起来。但同时这些范畴，在这一时期，却完全不能穿鉴“表面现象”的底蕴。换言之，不能摆俗流的思想，不能在全体及发展状态中，去理解经济生活的过程。这个理由，又非常明白。原始的诸关系，以商品，价格、工资，利润等范畴为自身的观念的表现。这些关系，实际存在着，但同时又没有存在。没有存在着，但在某种意思来说，又在存在着。似存非存。它们好象旧斯拉夫人头脑内的永眠者的灵魂样，又好象是潜居于正统基督教堂中的异端的神灵样，营一种虚而实，实而虚的不可思议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根据着当时生产关系的实情而确立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特有的从来的武器，到现在生了效用。虽则如此，然而事实上，现在还有人不会消化的利用这些武器，来作真正能够理解经济生活体现象的手段。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212—213页

我们当研究转形期经济的时候，不应单只研究“纯粹”的形态及范畴。并且在这一时期中，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所以，这种研究（纯粹的形态及范畴的研究），尤其困难。现今一般的所谓科学，是在研究流动的“过程”而不是在研究固定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所以，在过渡期中，我们要拿生成的范畴，来代替实有的范畴。——这是很明了的。流动性、可变性、可动性——这些性质，很明显的是过渡期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的程度，比之于在“寻常”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固定的生产体系内的关系，照常的进行着），要大得多。因此，这里，就发生下列的问题：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应用的方法及思维范畴，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崩坏及开始建设新社会基础的时期。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210页

关于宗教、科学、艺术等 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言论

社会生活里我们看见有许多不相联系的非系统化的方面，在那里决不一定从头至尾都是一致的。

……社会的（亦可以说社会的“集体的”）心理与其意识形态之区分就在于系统化的程度。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75—476页

社会中之支配心理可以归纳为两种主要的成分：第一是一般的心理之特征，这种心理可以为社会中一切阶级所共有，因为不论那些阶级的地位如何不同，却都可以有其共同的特征；第二是支配阶级的心理；支配阶级“高视阔步”社会之中，坚决地予以全部社会生活之音调，使其他一切阶级服从他的影响。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79页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能有坚决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心理”，那是异常之明显的。至多只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的意义却决不可以过高夸张的。

所谓“国民性”，“民族精神”等说来也是相同的。可以说，在“原则上”同一民族中之各种阶级能有某几种共同特征之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甚至马克思在有一个地方对于人种的影响亦是承认的，他说：在同一的经济基础上——在其同一的主要条件上——因为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的情况，外界的自然环境，人种的关系，以及外界之活动的历史影响，等等，才能在其表现中显示出无数的变调和程度来。只有将这些经验所给予之情况加以分析之后才能理解那些变调和程度”（K. Marx: Das Kapital, III, S. 324）。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82—483页

我们已经说过，阶级的心理是为那在经济生活上即在经济上占有根本地位的诸阶级的生活条件之总和所规定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阶级的心理归到阶级的利害上去，这是常常易犯的错误。阶级的利害造成阶级斗争之主要的神经，这是绝对正确的，可是阶级心理还不止于此，还包含许多别的要素。……

所以一考察到阶级的心理，我们便知道这种现象亦是极其错综繁复的，决不可以仅

仅凭简单的利益去解释，然而必须常常拿那些阶级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的环境去说明。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486—489页

进世的科学，已经证明宗教的初形是奉已死的祖先为神明的。而这种初形，最发生于种族中最长的人，古代社会中最富的人，私有经济和有智识的人，得有统治社会中其余分子的时候。在人类历史的最初时期，当人民生活着象半人猿的群众，大家都是平等。但是后来有酋长出来统治其余的人了。那些最初受人尊敬的。尊敬这些人死后的灵魂，就是宗教的基础，而这些“神”“圣”就是最后来宗教中的上帝，这种上帝有处罚，赦免，审判和管辖之权。

布哈林：“共产党底计划”，（ ）汉口长江书店

1926年版，第90页。

所以我们知道，宗教的上层建筑是依人类之物质的生存条件而决定的。宗教的核心就是社会内之社会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制度之反映。这一核心为其他种种的观念群所围绕，可是那些观念的中轴便是已经被移植于不可知的世界之社会结构，并且是由各个阶级的主坊看来呈现各个不同的形态之社会结构。在这里可见“精神”实为社会的“物质”之一极能。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92页

我们已经知道，宗教的“本质”是建立在超自然力的，即不可思议的精神的信仰之上的（不论信仰一神教或多神教，粗笨的或精爽的——都是一样的）。这类“精神”，“灵魂”等等的概念，都是在“氏族的长老，或后来的族长发生的时候（在父族长与母族长之下，其本质都是相同的），才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即在分工已经使组织的劳动即管理的劳动等分离的时候，反映着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产生出来的，氏族的长老在生产上是一个一切积累的经验之保管者，组织，管理命令，设立劳动计划，规定行动的“创造的”原则，同时其他的人们则服从和执行命令，服从上面已定的计划，依照别人的意志去活动。此种生产关系造成了一种对于考察一切现象之模型，首先就是考察人类自身之模型。人被分裂成为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精神”——这是指挥“肉体”的。精神之高于肉体，犹之组织者与管理者之高于简单的执行者（亚理士多德曾把精神比之为主人，肉体比之为奴隶）。对于世界的其余一切也是依照此种与同样的模型而观察的，人们曾想象，以为每一物之幕后都有这一物的精神之存在；一切自然似乎都是有灵的（此种见解在科学上称之为“万物有灵论”“Animism”，这是由拉丁语“Anima（精神）或Animus（灵魂）而来的）。这样的观念既经出现，那便不可避免地要引到崇拜祖先，氏族的长老，管理者，组织者，以至于信仰宗教。祖先的“灵魂”或“精神”自然地被视为一种最有知识的，有经验的，有能力的精神，这精神能帮助一切，依靠这精神能完成

宇宙间一切。这便已经是宗教了。这就是说，宗教的起源就是由生产关系（即其中之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及依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制度之反映而发生的。宗教之对于整个世界的解释便是按照它对于社会内部生活的模型而解释的。后来一切宗教的历史，都证明宗教的形式是与生产及社会的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的；如果社会是由几个氏族间之相互的薄弱关系所形成的，每一氏族都各有其长老和酋长；——那时的宗教便采取多神教的形式；但是当联合的过程发生，中央的君主成立，那时在天上也就发现同样的现象，统治着天国的是唯一的上帝，如同地上之残忍的统一的皇帝一样；譬如在奴隶领有的商业共和国里（如纪元前五世纪之亚谢Athen，虽然胜利的城市——Pallios Athen——之女神已经从许多神中树立起来，而神的组织差不多全是依照共和制的。

在每一个“有秩序的”国家里都有一种整个的阶位式的官吏制度，在天国里也完全一样，圣者，天使等神都依其品格而定为各种各色的阶位与勳位。此外，在诸神中间也如地上之各官吏中间一样，发生了分工：这一个掌理军事（罗马神话中之Mars，基督正教中之征服者，总指挥官George，即Mischael元帅），另一个管理商业，第三个掌管农业等等。更奇妙的，譬如俄罗斯的天国中甚至有育马的“专门家”（Frol and laur）。无论什么地方，祇要有统治与服从关系之存在，便一定有反映此种关系的宗教之发生。在现实生活上发生了战争，压迫，暴动，依宗教的学说，在天界里也同样有战争，压迫，暴动；魔鬼、邪神，“混世魔王”——这就是敌方的首领之反映，他们在地上企图破坏国家而在界则企图消灭全能的上帝之帝权和颠覆一切天国之“现存制度”。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67—370页

许多思想单纯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宗教并不妨害了我的做共产主义者。我信奉神。同样又信奉共产主义。我对于神的信仰，并不妨害了我的为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而奋斗。

这种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宗教是和共产主义，不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不一致的。

共产主义者都须承认社会现象（人和人的关系、革命、战争等等）是依一定法则而发生了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法则是由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以空前的完全，而确立了。这门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以由我们伟大的教师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创始之史的唯物论为基础的。依这个理论来说，所谓社会的发展，决不是为超自然的力所左右的。保存宗教的信仰，乃是支配阶级的利益，宗教的偏见极有势力，就是非常贤明的人也是被迷惑的。

整个自然的变化，也同样是不得被何等超自然的力所左右的。人类在和自然的斗争中，获得了多大的成果。人类不是因了对于神的信仰和神的助力，而是由于抵抗这种信仰，在一切重大的实践上渐渐证明为无神论者的事实，以征服了自然力。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根据自然科学的成果”——这是和一切宗教的捏造处于最难以和解的敌对关系上——而进行一切自然现象的判断。

共产主义在实践上也是和宗教的信仰不能一致的。共产党的战术对于它的党员规定了一定的行动方针。一切宗教的戒律也同样地对于它的信者，命令一定的行动（例如基督

教的戒律——“要是有人打你的右颊，你便把左颊也向了他”）。共产主义战术的指令和宗教的戒律之间，在大体的场合，都有难以调和的对立。抛弃宗教的戒律，听从党的规则以行动的共产主义者，便不是信者。固信仰而且自名为共产主义者，但在宗教的名分上，违反了党的规则者，那便不是共产主义者。

布哈林：“社会主义大纲”

第110—111页

和宗教的斗争是有二方面的。共产主义者须严密的加以区别。第一是和对于民众的无知及其宗教的隶属具有物质上利益的宗教宣传之组织的权令相斗争，第二是在在勤劳大众的大多数间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之宗教的偏见相斗争。

布哈林：“社会主义大纲”

第111页

我们的纲领对于这一点说，“俄国共产党是由所谓只有在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实现大众之计划的，意识的活动，始能达到宗教偏见的完全死灭这一确信所指导的。”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宗教的宣传、对于神及一切超自然的信仰是驱迫大众的意识由超自然的见地说明社会生活的全部组织。资产阶级生产样式的各种关系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说来，都是极相宜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及物品的交换是并不意识地按照一定的计划而进行的。市场是支配了生产者。商品的生产得过剩与否是谁都不知道的。庞大而又复杂之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是怎样活动的？为什么突然发生了恐慌和失业？为什么商品的价格时而腾贵时而下落呢？这些问题，在生产者是不明白的。普通的工人因为不懂得说明社会变化的真因，遂求之于能够说明一切事物之“神的意志”。

反之，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及分配的领域对于勤劳者已经没有什么秘密的存在。一切工人不只尽力于他所担任之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且须参加全部生产计划的完成。在社会生产的全部机构中，已经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解的、意想以外的事物存在了。神秘的虚构和迷信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了。恰如亲自制造机子的家具匠，明白这个机子是怎样的做法，而且不必求请天国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的勤劳者，他们也明白协力起来怎样的制作什么东西。因此，单是以社会主义秩序的组织及其事实，便能给宗教以难以恢复的打击了，然而自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由完成了资本主义的绝灭之社会达到阶级对立及阶级斗争等一切痕迹完全消除之社会的过渡，会得引致一切宗教及一切迷信的自然死灭。

不过所有这些，我们都是说宗教之未来的灭亡，意思并不是说，不必有所作为，宗教就会死灭的。

在引致大众到政治斗争的路上的时，教会往往成了反革命的组织而出现，努力利用它们对于大众的势力，所以对于宗教偏见，必须进行特别激烈的斗争。由僧侣所拥护的正教，是努力和君主政治结成了同盟。对于这点，苏维埃权力已是尽力展开广泛的反宗教

宣传了。这件事由于举行了特别的讲演会，实施讨论，出版适当的文书版次而又确实在将播动宗教之一切权威的知识普及到了一般大众间始能成就。最近共和国各地所举行之“不朽”灵宇的公开是对着广泛的大众，暴露了一切宗教所依存之卑鄙的诈欺、成了宗教会相斗争的很好武器。

对于大众之宗教的迟纯性的斗争，不只须以一切精力不屈不挠来遂行，而且又须以必要的忍耐和注意来遂行。信心极深的大众对于伤害自己感情的一切事物，具有极易感觉的性质。压迫宗教的风俗、嘲笑礼拜物、强制大众赞成灭神论等，非但不足以促进对于宗教的斗争，反而使它变得迟滞了。教会虽受迫害，但在大众间因此获得更大的同情，使他们又想起已经忘却的宗教和民族的自由防卫之关系，而动员了一半已归死灭之意识形态的一切残滓。

布哈林：“社会主义大纲”

第118—120页

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科学就是将人的思想立成系统，组成秩序，整理之，洗刷之，除去其矛盾，将断片的知识制造成为整齐的科学的理论与体系。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422页

科学自身就是从实际中生产出来的。果真如此，那就十分明显，社会科学有阶级性。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实际，有自己的特殊任务，有自己的利益，因之，对于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资产阶级所首先注意的是：保获，巩固和扩大资本的统治。工人阶级则首先注意：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保证工人阶级的统治，改造全世界。不难知道，资产阶级的实际所要求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实际所要求的是另一种；资产阶级对于事物是一种见解，无产阶级对于事物是另一种见解；因之，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而无产阶级又必然地是另一种社会科学。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5页

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所以高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能深刻地广泛地去研究社会生活的现象，因为它能够推究未来，能够观察那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所不能观察的东西。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的权利说无产阶级的科学才是真理，并且要求大家来认识这个真理。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8页

艺术是“感性的社会化”之一种手段，或如托尔斯泰(Leo Tolstoi)所说的，艺术是“传染”人类情绪之一种手段(见何谓艺术?)——这是艺术之更正确的一种定义……。

究竟什么是艺术，现在算是明白了：艺术就是在形态上系统化了的—种感情。艺术的直接作用就是使这些感情社会化之—种手段，传染它们，普及它们于社会，这亦是很明白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422—423页

艺术在各种的仪态里，直接地或间接地或经过许多的中间锁链——从各方面——始终是受经济制度和社会技术的水平所规定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Ⅰ”（1921.9）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第438页

关于阶级、国家和革命问题的言论

什么叫做阶级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上述的解释中已经给了一个一般的答案。现在须得详细一点来分析一下。我们已前就知道，所谓社会的阶级就是在生产上演着同一作用的，即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别的人们立在同一关系之上的人的总和体，在这里这些关系亦同样表现于事物（劳动机关）之中。由此便发生一种情形，在生产物分配的过程中各阶级都被一样的收入源泉所结合，因为生产物分配的关系是依其生产关系而决定的。纺织工人与金属工人不能形成两个不同的阶级，而是一个阶级，因为按照他们对于别的人们（技师，资本家）之关系是立在同一关系之上的。同样，矿山主，炼瓦制造厂及柯尔谢特（Corset即一种如人之胸衣紧身裙，以鲸骨制之，西妇束之胸际使腰纤细也——译者）工厂之所有者都是隶属于一个阶级的范畴：因为他们当从事业时在事物的物理上怎样不同，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人之关系是立在同一（指挥的）关系上的，这关系亦是由事物（资本）中表现出来。

因此在社会阶级分类之基础上便横着—种生产关系。……

社会阶级（class）同等级（cast 这一字乃是门阀，或身分的意思，在这里为便于通俗起见被译为“等级”——译者）中间之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所谓阶级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在生产过程中依共同作用而结合之—种人的范畴，即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他参加者站在同一关系上之—种人的总和体。至于所谓等级的意义，这都是依法制的法律的社会制度而结合之—种人的集团。大地主——这是一个阶级。贵族——这是等级。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644—655页 649—650页

我们知道，如恩格斯所指示的，阶级自身便是由分工中，由社会向前发展在技术上必要之组织机能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25页

政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阶级之一部分，有时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政党却是阶级的头脑。所以将政党来对阶级对立，那是异常之荒谬的。劳动阶级的政党乃是最善于表现阶级利益之政党。阶级与政党之区别，犹之头脑与人体全部之区别一样。对立是不行的，犹之希望人之长命寿致，便不能将其头与身体割切离开是一样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716页

阶级斗争立足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利益冲突上面。这种利益根本上是不能调和的，有如狼与绵羊的利益不能调和一样。

大家容易明白，资本家的利益在乎使工人尽可能的长久做工，在乎给工人以尽可能的微少工资；工人的利益恰恰相反，乃在乎做最少的工作，得最大的工价。所以自从有了工人阶级，便就有了增加工资与缩短工时的斗争——这是不难明白的。

这个斗争从没有间断过也从没有完全停止过。但这个斗争也不限于要求增加几个铜元的工资。资本主义发展，到处使群众相信有结果资本主义本身的必要。工人开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54—55页

从大战刚刚告终，经济的情况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农村的经济就渐渐的成了商业的经济，农民渐渐与市场接近了。农村的经济愈发展，农民就愈有货物到市场去。由卖农产所得的钱，就可以购买他的必需品与非他自己所能够制造的货物。供给他们这些货物的机关，就是国家的工业机关。据这样看来，是在市场里，农民才与国家的工业生直接关系。而国家的工业是在工人阶级手里，所以农民在市场里才与工人直接的关系。农民是卖农产品的人，而买农产品的人差不多都是城市中人，尤其是工人。农民于农产，是卖者，工人于国家的工业出品，他又是卖者，农人又是买者。而在市场里，买者与卖者的利益总是冲突的。买者总是要物价愈便宜才愈有利益，卖者又总是以物价愈贵才愈有利益。在现在的时期——在经济的统一还未有实现以前，在经济组织还未有实现以前，在还没有把工业与农业合成为一事的时期——经济愈发展，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值问题，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因为于这价值的问题，农工两阶级的利益，有直接的冲突。也是因为这种利害的冲突，农工两阶级之间，就有不能避免的倾轧，于他们的联合战线是不无妨碍的。

布哈林：“社会主义之路”（1925年8月）

辛垦书店 1930年5月版 第65—66页

资本主义是一对抗的矛盾的体系。并且使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这一阶级对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表现出来。所以，资本主义的构造，是一种一元主义的对抗，或对抗的一元主义。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68—69页

并且农民本身的情况，彼此也就很不相同。有些是小康的农人，是放账的农人，是地主；他们自己不种田，请了多少长工与短工帮他们种，他们来分得这些人工作的（剩余价值）。有些是小地主，同他们一家人工作，所有的出产，仅仅只能敷衍他们一家人的日食。有些就是“耕农”，他们自己的田很少，不能够敷衍日食，在一年之中，不得不抽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卖给别人，得点薪资。这许多种类的人，大家都不分清楚，统称之曰“农民”。

布哈林：“社会主义之路”（1925年8月）

辛垦书店 1930年5月版 第22页

如果第一种倾向说：放松富农，仅此而已，拉林同志则陷入另一个极端。在他看来是怎样呢？他眼中没有了中农……拉林同志说：“资本主义关系”——一端是雇农等等，另一端是农业资产阶级。这很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这是否符合全部实际情况呢？这并不符合全部实际情况，因为拉林同志忘记了“中心人物”。他抓住两极，说全部问题就在于此。事情并不就在于此，看不见基本农民群众，只看到两端是不正确的。富农和富裕农民有多少？约3%，不超过3—4%。人们还说我们这里几乎有了农场。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不错，我们这里不久也会有农场的。但当我们决定全部政策时，我们不依据实际的比例，我们应当正确掌握农村群众所有各阶层的对比关系。在拉林眼中中农消失了，中农不见了，要白天打着灯笼到拉林同志的观念中去找这个中农。由此就产生他的特殊倾向，这乃是在农民的问题上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继续。这是在农民问题上由于认为中农消失而产生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旧政策的继续。总之，拉林同志的主张在于，中农隐而不见，一方面是富农，另一方面是无产者，而我们“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则在于，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势必引导我们走向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势必引向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即剥夺另一个阶级。这是从拉林同志的整个立场引伸出来的。如果昨天他想在我们面前开开玩笑说，那时苏维埃政权将十分强大，能够“一道指令”实现这次革命，要知道这话是不能讲的。我们并不能够“马上”强大到能以一道指令就消灭这个强大的阶层……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译）1925年

5月3日“真理报”

（见：“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 中国人民大学

是故所谓阶级斗争，就是阶级与阶级在行动中对抗的那种斗争。由此便发生底下极重要的一个原则“凡是阶级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但是实际上，当着被压迫阶级已经成为一种阶级的势力去反抗压迫阶级时，这是表示什么呢？这就是表示被压迫阶级正在挖掘“现存制度的基础”。而“现存制度”之权力的组织既是其指导阶级之国家组织，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之每一个行动客观上都是趋向于反对指导阶级之国家机关的，虽然参加被压迫阶级斗争的人起初是不觉悟的。因此每一个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是含着政治性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698—699页。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革命之第二个形势就是政治革命，即新兴阶级之夺取政权，在这里新兴阶级的革命心理变成了行动。被压迫阶级直接地与统治阶级的集中势力，即国家机关相冲突。为要消灭敌人的抵抗，在斗争的过程中新兴阶级必须多少去体解和破坏敌人的国家组织，由一部分旧的要素中及一部分新的要素中建立出自己的国家组织来。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和说明的，就是新阶级之“夺取政权”决不是并且不能够是一国家组织由这一只手到那一只手之单纯的移交。此种天真烂漫的谬误见解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内却是散布得极普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对于旧政权之摧毁与新组织之建立曾经特别说及过。这是异常明白的。实际上，国家的组织就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之最高表现，就是它的城垒，它的斗争的主要机关，它防御被压迫阶级之自卫的特殊武器。假使压迫阶级的特殊武器存在，被压迫阶级怎能消灭压迫阶级的抗拒呢？不摧毁这一敌人的势力，怎能够战胜敌人呢？异常之明显，二者之中只有一种可能：或者统治阶级的势力保留着，即其大体上不受伤害，那时按一般的法则说，革命是失败了；或者是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说统治势力（第一就是国家的组织）之解体 and 毁灭。但是国家政权的物质势力，其主要的表现既在于武装势力，即军队之中那就明显地破坏旧军队是一切破坏之前提。这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已经表示过了，这一革命曾摧毁了国王与地主的国家政权及他们的军队等，并造成了普利单之革命军和克伦威尔狄克推多，法兰西的革命也是如此，它消灭了国王的军队，并在新的基础上创造了革命的军队。最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革命也是同样的证明：这一革命粉碎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破坏了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建立从未曾有过的新国家模型和新式的革命军。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98—599页

为争取商品市场存亡的斗争——为争取各自的生产形式的隐然的斗争，这大概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所发生的城市与乡村关系的经济的环境。这一点是同城市现象

非常不同的一点。在城市方面，为争取经济型式的主要斗争，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时候，便同时告终了。在乡村方面，这一斗争，只能在对大资本家主义的胜利的观点上，才算终了。然而在同一的瞬间，这一斗争，复采取他种形式，再发出来。即是，这表现为两者——代表劳动的社会化的无产阶级之国家的计划，与代表分散的所有同市场要素的农民之放肆的投机及商品的无政府状态——间的斗争而再发起来。然而因为单纯的商品生产，不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以上述两倾向间的斗争，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间斗争的继续。虽则如此，然在农民的头脑中，却栖息着两个幽魂。而且，设若农民愈加贫困，便越发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所以，上述斗争，又是农民自身内部的斗争。斗争关系，愈加复杂。

布哈林：“转形间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44—145页

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家的权力。什么是国家的权力呢？要想答复这一问题，便必须问问自己：有阶级的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存在呢？如果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组织成的，那末，这些阶级各自有其不同的利害，这是很明白的这一些人占有一切，而别些人却一无所有；有一些人发命令，当指挥，把别人劳动的生产品统统据为己有；而别些人却只管服从，执行他人的命令，将自己亲手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统统奉送给他人。在生产与分配中之阶级的地位，就是他们存在的条件，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他们的“社会实质”，由此便引出一定的觉悟来。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世界上一切都是有一定的，无因之果是绝对没有的。各阶级之不同的地位规定他们不同的利害，不同的愿望，不同的斗争——有时是死活的斗争，——这是没有什么希奇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阶级的社会结构怎样才能达到平衡呢？在每一个场合里怎样不至于崩坏呢？如一个英国政治家所说的，在一个国里实际上存在有两个“国”（即两个阶级），象这样的社会究竟怎样才能生存呢？

然而我们知道，有阶级的社会确是存在的。就是说应当有一种平衡的附加条件，应当有一个团结阶级的圈儿，不给社会衰落，毁坏，终至于天裂，这样的圈儿便是国家。这是一种组织，这组织用无数的螺丝联系着整个儿的社会，并且将他放在自己的船鬚网里。但是这组织究竟从何处来的呢？很明白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非阶级的，其理由异常之简单：在阶级的社会里不能有超阶级的人。所以，在这里没有组织阶级以外的或超阶级的组织之材料，即没有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学者先生们所歌颂讚叹的材料。国家的组织完全是一个“统治阶级”的组织。

现在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在统治着呢？那在用他的强权，他的暴力，他思想的精神的机锁，及一切其他的机关来支配着其他阶级的国家权力，究竟是那一个社会阶级的组织呢？如果我们只要把我们在上面所说过的一切记忆住，对于这个问题是不难答复的。我们且把资本主义社会从实际上来想象看。在这里支配着生产的是资产阶级。譬如无产阶级能不能长期地在这里统治着国家呢？很明白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平衡的根本条件没有一个；或无产阶级自己手里握有生产的支配权，或资

产阶级手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这就等于说，包含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社会之存在，便应当有适合于其经济组织之国家组织；换句话说，社会的国家政治结构是依着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决定的。

我们还须注意一点。国家——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包括着整个儿的国土，统治着千百万的人民。这个组织需要许多军队，官仔，兵士，军官，立法家，法律家，国务员法官，将军等等。这个组织的本身内部包含着许多执事员，一个踏在一个的头上。这组织在它本身的构造上好象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生产中所有的一切。譬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生产中上层的指挥者是资产阶级；在国家也是如此，在工厂里充当经理的往往也是资本家自己；同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充当国务员的，即站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之最高位置的，也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军队中当高级军官的也是资产阶级；在生产里站在中等地位的是技师和工程师，即技术的知识阶级，同样在国家机关里也是这些知识阶级的分子占着中等官仔的地位，并且由此往往形成军队中的军官团。至于工人阶级却是充当下级的役员，兵士等。当然也有某种的例外。但是国家权力之一般的构造却是适应着社会的构造的。因为假定顷刻之间下级的职员搬到最上级，这却是表示，以前的阶级已经失掉了他的国家权力了。这种情形只有在那个时候，当着整要儿的社会出了平衡的轨道，即发生了革命，才有可能。可是此种革命，在生产上如果没有发生相当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由此我们知道，国家权力机关的本身是从经济的构造上反映出来的，即同一的阶级便是拥着同一的地位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14—318页

埃及，生产的支配者差不多就是国家的支配者，在那里站在生产和国家的头上的都是大地主。生产的最大部分就是大地主的国家之生产。在生产上之社会集团的作用，是同那国家之上级中级的官吏及其奴隶的地位恰相符合的（O. Neurath “Antik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erl. Zenlner 1909. s. 8）。“诚然，显贵者的家族就是大地主的家族，同时他们第一就是世袭的贵族（Max Weber, “Agrargeschichte”. Handw.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有时国家权力与在生产上之指挥的权力的联系达到奇异明确的表现。当十五世纪时佛罗莱斯（Florence）之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便是为美狄西（Medisi）之银号所统治着的，“美狄西的银号与佛罗莱斯的财库是完全一致的，美狄西的商号一经破产，佛罗莱斯的共和国也就随之崩溃了”（见波克罗夫斯基 Pokrofsky 所著之经济的唯物论，一九〇六年莫斯科出版，二七页）。当十八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统治着生产的是坐在农奴头上的地主；所以统治着国家的也是地主，即特别组织特权的贵族阶级。当着农民掀起所谓“蒲加乔夫 Pugachov 的暴动”时，代表贵族的女皇加德邻（Catherine）第二——她是当时国家权力之化身——便组织骑兵队去镇压“暴徒”，籍以表示她对于凯萨（Kazan）地主之忠诚。与法兰西爱好自由的哲学家亲密交际的加德邻也没有废止乌克兰（Ukraine）的农奴法；托尔斯泰曾痛快地将此种情形的关系描写出来：

伟大的国民，
你是他们的母亲，
应当给与以自由，
应当给与以自由。
她对他们说，

“Messieurs, Vous me Comblez”. (注一)

可是同时她却努力推广乌克兰的农奴制呢。

“注一” “主啊，充满着为以仁慈罢”

在现在的美国支配着一切生产的是财政资本，即银行家和一切托拉斯的组织者。国家的一切权力也属之于他们，凡是国会中之一切决议案都是预先经过资本家团的秘密室里协议过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 I” (1921年9月)

见：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318—321页

支配阶级的国家组织，所以不同于支配阶级的其他诸组织的根本特征，是在前者（国家组织）之具有一般性的一点。国家的组织，是阶级之最广泛的组织，在这中间，阶级的整个势力，集中起来，在这中间，一切机械力的压迫及强制手段之工具，集中起来。在这中间，支配阶级，不是以其阶级之小部分或小集团，而是以整个阶级全体，组织起来。所以，在这里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行动，只要是包括了一个整的阶级，必然至于带上“政治”的色彩。而这个时候的攻击目标，自然不是一个集团，而是此阶级的整个全体，因此，是此阶级的国家权力自身。

国家是某一集团人们的组织体。所以，国家不是人们对自然界之技术的表现的关系的表现，而是人们互相间之社会的表现的关系的表现。因此，若把国家的“本质”，在技术的组织上的定义中去追求，比如在“国家者，一个集中的装置之谓也”样的定义中去追求的时候，是完全错误的。何以说呢？因为一个集中之抽象的概念，可以拿一个全然正相反对的诸型式的社会关系为其前提之故。而此社会关系之型式怎样，又根本是问题的主要所在。“尼哥罗依然是尼哥罗。依然是黑色人种的人们。只有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才成为一种黑奴”（马克思）。生产手段，到无论什么地方，还是生产手段。这是一个技术上的概念。只有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生产手段方才变为资本。而且所以能够如此，是要在一定的社会的相互关系，开始表现于生产手段之中的时候。要具有这样全然特殊性质的关系，才能形成资本的“本质”。“资本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一种社会的关系”。（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有历史性的东西。他在此历史的被限制的性内，去探求一切现象之构成的特征。所以，根据马克思的见解说来，国家无论如何还是历史的范畴，而且很明显的是阶级社会的一个范畴。因此，国家之“本质的”意义，在在乎“国家此一集中之装置也”的一点，而在乎此集中的装置，具体的表现了阶级间之一定关系——尤其是支配、权力、压迫，及束缚的关系——的一点。阶级一消灭，阶级统治的最后形态——无产阶级专政一旦消灭，则这装置也就会同时消灭。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26—28页

所以也就无所谓国家的组织，也就没有特别组织的统治阶级，用强硬手段压迫仇敌阶级。一个人对于别的人，没有权力，没有管理。所有的管理，只是对于机械的管理；所有的权力，只是对于自然的权力。

布哈林，“共产党的计划”，（ ） 汉口长江书店

1926年版 第16页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十分正确的规定‘从资产阶级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期（这过渡时间，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的过程）在政治方面，便表现为旧国家机关的崩坏，旧国家机关的分散为各个构成部分。国家这个东西，决不是诸阶级所能互相授受的对象，而且决不是按照有产阶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亲族法律，所能承继的东西。

“无产阶级的夺取国家权力”，是要破坏有产阶级的国家系统而建设新的国家系统。当这个时候，崩坏之后的旧系统的诸种成分，一部分破坏起来，一部分则在新的组合之内，新形式的联结之内，再表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然而非常大多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则关于“夺取政权”一事，从来就抱着非常幼稚的观念，而且现在还是如此。他们说，只要把“头脑”（即“政府”）变更一下，其余的“整个机构”都可以原形无缺的夺取过来。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74—75页

…：国家是权力的组织，一阶级对付他阶级的支配组织。资产阶级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成为有闲者阶级，不帮助生产。压制反抗的被榨取者大众而拥护资本家的安静和幸福的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的呢？警察、宪兵、常备军、司法机关、及其一切国家的行政机关，全是人数很多的集中，但其中没有一个人生产东西的，就是一普得谷物，一阿亚新织品，或是一只针，也不生产的。这种组织都是牺牲了工人农民所作成的剩余生产物而发生了。这些剩余生产物，国家以直接税或间接税的形态来受取的。例如俄国沙皇政府，它的手中有三十亿以上——是从工人农民方面榨取得来的。租税收入中的小部分，使用铁路、船舶、桥、国营工坊等的建设上。

无产阶级国家是怎样的？在继续着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也是站在生产之上的机关。无产阶级国家诸机关的机能，不是创造新价值的劳动。反之，所有的国家机关是牺牲了工人和农民所作成的生产物而存在的。例如全部军事机构及赤卫军、管理机关、镇压反革命机关等。这些机关，和榨取者的国家相似的。可是，这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征。无产阶级国家的特征是把非生产的组织慢慢地转化为经济管理的组织。

布哈林，“社会主义大纲 第224页

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是资产阶级最大的和最有力的组织；同时还是最复杂的组织，具有无数部分，四面八方照顾周到。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就在保持、巩固和扩大对于工人

阶级的剥削。国家具有暴力的压迫和精神上的愚弄，以对付工人阶级；这些手段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机关。

从暴力的压迫中，首先必可看见军队、警察和宪兵、牢狱和法庭，及其辅助机关；间谍、侦探、破坏罢工者和雇用的刺客等等。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23页

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生产关系的本身总是极不变动的，极保守状态；因为这些生产关系正是一阶级之垄断经济支配权的表现，亦就是垄断的政治统治权之表现。象这种表现阶级的根本利益之躯壳，要被一个阶级维持到底，维持到最后的一步，在这时期中这一躯壳内部的变化，即不搅乱该社会的原则的基础之部分的变化，可以比较不苦痛地经过的。那全是自然的。由此，十分明显，没有什么“纯粹政治的”革命；一切革命都是社会的（即转换阶级的）革命；一切的社会革命都是政治革命。因为要想毁灭生产关系，不毁灭这些关系之政治的城垒是不行的，反之，如果破坏政治的权力，这就是说破坏在经济方面之阶级的统治，因为“政治就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

所以，革命的原因便是生产力和依统治的政治组织所巩固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此等生产关系既经障碍生产力之发展，假使社会是在向前发展，那就必须不可避免地要爆裂。假使它们不爆裂，那就一定要障碍生产力的发展，那时全部社会不是陷入停顿状态，便是退步，即要经过一个衰落时期。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 第573、574—575页

现在我们特别提出一点来，依马克思的意见，革命的原因决不是如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所主张的是经济和法律间的冲突而是生产力和“经济”中间之冲突。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65页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人造的。如果说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中间之冲突就是表现生产机关，即死的机器，物体等向人之进攻，这样的假定是奇异而且可笑的。但是事体究竟是如何呢？很明显的，事体的究竟就是：生产的发展将人类置于露骨的对立关系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中间的冲突在人同人中间的冲突，即阶级同阶级中间的冲突中表现出来。至于究竟这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们算是已经明白了。因为劳动者中间之共同劳动的关系乃是表现于活的人之中，即表现于含有自己利害，倾向，社会力量及权力的无产阶级之中。反之，阻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统治基础的亦是由人的当中，即资本家阶级的当中表现出来。全部的冲突都是从严酷的阶级斗争当中，即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的革命斗争当中表演出来的。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590—591页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恐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在发达，而资本主义因有了国家的组织，这个发达就限制，因之，就有矛盾，战争就是这个矛盾之表现。资本主义欲以刀兵解决这个矛盾，这样的办法，就象一切恐慌一样，毁坏了生产力。所以战争也是一个“恐慌”，但若说资本主义的寻常恐慌与战争是一样的东西，那么这句话是大荒唐。因为战争的恐慌，在质的方面，与寻常恐慌大不相同。

布哈林：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54页

现在我们试来总括地说一遍。革命发展之出发点，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之平衡的破坏。这就是表现生产关系各个部分中间之平衡的破坏。此种平衡的破坏在它必然的趋势上一定要引起阶级与阶级中间之平衡的破坏，在这里首先表露出来的便是国内和平的心理之破坏。其次就是政治平衡之激烈的破坏及其在新基础上之恢复，再其次就是经济构造的平衡之激烈的破坏及其在新基础上之恢复，而最后便是建立新的技术基础。如此，社会便开始在新的生活基础上生活着，社会之一切基本的生活机能便著一套异样的历史的衣裳。

布哈林：“唯物史观”（第三卷）（1921年9月）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30年版 第610页

所谓革命过程的发展“阶段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答复这一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许多荒谬绝伦的观念，都是由于错认了种种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合法的顺序，才发生出来之故。

德国的一位技术家韩尔曼·倍克，“反对”马克思，而认定：社会的破坏（即革命），全然不能受经济的条件的支配，何以如此呢？因为，比方在“反军国主义”革命的实例中，“本来应当发生在发展过程的末尾的权力移动，却发生在这一过程的开端”之故。然而我们可以容易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法则，横躺在革命过程的里面。即是：照历史讲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首先发生冲突；而这一冲突，在主观的阶级方面，便表现为“无产阶级的厥起”。换言之，这一冲突，依照着一定的方法，确定阶级意志。原动力是由经济方面，较正确的说来，是由生产力与经济的外壳间的冲突，发生出来的。更进一步，思想方面，也就开始发生一破坏的急剧的“反作用”，到生产力方面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平衡条件，便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出来。这一辩证法过程，须通过下述的诸阶段。

一、思想的革命。经济的条件，打破举国一致的思想。劳动阶级渐渐觉悟，自身是必须掌握政权的阶级。“工人帝国主义”的观念的体系，被破坏净尽。于是，生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生出准备将来活动的“工作计划”的观念，来代替那一观念。

二、政治的革命。思想的革命，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国内战争及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的装置，国家机构之巨大的整个组织，都被破坏。代此而起的，

便是一个新的体系，无产阶级的府权制度，苏维埃共和制度。

三、经济的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为一国家权力。他们的力量，集中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内。而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便成为经济革命的推进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破坏起来。旧的经济构造，失去存在。从来保持下来的一切联结关系，都被破坏（“掠夺者反被掠夺”）。旧制度中的诸种要素，被吸收到新的组织之内。在长期的而且艰难的过程中，生出新型式的生产关系。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便建立起来。

四、技术的革命。因社会构造的改组而得到相对的社会平衡，因此可以确保生产力的正当的发挥作用——虽然，在当初，只能在狭小的范围以内。继此而起的阶段，便是技术方法的革命。即是，生产力的增大，合理化的社会的技术的变更及迅速的改良。

我们在论述这种革命发展的诸阶段的时候，应当注意各个历史的阶段的重要点，注意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及其中间的典型的特性。这是不待言的。上述的法则性，虽然依照着演绎法而推论出来的。然而在上述的范围之内，这一法则性，又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诸经验，获得了它最初的经验的确实性。若误认了这些时期的排列顺序，则在理论上一定生出乖违的离奇的结论。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101—104页

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的方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夺取政权有甚么意义呢？有许多人以为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好象从这边袋里拿个皮球放在那边袋里，那样容易。

这样的观察是不实在的，……。

……夺取政权并不是夺取旧有的组织，而是创造新的组织——在斗争中胜利的阶级的组织。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79—80页。

革命的一切的实际的损失，归结起来，是再生产过程的缩小及生产力的低减。这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下列诸项。

一、生产要素之物理的消灭。属于此项的，有生产手段（工场、机构、铁道、器具、家畜等）的消灭。在国内战争及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间的阶级战争过程中，有人命——工人等——的消灭。因为不好的处置，怠工，及某一部分恢复工作的迟延而发生的机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消灭及损伤。技术的精神劳动者的消灭（在国内战争中，或根据混乱之一般的结果等等）。

在这里很明白的是，一方面，生产之物质的材料的要素的消灭；他方面，生产之人的要素的消灭。

二、生产要素之品质的低下。属于此类的有机械及一般的生产手段的消耗，劳动阶级之（肉体的）疲弊，技术的精神劳动者之劳动力是品质低下，生产手段及劳动力的“临时的”补缺（妇人、非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分子的增员等等）

三、生产要素间的联结的断绝。属于此项的，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劳动组织

的瓦解，社会的分裂，一切平衡的破坏及随之而发生的再生产过程之一时的停止。——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详述过了。此外，都市及农村间的断绝联络，国家间的关系的崩坏，也属于此。在这种瓦解的过程中；不独一般的劳动配置中之人的要素，实际上脱出生产的圈子以外，即物质的材料的部分，也溢出生产圈外。设若机械，机械的“体系”，整个工场“停止活动”的时候，那末这些东西，都等于没有。在这个时候，生产力在物理上固然没有消灭，但已变为潜势力的生产力。它虽然保有其物质的存在，但它已脱出了生产过程之外。

生产诸要素间的断绝联络，是过渡期中生产力减退的主要原因。这个同社会构造的变化，互相结合着，而实际上是不能与它分离的东西。这在这一构造的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出来，所以，它应当是理论的研究的中心点。此外，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的损失，例如工人阶级最初对于生产诸要素的处置的不熟练，建设期的“生蔬”，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能力，都属于这一项目。

四、改编生产力时候的不生产的消费。属于此类者，第一是对于国内战争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战争的一切需要的供给。革命过程一发展到世界革命的过程，同时，国内战争也转化为阶级战争，而履行这一阶级战争的，在无产阶级方面，便是正式的“红军”。若把再生产的下一次的循环作标准，则这一阶级战争的损失，很明白的同其余一切战争的损失，一样的要惹起经济的疲惫。正因为在新的基础之上，发生社会构造上的组织化的过程，所以，才发生阶级战争。但是，消极的扩张再生产过程所惹起的生产力的减退，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也继续进行。这一战争，不独需要着物质的材料的资源，而且需要最良的人的材料，换句话说，需要对于工人们的行政者及组织者。

我们可以容易明了，上述一切项目，归结起来，不外是再生产过程的缩小、损伤、停止，某时候的全身不随，及随之而发生的生产力的低下。欲“否认”这种事实，便等于欲“否认”革命的自身，一样的不成话。但现在的问题，便是：这一生产力低下之机能的意義，究竟在那里呢？代表资产阶级的近视眼的思想家，同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不同点，不是在一方面“主张”这一事实而他方面否认这一事实的一点，而是在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拿静学的方法来理解这些现象的一点。然而唯一的正当的（因此，一般所通用的）方法，是从转形过程的观点来观察生产力之一时的低落，换言之，不单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下一次循环为标准而下观察，而从整个历史的规模的广泛的立场，来下观察。

既然生产力的减退的过程，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直接的消灭的时候，那末，这一过程所程过痛苦的程度，自然同战时中生产力的低下程度，相行并进。根据这种原因而发生的生产力的减退，同生产力之“革命的”低下相结合着。——在社会转形的过程中，战争同革命，互相融合来破坏资本主义的体系。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64—168页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其他一切的革命，一样的惹起生产力的减退……在夺取政权的斗争及国内战争的过程中，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中，生产力的

曲线，不断的向下低落，然而同时各种组织形态，也生长起来。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 第80—81页

这些学说的要点可以这样说，在社会革命的时期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破坏了，新的专政——“反德诺克拉西的”同时又是无产阶级德诺克拉西的国家——开始创立起来，这是十分新奇的和特别的政权形式，这政权往后便开始毁灭。考茨基就绝不是这样说，考茨基和一切修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于这一点，都解释说，国家政权从这一阶级手里过渡到别一阶级手里，好象一架机器从这一阶级手里过渡到别一阶级手里一样，用不着这一新阶级把一切螺絲拆开，然后依新形式装置的。从这种论调，使逻辑的一贯的产生战时的保护祖国的政策。我们于战争开始时，常在社会爱国派会议上听见这种论断，这种异常幼稚的论断成了保护祖国派的基础，有不少的成效。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既然明天要归到我们的手里，自然我们不应该要破坏它，而要保护它。这样，我们的任务便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不同了。既然不该破坏国家，因为它明天将到我们手里，那么我们便不能破坏军队，因为这是组成国家的一部分，也不能破坏任何的国家纪律及其他。

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1924）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10—11页

社会民主党对于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其全般意见主要的是下列三种：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治的经济的组织之日增强固，是将来资本主义兴盛的现象；第二，资本主义转入新的发展局面，资本主义生产已消灭其无政府状态，不仅单独一国的经济如此，世界经济亦然，这些理论家以为如此就可以形成国际政治组织（国际联盟）用这个组织以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因争夺而起战争；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势力正在结合，将来可以和平地或几乎和平地“渐入社会主义”免去革命的震撼，免去无产阶级专政。如此，我们可以看清他们思想之全盘，这种思想，已完成投降资产阶级的观念，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
1927年2月版 第3页

国内战争发展去，这战争的新形式又发现出来。当无产阶级在所有各国都被压迫的时候，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政权的暴动形式。但若是在某一个国家，无产阶级得了胜利，且掌握了政权，那么会发生什么出来呢？这时候，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国家权力，本阶级的军队，全部政权的机关，任其使用。这时候，无产阶级与那组织阴谋和暴动以陷害无产阶级的一切资产阶级作战。但这时，无产阶级是以国家的资格，向资产阶级国家作战的。此时，国内战争取得新的形式，真正的阶级战争的形式——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作战的形式。此时工人不单暴动起来反抗资产阶级，而且工人国家向资本的帝国主义国家作正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作用，不是为抢夺他人，而是为

共产主义的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专政。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144页

国内战争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相反的各阶级，手拿武器对抗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分成两部分的，实质上，至少也应说是两个社会——这种状况在平时是隐藏不露的。为甚么？因为奴隶安安静静服从他们的主人。到国内战争时，这种安静就告终了，而社会上被压迫的一部分遂暴动起来反抗压迫的一部分。在这些条件之中，自然各阶级间是绝没有“共同和平生活”之可能的。军队分成贵族资产阶级和有錢的知识分子等的自卫军和工人农民的红军。制造家和工人共聚一堂的宪法会议，无论取那种形式，总是不能存在的：当他们在街上互相枪杀的时候，他们怎样能够“安安静静”列席于同一宪法会议中呢？在国内战争中是这一整个阶级站起来反对另一整个阶级的。所以国内战争只能由一阶级完全战胜别一阶级才可以了结，而决不能以妥协调解而终了。……。

确定战胜敌人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世界的国内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139—140页

国内战争是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爆发为革命的阶级斗争。各派资产阶级中间为瓜分世界和重新分配世界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是服于资本的奴隶而实现的。然而这个战争，给工人们以过重的负担，使阶级斗争不得不变成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国内战争。这个战争，马克思即称为唯一正义的战争。

我们十分明显看见，资本主义要引起国内战争，资产阶级国家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要变成阶级间的战争。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第136页

在民族问题上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要反对我们的主要沙文主义，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同志在这里说的完全对，问题的十分之九在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只有其余一部分是在于地方沙文主义，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如果我们在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问题上不确定一条真正的路线，那末这种不正确的政策就会象链条一样反映到一系列的地方沙文主义上面。只要我们打击了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环节，即最主要，最基本和最危险的环节，我们就会因而打击到地方沙文主义的中间环节直到最低级环节。问题就在这里。这里甚至不能采用各民族平等的观点，列宁同志已不止一次地证明，这一点。相反的，我们应当说，作为以往大国民族的我们必须抛弃民族主义的想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得到首先是被压迫民族方面的真正信任。

布哈林：“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3年4月）

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要说，把问题这样解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却要说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不曾说无论那个国家，不管它的国际环境及历史的时代怎样，一定要渡过别国新走过的各阶级。我们大家知道，马克思曾以为，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俄国可以有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却与这相反，（即俄国终于有资本主义发展），所以相反的缘故，是因为俄国的生产制度从封建主义走入资本主义之时，欧洲各国还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可能性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说，倘然国际情形的发展与平常十分不同，或不照平常的路发展，一个刚在走入资本主义阶级的国家，不能用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在这种发展的方式中，资本主的趋势是被压制的。现在，这与平常十分不同的国际情形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经过世界战争与许多革命而日益削弱，革命的大中心组织——苏联——之存在，中国在地理上与苏联接近，而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中心离得远。列宁的意见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各农业国可以“避免”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当然是指发展的主要情形，而不是说整个的、简单的、绝对的没有矛盾的发展），这个意见，第一个就可应用于中国。倘使在中国不能应用，还可以应用到那个别的国家呢？在历史的转点上提出这样重要的问题，而用刻版的眼光去看他，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从我们自己的经验里我们知道，倘使人人都象孟什维克一样，用刻版的眼光去观察问题，则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要因此而受多少损失啊。上面两种环境——资本主义恐慌与苏联之无产阶级专政——警告我们勿用刻版的眼光看现在的问题。中国国内的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薄弱，农人非之，多，手工业与小商人占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不十分多，但代表在政治上有重大使命的强固势力，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声浪非常之高，以致有时资产阶级也会与群众在一路上跑，这个现象在国民党上的政治上表现出来。

中国革命，从他的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关系看来，可仍有两条出路。现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是一定要完结的了。它的地位已经动摇，而且反对它的势力，比它本身高明万倍。但是中国革命的将来怎样呢？中国革命的将来，有两条可走的路，这两条路是大不相同的。第一条路是中国与外国资产阶级协调及联合，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在侵略行为失败之后，将以经济的影响及与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结合为手段，而掌握中国之一切发展。第二条路是中国与无产阶级专政之苏联及西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些人能够破坏一切资产阶级压迫中国革命的阴谋。倘若中国走条第一路，那么在封建制度崩坏之后，在一切因为内战外债而起的紊乱都归消灭之后，统一的中国就可以开始“近随”欧洲，以平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而发展。结果就是中国民众之更形穷困，农民与手工业者，因大资本之兴起而入于破产。经济地位优越的外国资本主义，仍可得其大利，虽然他取的方式或者不象现在那样贪婪残酷。第二条路，可使中国借世界工人的帮助而独立的发展。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延长民众——在其间，无产阶级有很重要地位的——专政。此外还可以有个很特别的发展方式，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在工人阶级影响之下，与无产

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关系，而更有若干国家工厂，铁路与银行的——可以减轻农民的苛税，渐渐增进国家的幸福，直到苏联的工业化与西欧革命之胜利能在整个经济上给以有益的帮助，而使他依靠社会主义的路发展。这条路当然不是完全平坦而没有一点矛盾的。不用说，一路上处处要发生资本主义倾向的。但是，倘能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减至极微，则取这个方式，不是全不可能之事，因为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是非常薄弱的。当然共产党的政策必定是争发展的趋向的政策。但就在这件事上，他们将遇到最重大的难关。第一件事就是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保证这个胜利的就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个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并不证实国民党中派的特别理论——戴季陶发明的这个理论，说革命没有阶级，没有阶级专政，而以各种“良知”代替了各阶级力量。照了这个理论，世界上应该论有“良知的”领袖，“良知”比较稍差的少领袖，以及“良知”更差的群众眼随着这些领袖们，但是没有阶级。戴季陶把合于一阶级的理论用之于全社会，他把社会当作一个没有阶级的。这个理论的来源，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而带些欧洲事实论

Positivist 的色彩的。现在这个理论已在实施，结果，“最良”知的领袖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亦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此地我们不能很精细的来分析这些理论，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共产党人在人类还有历史的时期内，不能幻想阶级斗争的消灭。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在共产党方面，是根据各阶级势力的鉴别的。共产党根据了这个鉴别，因而一定要在现时拥护这个统一的国民联合战线。但是，要得对帝国主义胜利，只有作到中国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尤其农民——加入斗争。所以中国革命政策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域内改良土地制度，在别的地方则要组织农民，拥护与增进农民的要求。最困难的，是中国的一切地主，不论大小，都与商业资本有关系的，所以只要土地制度发生扰乱，在国民革命统一联合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就因此而动摇起来。另一方面，预交了许多年赋税的农民，他们受过许多军阀内战的痛苦，他们之中有许多流为游民强盗乞丐，若不能从革命得到若干经济上的救济，是不能走入革命的轨道的。

所以，共产党在目前阶级中以及走向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形（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形）的时候，其任务是：拥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同时致力于解决土地与农民的问题而引导一切中国的民众，坚决的加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142—147页

资本主义衰落的第三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大革命。在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世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都在积极地从事寻找市场，中国的逐渐脱离外国资本影响，乃资本主义统治的当头喝棒。我们要记得，中国大生产的大部分，是属于外国资本的。海关和各种专利品（如盐），都全在外人掌握中，纳税的事，也有大部受他们管理。英日美等国，都拚命在中国投资。中国有极稠密的人口，达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是投资与锁制品的最大的未辟的市场。中国同时又是供给原料的巨源，所以，中国是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最重要的聚点。中国革命对于其他附庸的殖民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直接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中国革命渐成为东方殖民地觉悟群众的中心。南洋群

岛已淹没在革命空气之中，其中几处已爆发反对外国资本的公开内战。英国对印度的和平政策，的确奏些效验。但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势必影响到印度，而印度的工业化，将使其产业工人走上革命的前线。这种情形，使革命的中国之都城——广州——成为亚洲殖民地革命的“赤色莫斯科”。

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列宁曾暗示，觉悟的东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的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最有力的同盟军。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整个命运，定于中国革命之是否与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一直继续其友谊的联合，与外国资本主义之是否能攫取中国经济政治大权。外国资本主义是不断地在尝试作这件事，他们或者直接帮助反革命军阀摧残革命势力，或者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若干利益，民富原的外国资本家团结指挥之下，使中国依了资本主义的路而发展。国际资产阶级所最害的，是下在奋战的西欧无产阶级群众，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以及中国工人农人，三大势力的大联合，这个庞巨的力量，可以保证国际革命之成功。我们在观察国际情形时，不可以把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作一件独立的东西。这是历史大转变过程中的一部分；长期世界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为此故，中国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隐定的致命伤。

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 1927年

第43—45页

我们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的民主呢？从保证党免除党机关官行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现象这一角度出发。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具体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儒子才不懂得这个道理），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同时这个制度，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党内民主制度也就应当保证这两项任务的结合。如果破坏了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机关官行主义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过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那我又认为自己有权认为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平衡的事实。我要再次提到我在这里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并非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的一大段讲演词，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对于较不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4年5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85页

党的舆论必然会在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中形成起来。使这个过程只局限于机构内部，然后把现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教给全党，这就是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软弱无力。让全党都来参加决议的拟订工作——这就是欢迎临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还有转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派别组织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在党内“风平浪静”制度和党的派别分裂制度之间难道就没有实行党的路线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线是有的，党的领导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转变关头，都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找出党的路线来。中央的决议坦率地写道，党内的官行主义制度是派别集团形式的原因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针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丝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别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就蕴藏有成立临时性或长期性小集团可能的这种争论的爆发（对这一点详作不知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诚诚恳恳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闭关自守和派别活动的道路。“可是，派别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精神辩护吗？”——我们听到官行主义高明人士发出这种呼声。真的吗？但是，第一，我们加了着重点的整个句子都是确切地从中央决议中摘录下来的。第二，从什么时候起，解释忽然等于辩护了呢？说脓包是血液循环不良的结果，是氧气不足的结果，这决不是替脓包“辩护”和承认脓包是身体机构中正常的组成部分。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剖开和清毒，除此而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到新鲜空气中的氧气。但是，糟糕的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主张党机构实行旧方针的一派人物却坚信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说的官行主义是派别活动原因之一的那一部份决议是错误的。如果“旧方针拥护者”没有把这种意见说出口来，那只是出于形式，正如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充满着作为官行主义思想底细的形式主义精神一样。

不错，派别组织是我们条件下最大的恶行，而小集团——那怕是临时性小集团——又会转变成派别。但是，象经验所证明的，为了使小集团和派别无法产生，只宣布它们是恶行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切实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而且每一次都要适应具体环境。

托洛斯基：“新方针（二）”（1923年12月）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64—166页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们的错误而形成的旧方针，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的对立有日益加深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固执地保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蜕化是在党的两极上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以及学生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即各种小集团和派别。象“工人集团派

这种小集团之所以具有预兆的意义，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

执政阶级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国家机构、合作社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人化，按其实质说来，就是削弱党的基本工厂支部并使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出身的行政干部在党内大量增加。这就是事物的矛盾。只有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健康地活跃工厂生活和经常地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这种矛盾。至于这个主要过程实现的速度如何，它将经历那些来潮和退落，目前还很难预察。不言而喻，即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也必须尽力吸收更多的产业工人入党。但是，要大大改变党的成分，使工厂支部大约占全党三分之二，这是不能很快做到的，是只有在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估计到最有经验和最积极的党员——当然，其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还有很长一段时期要在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和党机关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有危险，将成为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

托洛斯基：“新方针（三）”（1923年12）

见：“苏联托洛斯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第一册

人民大学 1958年版 第175—177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言论

为着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应该把所有的政权和势力都掌握在手理。若没有这种势力在手理，若暂时没有变成统治阶级，则无产阶级必不能推翻旧的世界。没有争斗，资产阶级自然不肯让出自己的位置。在资产阶级方面看来，共产主义实现，自己旧有的优越地位便失却了，吸取工人血汗的‘自由’和享用利润、利息和租金种种权利也便失却了。因此，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造，便碰着剥削者方面的最猛烈的抗争。因此，工人政权的任务，便在于不顾惜地压服这种抗争。这种抗争一定是很强大的，因此工人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需要这种专政为剥夺资产阶级的自由，为束缚资产阶级的手足，如制止资产阶级向革命的无产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的抗争力愈大，愈加调动其势力，愈有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更严厉地更残酷地对待之，到极端的状况时，甚至采用恐怖手段亦所不惜。这只有剥削者完全被压服下去，他们的抗争力消灭了，他们再没有妨害工人阶级的可能了，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逐渐缓和下来，到后来旧时的资产阶级逐渐与无产阶级混合，工人的国家亦将逐渐消灭，而全社会遂自然会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新青年社1926年版，第75—79页。

所以对于旧资本家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压，是一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强压，是这

一阶级对于它所欲强压的对象所实行的阶级斗争。至于对于非榨取的农民大众的无产阶级方面的强压，则只在这种农民是私有财产和投机者的时候，才是一种阶级斗争。设若这种时候农民，是勤劳者而不是榨取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那末，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强压，是要把他们结合到工人的组织，是要教育他们及引诱他们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至于对于无产阶级自身的强制手段，是无产阶级对自身所施行的一种组织方法，换言之，是以强迫手段促进自身组织化的方法。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第250—251页

当各国无产阶级互相孤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获得胜利。所以，在斗争的进程中，凡是已经确定的一切苏维埃共和国，都非互相结合，融合及缔结同盟不可。即就资本家阶级方面来说，在过渡期中，世界的同盟，客观上也是必要的。即从经济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说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过渡机的希望危。而且这一同盟，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无产阶级这种理由，他们才合首建立什么“国际联盟”。但是，既已开始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瓦解，它的大规模的解体，及所发生的许多倾轧，都极端的激成分散的倾向，所以，资本家阶级不能不遭遇沉舟的危险。瓦解的要素，压碎了资本家阶级的组织上的理性。他方面，无产阶级的最重要问题，是在经济上及政治上的统一。而且无产阶级的部分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既然是在克除瓦解状态，那末，客观上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国家的体制总和起来。世界经济之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一变更其形态，无产阶级诸国家及其同盟，一化为不世界经济的重心，于是正个世界经济也随之而一变其面目，在旧殖民地及落后的农业国家内，固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但它们还是能够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共和国，经济的结合起来。他们也大概和社会主义国家农民经济以已被编入社会主义体制样，渐次的被编入社会主义体制之内。

无产阶级的世界专政，这样的渐次成长起来。随着这一成长，资产阶级的包括，渐次的减小。而残留着最后的资产阶级的结合体，将同其一切的组织，消灭无遗。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第268—269页

当一生产制度代替他一生产制度时期，革命的权力，是一种助产妇。必须拿这一革命的权力，来打破社会发展的“桎梏”。换言之，一方面，必须拿这种权力，来打破反革命的“集中的力量”的旧形态，——旧国家及旧形式的生产关系。而他方面这一革命的权力，必须成为经济的变革之原动力而作用起来，造出新形态的“集中的力量”——新阶级的国家，来变更社会的经济的构造，而积极的促进新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如此这般，权力一方面尽着破坏的动力的任务，他方面又是一种结合，组织，建设的力量。实在的说来，不外乎是“经济力量”的这一“经济外面”的力量，越发大的时候，则过渡期间的“损失”，也就随之而愈小，（自然是要预想他种类条件没有变动）这一过渡期间也就随之而愈缩短，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社会平衡也随之而愈早开始，生产力的曲线也

就跟着急速的上升。这种力量，并不是什么超经验界的神秘的力量，而只是一种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它的社会的实力。所以，这种力量的伟大程度，是专要靠这一阶级的组织化的程度而被决定的。而革命阶级的组织，最强大的时候便是它自身国家权力的组织。根据着这个理由而言，国家权力，实是“社会之集聚的及组织的力量”。根据这个理由而言，革命的国家权力；是经济的变革之最有力的桿杆。

哈布林，转形期经济学

华乐图书公司1980年第236—237页

考茨基，鲍易尔及其他的诸位先生们，一说到权力就不管它内容怎么样，一味表示着愤懑和厌恶的态度而把它否认起来。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创始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就完全不同。比如，恩格斯批评着杜林说：“但是暴力在历史上，还有他的别的任务——革命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杜林氏不发一词，他以想惋沉痛的态度（注意，注意，布哈林註）而勉强的认定：为打倒榨取的经济关系，恐怕必须要利用暴力。他认为一切暴力的行使，都减低了行使者的人格，而对于这种事实，大发叹声。……。而这种毫无血气的传教者的思想，乃硬欲混入到负有历史使命的革命的党内来！”（恩格斯，“杜林氏科学的变革”163页）我们一见着考茨基对于“善性”及“人性”的考察，便不能回想到对于“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恩格斯的这一的明言。现在他们动不动就说些什么“人道”，什么“实现人道”，——正确的说来——鬼鬼崇崇的“实现人道”，对于财产关系，则不大开口，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的痛苦，劳动的组织化，团结力的养成（这是下次民众阶级抬头起来的必要前提条件，但必须要经过长久时日）等等，更默无一言。此外，对于实际的社会生活，……问题，他们更极没有涵养。他们那一派的一切著作的内容，都不过是如此。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思想之“绝对不偏不依”的努力和精神。而他们偏偏要命这种无聊的法宝，去革德国的命，去号召无产阶级，去唤起大众思想和行动的能力！这些“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战战兢兢的特性，也自然反映到关于国内的政党事情，马克思说：“这些老妈子的特性在那里呢：即在于蒙蔽实际的政党的斗争而注入一种麻醉剂。”这是不是“没有先入见的”“中立的”“独立不依的理论家”的一真正的模型么！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第237—239页

最慌谬的是，在现今国际联盟显然分裂，各国团结完全不稳之时，还有人倡“超帝国主义”之说。客观上，“超帝国主义”的宣传，是敌对不肯加入国际联盟的苏联的宣传，是敌对使帝国主义不能“平安地”施其剥削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宣传。即自名最“左”的澳洲社会民主党，也正在奔走呼号反对苏联与中国，确确实实的作一个破坏全盘和平者。这恰恰就是现在时期中“超帝国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即反苏联与中国，破坏和平）这个在实质上完全错误的理论，它的作用，仅是反革命派手中的武器，用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

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

新青年社1927年，第112—113页

我们断定，正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动摇，是表示资本主义的崩坏。然而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一派博学的无识的讲谤者，却认我们的这种断定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这种意见的发生，从理论上说来，是因为全然误认了生长在矛盾之中的辩证法的过程。世界战争，革命时代的开始等等，正是我们现在客观的“成熟”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所以发生了这样最大程度的冲突，实由于，不断的再生产起来，而不断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长着的矛盾，扩大到了极点的结果所致。资本主义的震动力量是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相当正确的指标，而同时又是一个悲哀的表征，表示：在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外表之下，生产力怎样的完全不能够再行增大。这正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创始者所再三预言过的崩坏。创始者的话，实没有错。而最可怜的是改良主义的幻想，梦想着：不必要破坏社会的平衡，不要经过流血的斗争，不要经过崩坏，而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第92—93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暂时的政制，在此专政时期，生产机关实际不是属于全社会，而仅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其国家的组织。这里，工人阶级，即是说大多数的人民，暂时垄断一切生产机关。所以那时还不完全算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里，还有社会阶级的分化，还有统治阶级（无产阶级），还由这新的阶级垄断一切生产机关，还有国家的权力（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敌人。但到旧时的资本家、地主、银行家、军官和教士的抗争一天一天的被镇压下去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经过任何革命，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镇压敌人的武器，而且是经济改造的工具。这个改造应该是改变生产机关的私有制为社会公有；这个改造应该“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关和交通机关。究竟谁去干这工作，谁应该去干这工作呢？这显然不是由个人去干，那怕他是由无产阶级出身。假如这工作是由个人，或进一步说由单独的团体去干，那末，做得好不过做到均产，做得坏就会变成单纯的抢劫了。所以，没收资产阶级财产显然应该由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干。而这有组织的力量就是专政的工人国家。

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 ），新青年社 1926年版，

76—77页

直到现在这个时候，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人谈及，没有人晓得如何去实行这种专政。俄国革命，已经指示出来专政的方法和形式，他的形式，就是劳农政府。

布哈林：“共产党底计划”（ ）汉口长江书店 1926年版，第36页

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托辣斯的一合成体，那么到了原则上要消除了这种可能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自然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就一般说来，必有人提出上述的一问题。即是，无产阶级国家，在成立的当初，在实行“掠夺者之掠夺”以前，为的要调节资本主义托辣斯的活动，为的要维持原形无缺的一切的“装置”，是否能够预先把这一收夺“合乎理的准备起来”现在就假定有这样的可能，但这已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本是以资本家国家为其前提条件之故。所以，即假定有那样的可能，这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之最高的表现，而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中间阶段。但是在事实上，这种假定，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假定，是建立在一个幻想的上面；无产阶级，不必破坏资本主义的处女膜，而能“占领”正个资本主义的机构，资本家诸公心愿诚服的服从无产阶级权力的指挥。所以，这一假定，是等于在原来就完全没有平衡的条件之下，而假定某一平衡。

社会主义的专政的体制，设若不怕与普遍的用法相混同，则我们可以呼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之辩证法的否定，是它的正反面。在这时候，根本的变更了生产关系的型式，消灭了资本在生产中的最高权力。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一切基础中之基础——所有关系，已经变化之故。在这时候，当然是有“具有反货殖主义的倾向的社会合理化”。然而这一性质，是建立在一全然不同的阶级关系的上面，因此，生产过程的正个性质也迥异于前。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中，经济主体，是资本家国家——集合的总体的资本家。反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经济的主体，则为无产阶级国家，综合的组织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生产过程，是资本家阶级所抓取的剩余价值之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兼带有变剩余价值为剩余生产物的倾向。反此，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生产过程，则成为有计划的满足社会慾望的手段。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寡头执政者对于大众榨取的最完全的型态。反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变集合的资本家财产及其私的资本家的形态为集合的无产阶级的“财产”，所以，使一切榨取，都陷于不可能的状态。因此，形式上虽则相同，然一考其本质，则极端的相反，而这一相反，也就规定了这两制度之一切机能——这在形式上虽然相同——的性质的对立。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 第180—183页

但是在达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有一阶级专政？为什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呢？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那个力量可以不断的领导全社会，而走入社会主义的路上去。

我在前面曾经讲过，在农工联合的战线中，要能够走到社会主义的路，指导的责任，一定是要归无产阶级负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掌握中央政府机关，也不是别的，只是由一个劳动群众负指导的意义的。

况且工人阶级虽然专政，他并不是要想永远的去掌握政权，永远的居于指导的地位。他之执政，是想一切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能够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于物质上，政治

上，知识上都能够超过于无产阶级的水平线。

只等到农民群众的情况改变了，他当然与无产阶级是接近的。并且是要与无产阶级合拢的；共同行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从此阶级的分别也就渐渐可以减轻，农民群众之与劳动群众也渐渐混合了，一阶级专政的事实也就渐渐的消灭。

.....

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就不如是了。他的目的，不是要把各阶级中彼此现有的分别使他永存，而是要行使人民的教育，去消灭阶级的特异之点。他们这种改造社会主义的方法，其基础在改革人民经济状况，使他们走到社会主义的路上去。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全力去教养人民，尤其是教养那些与他们共同去向资本家，大地主作战的忠实好友（人民中的农人）。因此，所以苏维埃政府建设的工业，工人阶级是要让农民与闻的。他们渐渐吸收了无党派的农民为苏维埃工作。又帮助农民去受教育，使他们发展并改革他们的天性。又使他们对于公共的事体得到必需的经验，了解国家的与地方的重要问题。把那些与农民阶级相隔绝的鸿沟，渐渐扫除干净。由这些受了教育的农民做媒介，新的农民团体就渐渐的发展，而求得一个新的生活。更得工人阶级的帮助，其结果所有的农民都与工人阶级混合了。凡是工人阶级的主张思想，农民也就是同意的。同时又用‘协作社’的方法，使农民的经济与工人的经济相合而成为一个唯一的社会主义之经济。更因事实的力量，而改变农民的生活；因改变生活渐渐于工人阶级和合，同为‘劳动者的社会’中的人，而无所谓阶级了。在起初农人阶级之与工人阶级，有其隔绝的鸿沟。工人是‘集合的劳动者’农民是‘不集合的劳动者’。等到‘协作社’渐渐发展了，农民阶级就到劳动阶级中来了。不过他虽然到劳动阶级来了。还只算得是劳动阶级中之落后的一个阶级。等到以后，协作社愈发展，农民阶级之与工人阶级也渐渐接近。愈接近愈亲密，其结果两个阶级的分别不见了。而这两个阶级，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之一个唯一的阶级。到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执政也就是要消灭的，也就是无用的。

布哈林：“社会主义之路”，（1925年8月）辛垦书店 1930年5月
版，第111—112，113—115页

共产主义不是过渡期中的一形态，而是过渡期完成后的形态。它是一个无产阶级无国家的构造。而这一构造的一切部分，都彻底的在互相调和着。在这里，才形成一绝对统一的有组织的“全体”。无产阶级专政，在其进展到共产主义的道途中，成熟起来，而同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死灭。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186页

当经济危机（疲惫的危机）的顶点，已经过去而富于行政能力的人才越发增加的时候，这时候，极端的军事的行政型式，便化如长物。这一型式，虽有许多长处，但这种强制纪律的形式，实具有某一种的大缺点。在需要迅速的及果断的行动的实情之上，这种形式，固是无条件的重要，在这种时候，它的长处，却能胜过它的短处。但是，一

到了它的使命完成之后，便应当有“展开的”行政制度的新局面，来代替它。这种新局面，绝不是从来经过的阶级的单纯的重演，而是过去两个阶级的综合。若照黑格尔的话说来，第一局面是正，第二是反，第三便是一更高级的统一形态的综合。不待言，在这里，发展过程绝不会停止。按照人们自身关系中的国家权利及强制手段的毁灭程度，于是共产主义的人类，渐次的创造“管理事物”的最高型式，在这时候，任何形式的全体动员或选拔个人的问题，也就消灭。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人们，决不会象现在的样，根据着枯燥无味的统计，来处理一切事务，而会利用自身自由的意志，来支配一切，因此人们的行政管理，也会永远的消灭。

布哈林：转形期经济学

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第207—208页